

第一章

从西柏坡到北平，毛泽东“进京赶考”。双清别墅“不速之客”不愿搬入中南海

古都新生

1949年开年。北平，瑞雪纷飞。古老的城墙如披玉甲，更有千树“梨花”竞相开放。这一天，在那道经历过无数封建王朝变迁的高大城门口外，浩浩荡荡开来了一支支整齐威武，军仪雄壮的大军。一块块的方队，一辆辆的战车，缓缓的穿过幽深而神秘的城门，出现在北平城的大街上。

北平欢腾了……

北平新生了……

手持小旗彩带的百姓，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参加庄严而隆重的人了解放军入城仪式，纵情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到处是欢迎的口号声浪，到处是喧天的锣鼓鞭炮，京城的人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指着手上一面粉红色的小旗对身边的老伴说：“记住这旗上写着的时间了吗？这可是咱们北平人最不能忘的日子呀——”

老伴眼里闪着喜悦的泪光，喃喃地连声说道：“放心吧，忘不了，忘不了的！”

是呀，这日子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更是刻在几百万北平市民心中的呀！它就是1949年1月31日。

同一天，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中央统战部行政处长周子健、统战部交际处第一处长申怕纯、统战部交际处第二处长金城等4人拿着周恩来副主席的手令，连夜坐卡车从西柏坡赶到北平，为党中央迁入北平打前站。

他们走后不久，周恩来一封电报赶在他们之前到了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手里。周恩来要求打前站的同志把中南海先接收下来。齐燕铭是蒙古族，办事如快刀斩乱麻，是个急性子。他没看完入城式，就和另外3位战友分头去接收中南海了。

中南海是傅作义的“剿匪”司令部。北平和平解放后，整个中南海2000余间房子只有勤政殿住着傅作义的一个连。他们像乌龟一样缩在勤政殿里，只有几盏孤灯发出微弱的光。

齐燕铭清华北军区程子华兵团派了一个连进驻中南海，他们让傅作义的连队放下武器走了。周子健是从北门走进中南海的。这个大门，后来成为国务院管理局的出入之处。

“这里还可以走进去吗？”周子健问看门人。

“早先，这里是公园，现在什么也不是了，但4个大门全畅通着呢。”

“太谢谢您了。”

周子健大步往里走，走了几步，这位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回头给了看门人一个灿烂的微笑。

就是这个微笑，深深铭刻在看门人的心里。

看门人叫夏友廉。后来他志愿给解放军服务，一干40多年。

那时，别看他看门，却关心时局变化。傅作义在中南海开会时，由夏师傅倒茶递水。有一次，夏师傅递毛巾给傅作义擦汗，发现傅作义一脸愁云，

他想，看傅作义这样子，没准儿北平还真打不起来呢。

瞧瞧不是，解放军都开进中南海了。

第一次来到中南海的齐燕铭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萧条破败的图景。太液池中尚未开化的冰块呈现一片黑紫色；没有树叶的各种杂树东扭西歪；枯叶和废纸遍地，似乎这里几十年前就没有人烟了。

紧接着，齐燕铭等开始布置清扫工作。这时，怀仁堂已经被定为政协会议的会场。正当他们为庞大的计划发愁时，华北军区派来了一支卡车队。于是，卡车队夜以继日地往城外拉太液池里的淤泥。

这些淤泥往少说也有百来年无人动过了。中南海被一团腥臭的空气笼罩着，污水呈不透明的灰黑状。

他们放干了污水。刚刚住进中南海的小伙子们抬来了电网，捕捞水中鲜活的各种食用鱼。

那些日子里，他们天天吃白水煮鱼，吃得直倒胃口。

太液池紫黑的底被大自然风干后，华北军区派了几百名壮实的士兵去挖淤泥。

整整三个月的辛劳。

当夏天的风驻足中南海时，那满池的碧波才真正有了太液的味道。

直到这时，那4位打前站的人才觉得累了。精神的力量确实了不起，这4位随卡车跳跃了40多小时的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进了城，没有休息一分钟，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似乎那一身的疲惫已经成了习惯。

齐燕铭抓总，周子健等3人跑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忙完了1949年的春天。以后，也还是忙，一直忙碌完10月1日，没有休息过一天。

轻骑急驰西柏坡

这是1948年8月3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各骑一匹马，赶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进得屋来，只见正中放着一张高脚八仙桌，四面摆着长凳。毛主席迎门而坐，左首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右首是少奇和弼时同志。毛主席身后的角上，是一个权作茶几的矮桌，上面放着暖壶和几只战士用的那种搪瓷缸，充满了农家气息。”

杨成武坐在毛泽东对面的长凳上。

毛泽东首先给他们看了两份电报，即1948年7月23日、30日中央军委先后致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第一份电报的核心是命令东北野战军8日开始南线作战，打范汉杰集团，这就是名垂青史的辽沈战役的开端。

第二份电报是指示先打范汉杰集团，然后打北平、承德、张家口一线的傅作义集团。

杨成武明白了，他的新任务肯定是与傅作义打交道。

毛泽东任命杨成武为新组建的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下令第三兵团进军绥远，把傅作义的主力拉住在平绥线，使他们的兵力出不了关、少出关，以保证东北军的作战胜利。

毛泽东说：“绥远是傅作义的老巢，他们在那里经营了20多年。傅作义

一辈子经营两个兵团：孙兰峰兵团、董其武兵团，一辈子经营绥远，搞了些小恩小惠，群众对他有幻想。他又在群众中进行了像我们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坚壁清野。成武啊，你们到绥远，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毛泽东稍事思忖，转向周恩来说：“恩来，你交代薄一波，给他们10万现洋，让他们背着，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现在不比以前了，别让咱们的战士像叫花子那样穷。”

杨成武担心：10万现洋得多少人挑啊，怎么带得动！朱德笑了：“我们部队里怎么都是成武这样的‘傻瓜’！你可以用红军时期的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化整为零，没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自日本投降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胜利在望，重新聚首，自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

这次会议，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五百万”，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5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上来。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近200个旅，是蒋介石总兵力500个旅的2/5。今后按每年消灭100个旅左右计算，再有3年，歼敌300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

这位开创新时代的伟人，没有沉溺在胜利的凯歌声中，他指出妨碍打倒国民党的四个困难：第一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是天灾，即他在中共“七大”上说过的，大旱三年，赤地千里；第三是军事发展不顺利，战争延长，明年打不过长江，只能在江北打；第四是李宗仁等出来“组阁”另立政府，“搞个曲折”。

按照这种设计，5年或者更短、更长的时间之后，彻底推翻了国民党，那么，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

当时，毛泽东对和平解放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抱以很大的热情。因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不仅能迅速瓦解蒋介石政权，保护大量的工商企业，为建国后进行经济建设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他害怕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他曾说过，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会议期间，毛泽东找到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迟疑了一会，说：“恐怕不太容易。”

毛泽东急切地问：“阎锡山有何顾虑？”

徐向前说：“恐怕不是顾虑问题。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阎。结果他

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徐向前见毛泽东的脸色阴沉下来，赶紧补充说：“我们立足于打，但也不放松争取、瓦解工作，尽量减少麻烦。”

毛泽东缓缓地点了点头，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毛泽东迫切地希望和平解放北平，其中中共政权意欲定都北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49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天，就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烟，自己也吸了一支，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沉思了片刻：“是不是定在北平？”

“嗯，谈谈你的理由。”

“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

“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笑着，不住地点头。事实上，王稼祥的看法和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傅作义做了件大好事

辽沈战役后，天津解放，北平20万傅作义部守军犹如瓮中之鳖，陷入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共中央派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参加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古老的北平和她的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完整地保存，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22日，傅作义、邓主珊等飞赴石家庄，在石家庄机场上，傅作义的恐慌表情，给专程来陪同他们前往西柏坡的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穿着极普通的布衣，手里提着10条香烟，说是送给毛主席的，后来见杨尚昆吸烟吸得很凶，便非要送他两条不可。杨尚昆笑着谢绝了，傅作义不好意思地把香烟又收了起来。

下午2时，这行客人乘美式吉普到达了西柏坡招待所。傅作义对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周恩来恭敬备至，并一再表示歉意。周恩来亲切地拉着傅作义的手说：“傅将军，你是俊杰呵，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比蒋介石先生聪明多了，蒋介石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你却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北平的和平解放，你立了一大功。原来我们准备在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就可以去北平开会，你也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你既是有党派的，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就更具有代表性了！……”

傅作义被周恩来的这席话感动了，久久地低下头，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

这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的5位书记几乎天天都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每晚8点左右开始，到凌晨三、四点散会，因此毛泽东的起床时间一般都在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周恩来告诉他傅作义已经来到西柏坡，他马上穿

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到西柏坡招待所。

傅作义见毛泽东走来，连忙大步向前，伸出双手，毛泽东没想到傅作义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毛泽东说：“谢谢你，北平和平解放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你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假如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的，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下来说，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完整。”

“傅将军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决，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整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和其他人一样看待，绝不歧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的战士，大部分是国民党那里来的兵，连我们的朱总司令，还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高级将领，过去也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而且是很有名的。我想，这主要是思想问题、立场问题，思想和立场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嘛。”

毛泽东讲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再摆开战场，相互杀戮，把紫禁城毁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骂我们才怪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指指傅作义，又指指自己，“这个罪名，你傅作义得背着，我毛泽东也得背着，现在好啦，北平和平解放了。”

这时候，周恩来劝大家喝点茶，傅作义利用这个间隙，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毛泽东说：“傅将军，我想听听你将来愿意做些什么工作？”

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方面的事。”

毛泽东好奇地问：“军事上你是很有才干的，我还真没想到傅将军对水利工作也感兴趣？”

傅作义说：“我对水利一直有特别的兴趣，过去是身不由己呀。”

毛泽东急忙摇头摆手：“那不行，那黄河河套的工作太小了，给你是大材小用嘛，那样的话，蒋介石也会感到委屈的，你过去是他的堂堂大将军么！我看哪——”毛泽东回头看看周恩来和朱德，又转过头来看着傅作义，“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

周恩来和朱德都笑着点头，说：“好哇！”

“军队上的事，你也别全抛给我们。我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觉得咱们谈得来，能合作共事。你将来不一定去军队做具体的工作，我们可以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的行动和建设，我相信，你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毛泽东没有食言。共和国诞生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不仅当上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而且还是国防委员会委员。

“进京赶考”

3月24日上午10时，卫士长李银桥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埋怨李银桥：“我昨天要你9点叫醒我，为什么现在才叫？”李银桥说：“是周副主席的意思，怕您休息不好，路上太疲劳。”

这天，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思想的毛泽东，实现了他的夙愿，要大踏

步地前进，到北平去！

午饭后，十几辆旧式军用吉普车，一长溜儿停在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这些美国人制造的马力强大而吼声震耳的战场指挥车，都是前方将士浴血厮杀缴来的战利品。司机和保卫人员早已整装待命，站在汽车的旁边。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等人，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汽车队走来，看上去，这些中共最高层的领袖们精神格外的好，满面红光。

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走啦，咱们这是进京赶考！”他把进城比喻为“赶考”，这个比喻具有很深的意味。

周恩来说：“我们都要考及格，可不要退回来呀。”

毛泽东非常自信，一挥手：“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然后，十几位中央首长各乘一辆吉普车，告别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向北平方向驶去。

毛泽东随身带的行李十分简单。这位嗜书的领袖带的除了《辞海》、《辞源》等工具书外，就是正在阅读的《史记》、《资治通鉴》。

其他领导人搬走的行李却十分有趣。

建国后，西柏坡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去北京征集到大量文献资料和革命文物，其中朱德的金属桌椅，董必武的拐杖，都是战利品。

朱德的金属桌椅原来共有5件，除桌子外还有4把椅子。当年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朱德前往部队讲话，陈毅就把缴获的张灵甫的这套桌椅送给他留念。

董必武的红木拐杖非常讲究，上面白银镶嵌篆书寿字4行，每行25字，共100个寿字，故名“百寿杖”。上面还写着“岳父大人六十秋荣庆，婿宋席儒叩贺于鲁维军次”的字样。这是国民党将领宋席儒给其岳父60寿辰的贺礼，淮海战役后，中央办公行政处副处长赖祖烈到前方检查财政时带回西柏坡的。当时董老患肺病，行动不便，赖祖烈便把这拐杖送给了董必武同志。

任弼时随身带往北平的行李中，有一只普通的帆布皮箱，这个箱子，是1938年党中央派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用来存放重要文件和书稿的。1977年6月，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把它赠给了西柏坡纪念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毛泽东等先坐汽车到涿县，再从涿县坐火车直达北平清华园。

叶剑英专门到涿县来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北平的情况。

他说，北平的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照常，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不是和平解放，北平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不管怎么样，和平解放北平，这是给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一个大奇迹。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国都、大城市或重要阵地，不是攻打不下被迫退兵，就是强行攻占，将敌人消灭，有条件的和平解放，在战史上几乎是没的。叶剑英一口气说了很多。

是啊，战史上见不到，咱们今天就见到了，这是傅作义将军的功劳，他带了一个好头，毛泽东笑着说，今后，南京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军队，还可能这样做。凡是要求和平解放的地方政府和军队，我们都欢迎。因为这样做，对国家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有好处。

叶剑英说，北平和平解放时，不少人向傅作义表示祝贺。不少民主人士

也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

毛泽东说，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叶剑英又讲了北平和平解放后，工厂照样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北平的政权机关和官办机构，都派了军官和接管人员。社会秩序很好，也没有发生骚乱。过去那些社会流氓也没有敢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现在还没有公开进行破坏，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时机不到。

毛泽东说，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照常，这就好了。要对参加军事管制的人讲清楚，我们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能管理好大城市。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要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当前来说非常重要。

毛泽东在进入北平的当天下午，就驱车去西苑机场检阅参加平津战役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他穿着一件旧大衣，戴着一顶旧棉帽，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深情地望着排排大炮、装甲车。他也许在心里想，南京不久就会是我们的了。

傅作义也来了。他没有像去西柏坡那样身着军装，而是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一顶礼帽，把两手交叉在胸前，跟毛泽东单独聊了一会儿。

毛泽东袖着两手，又一次对傅作义保护了千年古都而代表人民向他表示衷心地感谢。

后来，毛泽东邀傅作义在会议休息时去天坛游览，高兴地对他说，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呢！

毛泽东夜宿颐和园

毛泽东等进京后的第一个休息地方是颐和园。

这天早晨，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来电话，要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林溪马上到他那里去，说有要事。

柳林溪赶到市政府，见到薛子正，还没有来得及问明白有什么事，他就对柳说：“介绍信已开好，你拿着信乘我的车，马上赶到社会部找李克农部长报到。具体任务，李部长会向你交待的。”

在社会部，李克农看完信后，望着柳，他那张非常严肃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无法掩饰的喜悦。他说：“今晚10点钟左右，党中央毛主席从平山县西柏坡来北平，要在颐和园景福阁休息。你在东大门等候，负责接待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休息。”

“保证完成任务！”柳林溪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站起来答道。

晚10点多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颐和园。

第一辆车坐的是毛泽东，柳林溪忙上前迎接。毛泽东下车后，亲切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颐和园的负责人？”柳林溪激动地答道：“我叫柳林溪，是负责人。”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相继下车了，毛泽东一挥手，说：“走吧！”柳林溪领着他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景福阁。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毛泽东就握着柳林溪的手，问道：“你认识我吗？”“认识。”柳林溪说。

早在1943年，柳在延安先后在行政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学习，多次聆听毛

泽东的报告。为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纺过线、开过荒，在瓦窑堡搞过农场，种烟叶、种甜菜、制过糖。柳林溪简单地将延安几年的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风趣地说：“噢，是你熬的糖，我还吃过你熬的糖呢！”

毛泽东的几句话，使柳林溪本来有些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柳林溪想，主席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于是他主动告辞，离开了景福阁。

夜 12 点多钟时，毛泽东打电话来，要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这次，他详细地询问了颐和园的情况。

毛泽东关切地问：“接管了多少旧职员，多少工人？有没有太监？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有困难没有？”

柳林溪将颐和园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们接收旧职员 20 多人，工人 30 多人，没有太监。他们大多是年岁大的，青年人很少，生活比较贫苦。北平被包围时，全园职工连工资都领不到了。当时，就要过春节了，职工无法生活，更无法过年啦。我们进城接管后，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市政府。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工资，让大家过年。毛泽东非常关心职工生活，听到这里，赞许地说：“那很好。”接着又说：“对原有职工的生活，我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不要解雇，原薪是多少，还发多少。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如果那样就不好了。”

柳林溪回答说：“我们就是按原薪发的。”

听到已经这么做了，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还对公园管理和园林建设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过去我们在山沟里打游击有经验，进了大城市搞公园就不行了。没有经验，要向老工人学习嘛，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先把原有的公园管好。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劳动人民一没有钱，二是没有时间逛公园。我们今后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在劳动之余，有时间在公园休息娱乐，恢复疲劳，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

这一夜，他们谈得很晚才休息。

双清别墅的“不速之客”

双清别墅是香山公园的名胜之一，座落在古老的香山寺下。由于这里曾有两股清泉从院子西面高坡上的山石中翻滚而出，水极晶莹，清代乾隆在山泉旁的石崖上题了“双清”二字，由此得名。1917 年直隶（今河北省）水灾，督办熊希龄在香山创办慈幼院，在此修了一座别墅，称为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淡雅幽静，院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冽的泉水汇聚一池，清澈涟漪。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施教，秀丽非凡。人们在此，春日赏花，酷夏避暑，秋观红叶，严冬踏雪。由于这里景色美，被称为香山之“园中园”。

那是 1949 年 3 月 25 日，春天刚刚降临到香山脚下，双清别墅的幽静被一批“不速之客”打破了。来的是身穿棉大衣、中山装，55 周岁的毛泽东和他的随员。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时正值中国人民革命处于伟大的转折时期。他来到香

山之后，4月4日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文章。4月21日又在这里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这里指挥了我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4月23日，我军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在这振奋人心的时刻，毛泽东坐在双清别墅的六角亭下，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光辉诗篇，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这一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还在双清别墅积极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这里起草了《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党成立28周年前夕，6月30日毛泽东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光辉的历史文献。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工作期间，还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许多评论，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在这里举行重要会议，研究讨论建国的方针大计。毛泽东还曾在这里会见过许多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及爱国人士等。

“香山事件”

毛泽东等住到香山不久，曾发生过傅作义留下的警卫团的两个营冲击香山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事件。这件事在当时没有见诸报端，后来也没有被人提起。直到42年以后，舒云的《开国纪事》出版，人们才知晓这件曾经被历史遗忘的小事。

根据舒云的披露，当时中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尽管保密，人们还是猜出了山上住的是毛泽东。原因是歪打正着碰上的。

“劳动大学”被老乡简称为“劳大”，这两个字从京油子嘴里说出来就成了“老大”。

这一天，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在吃饭，周恩来急匆匆赶来，开门见山地说：

“赶快调一支部队去执行任务。”

聂荣臻有些纳闷儿，今天怎么回事？这位老战友连门坎也来不及迈过，站在走廊台阶上就叫起来了。要是往常，周恩来总少不了打趣几句。

周恩来三言两语说明了来龙去脉。聂荣臻也急了。

他有点埋怨傅作义。尊重他的意见，给他留下整整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他。这倒好，到香山“劳动大学”示威去了。

聂荣臻对站在台阶下的作训处长唐永健说：“你带一个团去办，动作要快。”

唐永健坐上辆越野吉普，带着警卫北平独立某师一团士兵悄悄包围了闹事官兵的营院。傅作义的加强团住在翠微路的兵营里。

这个特意留下的加强团中只有一个营没参加冲击香山。而闹事者认为他们没犯什么错误，还和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3月的黄昏很短暂，仿佛一眨眼，四周已经披上了褐黑色的轻纱。独立师的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院外制高点。

唐永健驱车直往院子里开。

院门卫兵没多加盘问，任其自由进入。院中士兵已经吃过晚饭，一片和

平景象。

唐永健在进来之前已经命令部队待命准备战斗。

就是这些看来和平的士兵中，有两个营屡次冲击香山。

警卫香山的部队是从延安起就担任中央警卫的一个师。这个师后来抽了一个团组建了中央警卫一团，也就是人们熟悉的 8341 部队。这个师的官兵个个是神枪手。傅作义的两个营士兵冲击香山时没有带枪，叫警卫战士连劝带吓给请走了。

唐永健走进指挥所，找来我方的同志，告诉他们：“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去分头做做工作，让他们放下武器，我们握手言和，否则不客气。”

唐永健说：“你们明确告诉他们，就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这座兵营，除了把武器交出来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放下武器时，摔摔打打，解放军可要使用武力的。”

几位党代表分头去做工作。3 小时后，他们同意放下武器。

交接武器的仪式立即开始。傅作义留下的最后一支部队，使用的全是在围城时美国空投下来的崭新卡宾枪。

官兵们被叫了起来，他们迷迷糊糊地抓起枪和子弹袋，堆在地中间。然后，又横七竖八地去做没有做完的梦了。

唐永健从值班参谋那里问清了他们团指挥官的住址，驱车进城。三位官员并不知道此刻他们已经成了光杆司令。

唐永健又跑到六部口，找到卫戍区纠察总队的参谋长李青川。李青川一听有人要冲击党中央所在地，当即要去抓人。于是，加强团的三个主要军官被“请”进了拘留所。这一夜，没有浪费一粒子弹。

唐永健返回庆王府时，已是凌晨了。

周恩来几次来电话询问。聂荣臻也很着急。

“司令员，睡了吗？”唐永健绕到窗户跟前，敲了两下窗棂。

“呵，情况怎么样？”聂荣臻并没有睡着。

“都解决了。我拐回来又把团长抓起来了。”

“恩来同志叫你抓了吗？”

“他没说。我觉得应该抓。”聂荣臻没有再说话。

唐永健想：擅自抓人，尤其是抓傅作义的人，抓错了可是要犯政策错误。得问问周恩来去。

周恩来说：“抓得好，这样我们就更主动了。”

收缴傅作义最后一个团的武器一事，周恩来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武力解决，以免后患。

第二天一大早，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也知道了缴枪事件。他找到作训处，叫他们顺便把他那里的一个半连的傅家兵的武器也收掉。

整个“香山事件”圆满解决，但是，有一件事疏忽了，万一出事，那可不得了。40 多年后，唐永健说出来还有些后怕。

虽然那晚上缴了一团士兵的枪，但没有把他们分散处理，幸亏士兵们忙于睡觉，否则，一个团的士兵满北平疯跑，那会给本来就动荡的北平增加多少不安定的因素呵。

那一夜寂静无声，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傅作义获悉他的一个加强团几乎全被缴械，只剩下不多的部队，于是大发脾气，气呼呼地敲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房门，拍桌子大叫。

叶剑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好言劝走了这位有大功的将军。上午 10 点，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找到华北军区。

聂荣臻叫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和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一起接待这位不速之客。

“傅将军说，你们共产党人不讲信义，过河拆桥。”王克俊一脸怒气。

“你先别急，咱们慢慢谈。”蔡树藩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说。

“枪都下了，还有什么可谈的！”王克俊从椅子上蹦起来。

“傅先生几十万军队都交出来了，决不会在乎一个团一个营，他为保护古都立了大功，我们决不会亏待他，这你放心。”

“傅先生留下全副武装的部队，无非是保证他自己的安全。”

“对呀，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卸掉警卫部队的枪？”王克俊愤愤然，“这样，安全有什么保证？”

“说句实话，要保证傅先生的安全，我们比你们顾虑还大。”唐永健说。

“我们更怕蒋介石来暗杀他，然后再满世界造谣说共产党请他起义是骗局，是不是这样呢？”王克俊无话可说。

“退一步说，你能保证目前留下的 4 个大排中没有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去暗杀傅先生的人吗？”唐永健问。

“呵，我没这个把握。”王克俊的口气软下来了。

“我们也不为难傅先生。你回去，挑三五十最可靠的士兵，要那种给钱也买不走的，其余的全部把武器收上来，如何？”

王克俊铁青的脸色淡了一些，脑袋动了动，说不上是摇头还是点头。

后来，傅作义听了王克俊的汇报，怒气退了一半。他亲自挑选了 35 名贴身卫士，每人 3 件长短武器：卡宾枪、驳壳枪和左轮枪。

冲击香山的事傅作义不知道。

但是，他的部下的不满情绪他是知道的。就是他自己，何尝又没有一点怨气呢！

同一天，19 兵团派了两个师级干部去接收这座卸去武装的兵营。

以后，“香山事件”中的那两个营，交给了华北补训兵团，拆散了重新组合。

而没去闹事的另一个营的军官，有一部分被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学习完后提升了职务。

至于那几个被抓起来的团座，很快恢复了自由。

新政协第一份邀请名单

初夏的中南海，一片喜气洋洋，沐浴着晚霞的余辉。

由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949 年 6 月 16 日在中南海举行。晚 8 时，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林伯渠、沈雁冰、郭沫若、张奚若、陈嘉庚、蔡畅、李立三、蔡廷锴、章伯钧、陈叔通、黄炎培、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等陆续来到。张澜因故未能出席，特派刘王立明代表出席。

说到新政协会议，人们必然要联系到旧政协会议……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 8 年浴血奋战，付出了 2100 余万军民伤亡、1000 亿美元财产损失和

战争消耗，终于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这种时刻，蒋介石对发动内战还有所顾忌，他迫不得已向延安接连发出3次电报，邀请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28日晚，毛泽东以惊人的魄力和勇气，从延安乘专机飞赴重庆，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历时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历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这次谈判中有项重要成果，就是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的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历史学家一般简称之为“旧政协”。

3个月后，即1946年1月10日，旧政协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5项协议。会后，在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蒋介石的一些亲信大哭大闹，说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沮丧地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将来再说”是一个伏笔。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11月15日就撕毁“宪草”，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和谈由此破裂。

1947年下半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一年多时间里，歼灭了150多万国民党军队，收复和解放了164座城市。军事上的胜利，解放区土改的深入，以及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沈钧儒两先生。电文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会议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时间拟在“今年秋季”。

中共中央邀请人士，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章乃器、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等29位著名民主人士。

这是中共中央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开出的第一份正式邀请名单。

香港秘密“来客”

1948年8月初，中共中央派钱之光秘密潜入香港，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一起，负责对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交通保障工作。

潘汉年当时的化名叫“小开”（上海话意为小老板），连贯的化名叫“连叔”，俩人授命罗培元直接负责。

罗培元按“小开”提供的门牌号码，依次到准备北上开会的民主人士家里，取走了他们的随身行李，运到维多利亚海湾的小码头，和小船的老板谈好价钱后，正准备将行李装船，冷不防，一个香港巡警出现在他们面前。

身材高大的巡警冷眼盯着罗培元，从头到脚地审视着他，用警棍敲敲行李包，冷笑着说：“来头不小呵！”

罗培元想起“小开”嘱咐他的话，“这件事无事是小事，有事就是大事”，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巡警掏出一个小本本给罗培元看，还未等看清楚那上面有什么规定，巡警又倏然抽了回去。这个细小的动作，使罗培元悬起的心放了下来：巡警要敲竹杠。

巡警打着官腔说：“你已经触犯了香港的法律，按规定应该带你去差馆接受审查，不过也可以罚款代之。”

罗培元翻遍了口袋，只有大约30元，巡警见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收下钱，背剪双手走开了。

罗培元从维多利亚海湾回来，正向连贯汇报，门铃响了，走进5个人来。连叔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招呼大家上桌就餐。连叔抱拳说：“各位，今天咱们就不喝酒了，权当我小气罢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喝酒是会误大事的。

饭后，几位先生进了客厅，连叔则在厅门外一言不发，猛抽“三炮台”香烟。看得出来，这位中共在香港的重要负责人，心中很紧张。

过了一会，客厅的门开了，走出一群“陌生人”，那位有军人气质的高个子最引人注目，他已改装成一副苦力的打扮：一身颜色褪成荔枝黄的拷绸裤褂，头顶破毡帽，脚著旧布鞋。到这时，连叔手下的人员才知道，他就是原淞沪抗日名将、19路军副总指挥、大名鼎鼎的蔡廷锴将军。另外4位，是大律师、著名“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先生，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农工民主党执委会主席章伯钧，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常委谭平山和王绍鏊先生。

高大的谭平山和矮小的沈钧儒都留着大胡子，都把大胡子藏进了衣领内；而章伯钧、王绍鏊则穿着长袍，雍容阔绰，一副富商的模样。

见大家哄堂大笑，沈老便认真地问：“打扮得像不像？”

连叔静静地答道：“不抓到你们就像，抓到了，就不像。”大家一个个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情。

又是罗培元提前赶到海边，拣那些由妇女掌舵的小船雇好后，等他们一到，立即开船，在海上行驶半个小时后，这行人登上了大船，抬头一看，是一艘苏联的货轮，他们才高声谈笑起来。

苏联朋友把他们安排进舱内客厅，罗培元的使命完成了，心里顿觉轻松，向大家告别，走向舷梯。这时蔡廷锴将军匆匆赶上来，拉住罗培元的手轻声耳语道：“你回去后，一定给你宗妹（蔡将军的夫人罗西欧女士）打个电话，告我平安。”罗培元笑了。按连叔交给的任务，罗培元不仅力各位先生家中报平安，还把他们的衣服、鞋子等一一送还各家。

用这种化妆的方法，罗培元后来又奉命送走了大诗人郭沫若和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先生。

两个月后，罗培元的身分暴露，住所被搜，他已不能继续留港工作，便被调往粤湘赣地区打游击去了。

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沈钧儒、蔡廷锴等抵达哈尔滨。

在此稍前的时候，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及吴羹梅的代表何惧已经抵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这里是中共统战部的招待所。

11月5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华南分局，请他们邀请尚在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择机北上。

11月25日，东北局领导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各党派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冯玉祥夫人）等会谈，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如下共同协议：

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计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

筹备会一般的决议，经多数通过，全体负责施行；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有不同意见时，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同时还规定，“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

这份文件，仍将新政协筹备会的会议地点设在哈尔滨。

周恩来改添“启事”（草案）

7月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叶剑英主持的政协筹备会议第6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等方案）第一次会议议定，由其本人负责召集翦伯赞、蔡畅、李立三、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组成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由郭沫若负责，组成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为成员的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会议建议，上述两个委员会除由第6组成员参加外，还要请一些学识渊博的专家为委员，委托郭沫若、沈雁冰提出初步名单由常委会作出最后决定。而且要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国歌词谱启事，并定于8月20日为征求截止日期。会上推举郭沫若、沈雁冰和郑振铎立即起草文件交会上讨论修改后提交常委会通过，没有由秘书起草。

这天，周恩来召集新政协筹备会的党组干事开会，进行了责任分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工作；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工作；董必武、陈绍禹负责政法工作；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工作；胡乔木、徐冰、周扬、钱俊瑞、廖承志负责文教工作；李立三、蔡畅、冯文彬负责工青妇工作；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

进行责任分工，已是迫在眉睫的事。因为毛泽东指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迅速”二字，表明毛泽东已决心不再坐视时局的发展，立刻就要解缆远航，将载有4亿中国人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这艘巨轮，驶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会后，新政协筹备会临时主席周恩来又与秘书长等人一起敲定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的代表名额分配。中共中央曾电示以上各局，在推选代表时，应包括工、农、妇、文化、财经、民主人士和私营工商业家等。当讨论到农民代表时，周恩来说：“农民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贡献很大，这样吧，西北2名，华北4名加候补1名，然后华中3名，东北3名，让这些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乡代表们，都来瞧瞧咱们这改天换地的伟大时刻！”

晚上，周恩来要中共中央统战部电示香港的乔木（乔冠华），邀请并设

法帮助在广西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李任仁、在云南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杨杰经港来京，参加这次描绘中国未来前景的新政协会议，并要尽最大的努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周恩来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杨杰将军于1949年9月19日由云南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途中，因叛徒出卖，在香港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周恩来回到寓所已是凌晨，办公桌上的案卷，第一页就是那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的清样。

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

本筹备会为征求新中国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特制定条例如下：

一、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赤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二、国徽：应注意：（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三、国歌：（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毛泽东思想（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四、应征国旗国徽图案者须附详细之文字说明。

五、截止日期，八月十日

六、收件地点：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转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七月 日

草案全文仅200余字，周恩来改动、增添达14处，仅标点符号就改动了8处，在第一条（丁）项中，他把“色彩以赤色为主”的“赤”改成了“红”；第三条歌词应注意的“毛泽东思想”改为“新民主主义”；截止日期推到8月20日，收件地点改为“北平本会转”。

最后，他又在“七月”与“日”之间郑重填上“十”。

这一天——1949年7月10日，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只差3个月又少9天！

8月5日下午3时，第6小组在北京饭店7楼大厅由马叙伦主持第二次会议，初步议定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顾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恩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4位专家为顾问。为了便于协调这项工作，请马叙伦参加两个初选委员会。

经过约半个月筹备，第6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8月22日上午10时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次，增加了一名列席者——画家吴作人。在一部分应征的来稿中，大家初步选定国旗16幅、国徽4幅交全组再次审选。在紧张筹备的日子里，截至9月14日，第6组先后召开了4次会议以及若干次座谈会。为了供各位委员选阅应征来稿，还在北京饭店设立了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稿件集中陈列。

自登报征求来稿后，社会上反响强烈，仅一个月内便收到数以千计的设计稿件。其中，国旗 1902 件，图案 2992 件；国徽 112 件，图案 900 件；国歌 633 件，歌词 694 件。应征者遍及国内外，前三名首推东北（435 件）、北平（411 件）、上海（391 件）。另外，香港、美洲、马来西亚、澳门、朝鲜、印尼等地也先后寄来了很多应征稿件。

来稿者中，既有以文言文写作的老先生，也有工人、农民，还有机关干部，同时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自由职业者，还有解放军战士、海外华侨。甚至连小学生也以稚嫩的字迹写来了意见稿。这充分说明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拥护，对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异常关心，翘首以待。

毛泽东不愿意搬进中南海

中南海的红墙内，在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是一座楠木大门。大门上方横挂着一块匾，上面刻着三个大字“丰泽园”，棕黑漆底托出金色的欧体汉字，显得圆浑清秀。在这块横匾上方正中有一块大方印印迹，大概是乾隆皇帝的御印。这样的字体风格在北京到处可以看到，但它并不是乾隆的御笔，而是他人代笔，以示乾隆的风流。

毛泽东原保健医生王鹤滨在《紫云轩主人》一书中，曾将“丰泽园”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联在一起，颇有趣味。毛泽东，字润之。“泽”和“润”二字是同义，古人早有“泽润生民”的治国之道。毛泽东的名字非常含蓄而深邃地表述了他的志愿和奋斗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宗旨，这与他曾经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可能就是“泽润生民”的发展。

丰泽园是一所古代的大建筑群。在丰泽园的大院内，被小的院落分割成一些较小的建筑群，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有名称，都挂有匾额。

中共中央迁址北平后，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搬进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古代建筑之中。这一年毛泽东 56 岁，这个农民的儿子，如果一直在他出生的湖南省韶山生活的话，他应该是一位子孙满堂，开始靠晚辈的供应的老年人了；可他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他是年轻的。年轻与年老，永远是相对的。

毛泽东身高 1.8 米多，身长手长臂长腿长，连眉毛也厚宽像韭菜叶，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是一副典型的帝王相。

深沉的面庞上是中分的黑发，纤细的双手，直射对方内心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下颏上的黑痣在没有皱纹的宽阔的脸上尤其突出。“这是典型的中国人”，一位熟悉他和其他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缅甸人这样评价毛泽东。

一位美国传记作家怀着敬畏的心情称毛泽东“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可以同时思考 6 件事情的人物”，“像绷紧的铁丝一样单纯，又像猫一样敏感。”

凭借他过人的智慧和超人的强健体魄，毛泽东走出韶山冲，靠着他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与对中国实际的透彻了解，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情况的革命方略，战胜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率领党和军队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在中国这块古老而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

关于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居住的经过，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舒云在《开国纪事》中这样披露：

国庆大典以前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劳动，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经焕然一新，于是，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迁入中南海。

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叶剑英专门跑到香山上的双清别墅去催他的报告。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毛泽东等叶剑英走了，很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含笑而言。他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好直接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头。

“不谈就不谈。”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它是慈禧太后独揽国家大权的地方，也是光绪皇帝因变法维新被囚禁的地方。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占据这里为大总统府，并在这里筹划复辟称帝阴谋。

进城之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一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讲了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

周恩来希望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主要考虑安全，四周的红泥高墙是天然的屏障。

“毛泽东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周恩来对坐在一边的朱德总司令说。

朱德表示赞同。

党中央终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搬进了中南海。

另一种说法出自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中央机关在香山期间，只有周恩来一人几乎每日进城办公，与各方联系，指导工作，处理问题，刘少奇一进京就离开中央去天津参观访问，拜亲会友，忙做一团，朱德总司令忙于参观、游览、访问、谈话。任弼时由于病魔缠身，不多出门活动。

这时，毛主席由于每天要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同时还要指导筹备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的工作，所以住在香山，工作很不方便。6月，他决定离开香山双清进城办公。进城后，歇息在中南海丰泽园一个小院的平房里。政协筹备会安排就绪后，同志们鉴于敌机经常骚扰，建议毛主席仍回香山去，那里比较安全、宁静。但毛主席不同意，说他不回香山去，而且就要住在他当时休息的地方，不再搬迁。这样，丰泽园就成了他办公、住宿、开会与接见来宾的地方。

也许毛泽东不愿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大兴土木为党中央建筑办公地址，最后，他搬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被安排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这里曾是周恩来进京后的临时居处，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周恩来比较各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综合条件好些，便请毛泽东住进，自己搬到西花厅。

有幸走进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房子的人都知道，这里只是一个过厅，穿过它去才是一所院落。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菊香书屋改成“菊香书院”更为合适。

在菊香书屋的过厅中，南、北墙山上有痕迹表明，它原来是与南、北的西厢房相通的，因为在南、北的山墙上尚留有被堵上的、相对称的门的轮廓。被堵上的北侧的两间房屋正是毛泽东书室的一部分。如果将被堵起来的北侧门打开，在书室里再放上几盘菊花，那么“菊香书屋”之称，就名副其实了。

通过菊香书屋过厅走到院内，可以看出这院子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的结构，是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五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间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东侧的两间是通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成东西向的长方形。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在本院的南房。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是毛泽东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一墙之隔了。这个小院内有个简易的防空洞，是进驻后由卫士挖的，毛泽东从来未使用过。这里的杂草丛生，只有在防疫搞卫生时才清除一次。这样，过厅的北门也就不开了。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五间。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洗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去南院，北可去菊香书屋的院落。西侧的两间毛泽东的女儿曾住过（长大了以后），这南房实际上也是北房，因为穿过它的过厅出南门又是一个院子，工作人员称它为南院，这样菊香书屋的南房就成了南院的北房了，因为这所房屋的南、北门窗是一样大小、一样格式相对称的。

东厢房也是五间。中间的一间是过厅，靠北侧的两间是通着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与过厅相通。靠南侧的两间不与过厅相通，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开在东厢房东面的夹道内。这里是贮藏室，若去这贮藏室，需要走出菊香书屋这所院子。

西厢房也是五间。挂“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是西厢房中间的一间房子，南北两侧的两间房都不与这过厅相通。北侧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一部分。过厅南侧的两间，至今没人披露它到底作何用途。

北房外面的东头有个夹道。夹道西侧的房屋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海西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时，常从这个小便门出入。夹道的西侧北头也有一个便门与另一群建筑相通，去贮藏室时就从这个便门出入。从西便门走出去，经过弯弯曲曲的夹道就是南海北岸上的马路了。

毛泽东很少从此门出入，它常常是警卫人员进出的地方。厨师运粮运菜大都经过此门出入，有时也利用北侧的便门。

南房的东头外侧也有一个夹道，它通往南院，这是毛泽东的孩子们及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的通道。这条夹道比较忙，因为工作人员常与他的孩子们打交道，毛泽东的孩子们也常经此到菊香书屋院内来，找毛泽东，

找卫士等。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们的宿舍，准确他说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这里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老太太。她是照看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也住在里屋，外屋住的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毛泽东儿媳刘思齐，以后又加进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这里又好像是“客栈”。孩子们上中学后，都在学校住宿，只有节假日来这里居住。这里常来的小客人有叶子龙的两位千金，大的叫燕燕，小的叫丽娅。

出了菊香书屋直对面有一处西房，它曾是杨尚昆住过的地方。他乔迁之后，为了工作方便，由保健医生王鹤滨住在了那里。这里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院子的南面是颐年堂的北墙外侧，北面是放外国政府或朋友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的房间，相当一个小小的展览馆。据一些书籍记载这里可能是澄怀堂。靠东头的房间是放乒乓球桌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打过球，也曾在这里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汤，度过他的生日。

与菊香书屋的西厢房北头相接的一处东房，是叶子龙的住房。在这东房前也是一个院落，南面是礼品室的北墙山，西房和两层楼的北房则是机要室的天下。

由于菊香书屋院内的柏树阴影，加上古式建筑的瓦房的飞椽，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差，射进去的阳光很少。一到秋末、冬、春季节，即使是在白天，也须要借用灯光照明。

毛泽东要外出开会或接待外宾，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的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才能上车。

虽然那古老的建筑对于毛泽东说来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他一直喜爱这所典型的北京居民大院式的房屋。相比而言，毛泽东在北京的另外两所居处玉泉山和新六所居住和办公的条件都比较好些，它们是进城后新建的房屋。但是毛泽东在新六所住的时间很短，在玉泉山住的时间就更短了。这两处的住房从卫生条件、周围环境、日照光线都较紫云轩优越，但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这菊香书屋院里的紫云轩呢？这与他多年同战友、战士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所形成的习惯、观念有关。在这丰泽园的大院内，除了毛泽东以外，尚居住着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在丰泽园大院之外，在中南海北面的西花厅住着周恩来及邓颖超，中南海中部住着李维汉；同时，在丰泽园的大院内，还住着许多工作人员和战士。在这里，毛泽东生活、工作用的房屋和其他领导生活、工作用的房屋，以及与一般工作人员或战士生活、工作用的房屋，在质量上完全是一样的。毛泽东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是这丰泽园大院中的一员，他生活和工作在他的战友和工作人员之中；同志们则生活，工作在他的周围，这对毛泽东说来，好像是在井冈山上的茅屋，也像是在延安式的上窑洞一样，使他感到亲切。这也许是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形态：当条件改变时，大家一起变，由茅屋到窑洞，由窑洞到四合院，再由四合院到大厦。像杜甫所吟出的诗句那样：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毛泽东也曾手书过这两句，他把“俱欢颜”写成“共欢颜”，看来不是笔误，而是更加深了诗句的含义吧。

第二章

勤政殿众贤议国事，怀仁堂群英选统帅。毛泽东建国宣言响彻全球，中南海走向新纪元。

新中国标志的诞生

新中国标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在确定方案时，讨论比较热烈的是8月24日那次。这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6小组第3次会议，由马叙伦主持，共有16人参加。

会议一开始，翦伯赞就提议说：“咱们把这些应征的样稿摆起来吧。”于是，与会成员没用秘书动手，亲自离座将一件件设计大样摆在地上端详起来。

思忖良久，梁恩成站了起来，指着一个国旗设计方案，说：“我提个意见，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适当比例。星靠角好些，即使无风时也能看得见。”

“国旗的标志要有显著特点，在哪里都能知道它代表中国。”钱三强指着一个设计方案，说：“这个白地红星的徽，很容易和别国的相混。”

“蓝地白星怎么样？”郑振铎提议。

艾青建议说：“白地红圈好。”

“这个怎么样？”郭沫若亨出一个国旗图案，上面有两个蓝条和星。

马叙伦提出，“蓝色要改一下。”

“改黄色的好。”钱三强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理由：“我国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

这时，与会者一起赞同地笑了起来。国旗上的黄五星方案或许就是在这个基调上产生的。

“关于国旗，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也初步选了几面，还要进一步研究。”马叙伦作了简单的小结。又说：“国徽和国歌还要进一步讨论，常委会都定不下来，得等大家通过。”

紧接着，国歌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因为离大会正式开幕只有一个月左右了，时间急迫。

音乐家姚锦新提出，“歌词要登报征求，另一方面向文艺团体征求。”

“可以将精选的印一下，制谱后让大家来唱，然后用无记名投票选出。”艾青建议说。

欧阳予倩提醒说：“歌词不能太长，不然就成了长诗了。事实上也只能是三四段。”

“除限制在200字以内外，最多写四段。内容和情绪要庄严、愉快、奋发。”马叙伦说。

在艾青建议借鉴一下苏联国歌后，郑振铎说，建议请肖三先生朗诵。肖三笑着接受了任务。整个会场气氛活跃了起来。

半个多月后的9月14日，第6小组由马叙伦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了全体会议，对国旗图案提出了比较重要的修正意见。开始，马叙伦就将陈嘉庚的意见端了出来。说：

“陈先生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

为基础，主张不用苏联的镰刀、斧头，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样式呢。我们把上次定的国旗图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看了看，研究后初步打算采用 11 号图案，后来又比较了一下，觉得还是 17 号图案好一些。但发现这个图案有一条黄线把革命阶段截开了。于是又将黄线改了一下，制成了艾青修改案。毛主席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示工农联盟，在国徽上也可以表明。”

这时，陈嘉庚神态认真地接过了话：“上次会议定的初选 11 号国旗图案，1/3 是白色，远看好像在下半旗。印尼也是白色国旗，稍远点儿就区分不出来了……毛主席的意见原则上是好的，在国旗上是否要表明工农联盟，黄色代表黄河，黄星是否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还是要考虑的。”

在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意见后，陈嘉庚先生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显见当时的民主气氛之浓。

马叙伦接着稍稍作了点解释：“根据对第 17 号图案的讨论，星，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代表政权；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线。”尔后，他又说道：“对国旗图案，今天在会上要作出决定，提交常委会。再就是由我们讨论后印成小册子发给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以第 6 小组为召集人。毛主席也认为，这样做比较好一些。”

“我们可以在中山公园搞一次国旗图案展览，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可以看一看。”沈雁冰随着提议说。

李立三表示赞成这个意见：“沈先生的意见不错。但最好把国旗作成实际的样式好。我也赞成 17 号图案。”

这时，郑振铎提议将 11 号方案作第二选择方案。新的意见又出现了。于是马叙伦提议预备两个方案，就先后次序当即付诸表决。结果是：11 号方案四票，17 号方案七票。也就是说，国旗的设计方案将在这两个当中选择其一。

9 月 23 日晚 7 时，马叙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了第 6 组的第 6 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各组讨论的意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马叙伦宣布，经政协筹备会决定，本组工作今后直接向政协主席团报告；关于国都地点及纪年等问题，经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指定本小组研究提出意见。

关于国都，起初是有不同意见的。江西省政府就转来了一位医生建议国都设在内地重庆、西安或成都。其理由主要着眼于国防方面。也有部分人主张可建都北平，但不必将北平改为北京。

纪年的问题事涉历史，比较复杂，意见纷坛。开始，一位姓丁的代表建议，可采用公历，但要在 1949 年前加上“公元”二字，以免带有宗教意味。章元善则不以为然，他说：“我提议在大会上作议案时，可声明废除纪元制度。”而黎锦熙主张“以公历为主，各人可以自由地在使用公历年号后面加上括弧使用其他纪年。”

最后，还是主张使用公元纪年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种意见认为，现在革命胜利了，一切从新开始了，有了新的纪年，可以提高人民的警惕性，研究中国历史也非常方便。在付诸表决时，除张元济、周善培以外，各组出席代表都同意采用公历纪年，即民国 38 年改为 1949 年。但这仍不能算是最后的决议。

这是一个很值得记述的座谈会。1949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丰泽园召集政协筹备会第 6 组座谈。在谈到国旗问题时，毛泽东说：

“过去，我们的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的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

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那个国家的什么特点，苏联的镰刀、斧头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个国家也有同样的镰刀、斧头。美、英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因此，我们这个图案，”毛泽东这时拿起了五星红旗的式样，指着说道：“这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会场上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这个意见。

关于国都，经过代表的讨论，一致同意设在北京。

关于纪年，代表也逐步统一了想法，一致认为应采用公元纪年。

在国歌的确定问题上，讨论是非常热烈的。

“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就要成立了，而国歌一下子还制定不出来，是否我们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马叙伦开门见山他说。

毛泽东抽着烟，微笑着点了点头。

一个代表发了言，他建议改一下词，因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当。

张奚若和梁思成不同意，他们说：这个曲子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了保持原貌，主张对词曲都下改动。

“这样，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徐悲鸿说。

郭沫若接着说：“我赞成它代国歌。这个歌曲不但中国人会唱，外国人也会唱。但歌词改一个好些。”

“我倒觉得不改好一些。”黄炎培直率而言。

“这个曲子是好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其实这个歌词并不全是聂耳写的，他写了一段就被捕了，后来用聂耳的名义发表的。”田汉不仅谈了自己的意见，也道出了一件外人所不知之事。

这时，周恩来发了言。“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泽东接着他的话，一句一顿他说：“改还是改，但旧的还是要。”

讨论后，大家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来替代国歌。

散会前，毛泽东站了起来，与周恩来和大家一齐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代国歌，第一次回荡在中南海内。

由于在国徽设计上，尽管经过充分讨论，意见仍不一致，会议决定仍保留原小组，继续设计。

新中国标志诞生的日子即将来临。在政协全体会议最后通过之前，9月26日下午在北京饭店，由马叙伦主持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会议，沈雁冰等45人出席。

这次，除通过了上次座谈会决定的事项外，对国旗图案又作了认真的讨论，最后确定复字23号图案作为提交政协大会审议的国旗样式。鉴于原来有的代表对图案存在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对五星红旗作了如下说明：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代表632人。会议的主席团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经过讨论，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 1949 年。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以上四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掌声如雷，响彻了整个会场，经久不息。

遗憾的是因没有合适的国徽，即使在开国大典上也未能用上新中国的标记。

国徽的诞生，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在 1950 年召开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马叙伦代表国徽审查委员会报告说，自 1949 年公开征求后，国徽的应征者较少，而且大多不合体制，未能应用。经大会主席团决定，另邀专家制定，并请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召集人马叙伦、沈雁冰继续担任拟制国徽的任务。

此后，经过专家设计，产生了五个仿照政协会徽的图案和一个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以及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经政协常委会审查，指示以第二种为主，再行修正、另制图案。

这个拟定国徽图案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一、形式和色彩符合“国徽须庄严而富丽”的规定。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也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予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亦寓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结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此两项与条例甲乙两项规定，亦相符合。

1950 年 6 月 23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徽的决议，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9 月间，毛泽东正式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此令。

主席 毛泽东
1950 年 9 月 20 日

至此，成为新中国标志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全部诞生！

国号与国印的来源

6 月 15 日，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致词。最后他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是中华民族万岁。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提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政府的方案。

在历时 5 天的会议中，没有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

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质疑。

从新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名单中，可以看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是第4小组。会议主席张志让先生组织讨论。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两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焉有人民而下民主哉？且民主一同 Democracy 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两字从字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

于是，第4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有一个报告。董必武总结了第4小组的工作，他说，第一次小组会广泛交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7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仍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然后，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去讨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报告，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4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为提议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这次新政协筹委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力汉好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留恋的予以取消。

否则，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喊起口号来，难道还要有两种？把已经走上死亡道路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难道纪元已改为公元1949年，而仍可以简写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吗？

我们提议，主张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在中国人民政协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到：“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 70 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开门见山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 3 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求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

他接着说，各位在讨论 3 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 4 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稍稍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委婉地结束了她的意见。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归隐 38 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20 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 4 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 年更给蒋介石与 CC 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 3 年以后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语音响亮，激动得满面红光，听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全然冷落了一桌丰美的菜肴。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又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这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了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

法律学家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的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 3 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

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爱国华侨陈嘉庚操着浓重的厦门话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9月21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6天的记录是这样的：

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听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38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

1949年9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当他仔细端详了一枚镌刻得严肃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时，十分高兴地连声说道：“刻得好，刻得好！但不知这国印出自哪位治印名家之手？”

“这是由一位苦力镌刻而成的！”陈老笑道。

“苦力？”周恩来诧异了。

“是的，苦力，一名黄包车夫！”陈老再一次肯定回答。

早在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委托陈叔通请治印名家制作一枚国印。陈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泠社创始人王福厂说明了意图，王向陈叔通推荐了自己的学生顿力夫。

顿力夫原是王福厂家的车夫兼杂役，为人踏实勤劳。一天，他从字纸篓里捡起一张印稿对王福厂说：“先生，这样的印稿丢了，多可惜！”

王福厂一看，原来是自己收拾写字台时误丢的一张印稿。他很惊奇。“力夫，你也精干此道？”“还不是先生您教的！”顿力夫腼腆地回答：“我曾几何时教过你呀？”王福厂糊涂了。

原来，顿力夫在拉包车之余，一有空就潜心钻研王福厂的印稿，悄悄地学着雕刻，从此，王福厂破例收力夫为徒。

王福厂把顿力夫推荐给陈叔通后，陈老便把周恩来要求的规格、字体和具体事项等告诉了顿力夫。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当顿力夫将刻好的国印带给陈叔通时，陈老一看，果然镌刻技艺十分精湛。

“是呀，一个苦力，竟成为一名治印名家，真是不容易呀！”陈叔通向周恩来介绍这枚国印制作由来之后，感叹道。

“好啊，好！”周恩来握着这枚国印，意味深长他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毛泽东两次到北京站接人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和蔼可亲，礼贤下士，其中两次到北京站接人的故事广为流传。

对国民党老前辈程潜，毛泽东是很敬重的，他争取和帮助了程潜，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程潜被邀请参加新政协。1949年9月4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聂荣臻说：程潜9月2日抵汉，4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火车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看好住处。毛泽东在北平亲自到车站去迎接被邀前来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一共有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去迎接程潜。毛泽东还亲自设晚宴招待，登门拜访，并在百忙中邀请程潜同游天坛。一次，毛泽东单独约见了在程潜身边工作的程星龄，谈起了建国后程潜的工作问题。毛泽东说，颂云（程潜号颂云）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想颂云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之职，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考虑同颂云婉商一下如何？程星龄回答：他一定会欣然从命的，毛泽东坚持要程星龄回去同程潜商量一下，明日给回信。此后，毛泽东还考虑到程潜旧部多，其中可以安排工作的要尽量安排，有的还向他要钱，他本人也可能想给旧部一点钱，所以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程潜5万斤大米（后折人民币5000元）作为他的特别费，还为程潜在北京准备了房子，让他可以随意在北京、长沙两地居住，安度晚年。

毛泽东另一次亲自到车站迎接的是孙夫人宋庆龄。毛泽东曾两次邀请孙夫人北上参加新政协，一次是1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告诉她新政协即将召开，希望她能参加这筹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当时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行动不得自由，这封信几经周折才转到她手里。中共中央特别指示，孙夫人由沪北上，以安全力第一，如有危险，宁可不动。5月，上海解放了。毛泽东特派邓颖超亲赴上海迎接，并带去毛泽东6月19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信中说：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信中所表现出的尊敬与诚挚，在今天读来仍旧非常感人。因为北平是孙中山逝世的地方，宋庆龄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所以从不想到北平来。但在毛泽东的邀请下，为商讨建国大事，宋庆龄立即果断地同意来北平。在邓颖超等陪同下，宋庆龄于8月29日从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亲自到车站欢迎。

新中国究竟起于何日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47年前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当天《人民日报》所发消息的标题即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当时的盛况在今天全国政协档案处保存的一部影片档案中还有着完整的记录。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

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政协开幕的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叫日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以上文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1949年9月21日。那么10月1日的国庆日又是怎么回事呢？作为一个纪念日它的来历是这样的：

1949年9月21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说：“过去双十日已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庆日，所以要以10月1日为国庆日，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好讨论后决定。”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而1949年9月21日的“开国盛典”则渐渐不为人们提起，同年10月1日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则被称作“开国大典”，越叫越响，越传越广了。

记者包围了毛泽东

这是新政协最后一次筹备会，与会者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几位中共领导人和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著名的民主人士100余人。这些老先生们早就来到会场，先在人口处签名，然后落座。毛泽东来了，老先生们离座到签到处相迎。毛泽东神态欣然，挥笔签名，笑着对老先生们说：“今天是应当高兴的日子。你们的表情如此严肃，大家都要笑啊！”这一说，立时激起了一片笑声。

会间休息时，人们离开勤政殿，到场子上准备照相。毛泽东随着人群，迈着稳健的步子来到场上，记者们不失时机，众星拱月似地将他包围起来。他伸出右臂，与记者一一握手，并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

毛泽东与李廷瑛握手时，微笑着亲切地问道：“叫什么名字？有好多岁啦？是哪家报馆的记者？”李报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和报纸名称。毛泽东风趣他说：“《新民报》好发达罗！像新民主主义一样发达！”

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民盟代表史良，看见了上海3家著名的报纸《新闻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分别派来了各自的名牌记者陆治、林淡秋和唐海，亲切地招呼着，还把他们的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边接着他们递过来的名片，一边和他们握手。对《解放日报》记者林淡秋说：“你的大名很风雅。”又对《文汇报》记者唐海说：“唐朝的海，你的大名好记！”最后，毛泽东握住《新闻日报》记者陆治的手：“我们好像在延安见过面嘛，是不是？”

陆治忙答道：“是的，那是1937年12月初，太原失守以后，我到延安访问过主席。”

毛泽东笑着点头：“噢，原来如此，你们上海来的记者，不但有钢笔作为自己的武器，还带有照相机，可以说装备上占有优势，你们能不能在工作上打胜仗？”

这时，《大公报》女记者高汾挤向前说：“毛主席，你比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胖了。”毛泽东仰头开怀地笑了，他展开双臂：“那个时候，蒋介石压迫我们。现在，八路军把他打败了，空气好了，我的身体也好了。”忽然，毛泽东发现了什么似的指着高汾脚下的半高跟空花皮鞋，问道：“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对你这种皮鞋叫什么？”高汾竟答不上来，双颊微红，有点窘了。毛泽东来了个自问自答：“上海给这种鞋子叫‘空前绝后，’”又引起了一阵笑声。

毛泽东掏出香烟，划燃火柴，美美地吸了几口，这时，代表们纷纷入座，要照相了，他走到前排当中的木椅上坐下。有人注意他如何处理指缝中的那支吸了几口的香烟。他慢慢地将香烟掐灭，放到木椅边的地上。摄影瞬息即成，记者们又包围了毛泽东。出乎人们的意外，大半支香烟又夹进了他的左手指缝中。“嚓”的一下划燃了火柴，他又美美地吸了几口，然后随着人群，走进会场。

在场的有许多资深记者，见过国民党许多高层领导，对蒋介石也不陌生。把他们与眼前这位农家出身的中共领袖相比，觉得毛泽东不仅有宏韬伟略，更有平易近人，他那妙语连珠的风度，实在让人为之倾倒。

怀仁堂内尽朝晖

1949年9月21日晚，决定中国人民今后命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怀仁堂，过去是慈禧太后的寝宫，曾被称做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期间，慈禧强制光绪皇帝随她一同逃往西安，这寝宫，竟成了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突然有一天，仪銮殿燃起一片大火，一名德国将军烧死在大火中，瓦德西倒侥幸逃了性命。转年，慈禧回京花了500万两白银重建仪銮殿，改为西式洋楼，先起名叫佛照楼，后更名为怀仁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在这里办公。他在这里做过皇帝梦，死后，他的灵堂就设在这里。

人民解放军刚入北平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怀仁堂是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古旧建筑。要想在这里举行会议，必须有一番大工程。

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随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后，来到中南海，成了中南海俱乐部主任。

钟灵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画中南海的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紧修缮。

他把中南海的里里外外都跑遍了。

怀仁堂的修缮是重点的重点。

不久，中南海布置科成立，28岁的钟灵担任科长，两名副科长，一个叫郭英，以后当了香山饭店经理；另一个叫李钊，后来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钟灵离休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南海布置科一共108个年轻人，有刚从地方招收的十几岁的女学生；有留用的中南海花匠；有解放区来的干部。有人戏称他们是梁山泊一百零八

将。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合适的礼堂可以作为政协会场，只有这座怀仁堂了。不仅要翻修，还要改建扩建，在院子上搭起铁皮屋顶，与四周的长廊连接在一起。这样，既保存了古建筑的格局，又增加了使用面积，妥善解决了政协开会的会场问题。

钟灵刚忙完政协筹备会的布置工作，这个布置怀仁堂的任务又交到钟灵手里。忙对于钟灵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早在延安时期，钟灵就是延安出名的四大忙人之一。

怀仁堂装饰设计图很快放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当天，周恩来就用毛笔批复下来：

同意。周。七月×日。

这份设计图遗失在 10 年动乱中。

钟灵和东北来的美术家张仃根据这份设计图的原理又设计了一套中南海各个大门的立体效果图，染上实际颜色。经由周恩来拍板投入施工。

怀仁堂内外都装饰起来了。院子的大门、二门以及垂花门都显得气派而充满喜气。

钟灵已整整 3 天 3 夜没合眼了，甚至都忘了打几个呵欠。直到周恩来看过会场，满意而去时，他才一下子歪在桌子上，不多不少整整睡了 36 个小时。

晚上 7 时整，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从主席台的正席上站起来，面带微笑地宣布大会开幕，在毛泽东的身后墙上，悬挂着两位历史伟人的画像，一位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就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的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并已分发给委员代表的新政协徽章。

54 响礼炮过后，毛泽东用含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语言！

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全场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数千万人民英雄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身取义。而就在这一刻。被关押在国民党渣滓洞监狱里的江姐等革命志士，等待他们的是枪声和屠刀……

30 日，大会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众心所向，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6 人为副主席，还选举出陈毅等 65 人任政府委员。

当大会宣布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场起立，鼓掌欢呼！毛泽东当时坐在代表席的第一排，看到代表们都起立后，他也跟着站了起来。他的表情是那么严肃，一丝笑意也没有，双手下垂着，两只深邃的眼睛平视着前方，好似在沉思着这个贫穷、多难的农业大国的前途……

开国大典

“十·一”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广场初步修整完毕。

9月30日深夜，受阅坦克由西向东，隆隆驶过长安街，在东郊待命。

“十·一”凌晨，曙光曦微，城楼披上了红纱。下午2时许，百万群众汇集广场。红旗无数，形成红色的海洋，从城楼上望去，让人眼花缭乱。

将近下午3时，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登上天安门的中国领导人都佩带着红色锦缎飘带，上面印有竖写的烫金字的职务名称。毛泽东左胸前缀垂着红锦缎飘带，飘带的中央有闪着金光的“主席”烫金二字。飘带的下部，剪裁成了燕尾状，随着走动和秋风的吹拂，在毛泽东绿色服装的衬托下飘舞，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其他国家领导人也都在左胸前佩带着红色锦带，印着不同的职称。他们衣着的色调和式样不很相同，但是不管什么颜色的衣服，佩上这红锦缎的飘带都是光彩夺目，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带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着“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或“记者”烫金字样，这锦缎飘带也就成了走上天安门的证件。

毛泽东带头向天安门北面西侧的大砖垒成的梯道向上健步走去。此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摄影师们，看到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上走来时，立即打开了摄影机的旋钮，一边向上退行着，一边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英姿纳入了摄影机的镜头。随着摄影机的开动，随行人员立即闪向阶梯的左侧，躲开镜头。

当毛泽东带头走上天安门时，设在天安门上的扩音器中放出了播音员的声音：

“毛主席来啦！”

“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

顿时，天安门上下掌声雷动，如暴风骤雨一般，经久不息。数十万双眼睛一齐射向天安门，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像盛开的花朵，铺满整个天安门广场，在阳光的辉映下分外娇娆。广场上的红旗在蓝天的衬托下，像彩霞一般随风飘动，人们兴奋欣喜的面孔汇成欢乐的海洋。

毛泽东主席登上城楼后，站在前排的正中。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广播里播放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上的群众随声高歌。30万张嘴共同唱出的歌声。像太平洋上掀起的狂涛巨澜，震撼着古老的北京城，也是这座古城千年以来所经受的最响亮、最动听、最美妙的声响。

毛泽东向前挪动了两小步，站在麦克风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放28响。

人们早已认定，毛泽东亲手升起的这面国旗，是在中国领土上飘扬的第一面国旗。然而，远离北京的大南方——香港附近，有一个叫王母圩的农村小镇，也是在这一天，天刚蒙蒙亮，一面五星红旗已经升起。

那是在9月30日下午，香港《华商报》送去的新华社新闻稿中，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歌、首都和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受命参加接管广州的近千名中共干部汇集在王母圩小镇上，决定在10月1日早晨举行庆祝活动，于是分头着手准备。毛泽东画像早就有了，国歌大家都会唱，国旗的样子恰好新华社电讯稿中有详细的说明。粤桂边纵队参谋长杨应彬学过军事。做过图上作业，便自告奋勇承担了绘画工作，另请几位女

同志用红、黄、白布加以剪裁和缝制。后来，部队进入广州，与标准国旗对照，居然完全一致。

杨应彬回忆道：“升旗典礼是极庄严、隆重而欢快的。在南部中国的游击区，在还飘着米字旗的香港旁边，新中国的国旗，迎着晨风，在蓝天上飘扬招展。”

这当然只算得一个小插曲。从人们普遍的观念，王母圩升起国旗时，新中国还没有诞生呐。

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宣读了政府公告，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员，沈钧儒为最高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构。

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司令员朱德身著戎装，威风凛凛地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由聂荣臻总指挥陪同，检阅了 16400 名官兵组成的三军部队。之后，朱德重登天安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八路军进行曲》中，步兵师昂首阔步走来了；

《军队进行曲》中，炮兵师开来了；

《坦克进行曲》中，战车师来了；

《骑兵进行曲》中，骑兵师来了；

天上飞机一批又一批飞来了……

一位将军睹此情景，不禁感慨系之，对身旁的哲学家艾思奇说：“当年咱们经过雪山草地，几门旧式山炮还得拆下来用肩膀扛着走，而今‘鸟枪换炮’，大不一样了。”

两个多小时之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来了。首都群众欢呼雀跃，振臂高呼口号。这些口号都是由国庆筹备会于 3 天前发布的，共 30 条。群众欢呼最多的口号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

入夜，开国大典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采纳苏联顾问建议而决定燃放礼花。当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司令员下令：“现在开始施放礼花！”一枚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随之而来的是火树银花不夜的天空。盼望共和国已久的北京人民，在那一刻里，胸膛里也绽放出朵朵怒放的心花……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丽景象。

毛泽东穿上了那件棕红色的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坐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他泰然自若地享受着天伦之乐，体会着这大业初建的喜悦，恢复着在主席台上站立了五六个小时的疲劳。

五颜六色的焰火，千姿百态。加上焰火腾空的炮声和火花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非常动人。

那腾空的焰火随着一声爆炸之后，向四面八方射出彩花的同时，发出“啾！啾！啾啾”之声，像是百鸟交鸣，又像是百鸟朝风时唱出的歌声。制花工人真是别具匠心。

从焰火爆炸中心向四周喷射而出成伞状的无数条金色的火花，像金色下垂的菊花瓣，真像是金黄色的线菊，那是“战地黄花”吧！是那些革命烈士将它播种在天空，如今在大典的夜晚将花瓣长长地垂在天安门上！

那是“母子花开”吧，射向天际的花炮在一声巨响之下，飞出无数个小

彩球，旋即又一齐爆炸，向天空抛出无数个多彩的花团。

那是七彩的花。随着炮响，射入高空的花炮一声爆炸，好像从仙女的花篮里顿时倾泄出无数的七彩花朵，它是哪位女战士的英灵，她把自己的鲜血化作鲜花撒落下来，庆祝革命人民的胜利。

焰火在高空炸开，抛撒出无数闪亮的星光，与天幕上最亮的星群互相辉映，这无数亮星是无数灯火缓缓地飘然而下（灯上带有小的降落伞），像是无数先烈手执明灯，从九天飘来参加国庆大典的灯火晚会。

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的人们，兴奋地指手划脚他说着，看着。每人对每种礼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毛泽东的孩子们更是欢天喜地地指着多彩的焰火让他看。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面朝广场。香烟不时地被插在嘴中吸上一口，然后又持在左手的中、食指之间，再用拇指固定着。从口角逸散出来的残烟，在他眼前飘绕。他有时在沉思，有时在微笑，有时凝视着前方，有时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孩子们的嬉戏。

在这开国大典的焰火之夜，在彩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沉思什么？他老人家是否在缅怀三年解放战争以来，或是20多年来，在中国革命征途上牺牲的烈士、民族英雄？还是在缅怀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捐躯的亲人？还是在他的眼前展开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中，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英雄们伟大业绩的历史画卷。毛泽东微笑了，大概是他在默默地告慰忠魂吧。中国人民终于在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改变了中国人民被剥削压迫的地位，结束了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的历史，从此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在礼花撒向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时，从他心底里唱出了“忽报人间曾伏虎……”的诗句。他微笑着用双手捧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奉献在为中华民族解放流血牺牲的人民英雄的英灵之前，以慰忠魂……

毛泽东凝视着前方，他大概是在回忆着过去艰苦的历程。胜利来之不易，代价是重大的，仅他一家就有数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似乎透过飘拂在眼前的从口中流出的轻烟，想努力看清楚展现在他脑海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尚不清晰的蓝图。他给自己、给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刚刚结束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现在又要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长征路上迈进了。毛泽东也许正在努力地描绘着这今后尚不清楚的历史向前进展的长卷吧……

第三章

打点行装，中南海新主人首次出洋。千里谋杀，毛人凤机关算尽

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

就在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后的 24 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个占人类 1/4 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10 月 16 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等参加了这个仪式。由于没有经验，我方采纳了苏联人的建议，在仪式之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地向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部凉了，已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使大家兴趣索然。从此，在接国书之后再也没有举行宴会。当时外交部负责礼宾的是余心清，从未请外国人担任过这方面的顾问。

11 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着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 70 寿辰。他 60 寿辰那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 10 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

“12 月 21 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啊。”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凝望着中南海天空中高挂的一弯星月，陷入了沉思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就首次选择出访苏联，这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之前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了美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将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位大元帅是位性格多疑而又十分精明的领袖，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或是在

自己别墅的饭桌前，同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核心圈子的人边用餐，边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形势发展。

斯大林五次三番地问旁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

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到过苏联的人很少，毛泽东可算得是例外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闯。

斯大林急于想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却显得不紧不慢。于是乎，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有狭隘的农民主义立场。然而毛泽东却心地坦荡，既不受控于人也不斤斤计较苏联朋友的偏见，他有着中国传统伟人一样的君子风度，这些，斯大林是不了解……

刘少奇接受秘密使命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中央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主要是同斯大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当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商讨。所以，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时，就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并组织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复电的大意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泽东作为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望毛泽东再三考虑。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5月，毛泽东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当时驻保定的敌军欲以骑兵奔袭石家庄。由于战局动荡，苏方不宜来人。直到1949年1月，我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之敌，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月31日米高扬抵达西柏坡，这一天正是我军进驻北平之日。米高扬的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N和汉学家柯瓦廖夫·E以及两名警卫人员。米高扬在西柏坡呆了一个星期，与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进行了会谈，主要是由毛泽东向米高扬详尽他说明当时我国国内战争形势和我党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步骤，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形式，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米高扬说他只带了耳朵来，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回去向斯大林汇报。这次会谈由师哲和柯瓦廖夫·N担任翻译，但柯瓦廖夫·E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极，说要捶他。

1949年5月初，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苏。为此，委托刘少奇、周恩来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出国访问有关事宜；还调来戈宝权、邓力群等同志帮助工作。

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受毛泽东的委托并代表毛泽东前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的。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师哲。另有几名工作人员。

7月2日，刘少奇、王稼祥和师哲从北平出发，到了沈阳，高岗、徐介藩加入，他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去苏联，因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德

洛夫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的欢迎，所以飞了6天才到莫斯科。

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并不陌生，他在中共领导层中是一位著名的工人领袖，1921年他就是在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知识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那以后刘少奇一直是中共党内的工运专家，他熟悉苏联党和某些苏共领导人的情况，因此选择他做为中共代表团团长显然是十分合适的。

刚刚进入初秋时节，莫斯科的天气是宜人的，瑟瑟秋风刮着路边的落叶，通往红场的大街上行人并不多。这些苏联人大都行色匆匆，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很少有入关注行驶在大街上的一队小车。

刘少奇坐在开往克里姆林宫的小车内，神情安然，毫无倦意。他不时把目光投向车窗外边，看看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脸上浮现出一丝友好的微笑。

刘少奇从表面看来十分平静，而内心却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非同小可。毛泽东行前再三嘱咐代表团，对于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是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珍惜中苏人民和中苏两党之间长期结成的战斗友谊。如果遇到苏联同志有什么考虑欠周到的地方，千万不要计较，尽最大可能的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莫斯科的秋天显得成熟和稳重，这些来自中国的客人就在一片平静而稳重的气氛中，驱车悄悄地驶进了克里姆林宫。

于是，一场事关大局的会晤即将拉开序幕。

当天晚上，刘少奇在他下榻的住所里召开了一次准备会议，几位中共中央的代表坐在沙发上，聆听着刘少奇再一次周密细致地布置和交待。

大家望着刘少奇那双微微带着红丝的眼睛，想起这一路上他全身心投入会晤的准备工作，根本没有好好休息的情形，都无不佩服和感动。

“少奇同志，您还是早点休息吧，连着几天都没有休息好了——”同志们劝着他说。

“休息是小事情，抽个空闲一会儿就可以了。可主席交待的任务半点也马虎不得哟！”刘少奇认真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是在苏联，苏联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很好的会晤条件，这更应该把这次会见活动完成好，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好向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交待。”

他说完，又掏出笔记本，亲自把有关事项再次做了最后的分工，然后在日记本上那写有7月10日的日子下面重重地画上了一笔。

是啊！这一笔是不平凡的，它将记下一段非常重要的日子。

出乎中共代表团的意外，这一次苏联方面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示了非常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从接待安排到会晤规格，都是很高层次的。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原准备主要同相同规格的苏联领导人会晤商谈，然后礼节性地请苏联同志安排一到两次同斯大林的会见就可以了。但斯大林不仅从头到尾关心和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团的的活动，而且亲自与刘少奇会谈了五次。这在斯大林接待外国来宾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呀！

连一些苏共领导人也议论道：“斯大林同志怎么对中国有这样高的热情呀——”

性格多变的斯大林是非常不想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他的，而这次他却有些一反常态，听到有人汇报，他摸摸嘴边那一撮漂亮的小胡子，有点神秘地挤挤眼睛，得意洋洋的笑了笑，好像根本不在乎一样。

斯大林非常详细认真地听取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其他人的汇报，他听得相当认真，态度是坦诚和平等的，这使刘少奇和中国同志深受感动。

中苏双方的会谈就是在这样坦诚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会谈安排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小客厅里，红色的地毯，典雅的桌椅，桌上放着俄罗斯风格的杯子和盘子，旁边还有香檳果酒饮料之类的食品，这是高级领导人会谈必不可少的东西。尽管中国同志不大习惯主人的这种会议形式，但他们还是十分尊重苏联同志的安排，客随主便。

会谈开始后，斯大林和所有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领导人坐在桌子的一边，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则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会谈主要是在斯大林和刘少奇两人之间进行，其余的人说话的时间并不多，而刘少奇介绍中国的情况则又占了大多数时间。

第一次会谈基本上是刘少奇介绍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步骤等问题，斯大林只是认真地听，没有说什么。

第二次，当刘少奇介绍完新中国政权的内政与外交方针后，他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请教：

“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想法有什么高见，请您和各位在座的苏联同志多多指导。”刘少奇的态度显得诚恳和谦虚。

斯大林鼻孔里鸣了一声，欠起身子，双手放在桌上，轻轻拍敲着那只烟斗，好像在想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脸色严肃地抬起头来，看着对面的中国同志，神态显得也很诚恳：

“看起来，我以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犯了错误了。”

斯大林话音刚落，他两旁的苏共领导人都不约而同用一种惊讶和不解的眼光看着他们的最高统帅，似乎有些不太相信这话是从斯大林口中说出来的了。

刘少奇也略微一怔，但他仍保持着平静。他反应敏捷地说：“斯大林同志这话太谦虚了……”

“不。”斯大林一摆手，认真地又说：“我讲的是实话。”

室内的气氛沉默了，好久也没有人说话。刘少奇看看沉思之中的苏联同志，自己的思绪也仿佛被牵动了一般……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中国同志自然清楚斯大林这番主动检讨自己的话之由来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之初，斯大林一直相当固执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要同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全面抗衡，其力量对比是太悬殊了，而且悬殊得几乎无法比拟。当然，这位指挥苏联红军战胜了希特勒军队的最高统帅对中国这样一个情况特殊的东方大国并不很了解。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苏联需要拉拢南京政权以制约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华势力的需要，斯大林一直保持着与蒋介石的正式外交关系。

但斯大林清楚，即使让蒋介石掌握了中国政权，中国也不能算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中的一员，因为蒋介石亲西方的态度是鲜明的。因此斯大林一直在谋求让中国共产党也能参加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去。

自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为人了解得太不充分，他打电报向毛泽东建议说：

“……你党应该维持国内和平，再不能打内战了，否则有把中国民族引向毁灭的危险。”

当这份署名为“菲利波夫”（即斯大林）的电报传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看了看，随手把它放在桌上，淡淡一笑，风趣他说：“这事恐怕要问问全党和全国人民答不答应了。”他又向身边的同志进一步说：“人家说我们想打内战，可这内战是谁挑起和制造的却没闹明白。”

这位从中国湖南走出来的共产党领袖素来有不受人指挥的性格，他有着与斯大林一样的自信和坚毅。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和仔细分析之上的，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些关键的东西。

毛泽东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于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我们只能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

毛泽东放下了斯大林的电报，既没有盲目听从斯大林的建议，也没有去向苏联政府请求物质援助，他决心让历史来说话。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光阴一晃而逝，解放战争进展神速，1948年年底，平津、淮海大战的序幕即将拉开之际，毛泽东自豪地宣布——

“夺取全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

此时，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才逐渐意识到了中国革命胜利这一事实的势不可挡，加上蒋介石政权彻底倒向美国，他开始放弃了自己以前一直坚持的立场，不再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了。

然而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已濒于全面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又想利用苏联的影响来拖延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蒋介石再次致函苏联政府，请求斯大林出面调停，劝说中共军队不要再进攻了……

斯大林收到了电报后，一声不响，保持了沉默，后来他吩咐只字不动地把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这封电报的态度也是鲜明的，那就是——不予理睬！

同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见是在斯大林的别墅。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他说：“我举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在继续交谈中，斯大林讲到中国的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还讲了革命中心东移问题。斯大林说：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推让了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酒。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对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领导，斯大林认为是成熟的，特别指出总理和外交部长是现成的——即周恩来，那是当之无愧的。

国民党驻苏使馆人员此时全都弃馆逃之夭夭。这次会谈后，王稼祥在莫

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高岗也提前回国了。最后一次会见斯大林，只有刘少奇和俄文翻译师哲参加。

斯大林引刘少奇参观他的花园。花园很大，种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田，其中有从我国引去的谷子，已长出谷穗，大约两周后即可成熟。斯大林很想让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吃到小米粥，但代表团就要启程回国，所以他惋惜地说：“这次做小米粥是来不及了。”并且说他想大面积播种。斯大林还介绍了他的各种作物。刘少奇和师哲在花园里呆了很长时间。到吃饭时，来了几位政治局委员作陪。这次会见也是告别。

回国时，和中共代表团同行的还有一批苏联专家。中共代表团原提出需要 150 名。斯大林将这事交柯瓦廖夫· 去办。到中共代表团临行时，已物色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 96 名，由柯瓦廖夫· 带领，和代表团同车来到中国。

台湾的暗杀阴谋

12 月的华北大地，呈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图景。

这天，一辆编号为 9002 次的专列，像一条绿色的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驰去。

车头上悬挂着金黄色的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专列经过的路线，只见护路部队一公里一个岗哨；一双双警惕的眼光，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

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是一一选好了的。专列一共三节，前节是警卫连，后节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快又平稳。

肩负着保卫毛泽东访苏重任的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和同往的铁道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领导人，每到一站，总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

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由杨奇清副部长与滕代远部长具体部署的。

此刻，坐在前面警卫车厢的杨奇清，凝视着车窗外急速向后掠去的田野、树木，耳边又回响着周恩来亲切的指示：

“奇清，我们的国家还刚刚解放，对隐蔽的国内外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扫，这次你们随毛主席先行，我随后就到。在路上你们要百倍警惕，防范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杨奇清响亮地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周恩来高兴地握着杨奇清的手说：“好！杨奇清同志，我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杨奇清正在回忆，忽然，毛泽东派人来叫他。

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对潜伏敌台的侦破落实了没有？”

杨奇清从容地回答：“报告主席，不仅落实了，而且经过分析、判断，敌人还要搞活动。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此案已由李克农接替我指挥。请主席放心。也许主席到了莫斯科，就可以听到胜利的消息了。”

“那好。奇清，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在实战中提高嘛！”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后，继续问：“你们是怎么侦察、判断的呢？”

杨奇清说：“据侦察获悉，台湾保密局拟派专人潜伏大陆，配合华北土匪，在我访苏前后，组织暗杀活动。但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立刻逮捕！”

“好！来者不善、歼之有理嘛！”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原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自从接任戴笠任局长后，一心想在反共上大显身手。他不断总结失败的教训，变换着进攻的手法，深得上司的赏识。

这天清早，他正与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共进早餐，一边密谋在大陆的行动，保密局机要秘书匆忙走进来报告：

“昨夜两点，万能台自大陆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出发了，估计需要经过三天两夜到达满洲里。毛的安全在苏联境内由苏方负责。”

布莱德上校欣喜若狂：“这是刺杀毛泽东的最好时机。如果毛泽东顺利访苏，与斯大林结成反自由社会同盟，对美国、台湾、韩国战争都很不利。你们要立刻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督战。”布莱德站起来又说：“我们在正面战场虽然失利了，但是在情报工作方面一定要给共党以狠狠的打击。美国战略情报局希望在毛到莫斯科前后，看到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即刻命令说：“按行动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两套作战方针，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除破坏长春 14 号铁路桥以外，在哈尔滨车站要埋下定时炸弹。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反共复国斗争就会出现新局面。”

毛人凤又督战似地命令：“立即电告计兆祥，通知××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苏和回国的时间、路线。命令计兆祥从即日起，每天三次报告指挥情况，进一步加强空中联络。为此，除嘉奖计兆祥 2000 美元外，由国军中校台长晋升为上校台长！”

毛人凤转而对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吹嘘：“共产党绝难料到，在他们党政要员集中的心脏地带的‘南池子’，竟是我潜伏台指挥的天下！”

“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还不是你们的对手！”

北京朝阳门内路南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它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家。这一天，肩负着侦破潜伏台第一线侦察工作重任的老曹，第一次到这里，汇报侦破工作。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赫赫有名的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名将。他曾和我党地下工作者胡底（有说胡北风）、钱壮飞长期在敌人的心脏与敌特进行惊心动魄的斗争，给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周恩来誉为“三杰”。

尤其是 1931 年，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事件，国民党政府如获至宝，准备将共产党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由于李克农、钱壮飞、胡北风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机密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将叛徒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从而使在上海的国际机关、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免遭劫难，为保卫党中央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李克农这个人，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都无可否认地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传奇英雄。

老曹虽久闻李克农部长大名，但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当他思绪未定之时，只见李克农部长就笑哈哈地从客厅走出来，热情地说：

“杨部长向我介绍过了，同志们干得很好！老曹，从今天起，你每天只

向我汇报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接近计兆祥的人的侦察情况。”

“是！”老曹颌首答应。

当天上午9时，在中央社会部庄严、整洁的部长会议室里，李克农部长召集部、局、处长以上有关侦察干部会议。

一张铺着绿色台呢的长方形条桌，东西向摆放在会议室中间。

李克农以响亮的皖南口音在讲：“……对台湾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的侦察工作，按毛主席批示的限期即将提前完成任务。敌台台长就是那个因为发了战略情报而由一个小小的中尉很快升到上校的计兆祥。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屋内。现在就要决定破案了，但有一个问题需要统一一下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搞了这么长时间，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只捕一个计兆祥，恐怕不是全胜，不是歼灭战吧？今天的会议就是统一这个认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我公安机关决定逮捕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四职为一身的台湾保密局“万能潜伏台”特务计兆祥。

两个伟人首次握手

9002次专列缓缓地停靠在山海关车站。

望着那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毛泽东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决心下去看一看。

他身着呢大衣，脚踏方口布棉鞋，手执香烟，从车厢的中间走到杨奇清跟前，笑容可掬他说：“公安大臣，这里停多久！”

“半小时。”杨奇清回答。

“嗯，下去看看可以吧？”毛泽东用商量的口吻说。

杨奇清见毛泽东要下车，便对一旁的中央警卫团团团长汪东兴说：“外面风大，您帮主席加点衣服！”然后又与车厢里的滕代远、任远、冯纪打了个招呼，便第一个走下列车。

车站由于专列的停靠，顿时显得十分活跃。

在月台上、车站上值勤的工作人员，一眼望见走在中间的体格魁梧的首长，朝他们频频点头致意，啊，毛主席！是毛主席！一股幸福的暖流顿时涌上他们的心头，他们真想呼喊起来，但望着前面的卫士长那平和中透着严谨的目光，和他那紧紧抿着的嘴唇，他们会意地把千言万语凝聚在心头，只是用目光向毛主席传去纯真的崇敬之情……

毛泽东沿途请各地负责同志上车，做调查研究。

他谈笑风生，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12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到了“国门”满洲里市，列车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停了下来，由于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因此要换车。

在苏联国境线的车站上，早已停好了迎接毛泽东一行的高级专列。这是一辆设备很好的专车。车上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苏方赤塔州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来到边境线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亲切地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后，又登上了苏方的专列。

“呜——”汽笛高鸣中，草原上的这列专车驶离了边境线，在苏联国土上奔驰起来。

毛泽东登上苏联专列后，神态显得格外平静，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埋头

读书和查阅资料，有时连工作人员请他吃饭也没有听见。不知不觉中，专列到了入境后的第一站奥特波尔，毛泽东发觉车停了，他问道：“这是到哪儿了？”工作人员告诉他地名后，又请他下车，说是有仪仗队欢迎。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大步走下了车来。

他在站台上停了一下，望望天空，这里已是天地萧然，一片严冬景象。站前广场，寒林萧瑟，晓霜犹凝，北风吹得树枝沙沙地响，毛泽东却迈开了大步，有力地朝前走去。

军乐四起，鼓号齐鸣，奥特波尔车站前肃立着一排排威武整齐的仪仗队，一色的新军装，他们手持步枪“唻——”的一下齐整整地向着走来的中国领袖致敬。毛泽东冒着寒风，大步检阅了仪仗队后，又与欢迎的人握手致意，稍事停留后又登上了专列。

列车顶着凛冽呼号的北风继续向前行进着。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有名的，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客人也毫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已开始挂上了一道道晶莹的霜花，星星点点，不停地抖动着。当列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挂到了车站上，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途中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毛泽东听了挥挥手对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当列车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站时，毛泽东的身体有些不舒服，脸色有些不正常，可能是疲劳和气候的关系。

“主席，要不要通知苏方一下？”工作人员不安地问道。

“不用不用。”毛泽东摆摆手，站起身来说：“等车停下后，下去透透新鲜空气就好了。”

列车停稳后，毛泽东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下列车，沿着站台走了一会儿。这时天气奇寒，冷气袭人，不少人冷得直搓双手，他们担心毛泽东受凉，忙劝他上车休息。

毛泽东笑了笑说：“没关系。”他活动活动了身体，这才又登上了列车，随行的人见他恢复了常态，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车到了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这儿登车陪同前往。

精干的王稼祥一登上专列，就兴奋地奔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说：“主席啊，可把您盼来了——”

毛泽东也高兴地迎上前去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可少不得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

两人手拉手地在车窗前坐了下来，兴致勃勃地长谈起来，王稼祥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毛泽东能确立今天这样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是1935年春遵义会议的结果，而为了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关键的一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躺在担架上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地长谈。后来，这位当时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中央根据地中央局委员，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站在了被排挤压制的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地同王明路线斗争，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见解，投下了十分关键的一票。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王稼祥和周恩来当时也成为了毛泽东的军事副手。从那时开始，中国革命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今天，他们两人又在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再次相会，回首往事，感慨实在是太多了。

黄昏降临，车窗外晚霞渐浓，俄罗斯田野山水衬映在如画的金黄色光

环中。毛泽东抽着香烟向王稼祥说：

“记得斯大林 60 岁生日时，我们党还不怎么强大，人家也看不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没想到他 70 岁生日时，我们已夺取了政权，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是的。”王稼祥点了点头，颇有感触他说：“从 1920 年 3 月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国革命，派出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来华，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诞生，苏联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帮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说：“这种支持和帮助，我们过去需要，现在同样需要。”

毛泽东的话勾起了王稼祥对往事的回忆，他说：“我记得主席在庆祝斯大林 60 诞辰的那篇文章中这样说过：‘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声，求其友声。我们正处在这种时候’……”

“嘤其鸣声，求其友声——”毛泽东深沉地念诵着，把目光投向了车窗外。

窗外，夕阳如火，天边灿烂，茫茫的雪原在金色的霞光照射下，发出令人炫目的光，列车向着雪原深处一往无前地奔驰着，奔驰着。

1949 年 12 月 16 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大街小巷银枝拂掠，冰影映漾，四处显得格外地庄重和肃穆。快到中午的时候，空气中有了些暖意了，莫斯科人开始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大钟敲响了，“当当当——”12 下深沉而洪亮的钟声，这钟声在莫斯科城内久久地回荡着。

“鸣——”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钟声、汽笛声、车轮声中准时徐徐驶进了莫斯科车站，顿时鼓乐齐鸣，欢声划破了机车头那腾腾的白色烟雾，男女青年们手捧鲜花边挥动边欢呼，车站广场一片喜庆。

月台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一批高级领导人依次等候在站台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欢迎的人们在寒风中已站了一些时候了，尽管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一个个的脸仍冻得红红的，可他们依然热情和精神饱满。

列车停稳后，毛泽东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车门口，他微笑着边向人们挥手，边大步地走下车来。莫洛托夫等人热情地迎上前去，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拥抱，又把欢迎的人向毛泽东做了逐个介绍，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由于天气太冷，苏联同志怕毛泽东吃不消，于是加快了欢迎仪式。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就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之处，苏联驻华使节罗申也陪同随行人员前往。

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非常优雅、舒适的别墅内，这里曾是斯大林的住所。

安顿下来后，莫洛托夫请毛泽东好好休息，他转告毛泽东：“下午 6 时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在卧室内休息了一阵后，便叫工作人员马上做好会晤前的准备工作，自己则点着了一支烟，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步。他习惯性地一手握着香烟，一手背在身后，久久地凝视着郊外茫茫白雪覆盖着的田野，似乎在掂量着即将与斯大林握手的份量。

毛泽东是清楚的，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还有，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的做法也表示过忧虑，担心这样有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美英的西方路线。然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当时的时局和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此时的毛泽东有充分的自信心去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他为即将开始的会晤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过了一会，警卫人员前来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只带了顾问兼翻译的师哲，随警卫人员登上了小车。

克里姆林宫里的路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宫对面的广场地上铺的都是方形石块，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从斯帕斯门驶进去。小车经过一个很大的街心花园，车内的毛泽东注视着前方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游廊。原来游廊的顶部，全是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毛泽东似乎在领悟着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古老历史，他显得那么平静和从容，目光中透出深沉而稳健的神彩。

由一座座教堂和宫殿组成的克里姆林宫庄严神秘，一条护城河与红墙护卫着这座曾为莫斯科的公国和19世纪前的帝俄皇宫，而今苏联党政机关的心脏就设在这里。

毛泽东按时被送到宫内斯大林的会客厅里，这客厅十分气派，金碧辉煌，大理石墙壁光亮照人，红红的地毯显得隆重华贵，壁炉架上端的墙上有一口老式的俄国古挂钟，毛泽东有意识地看了看时间，5点57分，比约定时间提前3分钟到达。

斯大林的秘书走出来，他请毛泽东到他的屋里休息一下，他随即进去向斯大林通报。

客厅尽头有一条不太长的甬道通向斯大林的办公室，按规矩，以往斯大林召集会议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从这儿进入的，而且必须正点，不能迟到，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可今天，会晤的时间马上要到了，竟然没有动静。

“当当当——”挂钟敲了六下后，里间的大门打开了，秘书走了出来，有礼貌地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毛泽东起身来，步伐滞洒地大步走了进去，翻译师哲跟在他的身后。

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里全体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排成了一排迎接着毛泽东的到来。站在最前边的是斯大林。他沉着而坚毅，眼光深邃，热情随和，他身后依次站着的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

苏联的这些高级领导人全都衣著一新，仪表整齐，神态严肃庄重，显得礼貌而不失风度。

当毛泽东一跨进门，斯大林首先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前去，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来，两位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

“您好！”

“您好！”

“我们欢迎您的到来。”

“谢谢斯大林同志。”

四只手紧紧地握了又握，……

斯大林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红润的面容，赞叹地说：“好，好呀，真想不到你是这样年轻，这样健壮——”

“斯大林同志也很健康呀！”毛泽东回答。

斯大林回过头来，把全体政治局成员逐个向毛泽东做了介绍，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祝愿问候，尔后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中方随行人员情况。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桌两边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师哲坐一边，斯大林和苏方人员坐在另一边，斯大林望着毛泽东，又赞叹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您健康！”

毛泽东意味深长他说：“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

“不不不——”斯大林没等翻译把话说完，捏着烟斗的手习惯地摇了摇，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谁也不能去谴责一位胜利者。”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在场的苏联领导人也笑了起来，有人还轻轻地鼓了掌。

话转入正题后，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认真他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砝码，我们全心全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重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毛泽东的话很诚恳，他显得儒雅、温和，很有分寸，言谈举止中带有浓郁的诗人气质。

毛泽东的风度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都用极有兴趣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感到坐在对面的不仅仅是一位伟人，一位领袖，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常对毛泽东话中的旁证博引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人轻轻地点起头来。

斯大林取下嘴上的烟斗，思索了一下，问道：“我们双方这次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呢？”他最关心的还是中苏结盟的问题。

毛泽东想了想，巧妙他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是应该搞出一个东西来，可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他很形象的用手比划了一下。

苏方的翻译被难住了，他不知怎么把话的意思表达出来，脸都急红了。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见此情景，忙把毛泽东的话做了解释：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好看就是指形式上好看，应该是冠冕堂皇的才好，好吃就是说这个东西必须有好的内容，实实在在的。”

师哲解释后苏联同志还是不太明白，他们相互看着，比比手势。有的人还觉得好笑，竟然笑出了声来。斯大林的神情是很认真的，他在体会着毛泽东话里的含意，想弄清楚毛泽东究竟心里有什么打算，特别是双方若要签约需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他再三地询问毛泽东的想法。

毛泽东似乎显得不那么着急，他没有直接去回答斯大林的问话，只是说：“我打算请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斯大林抖了抖烟斗，微微蹙眉头，说：“如果毛主席和我还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来后做什么呢？”

毛泽东平静地掐灭了手上的烟头，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他接着把话题巧妙地岔到了一边。

斯大林觉得过去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他不便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来，以免造成“强加于人”的感觉。但他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或协议，都应由他和毛泽东亲自来签署，可毛泽东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由自己出面来办理这件事。

尽管如此，首次见面还是令双方满意和愉快的，大厅内的气氛显得平等、轻松、友好，说到兴致处，斯大林还不时习惯地摆弄他那精致的小烟斗，毛泽东也不时露出了微笑。

就这样，毛泽东在苏联首都度过了第一天。

“蜜月时代”的到来

12月17日，清晨了，莫斯科仍然罩在蒙蒙大雾之中，大街小巷到处一片雾气，像一层层轻柔的银纱，直到上午9时多了，大雾才慢慢散去。市民们走向报亭，走向邮局摊点，购买当天的报纸。以《真理报》为首的苏联各大报纸，均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会面这条消息，很引人注目。

40年代最后一年的冬天对莫斯科来说是个多雪的冬天，自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到达这儿起，几乎每天都在下雪。飞扬的雪花飘飘洒洒，铺天盖地，别有一番景色。而在当时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视野之中，中苏两大国领袖的莫斯科会晤象征着两大国的“蜜月时代”到来了。可是这种“蜜月时代”却诞生在多雪的日子中。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晤显得有些神秘和离奇，主人总是把会晤谈话时间放在深夜，而且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孔莱沃别墅内进行。毛泽东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也是喜欢夜间工作。每到更深夜静之时，他的头脑特别清醒，记忆力很好，因此这种夜间会谈对主人和客人来说都是很适宜的。

会谈室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坐在长桌的另外一侧，毛泽东则坐在紧挨斯大林的地方，翻译坐在中间，中国同志自然坐在自己领袖的这一侧。每个人的座位前各类餐具酒杯齐备，几瓶格鲁吉亚纯葡萄酒和伏特加酒、矿泉水放在桌子中间，桌上自然也摆着各种新鲜蔬菜和羊肉之类的食品。

会谈开始前照例是贝利亚代表斯大林先向大家祝酒，他总爱击击掌，用酒杯敲敲桌子，以示隆重。然后先检查一下每个人的白兰地是否盛够，这才祝酒，劝大家干杯。斯大林的酒是由红白葡萄酒掺在一起的，专供他单独饮用。

谈话几乎只是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人之间进行，其他人基本是陪客，没有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知识渊博，政治经济军事无所不谈，斯大林语言表达力敏锐准确，显得十分果断有力。两人的会晤从来没有既定话题，但毛泽东总喜欢涉猎历史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经历，这些对于斯大林来说也是有兴趣的话题。

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进行了好几次这样神秘的夜间会谈，两人彼此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自然也更清楚该如何与对方交谈了。有一次毛泽

东对斯大林老把红白葡萄酒掺在一起喝发生了兴趣，可他坚持不让翻译问斯大林。斯大林敏感地责问翻译：“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

“是这样……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类酒掺起来，而其他人为何不这样做？”翻译慌忙小声地解释起来。

毛泽东也平静地看着斯大林，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斯大林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镜片透了进来，他问翻译：“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费德林此时发现贝利亚的目光也紧盯着自己不放，他忙解释他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一点不大礼貌。”

“唔。”斯大林点点头，有点狡黠地又问费德林：“而您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斯大林说完后，微微一笑，开始向毛泽东解释了起来：

“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我相信红葡萄酒，在流放中我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给我饮用了少量红葡萄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

“这就是你喜欢红白葡萄酒一起喝的原因了吧！”毛泽东听完这番话，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有感染力。两国的同志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单独会晤中，自然也提到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贷款问题，但毛泽东坚持等周恩来到来后再谈具体内容，除此之外，他与斯大林的谈话还是富有成效和倾向一致的。

在毛泽东与斯大林多次的最高级会谈之中，一般说来，这位性格中总有些令人捉摸不定的苏联最高统帅同来自东方古老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谈话时，总是心平气和的，他显得格外沉着和冷静。在听毛泽东那富有诗意的讲述时，斯大林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毛泽东所谈的内容上，从不心不在焉。

毛泽东也很欣赏斯大林这种认真的态度，他不时提出一些能引起斯大林兴趣的话题来，与斯大林商量探讨。

斯大林很注意自己话语表达的准确性，他不愧是高明的语言学专家，遣词造句，十分讲究。他十分注意翻译对他思想观点的完整表达。

斯大林的这些要求给苏方翻译费德林带来极为不安的心理，自从在正式会谈中费德林两次被毛泽东引用的中国成语难住以后，他更怕以后的工作惹出更大的麻烦来。每次从会谈开始到会谈结束，费德林都是提心吊胆的，当他一接触到斯大林那双捉摸不透的目光时，额头就沁出一层冷汗。

那天因为毛泽东引用的“视死如归”中的“归”字没翻译出来，斯大林那双鹰一般敏锐的目光透过戴着的夹鼻眼镜直视费德林的那一刹那间，这位苏联高级翻译简直有一种危机之感。好在毛泽东的帮助，才使他渡过了这一道险关。

在费德林看来，那些日子的夜晚似乎特别漫长。那天的会谈直到凌晨5时左右才完结，费德林心惊肉跳地走出会谈地点后，径直驱车赶回自己的家里。他一跨进家门以后，甩下公文包，第一件事就是从高高的书柜上取出那本厚厚的《中国成语详解词典》，翻到“视死如归”的词条，读了一遍又一遍，证实了自己把毛泽东引用的这句格言成语解释清楚了之后才松了一口气，浑身无力地瘫倒在沙发上……

不能否认，斯大林在这些年中的确越来越有一种近乎冷酷，使部下心惊胆颤的威严。他的整个相貌和谈吐举止以及风度时时好像在向周围的人说

明，权力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

对于斯大林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在会谈中是有所察觉的。但毛泽东似乎显得不很介意。每当斯大林迈着有力的步子走进会议厅时，他周围的人像一下停止了呼吸，呆呆地笔直站立，这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同志多少有些不习惯。但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毛泽东并没有特别反感，他自己也这么做了。

但有时在会谈中，毛泽东也并不掩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与斯大林的相反观点。

有一次，两人长谈到兴头上时，斯大林突然问起了毛泽东在蒋介石军队已失去了对上海的防守能力时，为什么不马上去夺取这个中心大城市。

“毛泽东同志，我真不明白，那时的机会这么有利，而你们为什么不马上夺取上海呢？”

毛泽东笑了笑，轻松地点了点头：

“是的，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马上就夺取呢？我们的力量还有限，如果马上占领这座城市，我们就得负起 600 多万居民吃饭的责任，就得背起大包袱。这个包袱让蒋介石继续去背有什么不好呢？”

斯大林还是不太理解，他摇摇头，做了个无法理解的神态。毛泽东不介意地笑了起来……

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毛泽东有狭隘的农民意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他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要夺取革命胜利，首要的问题是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谁要忽视了农民问题，谁就会注定失败。

但是固执的斯大林并不这样认为，事后他曾把毛泽东的回答告诉了赫鲁晓夫等人，他说道：“真不理解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他为什么又不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去做呢？这些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真理难道毛泽东真不懂吗？”

然而毛泽东却有自己的理解，他对马克思列宁的话从不盲从，总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去贯彻。不错，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自信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每一次会晤都总要出现一些使人意料不到的问题，所有会谈的内容几乎全由主人来确定，但主人却从不事先透露题目。

在交谈的过程中，有一次两人突然对讨论语言和思维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斯大林一边喝着红白葡萄酒合在一起的酒汁，一边详细的向毛泽东阐述自己那本著名的语言学著作之精华，他反复比划着对毛泽东一次次地说道：

“我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你认为对吗？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长长地吸了一口手上的香烟，慢慢地抖着烟灰，不紧不慢地说：

“各民族的文化 and 各民族的语言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汉字和汉语尽管不太容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的人都能学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只要愿意学和不断地提高就可以掌握它，这也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苏方翻译费德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谈吐不紧不慢的毛泽东，手上的笔不禁停住了。

“费德林同志。”斯大林突然叫了一声，使这位译员吓了一跳。

没容费德林反应过来，斯大林用冷冰冰的语调命令般他说：“请拿着您的盘子到我这儿来！费德林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他不能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只好拿起桌上自己面前那只盘子，慢慢走到斯大林跟前。

斯大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看也不看他说道：“请把这儿的这一道菜拿去吧！这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肴，您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吧？”

费德林有些不知所措了……

“请拿去！”斯大林的口气仍然是平静的，“常言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听着这席话，费德林对最高统帅的这番盛情感到有些犹豫了。他刚才亲眼看到，女服务员上菜时，曾轻轻的对斯大林耳语了几句什么，然后，女服务员没有把这盘菜放在斯大林的面前，而是放在了他的旁边。

但是在主人的命令下和中国客人的面前，费德林不敢不照斯大林的话去做，他硬着头皮吃下了这道菜。

“怎么样，费德林同志，您喜欢这道菜吗？”过了一会儿，斯大林转过脸来问了一句。

“不错……斯大林同志，这道菜……这道菜的味道好极了。”费德林好不容易才吐出了这一席结结巴巴的话。

“那您干嘛不早说呢？”斯大林高兴了。

毛泽东和中国同志也跟着笑了起来……

斯大林 70 岁诞辰庆祝活动

斯大林 70 岁诞辰的庆祝活动开始了。12 月 21 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大剧院装饰一新，灯光通明，充满了喜庆色彩。除各国代表团外，前来赴会的苏联国内代表都是精心组织的，苏维埃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是很高的荣誉。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国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容光焕发的斯大林走上台后，首先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大家。所有人望着站在斯大林身边的毛泽东竟如此高大魁梧，气度不凡，不禁发出一阵阵的议论和赞叹声。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祝词。祝词热情洋溢，十分精彩，自始至终抓住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在费德林的翻译宣读中场内反映热烈，气氛活跃。费德林没想到这篇祝词竟会如此抓注人心，他自己的情绪也被感染了，当他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明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人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广泛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时，全场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有人挥动起了帽子和手中，场面十分热烈壮观。

斯大林也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报以感谢的一笑，他轻轻地鼓起掌来。在整个会议中，他不时和毛泽东相互交谈着，议论着。

庆祝活动安排的文艺演出开始了，斯大林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两人又边看演出边交谈着，显得亲密友好。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礼堂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雪亮，观众们都

回过头来鼓掌，有节奏地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

斯大林高兴地向大家挥动双手致意，毛泽东也起身向人们挥手表示感谢。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震荡着大厅……

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西方报道的捏造消息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下去了。

毛泽东游览列宁格勒

毛泽东这段时间的活动安排是丰富而充实的，他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和其它一些地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除此外，他在住所里请师哲为他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来观看，全是俄国和欧洲的。毛泽东不愧是历史学家，他对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能做出独到的评价，连斯大林闻讯后也佩服他说：“毛泽东真了不起，很聪明，专看历史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几天后，中苏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友好条约已在商谈之中……”公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和关注，这份公报的发表是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意思办理的。毛泽东在公报发表的第二天，便前往列宁格勒参观访问去了。

一月的列宁格勒天气很冷，一连数日的大雪，使围绕这座古城的辽阔田野变成了茫茫雪原，各种树干树枝像长出了白色的翎毛，田野里那些被雪盖住的冬季作物都成了无数的雪堆。几辆黑色高级小轿车从雪原上驶来，留下了长长的车轮印迹。

毛泽东到达后，提议去看看波罗的海的芬兰湾，这儿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

当汽车驶到波罗的海海边上时，毛泽东踏着长长的海岸线，眺望着十月革命时工人们暴动的喀琅施达特要塞，仿佛又在追寻着历史的足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然而为了寻求一条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的道路，他和他的战友们费尽了心血，吃尽了苦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牺牲。毛泽东清楚地记得，1931年8月在江西南部的根据地党代表大会上，他被解除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彻底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而罪名就是反对“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不屈不挠性来实现共产国际的决议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不仅仅是王明路线对他的打击和排斥，也是少数号称正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实际上的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对他的打击和排斥。正是这些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使中国革命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牺牲。毛泽东正是在这些代价和牺牲中摸索出了一条马列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才使

中国有了今天，而今毛泽东就站在了十月革命炮声响起的地方，他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波罗的海一到冬季，大海沿岸全结了冰，连成一片。毛泽东在一宽阔的冰面上停了下来，脚下的大地像一片望不到边的冰凌水晶，置身于这绚丽的千里冰封中，毛泽东兴致很浓，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迈着滞洒而轻快的步伐在冰面上又走了起来。当他那伟岸的身体在一处冰坡前停下来时，随行人员又恳切地上前劝他休息休息。

毛泽东豪情满怀地挥挥手，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崴——到太平洋的西岸至波罗的海——再到大西洋的东岸；然后从黑海边到北极圈，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个遍。”

“真有气魄呀！”随行者中有人感慨地小声说了一句，人们顿时也被毛泽东的博大胸怀所感染。

在列宁格勒期间，毛泽东还应邀参观了一些工厂和部分著名的历史遗迹，尽管他天天都要进行许多既定的访问和参观，但心里却始终在计算着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时间。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他“周恩来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

毛泽东一听大喜，他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

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他说：“君子言必信，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向他请示问候。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附近，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

周恩来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毛泽东拿起了话筒，直接与周恩来通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毛泽东竟然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谈得十分亲切，有时还哈哈大笑。

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自己这位杰出的助手。

两人的通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

通完话，毛泽东显得格外轻松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

一阵深沉雄浑的歌声在屋内响起来，缓缓的，沉重的越响越大，像奔腾的河水，流到了人们面前，这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动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着人们的心胸。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听着，又渐渐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么专注、深沉……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广场，苏方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是周恩来10年后的再次赴苏，他现在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分出现在莫斯科车站。

周恩来身着冬装，神采奕奕，面带笑容，一下车就以他杰出的外交家风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苏联领导人。他们目睹周恩来举止从容，落落大方，话语有礼有节，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点头称赞。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也是这样说过：“我认为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选周恩来，那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与毛泽东一行人相比，周恩来一行人就显得庞大多了，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宫、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人。

王稼祥同志照例赶到200多公里外去迎接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在1939年6月曾从延安来苏联治疗摔伤，在苏联住了8个多月。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共产国际于1940年1月至3月举行过一次特别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也是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关系的共产国际在解散前，对中共的工作作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建议中共及时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非常及时地把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带回了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苏德战争爆发和新疆盛世才转向反共反苏，阻隔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继续保持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中共也开始了旨在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所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了，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了。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老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半三更之时。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时间安排要比毛泽东紧张多了，他白天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谈判，晚上还要向毛泽东汇报和商量，常常是一天仅有几小时休息时间。可他仍旧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显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参加会谈的苏联领导人也自叹弗如了。

在谈判处于关键阶段的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仍在客厅里长谈着。

毛泽东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盛了不少的烟头，他手指上的烟卷还在冒着缕缕烟雾。毛泽东像是在思索什么往事，显得有些心绪难平。

“主席，时间不早了，您休息了吧。”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从1920年3月开始，到1943年6月为止，有23年多。”周恩来记忆精确地回答。

“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20多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

最大的。”毛泽东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周恩来点了点头。

“对！”毛泽东掐灭了手中的烟头，转过身来，“这就是我们在考虑中苏条约上的历史前提的呀！历史提供了我们经验，历史也提供了我们的教训。”

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话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过的三次“左”倾错误，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既对中国革命以支持，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缺乏信心，他在寻求与蒋介石政权发展关系的同时，也把本国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国革命发展之上，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

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国首脑举行了对战后世界局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了交易。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这样说过：

昨晚我同斯大林谈话时……他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俄国。他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用手画了一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我请他说明，他所关心的究竟是哪条铁路？斯大林指出是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条铁路，斯大林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特别重申：苏联无意干涉满洲的主权。当然，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苏联军队可能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1945年2月8日下午3时30分，斯大林同罗斯福正式会晤中认为他的要求是“正义”的，不然他和莫洛托夫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出兵对日宣战。他还向罗斯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共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既然他们有一条抗日统一战线，那为什么搞不到一块儿来？斯大林甚至还宣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没有哪个共产党强有力到足以统一中国。”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和对中共的干涉，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态度。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采取了坚定而明智的决策：既不直接干预苏美与蒋介石从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对斯大林的某些谈话，相反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尊重斯大林和联共（布）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维护团结，为争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创造中国革命形势取得大发展的局面而进行了成功的努力。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深得周恩来等许多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周恩来此行到莫斯科谈判签约，自始至终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的思想。

夜更深沉了，星月在天空闪烁，雪野冰霜与星光月影交相映射，为莫斯科的大地披上了深银灰色的衣装。屋内，毛泽东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上热水递到周恩来面前，关切地问道：“2月14日正式签约有把握吗？”

周恩来喝了口热茶，剑眉一扬回答说：“如果苏方不再提出新问题，我

想，2月14日正式签约是有把握的。”

“好！”毛泽东点点头，双手叉腰，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谈得很出色，应该记一大功。”

周恩来忙说：“是主席指挥得当，考虑周密。”

“不，要论这种场合，非你周恩来不可呀！”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神往……

“嘘——”周恩来蓦然做了个手势，止住了笑声，毛泽东也猛地意识到了此时已是更深夜静时分了。

窗外，夜色深沉，星月闪烁，预示着将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出现。

中苏正式谈判开始后，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也十分忙碌，每天清早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到世界各国主要报刊及首脑对中苏会谈的各种反映和分析。他让秘书把这类材料搜集摘录后，准时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少一件也不行。然后就亲自听取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等人的汇报，每当他听到汇报人总是提：周恩来的意思是怎样，周恩来的建议是如何之类的话时，就皱起了眉头，有时他干脆打断了汇报，说：“我更希望了解到毛泽东的意见怎样，毛泽东的建议如何……”

终于，斯大林再也等不及了，为了摸清楚毛泽东本人对结盟的真实具体意图，斯大林曾几次把电话挂到了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此时毛泽东已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请毛泽东住在近处，其目的也在于更方便联系。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卓越的、意志坚强、非常熟悉情况的人。然而到了晚年，他又显得性格多疑，他感到周围的人都不太可信，秘密活动到处存在，他对中国人的信任程度也并不能使人满意。记得1948年2月，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不听话”，坚持对蒋介石政权不做妥协的情况汇报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同志在莫斯科时同意我们的看法，但回到中国后又是另一种看法。”

当然，历史也使领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中苏条约是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的最主要问题，这一历史性会晤在当时不仅受到了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密切关注，在东西方最遥远的许多地方也紧追不放任何细节。

条约具体的内容是在周恩来和米高扬之间讨论和谈判的。周恩来则始终位于会谈的主角，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在新中国第一项外交使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会谈中周恩来的建议和意见使得米高扬也觉得几乎无懈可击，当最后一轮会谈完结时，米高扬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不久还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最后一次关于条约的定案会谈，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会，苏方除斯大林外的所有高级领导人也都全部出席了会谈。

大厅内5盏光线柔和而明亮的水晶大吊灯使得这儿的气氛格外亲切，双方平等地商定了各项协定和条约的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这些原则对于实现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加快经济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都是意义重大的，对此他感到满意。整个会谈中，一连几天没有休息好的周恩来仍是精神饱满，话锋敏锐，掌握着发言的主动权，毛泽东只是在关键地方插上几句有份量的话，充分显示出他的驾驭全局能力。

会后一位苏方人员感慨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签约 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2月8日，在所有的条约与协定开始拟定之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拜访了斯大林。由于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这次会谈谈得十分投机，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习惯地一个劲劝人吃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菜汤和烤羊肉串。

菜虽不算多，但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斯大林和中国同志边吃边谈着，当他了解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著述丰富时，便认真地想了想，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件大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回答：“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支持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斯大林手上的烟斗转动了一下，神色很认真。

“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就大好了。”毛泽东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唔——”斯大林眼睛盯着杯里的红葡萄酒，沉吟了好一阵子，毅然说：“我马上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斯大林握着烟斗的手挥动着。

“那太谢谢您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说。

斯大林笑了笑，显得有些得意。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来：“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但是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大都会饭店。”毛泽东明确地说。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斯大林不解了。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的语气很平和，但态度却有些强硬。

斯大林显然有些不悦了，他沉思片刻，侧起头来说：“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显然在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了。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坚持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毛泽东的话也显得软中有硬，他进一步说，“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停顿了下来，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冷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斯大林终于做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准备打破自己从来恪守的信条了，因为他清楚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常不一般的盟

友。

会晤结束后，斯大林再次破例把毛泽东一行送到了门口，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斯大林手中的烟斗轻轻转了两下，若有所思。

1950年2月14日上午，中苏双方正式举行隆重庄严的条约签订仪式，它意味着两个盟国的“蜜月时代”从此要揭开序幕了，尽管谁也无法预料到两个社会主义邻国的关系以后将会遇到什么坎坷和变化，这份条约的签订毕竟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剧烈的震动。

条约原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对周恩来提议加上的“互助”二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很合适”。

签字大厅内的灯光格外的耀眼，大小十余盏各式吊灯挂灯壁灯齐明，更增添了隆重气氛。

条型的签字桌中央分别插着中苏两国国旗，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了字，互换文本后，两人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也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至迟不过1952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在华权益。还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

仪式开始后，进程很顺利，可是当要签订贸易方面的协定时，文本却迟迟没有送到，双方领导人显然都等得有些着急了。斯大林不悦了，他问及下边，得到的回答是“中文的文本没有准备好。”斯大林不动声色，转身对中方翻译师哲说：“请您把这个情况通告毛泽东同志。”

师哲小声地对毛泽东耳语了几句，毛泽东不悦地一摆手说：“算了，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的身上行啦——”说罢，毛泽东再也不言语了。

然而文本的拖延是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差错造成的，他们在修改错误时耽误了时间，对此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他理智地示意维辛斯基再等等，一直等到文本送来后，场上的焦灼气氛才缓解下来。

签字仪式终于完结了，在全体人员合影前，毛泽东和斯大林又相互交谈了几句，彼此祝贺与问候。合影时站在中间位置的斯大林比毛泽东矮了些，他很机智地向前跨了半步，这样第二天见报的照片中，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是一样高的并肩出现在全世界面前了。

当印有照片的报纸送到斯大林面前时，他仔细地看照片。有些狡黠地笑了，似乎是在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你真聪明呀！”

然而毛泽东注意的却是报纸上消息的内容，对那张合影照似乎根本没有去认真留心过什么。

斯大林破例出席招待会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是一幢带有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2月14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把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厅全部包了下来，整整的一层楼都成了中国东道主接待客人的场所。自然，花费的租金也是颇为可观的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结束的告别宴会将在这里举行。

下午6时左右，中国东道主和请来的客人们都按指定时间来到了宴会大厅内，到处都是笑脸和热情的话语声，气氛是热烈而隆重的。

然而快到开始的时间了，仍不见斯大林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出现，不少人脸上浮现出忧虑不安的表情。大家担心斯大林是否真能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到这儿来参加招待会。几位苏方人员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认为情况不妙，另外一些人则显得信心十足地在等待着，他们都是平常很难近距离看见过斯大林的人，尽管他们的职位也不算低。

正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一位身穿便服的外交官悄悄走到苏方译员费德林身边，神秘地耳语道：“您应当到前厅去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

费德林心里掂量了一下，说：“你们做这件事或许更好些，难道这种事成了我的特权吗？”

外交官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费德林同志，关于特权的事，我们现在不谈它，我们现在是把你看做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还不明白？”他拉起费德林的手就把他带到了前厅，让他在指定的位置上站好。

6时30分，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饭店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了汽车，前来赴宴了，当前厅大门打开，斯大林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全场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这么近的看见过斯大林呀！

斯大林走到存衣处解开大衣，殷勤的服务员要上前帮忙，斯大林风趣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的。”他说完跟着费德林大步走进了宴会大厅内，顿时，全场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回荡开来……

斯大林停了停，向狂热的人们挥挥手，然后向“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大步走上去，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双手与斯大林亲切地握握手，请他在自己旁边坐了下来。

“斯大林同志，您好！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毛泽东同志，您的身体看来也不错，还适应莫斯科的气候。”

“还好！谢谢苏联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说完话将走上前来的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人中斯大林尚不认识的作了介绍，斯大林也微笑着同他们问候并握手致意。

敬酒开始了，大厅内灯光辉煌，欢乐的乐曲四下回荡，两国同志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酒词，但所有祝酒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并排站在用玻璃板壁隔成小间内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领袖在小间内交谈着、议论着各种问题，同以往的数次会晤一样，他们的谈话是没有题目的，高兴议论什么就谈什么，十分随便。

祝酒讲话开始不一会儿，大厅内的人流全都向小间前涌去，周恩来眼看玻璃板要被挤倒，忙叫人把它拆开，使大厅小厅合成一处，这样才使狂热的苏联人稍稍安定了一些。斯大林对人们没完没了的欢呼和兴奋看来有些厌倦了，他几次用目光向大家发出呼吁，但最终看来是徒劳的了。

首先发表祝酒词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嗓音洪亮，没有用事先为他准备的讲稿，但所讲的内容竟和讲稿几乎一字不差。周恩来主要讲了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中国人民感谢苏联老大哥的援助，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内容。他的讲话使得在场的苏联同志十分激动，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费德林有时也觉得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翻译了。周恩来

的讲话结束后，人们更关注下边的议程了，因为斯大林也要发表祝酒词了。

斯大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站了起来，显得从容不迫，他触了一下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说：“请注意，我要讲话了——”

他首先为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而举杯祝贺，他的语调是轻松的，他说：“中苏友好的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也代表了我的意思了。”可接下来他却把话锋一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起来，可惜今天与会者中间少了南斯拉夫的同志，我感到很惋惜……”最后，他放下酒杯，举起双手高呼着：“团结就是力量！”

宴会进程中，气氛始终很热烈，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祝中苏人民友好下去。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斯大林这时情绪很好，不时的与中国同志谈笑着……

这次宴会，斯大林与毛泽东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共同举起了祝贺的酒杯，尽管这酒杯的举起多少有些不容易，但它毕竟代表了5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的“蜜月时代”到来了。

告别宴会持续到午夜，人们才尽欢而散。

李克农严词毛人凤

这天，李克农部长认真地说：“小计，我这个报，你可要给我发好哇！”计兆祥连连颌首：“是！是！”

……………

此时，台北近郊。一座隐蔽在浓郁茂密树木中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里，笼罩着一种神秘、可怕的气氛。

神经过敏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刚刚接到人民解放军即要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情报，又接到情报部门报告：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已集中大批部队，空军已进驻华东的一些机场，登陆舰艇也正在一些港口集结。看来，那阵势是对着台湾来的。

毛人凤面带难色，忧心忡忡。而蒋介石这时正在阿里山庆寿。他暗自恩忖，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在毛泽东访苏归来时干掉他，中国的风云就会发生突变。否则，万能潜伏台、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将更加困难。不把握住这个时机消灭毛泽东，蒋介石不会答应！

这时，急功近利、坐阵督战的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对毛人凤说：“立即电告计兆祥，报告潜伏大陆暗杀队的准备情况，对东北技术纵队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并委任纵队司令马耐为国民党东三省救国司令。”

毛人凤焦虑地抽着香烟说：“按规定的联络时间已经超过了，可现在还没有得到大陆的任何反应……”

布莱德很敏感，打断毛人凤的话说：“立即电告计兆祥，停止发报，马上转移。”

“我看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共党再狡猾，也不会那么快发现我万能台的踪迹。也许计兆祥马上就会发来成功的电讯！”

电台安装完毕。

“嘀嘀嘀……”计兆祥熟练地按动键杆，用以往的手法呼叫台湾保密局，并传出毛人凤接电讯的讯号。

毛人凤得此消息，高兴地眼珠一转：“来了！”

他平心静气地守在电台旁，等待接收译电。

这时，李克农部长以无可仿效的口气说：“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在中国大地上洒满了怨恨，你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刻侦破你们。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有丧师八百万，逃往海岛的教训。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咎既往。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心惊肉跳地拿过译电原文又扫了一遍，不知所措。但他想最后摊牌的时候还未到，手里还有东北技术纵队这张王牌，心里踏实了些。只是眼下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待为好。特别是李克农的出现，更能惹怒“老头子”。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曾在“国统区”做电讯情报工作，把他和戴笠整得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悬赏10万元，捉拿李克农，但始终连李的影子也见不着。为此，他俩多次向蒋介石下跪请罪。蒋介石气得训斥他们是：“饭桶，无用，白痴！”他们对李克农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徒叹奈何！

冤家路窄。没想到，今天在无线电里，毛人凤被李克农义正严词地训了一通，不禁恼羞成怒！

他忽而一想，今天已命令在太平洋某半岛待命的两位特派员，飞往大陆督战，让计兆祥电告东北技术纵队准备接应。说不定，计兆祥的电报也被共产党截获，如果真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该死的计兆祥！混蛋！”他绝望地骂了一声，把电讯稿猛地一摔，吓得几位女报务员哆嗦起来。

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走过来，不知所然地问：“大陆的情形如何？”

毛人凤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仍然大叫大嚷：“他妈的，共产党进了北平，比过去更厉害了！”

特务们见状，都吓得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

布莱德上校看了译电，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但他故作镇静地说：“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的飞机已经起飞。你要有信心，不要激动，丢掉了万能台，但是我们还有技术纵队。”

毛人凤知道美国顾问不了解中共的厉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李克农部长见计兆祥发报以后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便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小计，今天这个报，你发的还可以，不愧是毛人凤的万能潜伏台。”

李克农走到院子中间，对侦察员们说：“攻克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的战斗，我们彻底胜利了！”

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向首长鼓掌致意！

李克农部长临上车时，对老曹说：“明天上午我再来看看同志们！”

“马司令”落网

这是一个早春的夜晚，天空黑沉沉的。

约7点钟，一架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飞机，正悄悄地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它小心地绕过猛烈的高射炮火网，穿过鸭绿江，又越过吉林，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低低地盘旋，寻找着合适的空投地点。

片刻之后，突然从飞机中部跳下两个神秘的怪物。稍顷，飞机便怪叫着在漆黑的夜空中消失了。

此时，成润之副科长、侦察员沈继宗和哈尔滨的侦察员，正等候在这里。

成润之副科长仰望着空中的两个怪物，沉着命令：“注意目标，迅速接近！”

两个怪物落到地面，收拾了一下东西，正庆幸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到中国大陆数百里时，忽然一道道手电筒光和一个个森严的枪口，对准了他们，他们沮丧地低下了头。

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证明，他们就是由台湾派来的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这两个人，曾是国民党高级刺客段云朋的助手。从他们的衣物中，搜出了美国的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

这两个特务叫张大平、于冠群。次日上午8点，将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鼓励反共有功人员。

翌日清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住着一位身穿蓝料子服，戴一副墨镜，留一撮小胡子，打扮得像绅士的人，独自在客房内踱步。他时而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临街的动静，时而焦急地看着怀表，好像是在等一个什么人的到来。

突然，门“砰砰”的响了两声。声音非常小，除非有意识听，否则是听不到的。

“谁？”穿蓝料子服的人问了一声。

“我。”门外的声音极小，“205来了！”

“请进来！”

门轻轻地敞开了，但只敞开了一半，原来门外站着三个人，除了那个敲门的中等个外，还有两人。他们三人侧着身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房主人转身坐到沙发上。中等个指着身穿蓝料子服的房主人，对另外两个人介绍说：“这位就是保密局特派员张大平先生，毛人凤局长的臂膀！”

其中一个高个子立刻摘下毡帽子，朝张大平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龇着黄牙，献媚地说：“久仰！久仰！”

然后，中等个又给特派员介绍说：“这位就是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代号‘205’。”

“噢！请坐！”特派员稍微欠了一下身子。

马司令看了看特派员的脸，小心翼翼地提起他的半旧棉袍坐在靠近特派员的沙发上，然后用手擦擦脑袋上的汗珠，假惺惺地说：“昨晚受惊了吧？兄弟未能亲往迎接，失敬，失敬！”

特派员点头表示体谅，然后站起来说：“我奉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命令……”室内空气立刻严肃起来，马司令把脖子挺得溜直，听特派员宣布：

“……蒋委员长的饬令，此仗不成功，便成仁。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

马司令松下了一口气说：“多蒙党国关照。请特派员指示！”

特派员一挥手让另外两个人到外边去。

特派员说：“马司令，谈一下行动的准备情况吧！”

马司令得意洋洋，往沙发上一靠，吹嘘起来：“这次中共访苏，共党防守极严，沿途及车站军警岗哨林立，还有便衣、地方干部都参加巡逻。我们给共产党灌了个迷魂汤，让他走时安然无恙，回来时粉身碎骨。”

“你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可靠？”

马司令压低声音说：“根据北平潜伏台指示，毛泽东专列明天晚上8点可到达哈尔滨。我们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举行三次行动。作战计划是分三路进攻。一路从正面攻击，打个快速歼灭；一路从背后堵击，防止他们撤退，剩下的一路迎击中共援军。事成之后，撤退到长白山区，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就可迎接国军到来！”

“有响货吗？”特派员问。

“当然有。都是香港送来的黄色烈性炸药。明天，我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埋炸药。到时候，炸药一响，把他们的专列打个一塌糊涂，叫他们签订什么中苏友好条约，建立什么反帝联盟，统统见鬼去吧！”说完，马司令嘿嘿一阵冷笑。

特派员点点头，担心地问：“行动计划都有谁知道，他们不能变节吗？”

狡猾的马司令不讲谁知道，因为他对特派员还有点戒心。

特派员要挟地说：“这次行动成功，立刻就发委任状，论功行赏！”

马司令一听，故意不回答第一个问题，而回答第二个问题。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说：“我手下的人都是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的人。我们报效党国，脑袋丢了也不会变节！”

特派员早已明白马司令的意思，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代表国府发委任状的。你不讲多少人，不讲组织成员都是谁，我怎么向上级报告，给你们请功行赏？”

想到发委任状，马司令不由得心花怒放。炸了毛泽东的专列，风云突变，大陆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他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司令。到那时，要女人有女人，要枪有枪，于是他便和盘托出东北技术纵队人员名单：“这是组织成员联络图副本，共170人。”

特派员看了看，将副本装进自己的衣袋，说：“到时，我就按这个单子点名！”

马司令操纵的这个东北技术纵队，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秘密武装。保密局在全国有三个技术纵队，一队在南京，一队在广州，一队哈尔滨。所有的敌特均经过严格的技术训练，都能熟练地掌握射击、爆破、投毒等特工技能。他们是“全五行”的杀人魔王，专门从事重大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解放前，这支人马大部分打入国民党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人民解放军，另一小部分则散落在社会上，隐蔽下来，伺机行动。

谈话进行了一点一刻钟。

该是收场的时候了。特派员看了看表，对马司令的谈话感到满意。

这时，那个中等个子的人敲了敲门，从外边走进来，把一张纸递给马司令，并很幽默地说：“马司令，你不是准备要委任状吗？我现在就发给你！”

马司令喜出望外，接过来一看，不是委任状，是逮捕证！

特派员笑了，问马司令：“司令先生，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说着，特派员把眼镜一摘，小胡子一薅，原来是成润之扮演的特派员。

翌日清晨，李克农部长准时来到侦察科现场指挥部云南会馆。

云南会馆这个幽雅、古老的庭院，充满着蓬勃生机：公安部侦察科全体参战人员，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一队部分侦察员，早在门前列队欢迎。

老曹快步向前迎接李克农部长下车。同志们高声说：“首长好！”

李克农部长一边走一边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进入客厅后，李克农部长招呼大家一块儿坐下，然后问：“老曹，这就是你的破案指挥所吗？”

老曹回答：“是！”

“那从今天起，就不是华北贸易货栈了。”李克农部长幽默他说完，接着问：“东北的情况如何？”

老曹说：“已经来电，一网打尽了！”

李克农部长更加高兴：“老成回来，我亲自给他们接风！”

由于李克农部长平易近人，说话风趣，不少同志又与他见过面，所以都能自动给他倒茶、递烟、送糖，无拘无束，显得很亲热。

高兴之下，老曹一时忘了请同志们向李克农部长作自我介绍。

李克农部长指着对面的外线侦察组组长辛立学问老曹：“他姓什么？”

“他姓辛。”老曹答。

李克农部长用英语风趣地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张嘛！”

老曹还没有明白李克农部长的意思，只是笑了笑。

李克农部长说：“嗨，他叫张飞嘛！”说完，又指着侦察员任洪友问：“他姓什么？”

老曹答：“他姓任。”

李克农部长还是用英语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李！”

老曹赶紧说：“噢！我明白了，他叫李逵！”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李克农部长说：“不再问了。如此爽朗的笑声，就是自我介绍了。你们这个队伍的同志，都是智勇过人，立场坚定，胆大心细的好同志！”

同志们纷纷说：“不敢当！”

老曹也说：“部长过奖了！”

李克农部长说：“同志们干的好哇！为侦破此案，老曹之所以敢立军令状，原来，你们有这么多张飞、李逵保驾呀！”

同志们没有等李克农部长再夸奖下去，辛立学代表大家说：“都是部长亲自领导，我们天天都能听到部长的指示，才打了胜仗！”

“哪里！哪里！我和你们杨副部长，也和你们曹科长天天向我们汇报一样，我们也是天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是党中央、毛主席天天在关怀着同志们的工作哟！”

李克农部长的话激起大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登上归程

午夜过去了，莫斯科沉入了梦乡之中。“当——当——”克里姆林宫钟

楼上的大钟钟声又深沉而悠扬的响了起来，宽阔的广场上已没有了人迹，天空中飞扬的雪花仍在静静的飘洒着。广场尽头处那座高耸的石座上竖着一块铁铸的纪念碑，这是纪念罗曼诺王朝帝王亚力山大二世的铁碑。此刻，这座古迹仿佛作为见证人，站在这静悄悄的夜晚里，向历史诉说着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之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在这寂静的深夜，已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周恩来却还没有功夫休息，他在房间里向工作人员一一布置着回国前的事项。他亲自清点带来的礼物清单，其中送给斯大林的是中国绸缎和屏风，其他领导人的也是绸缎刺绣之类的物品。周恩来还特别仔细的检查了分发给所有苏联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礼物，包括没有见过面的人也是一人一份，全都写上了名字。

分发完毕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要漏掉了一个人。”

第二天，当这些普普通通的苏联工作人员接到礼品时，好多人禁不住激动得大哭起来了。

启程的日子到来了，2 月 17 日，中国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回国了。这天早晨，毛泽东早早地起了床，他同往日一样，动手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又把房间整理了一遍，然后点着了一支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把这房里的一切看了看，像是在同它们告别似的。

门轻轻地推开了，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端着水走了进来，她一见毛泽东早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不由得一阵激动。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毛泽东总是自己收拾房间，这使那些长期在斯大林身边服务的人员感动不已，今天毛泽东要走了，仍然早早起来收拾好了房间，女服务员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她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不由得哭出了声来。

毛泽东笑着拍拍她的肩头说：“我们要走了，欢迎你到中国来做客哟——”

分别的时刻到来了，苏方全体服务人员都赶来送行，不少人哭红了眼睛，他们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亲切朴实，短短两个来月，中国领导人已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莫斯科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前来送行的苏联同志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来向毛泽东送行，他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请您一定注意保重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应该保重。此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这是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您的。”莫洛托夫说这话时神态很认真，斯大林晚年性格中那种多疑，总感到自己周围有许多幽灵，这种心理状态也影响着像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眼中，权力是神秘的，权力的力量应当使人捉摸不透……

可毛泽东似乎与苏联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把自身的安全看得多么重要。他握了握莫洛托夫的手，笑着回答：“感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也请您转告我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长长的汽笛声划破长空，专列徐徐启动了，与毛泽东同车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从窗口探身向送行的苏联同志挥手告别，人们彼此久久地挥着手，直到列车远去。

阳光从云层中探出了头，洒在大地上，2 月的风已有了一丝暖意。车窗外，远处的雪线在慢慢上升着，渐渐显出了一片新绿，人们似乎感到了春天将临……

2 月 26 日，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城满洲里。毛泽东到

达满洲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致谢电，周恩来总理也向维辛斯基外长发了致谢电。

1950年3月14日晚，毛泽东回到了首都北京，结束了他这次并不是很轻松但却很有成果的首次出访。

第四章

胡志明秘密访华请援，新中国慷慨相助。中南海派出第一军事顾问团，陈赓受权指挥越军

越南人民面临严峻的局势

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越南人民面临着严峻的局势。

按照苏、美、英三国的《波茨坦公告》决定：在彻底粉碎日本法西斯军队之后，对于占领越南的日军，以北纬16度线为界，其线以北由中国的国民党军受降，其线以南地区由英国军队受降。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不久，便受到美、英两国支持的法兰西军队在西贡强行登陆，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民族战争开始了。

1946年3月，进驻越北的国民党军开始撤出，法军着手于海防、河内两地集结兵力，终于在12月19日发起全面进攻。

与此同时，法军又以5个团的兵力对越南中部的岬港、东海蜂腰地带实施登陆作战，完成了对越南的军事分割。

1947年初春，侵越法军总兵力超过了10万，攻占了越北的大部分城市和集镇。9月，法军又集中了12个团，在空降兵和海军舰队的配合下，使用机械化部队作纵深穿插迂回，对越军进行合围攻击。

越共中央和政府转移到越北山区，各根据地被法军分割，不断遭受扫荡。

1948年，美帝国主义通过对法国实行军援的决定，介入了越法战争。

就在越军艰苦抗战之际，中国革命发生了巨大的战略转折，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饮马长江的消息传到了越南，这场战争的胜利将给世界带来巨变，山水毗连的越南无疑是最先感受到的。

1949年1月，越共中央举行会议，确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打到印度支那边界，要求越南部队努力准备，迎接“大好时机的到来”，“绝对不应错过战略机会”。

对中国革命将胜利所产生的影响，法国殖民当局也感受到了。于是向越南增派了援军，加强了对中越边境的封锁，力图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中越边境之前，稳固法方在印度支那的局势。

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越共中央领导人胡志明，不得不向外伸出求援之手。

罗贵波中南海受命

1950年新年伊始，北京中南海静谧得没有一丝声响。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走出居仁堂，向万字廊方向刘少奇办公的地方急急走去。

冬天的中南海700亩湖面冰莹一片，点点冰光闪烁，映照着水边古老的元、明、清三朝帝王行宫。湖畔墙外的世界已经完全变样了，只是湖边的雕栏玉砌依旧。

穿过一道两边红墙耸立的窄巷，经过万字廊，罗贵波走进刘少奇居住的院落。

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王光美连忙迎了上去，寒暄几句，将罗贵波引入办公室。

罗贵波一边走一边抬眼望去，只见院落年久失修，墙壁和油漆剥落得斑斑驳驳，与中南海中金碧辉煌的大殿、楼阁形成鲜明的对比。

王光美见罗贵波的诧异表情，微微一笑，解释说：“这里原是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光绪的命运是个悲剧，后来自然没有人为他修房子。”

罗贵波感慨道：“真是世态炎凉啊！皇帝也不例外。可现在已是新中国了，为什么还没有人整修呢？”

王光美说：“少奇同志住进来以后，把东边厢房作了办公室。这个院子小，房间也窄小，曾有不少同志建议把房子扩建一下，可少奇同志认为国家刚成立，还很穷，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始终没有同意。”

“原来是这样！”罗贵波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天气很冷，罗贵波踏进屋子，顿时觉得暖和了许多。

刘少奇见罗贵波进屋，连忙起身，握住对方的手，让他坐在火盆旁，说道：“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让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还有什么意见吗？”

这件事罗贵波早在上年的12月间便知道了。已经知道越南党派来了代表，提出了要求中共中央予以援助的事情。

若干天前，刘少奇已经征询过罗贵波的意见。当时罗贵波没有丝毫准备，未置可否，而且刘少奇曾说，这件事还要请示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主席才能作最后决定。

此刻刘少奇谈得如此庄重，罗贵波自然明白中央对此事持何种态度，他想了一下说：“以前从没有担任过这样的工作，缺乏经验，怕误事。另外，不知去多长时间，我到北京原想是检查身体的。”

刘少奇说：“时间不会很长，大约三个月，主要是去越南了解情况，向中央汇报。”

尽管刘少奇说的轻松，罗贵波还是觉得情况非同一般，他沉默了片刻说：“我深感中央对我的信任，但这对我来说是一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工作，任务复杂而且艰巨，我担心难以胜任。”

“我们认为你完全可以的。”刘少奇接过话茬说，“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停了停，刘少奇又接着道：“何况法国殖民主义者还勾结国民党残余部队和边境土匪、封锁中越边境，经常骚扰我国云南、广西地区的边民，这就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我此次去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罗贵波问道。

“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到越南主要是去看一看，去商量怎样援助越南。你先去了解情况，首先建立两党关系，作调查研究，供中央决策，时间大约三个月。完成任务后即可返回北京了。”刘少奇说。

“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罗贵波脱口而出。

在与刘少奇谈过话后，罗贵波的工作顿时紧张起来。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下，他先和从苏联来北京的越共中央委员黄文欢（当时化名陈春风）见面会谈，然后又与一直等在北京的李班、阮德瑞见了面，听取他们对越南情况的介绍。

接下来，罗贵波又同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进行了接洽。

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带着一部电台同秘书、参谋、机要员、警卫和报务员等8人，离开了北京。

临行前，罗贵波到中南海向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辞行。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刘少奇问。

“是的，明天一早便起程了。”罗贵波静静地说。

“你去越南这件事绝对保密，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由越共中央确定，在适当的时候回国汇报。”刘少奇嘱咐说，“赴越代表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你们，不要提过多的要求。”

“请放心，我一定小心谨慎。”

“这里有一封信，你带给胡志明。”刘少奇说着，将一封信递给罗贵波。

信中写道：“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8人。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

在越共中央代表李班、阮德瑞陪同下，罗贵波一行乘火车按时出发。

实际上，在罗贵波着手准备前往越南的那几天里，越共中央已经和中共中央沟通了无线电联络。

胡志明首进中南海

1950年元旦，胡志明主席致电毛泽东主席：“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后这种友谊将更加紧密起来，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并保卫世界的和平。”

1月15日，越南外长黄明鉴又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出照会：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

这份照会立即由刘少奇转给正在苏联的毛泽东，毛泽东立即亲自起草复电，并于1月17日电告刘少奇：

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十八）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给胡志明；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1月18日，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藉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刘少奇送走罗贵波之后的不几天，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便出现了胡志明秘密进入广西的电报。

事实上，刘少奇对胡志明此次来华早有思想准备了。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会晤。

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个认识，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东移，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求助于你们。如果这样，由你们给予援助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则不行，因为我们离得远，也不如你们了解情况。”

斯大林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定下了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苏联与越南关系的总格局。

刘少奇迎来胡志明后，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便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住下，并电召已经出发的罗贵波返回北京与胡志明见面。

刘少奇同时安排了，由他本人参加，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组成的中方会谈小组，与胡志明会谈，解决胡志明提出的问题。

对于胡志明到达北京一事，刘少奇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一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

经过会谈，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已决定承认越南。同时，中国政府还将与苏联政府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

刘少奇还说，中国政府承认越南，会使正打算承认中国政府的法国政府延缓承认时期，但是我们不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使越南人民尽快胜利。

胡志明听了刘少奇的一番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稍微平静了一下之后，胡志明表示要继续留在北京商谈援助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周恩来、毛泽东在莫斯科之机，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

中苏援越计划

斯大林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

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他希望与中国人商量之后决定。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再次谈到了他关于“世界形势”的认识。

他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

斯大林宣称，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

最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随即，胡志明随同毛泽东的专列离开莫斯科到中国。

途中，胡志明向毛泽东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

“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毛泽东听了对方的要求后，幽默地说。

“土顾问我们也要！”胡志明坚定地说。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中央军委的有关人员讨论援越问题。

大家的意见是，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翼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从根本上说，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所在。

胡志明完全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意味着什么。他高兴地对越南海外事务工作的负责人黄文欢说：“现在中国已解放，力量对比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战几年来，依靠本身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中国决定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援助，因此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重点不在泰国，必须转到中国。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的任务。在工作过程中要努力学习许多新的事物。但最有利的一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同志都表示要尽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尽管中国刚刚获得解放，他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

胡志明请派中国军事顾问

1950年3月9日，经过50多天的辗转跋涉，罗贵波终于踏上了越南的国土。

此时胡志明在访问了苏联和中国之后，已经先罗贵波一步回到了越北根据地。

待罗贵波稍事安顿，胡志明便请他参加了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前后持续了两周，详尽讨论了如何打开越中边境局面，以便接受中国援助的问题。

同时，越方提出了请求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的一揽子方案。

越方在会议开始就强调，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战役，将法军封锁的越中边界线打开一个口子，开辟一条中国至越南的交通运输线，将援助的物资运进越南。

为此，越南方面制订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先打老街，打开中越云南边界的通路，争取利用滇越铁路之便运输援助物资；一是先打高平，打开中越广西边界。

3月19日，罗贵波在研究了越方提供的有关材料，经过实地考察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报告了与越共中央协商的结果：准备实施一个边界战役，请求中国政府予以支持，派出得力干部帮助越方打赢这一仗。

同时，罗贵波还向中南海报告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先打老街，打开云南方向的边界，则因云南地势太偏，那里的物资和交通条件不足以供应越南战争的需要。从这点上看，应首先夺回高平。中南海回电，虽未置可否，但电文倾向于同意罗贵波的意见。

要打仗，必须有部队；要打胜仗，必须有战斗力强的部队。当罗贵波视察了越南人民军后，他吃惊不小，严格地说那不能算是正规部队。

几十年后，罗贵波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没有想到越军的情况竟是这样的，部队普遍缺粮，油更谈不上。战士们体质虚弱，衣服多已破旧，大多数人打赤脚。武器装备更差，什么型号的枪都有，使弹药的补充很困难。特别是他们没有打过较大的战役，缺乏攻坚战的经验。纪律也松散，这样的部队怎么能在越中边境打大的战役呢？”

罗贵波根据越方的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要打通中越边界，是要把军队攥成两个拳头。目前越南部队大都以营、团为单位独立活动，力量过于分散，越南党中央应早下决心，组建起一个或两个正规的作战师。”

不仅罗贵波发觉了越南人的不利面，他们也发现了自己致命的弱点，越共中央指出：“我们的政治基础强大，后方巩固，军民士气高昂。但我们还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和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讯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

于是，越方正式向中方提出：整编正规军，请中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提供地点，将需要整编的20000名越军主力开到中国去整训，由中国对这部分越南部队进行武器弹药、医药和通讯器材方面的全部装备。

同时，为了顺利实施拟议中的越中边界战役，胡志明请毛泽东下令向越军派出军、师级的军事指挥员担任战役顾问，派出团、营级的军官到越南部队中担任团、营顾问。

中南海巨人聚首点将

1950年春，越军第一个正规的整编师——308师（当时称“大团”），组建起来了，由王承武任师长，双豪任政委。

毛泽东很快便作出了决定：同意在中国境内整编越军。

进入中国的越军将分为两部分，进入云南文山地区的308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负责整训；越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174团和209团，开入中国广西龙州，由广西军区整训。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里，为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越军作战的事宜，与中央军委的其他几位领导进行讨论。

“朱老总，你看由谁来担任此次入越援助的领导？”毛泽东见开会人员到齐后，便直接向总司令朱德发问。

“这次入越的情况比较复杂，必须是一位军、政皆熟的人。”朱德静静地坐在那里，表情十分严肃。

“不错！”周恩来接过了话说，“这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是否能够战胜法国殖民者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新中国能否立足于世界强林之中。谁去，

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一下。”

“恩来说的不错，此人必须得慎重慎重再慎重。”毛泽东理了理头发说。

“我与恩来同志商量了很多次，一致决定让原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来担任。”朱德说。

“韦国清吗？22年前与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他们一起参加百色起义的，又进过红军学校学习，还参加白塔埠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上海战役，在军、政方面确有一定才能。”毛泽东说。

“主席真是好记性啊，多少年前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

“这叫着知彼知己，方可做到百战不殆。”毛泽东哈哈一笑道。

“韦国清现在是否在北京，我要立即召见他，与他探讨一下。”

“他在北京，本来准备让他到外交部任职，故此将他调至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工作，还没有定下来。”周恩来说。

“我看……”毛泽东看了看众人，停顿了片刻说，“以第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部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

众人听后都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等待着毛泽东继续讲下去。

“再由第三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四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军军事学校的顾问。”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朱总司令，你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周恩来见毛泽东说完了，便把目光转向了朱德。

“让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各抽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军事顾问团，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朱德说。

随即，中国大陆上的电波频频从北京呈发射状四处散开。

越 308 师编训中国境内

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和韦国清商议后作出决定，由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首长组成顾问团团部。这个总队的队长和政委、政治部主任三人，按照韦国清的指定，分别由梅嘉生、邓逸凡和李文一担任。

一纸纸调令，使刚刚拂去了解放战争征尘的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迅即离开了各自熟悉的岗位，集合起来，向南方那个多少有些陌生的经纬走去。

就在军事顾问团迅速组建之际，在中越边境上，整训越南正规部队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滇桂黔“边纵”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赶往砚山，会同第13军干部整训越军。

为了能使越南人民尽快赶走法国殖民者，中央军委责成第4兵团第13军负责，向进入云南的越南部队提供全套最新装备。要求“凡是国民党统治区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一件也不给越军，要给，就给全套美式装备”。

第13军军长周希汉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连续一个星期挑灯夜战，拟定了整训越南部队的方案。

越南西北战区负责将领王承武、双豪先期来到云南开远我第13军军部，和周希汉军长商议越南各部队分批开进云南的具体安排。

经过数轮会商之后，双方议定：越军各个战斗单位在河江集结，集结完毕一批即从麻栗进入中国境内；开进部队的掩护问题，以清水河为界，以南

由越南部队负责，过河之后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安全警戒。

至于整训地点应该在哪里？越方与中方发生了分歧，越方提出在麻栗坡或在麻栗坡后 50 余公里的文山县城。

但是，周希汉军长对越方提出的两个地点都认为较为不妥。他指出：麻栗坡一来距离边境太近，二者县城地处山沟；文山县有我军一个团在那里执行剿匪作战任务，不便于军队训练。最后，越方同意周希汉军长指定的整训地点砚山县。

遵照周希汉军长的命令，设在砚山的第 13 军随营学校数千人于 5 月初搬迁到滇中弥勒县，腾出房子让给即将开进的越南 308 师。周希汉带领一批干部和电台人员紧接着就到了砚山。

从 5 月 7 日开始，越南部队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由越南河江省进入云南，越军在麻栗坡县边境老山下的清水河两岸，把各种枪支放在河岸上，然后徒手进入中国境内。因为越方提出，他们还缺乏武器。于是我方即表示，凡是他们需要的枪支都带到清水河放下，然后运回越方根据地使用。徒手进入中国的越军在砚山领取全套装备。

可惜的是，越军的第 36 团被法军隔断在河江三角洲地区，未能来到云南整训。

跨过国境线，越南部队进入刚刚结束了战争的和平土地，他们再也不必专拣夜间行军，也不必担心法军直升飞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

对于越南的这支“两广纵队”，饱受战火和法西斯蹂躏的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云南当地的百姓沿途箪食壶浆相迎，并举起了无数欢迎的大幅标语。

这支“两广纵队”衣衫褴褛，绝大部分人赤裸着两脚，面色苍白。可是，他们一到砚山顿时变了样。

“两广纵队”按照班的编制走进排好的房子，里面是已搭好了的 12 个铺位，铺位上挂着蚊帐。12 支枪排列在门边，其中 10 支步枪、两支冲锋枪，还有崭新的军装……

6 月初，除了 36 团以外，预定的越军各个战斗单位都来到了砚山，越南人民军的第一个主力师——308 师（大团）在中国云南省砚山县正式编成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3 军抽出一个师的连以上干部整训越军。主要内容是班、排、连、营规模的进攻战术训练，单兵技、战术训练，以及抵近爆破、埋雷、设障，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摧毁敌工事的战斗技能训练。

越南官兵对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特别感兴趣，认为适宜在越南战场广泛使用，后来的战争果然用上了这一战法，成为摧毁敌军机场飞机和一些非永久性目标的最适用的战法。

中国人不仅为前来整训的越军第 308 师装备了全副美式轻武器，而且还提供了 12 门山炮和充足的炮弹，帮助越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山炮营。

为此，周希汉军长命令该军的山炮大队开赴砚山，从大队长（营长）到连、排长、瞄准手、驭手，一个对一个地手把手散练。最后又把拉炮的骡马一起交给越军，这些骡马都算得上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全部是从北方转战千里来到云南边疆的。

事实上，向越第 308 师提供的装备之精良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他们得到了 10 门五七式无后座力炮，乃是解放战争后期重庆兵工厂的最新产品，中国军队还没有用过便先装备了毗邻之邦。

援越顾问团受命颐年堂

中南海颐年堂，画栋雕梁。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师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军官和机要人员约40人，在6月30日的下午，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待中央领导接见，授予任务。

偌大的颐年堂里空荡荡的，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什么摆设也没有，屋子一头摆着两张木桌上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摆了几十张椅子和凳子，使得整个颐年堂变成了简陋的会议室。

唯一留在颐年堂的便是挂在墙壁上的清代宫廷字画古迹，那些有文化的军官们便乘机移到墙边看了起来。

“首长来了。”不知谁轻轻地说了一声，众人立刻返回到各自的座位前站好。

朱德总司令第一个进来了，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众人中不管是否相识，大家全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刘少奇、朱德先和站在门口的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寒暄，然后拉着他们走到屋子正中的桌前一齐坐下，接着，大家也分别坐了下去。

稍顿了一下，刘少奇又站了起来，点头向大家致意说：

“今天请诸位到这里来，要谈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来毛主席、周总理都一起要和大家见见面的。”

在这40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亲眼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本想借此机会一睹二位伟人的神彩，听了刘少奇的一席话，心中顿时有一种惋惜之情。

“由于朝鲜已经打起来了，情况你们也都看了报纸，总之，情况很紧张，怕帝国主义插手，因为这关系着朝鲜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央很关心朝鲜的局势，忙得很。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觉，现在他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那么就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谈谈吧。”刘少奇稳重他说，“怎么谈？是座谈吧，是不是请大家先谈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言。刘少奇转向朱德说：“总司令，你先说说吧。”

“副主席先说吧，”朱德十分谦虚地对刘少奇说。

刘少奇点点头，又一次问道：“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不愿意离开祖国到那里去工作。是吗？是什么原因呢？可以提出来谈谈嘛，有话就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考虑不去。”

没有人说话，因为大家都是愿意去越南工作的，还充满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鲜感。在顾问团组建过程中只有一两个人提出过不想去的意见。

刘少奇看着众人，又接道：“没有人说话呀，那我就说了。这次你们去越南工作，是一件大事。去不去，是个原则问题，也是共产党员的立场问题。大家都是党员吗，共产党员怎么看这个问题？是的，我们国家是解放了。但是还要深刻地想一想，台湾还没有解放嘛，大陆上还有残余势力和暗藏的敌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毛主席说过，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怎样理解呀？我们解放了大陆，蒋介石能甘心吧？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

国主义能甘心吗？”

接着，刘少奇又以李自成为例，告诫他们不能骄傲，不能掉以轻心，应时刻提防国际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勾结，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现在的胜利只能是开始，不是完成了任务。我们没有理由满足，没有理由骄傲，不能有享乐思想，不能松劲。就拿越南来说，他们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并不亚于我们，所受的痛苦甚至比我们还重，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和越南是近邻，边界上的人民互有亲戚，对于他们的困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能坐视不救吗？如果说，越南被法国占领，我们的边界能安全吗？他们被征服，我们就会受到直接威胁。所以援助越南，既是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胜利。

刘少奇讲完了，他看了眼朱德，征询他的意见。

“你讲得很好，我完全赞成。”朱德点了点头。

刘少奇说：“你也讲一讲他们到那里去的任务，要注意的工作方法。”

朱德不再推辞，宽和地对顾问们说了起来：

“刘副主席讲的我完全同意，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这次你们去越南，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同时很光荣，你们去干什么呢？不是像外交官那样办外交，而是要去帮助人家打仗，要上战场。帮助不是代替，不要推开人家，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而是出主意，想办法，平时介绍我们的经验，打起仗来帮助分析敌情，提出意见。

“去了还要了解人家的实际情况，人家也有经验，不要看不起人家的经验。介绍我们的经验也要切合人家的实际情况，不能照套我们的经验。比如，他们大体上和我们抗日战争时的情况相似，是不是应该以游击战为主呀？在有利的情况下打一打运动战呀？至于具体的作战方式，我看咱们的经验是可以适用的。要打胜仗，部队建设是先决条件，我们军队建设的经验我看都可以用上。要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都要搞好。”

朱德的讲话不长，他在快结束的时候说：“听说越南还很艰苦，你们要准备吃苦，要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去，这样可以以身作则。”

说到这里，朱德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桌面上的一张纸单，又把它拿起来，说：“我看了你们要携带物品的单子，有一些就不大需要。比如说皮鞋……”

话音未落，颐年堂里的顾问们“哄”地一声笑了起来。

原来，朱德手里攥着的，是顾问团写的一张清单。顾问们认为，他们要出国了，希望发一块手表，一支好钢笔，再发一双皮鞋。

说句实在话，顾问们的要求并不算奢侈，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大多数人已经多年没穿过皮鞋了，甚至还来不及拥有一双皮鞋，更有甚者，自小在牛背上长大，还从来没有穿过一回皮鞋。

但是，朱德总司令却不了解顾问们的心情，他十二分不满意地说：

“到了越南还要住农村，又是稻田、水网、山林什么的，皮鞋没有多大用处，背上还增加重量。”

刚才还觉得可笑的顾问们，看着朱德的神色，听着他的言辞，顿时三缄其口，一言不发，相互对视一下，连忙又各自垂下头。

朱德严肃地看着众顾问，接着说：“还是多带点草鞋布鞋比较适用。手表，是不是每人都要有一只呀？我看领导同志有就行了。还有派克钢笔，听

说要几十万元一支（当时币制，1万元合人民币1元——笔者），写好字不在用什么笔，毛主席的字写得好，他就没有派克钢笔，只有几支毛笔，有时也用铅笔。我看咱们新出的新华牌钢笔就不错，便宜又好使，可以每人发一支。衣服，也不要像外交官，不要这个料子那个料子的。他们游击队都穿便衣，最近编了些正规军，听说正式军衣也没有发全。我们可以做一些像他们军衣那样的衣服，不要特殊……”

“主席来了！”

朱德手里拿着清单正说的起劲，不知谁喊了一声。

众人连忙站起来使劲地鼓掌，毛泽东不知何时已站立在颐年堂之中。

刘少奇迎着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来了个把小时了。这几天你太疲劳，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哎，事情太多，睡不着啊。”毛泽东挥了挥手。

随即，毛泽东先与韦国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交谈了片刻。接着又走到屋子中间，和顾问们逐一握手，并且亲切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

“主席，给大家说几句吧。”刘少奇等到毛泽东回到桌前说。

毛泽东说：“你们都讲了，我再讲就要重复了。”

“主席，你就讲一点吧，大家都希望听到你的教诲。”朱德说。

“朱老总，你言重了，从何谈起‘教诲’两字。”毛泽东说。

“主席，你就别客气了，大家来了都是希望看看你，听听你的声音。”刘少奇说。

“主席，你就说几句吧！”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附和道。

毛泽东看着众人，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们都坐下吧！”毛泽东双手向下按了按。

待众人重新坐下后，毛泽东走到顾问们中间，说了起来：

“同志们，这次你们去当顾问，是一件大事、新事，我们党和国家、军队是第一次向外国派顾问团，这个意义很重大，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执行一项很重要、很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作出好成绩，取得好经验。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地派顾问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共产党人义务所在。

“世界上还有许多受压迫、被侵略的国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他们，还要伸出双手去援助他们。不可因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就认为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还要看到帝国主义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所以，帮助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唇亡必齿寒，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你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的事，这是我们要派顾问团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为什么要派顾问团时，毛泽东说：“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革命斗争中，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我们的斗争。胡志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就参加了，还有许多越南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血牺牲。另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就是在国际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才这样做的。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

停了停，毛泽东又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俗语：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还有一个原因，春节期间我不是去了一趟莫斯科吗？胡志明也去了，他是去寻求苏联援助的。在莫斯科，斯大林不了解胡志明，说不知胡志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胡志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见一见他为好。这样斯大林就见了。但是在胡志明提出请求苏联援助、派顾问时，斯大林没有同意。

“在回中国的路上，我和胡志明又谈了这个问题，胡志明则要求我们派出顾问团。我说物质援助我们应尽力而为，至于派顾问团，我们不大好办，因为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没有进学校的门，只是打仗有些经验。可是胡志明还是多次要求。我就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一下，要派，也是当顾问呀。”说到这里，众人都不禁笑了起来。

“既然斯大林不愿派顾问，那也就只能由我们给越南人民一些援助了。”毛泽东静静地说，“我从苏联回来，中央研究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派顾问团。现在已经派了罗贵波先去越南。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才决定派这样规模的顾问团。这就要大家辛苦一次，中央还准备叫陈质同志先去一步，他和胡志明是老朋友，我们已经在边界上帮越南人整训了一些部队，装备了武器。”

“你们嘛，”毛泽东接着说，“这次请韦国清当顾问团团长，本来是叫他去联合国工作的。但是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不让我们进去，还要那个蒋介石。以后我又想让韦国清去英国当大使。但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里只能降格了，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团长。他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哪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他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

讲到顾问团工作任务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去的任务，就是协助人家打仗。现在他们还是游击战，没有打过较大的仗，主要是分散打游击。法军现在主要是控制城市、交通线、沿海港口，越军则占着广大农村。这和我们抗日战争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光打游击战不行，要取得胜利，还要打大一点的仗。能打攻坚战、能打运动战，才可以转入反攻、打败法国。要打大一点的仗，就要集中大一些的部队。目前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些，由我们帮助装备。以后还要进一步集中一些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编成正规部队，经过训练以后打一些大的仗。”

“当然，”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不能削弱游击战。有些游击队升级了，还要扩大游击队，这方面你们有经验。总的说来游击战结合必要的运动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但你们主要是帮助他们组建正规部队，教会他们打正规战。游击战他们自己有经验，由他们自己去搞。”

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说：“向运动战转变要注意步骤，多作调查研究。口不要张得太大，先打几个小一点的仗，锻炼部队，提高信心，初战必胜嘛。解放战争的原则不要忘记，每次都要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有三倍、五倍甚至更大的优势兵力，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打赢。运动战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占领城市据点为次。所以，你们去了要先集中部队，加强装备和训练。”

至于怎样当好顾问，不丢中国人的脸，毛泽东说，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是参谋，给人家的指挥者当好参谋。参谋的职责是协助别人。

接下来，毛泽东提到了刚刚从越南返回中国的洪水。这是罗贵波到越南后不久处理的最为棘手的事情。洪水回越南担任军区司令员，屡建战功，但

是他和总司令武元甲的矛盾却越来越深，终于到了怒目相视的地步。为了调整这一局面，胡志明便告诉罗贵波，如果洪水愿意返回中国工作，越共中央也同意，并请毛泽东批准。

毛泽东在北京得到罗贵波发来的电文之后，即回电罗贵波，同意让洪水回北京。

由此，毛泽东提醒大家，要虚心，不能骄傲，看不起人家，否则，搞得不好也会损坏两国关系。

“要使越南人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毛泽东看着顾问们，深有感触他说，“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依靠外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穷，也是事实。百多年来，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我们是搞得很穷。但我们援助被压迫民族是无私的，尽一切努力的，我们援助是有限的。这样就得靠他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去赢得最后胜利。”

说到激动时，毛泽东突然站了起来，提高声音：“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个国家、党、人民、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胜利了，才有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才能富强，才能真正的独立解放，才能真正的胜利。”

毛泽东的话语充满激情，使颐年堂内的顾问们顿有所悟，随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最后，讲一讲保密问题。这件事要特别注意，‘顾问团’的名字不要随便叫，要搞个代号。如果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派了顾问，一定要大做文章。所以，你们的行动要绝对保密，不可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毛泽东突然将话锋一转，“要多穿便衣或者着越军的军服，我们的军衣一律不能带去。到了越南后不要随便外出，不要单独外出。作战时要十分慎重，不要太靠前，免得被敌人俘去。当顾问千万不能代替人家指挥，也不必冲锋陷阵，到第一线去。你们要多想点办法，严守机密。”

“顾问团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毛泽东停了停将脸转向朱德。

“报告主席，已经全部准备就绪，经过此次召见后便要出发了。”朱德总司令说。

“顾问们要带的东西定下来了吧！”毛泽东说。

“就这个问题还未最后定夺，他们有个单子，我的意见是叫下面再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那么必要。”朱德说。

“哦！”毛泽东听了朱德的话后，很是感兴趣，忙问道，“还有什么不那么必要？”

“也没有什么，就是手表、皮鞋、派克钢笔之类的东西。”朱德说。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将手一挥，为顾问们向朱德讨了个人情：“总司令批了就行了吧。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门面这一点要装饰的，你们看呢？”

“好吧，既然主席同意了，我就按单子给他们发下去。”朱德说。

“大家说好不好？”毛泽东笑哈哈地向顾问们提问。

“没有意见！我们听主席的安排。”众顾问异口同声道。

“好了，我的话讲完了。”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刘少奇、朱德，“你们还

有什么指示吗？”

“该说的主席都说过了。”刘少奇道。

“你呢？朱老总！”

“我也全说完了。”朱德说。

毛泽东：“你们都没有事情说了，我就将顾问们全带走了。”

刘少奇、朱德心中一惊，暗道：主席这是怎么啦？

众顾问也不知毛泽东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个个傻呼呼地睁着大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空气中静的出奇。

“你们都这样干什么？我毛泽东又不是什么凶神。”毛泽东依旧显得有点高深莫测。

“主席，你就快点将事说明了吧！”戎马半生的朱德说道。

“我是要带顾问们去参观一下中南海。”毛泽东笑着说，“防止到了越南，别人问起中南海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叫‘海’，你们全不知道。”

毛泽东的话一完，顾问们顿时鼓起了掌，他们心中所想的小事，全被毛泽东看出来了。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众顾问的簇拥下，信步走出了颐年堂。

怀仁堂领袖议换将

1950年6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

“恩来，罗贵波同志去越南多长时间了？”毛泽东问道。

“他们是1月初从北京出发的，经过50多天的艰苦跋涉才到达中越边境。”周恩来说道。

“罗贵波一行是3月10日到达越南并与胡志明等越共中央领导人相见的。”刘少奇接口道。

“韦国清和顾问团到达了越南没有？”毛泽东又问。

“他们已经到达了越南。”朱德说。

“近来越南战场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问朱德。

“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差些，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韦国清难以与胡志明等人沟通。”朱德说。

“为什么？”毛泽东不解地问。

“韦国清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前线，而越共最高指挥当局有时作出的决定，令他们完全难以相信。”朱德道。

“那韦国清为什么不到胡志明、武元甲等人身边当顾问？”毛泽东问。

“具体情况我们现在也未能得到，可能是权衡轻重面，前方战场上更需要他。”朱德沉思了片刻。

“恩来、少奇，你们看看该怎么办？”毛泽东将脸转向了周恩来和刘少奇。

“我们就再派一名高级指挥员去，直接与胡志明和武元甲接触，作为他们最高权力机关的参谋。”周恩来看了刘少奇一眼，遂又将脸转向毛泽东道。

“再派一位……？”毛泽东沉吟道。

“恩来说得不错，有必要再派一名高级指挥员去。”刘少奇点头道。

“我们刚刚收到罗贵波的电报，他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说这样可以在

越南中央产生一种我们特别重视援助他们的印象。”

“电文中有没有说越共方面的态度？”毛泽东问道。

“电文中没有说，但罗贵波说越共方面希望与更多的中国指挥官接触，以期得到更多战斗指挥方面的经验。”刘少奇道。

“越共没有提出？”毛泽东小声道。

“主席！”周恩来道，“我们已先后派了两批军事顾问到越方，他们当然不好再提出过多的要求。”

“嘴都张开了，再多说一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毛泽东道。

“人我们已派出了许多，再多派几个过去，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周恩来道。

“是呀！好人我们已经做了，当然要一直作下去。”毛泽东说。

停了停，毛泽东问朱德道：“朱老总，你看派谁去最合适？”

“是不是派林彪去。”朱德道。

“不行，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确实不错，但他不能给人做参谋，如果他去了，不是他给胡志明当顾问，而是胡志明给他林彪当顾问。”毛泽东摇头道。

“邓小平呢？”刘少奇建议道。

“不行，新中国刚刚建立，许多工作都才起步运转，邓小平若去了越南，他的那份工作没有谁可以挑得起来。”周恩来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

“恩来，你说让谁去？”毛泽东目光直射周恩来。

“陈赓！”周恩来道。

“陈赓，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毛泽东在周恩来提名之后，立即一口气报出了陈赓的本兼各职，“好，此人还是位较为合适的人选。朱老总、少奇，你们俩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主席。”二人同声道。

“好，就再派陈赓到越南去帮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毛泽东将大手一样，果断地做出了决定。

陈赓火速组团

6月22日，云南昆明。

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正在司令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

“报告！”机要员手持电文急匆匆地走到门口。

“进来。”陈赓抬起头，“有急件吗？”陈赓已从机要员的表情中感觉到了某种情况。

“中央军委急电，任命首长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去越南帮助越军组织、实施边界战役。”机要员将手里电文递到了陈赓面前。

“拿来我看看！”陈赓听了机要员的话，连忙展开电文细看。

“立即回电，我将立即着手准备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越南。”陈赓看完电文后，吩咐道。

“是！”机要员打了一个立正，转身向外走去。

“等一下！”陈赓略顿片刻道。

“首长，还有何指示！”

“发完回电之后，再电令以下人员尽快赶到昆明：四兵团宣传部部长曾

延伟，兵团作战处副处长王振夫，兵团军械处副处长杨进，兵团机要处副处长刘师祥，第14军作战处长梁中玉，后勤处长张乃詹，副师长王砚泉，炮兵团长杜建华，原边纵一支队司令员黄景文，团政委黄为，秘书兼翻译周毅之。”

一声令下，代表团成员星聚昆明。

“兵团宣传部曾延伟向首长报告！”

“兵团作战处王振夫向首长报告！”

“兵团军械处杨进向首长报告！”

“……”

“诸位都辛苦了，大家先到招待所休息一下，等人员到齐之后，我们再开会具体讨论研究一些细节性东西。”陈赓望着自己的部下一个个面容疲惫，心痛地说。

“不辛苦！”众人异口同声道，“不需要休息。”

“我们一见到首长这张亲切和蔼的脸，个个都精神抖擞。”第14军作战处长梁中玉笑哈哈地打趣道。

“不行，不行。”陈赓摇摇头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现在不休息好，把身体弄坏了，等到了越南还得让人家分神来照顾我们，那怎么行！”

“走！我们快点到招待所里去休息吧，否则首长马上又要命令我们了。”王振夫道。

看似极为不尊重的上下级交谈，可谁又能真正理解到他们这是经历了过多少次战火的洗礼，多少次血与火的考验，多少次生存与死亡边沿的挣扎后建立的深深情谊？！

送走了先到的人后，陈赓又坐在了办公桌边拿起人员花名册研究。

“这似乎还少几个人？”他自言自语道。

“首长，兵团机要处刘师祥向您报道！”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了陈赓的沉思。

“师祥！快进来，别客气嘛！”陈赓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急步走到门前拉住对方的手，“辛苦了，辛苦了！路上一切还顺利吧。”

“谢谢首长关心，我接到命令后便日夜兼程赶来了。”

“吃饭了没有？”陈赓亲切地问道。

“吃过了，1小时以前我便赶回了昆明。”刘师祥道，“首长，我未经你同意，又给代表团带来了3名成员。”

“三位什么样的人，在哪里？”陈赓奇怪地问道。

“就在外面。”刘师祥道。

“快点让他们进来。”陈赓连忙说。

刘师祥转身叫进来3个人。

“首长好！”三人同声。

“你们也辛苦了。”

“我来给首长介绍。”刘师祥道，“这三位都是我们机要处的机要员，名字叫傅孝忠、岳星照、延月庚，他们三位都十分精通业务。”

“太好了，师祥！”陈赓狠狠地拍了一下刘师祥处长的肩膀道，“知我者，真莫过师祥也，刚才我还在考虑我们随行电台沿途要和中共中央、西南军区、在越南的中央代表罗贵波和四兵团司令部这四个方面保持及时联系的问题，刚刚觉察到人手不够，没有想到你就给我带来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我的这点功夫还不是首长带出来的。”刘师祥谦虚地说。

“师祥，这次我事先没有征得你们的同意，便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名字报到了中央去，真是对不起了。”陈赓突然将话题一转说道。

“首长，这……”陈赓的一席话把刘师祥弄了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首长怎么命令我们，我们就怎么干，怎么说……？”

“我是昨天才听别人说你7月份准备与一个叫张瑞云的女机要员结婚。”陈赓内疚地说道。

“婚礼可以延期嘛！”刘师祥不以为然地说。

“话可不能这样说，一定要做好小张同志的思想工作，让她等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由我亲自去做思想工作。”陈赓道。

“这件事就不劳首长费心了，中国有句古话不是说：‘大丈夫何患无妻’嘛。”刘师祥打趣道。

“正经点，别打哈哈，都30多岁的人，也该成个家了。”陈赓正色道，“等从越南回来，我亲自给你们主持婚礼。”

“好！听首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刘师祥道。

“谁放心了？”

“梁处长来了。”陈赓一听到声音便知道谁来了。

一阵寒暄之后，陈赓问梁中玉道，“王砚泉师长跟你联系过了没有？”

“联系过了，他接到急返昆明的电报时正在滇西南凤庆地区指挥剿匪作战。”梁中玉道。

“这一段时间他可真忙得够呛，刚刚完成了对越军顾问团干部的选派，现在又收到加急电报，真是难为他了。”陈赓道。

在等待各路人马会集昆明的同时，陈赓又细心地为越共中央准备了礼物——从香港买来一批收音机、手表和钢笔。

同时，为了及时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记录新闻。陈赓司令员几经筛选，从兵团新闻科调来了一个机要员赵锡峰，由他负责记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有关新闻。

毛泽东再签派遣电文

盛夏的7月，在南国昆明已是烈日炎炎，即使你躲在见不着阳光的阴暗角落里，依然会汗流浹背。可是远在千里的北京的气候就截然不同，阵阵清风沁人心脾，极易使人忘记一切世间的杂念。

中南海里，毛泽东闲暇之余信步游览，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片经过人工雕琢后的大自然之中。

“主席，周副主席正在四处找你！”李银桥悄悄地走到毛泽东身边，轻声地说。

“恩来呢？”毛泽东转过身问，“找我有什么事？”

“昆明方面有份加急电报过来。”李银桥说。

“哦！陈赓又来电文了。”毛泽东道。

“主席，你的雅兴不小吗，我四处找你，没料到你倒爬到这里来享清福了。”正说话间，周恩来从假山后面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

“我这哪里叫享清福呀，只不过随便出来走一走，我住进中南海这么长

的时间，对这里的地形一点也不了解，都快迷路了。”毛泽东笑哈哈地迎着周恩来走了过去。

“怎么样了？”

“已经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出发了。”周恩来边说边将电文递了过去。

“真快呀，看来陈赓办事真的不一般，十几天的时间便将代表团组建成功。”毛泽东边看电文边说道。

“主席，你看他们什么时间从昆明出发？”周恩来道。

“让他们再休息两天，然后便出发。”毛泽东坚定地说。

“好，我马上去拟定电文。”周恩来伸手接过毛泽东手中的电文，转身便要离去。

“恩来，电文中要告诫陈赓他们要不骄、不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又吩咐道。

“放心吧，我会让陈赓司令员对他手下人多做动员工作的。”周恩来回头道。

陈赓率团出征

7月7日凌晨3时，一列小火车静悄悄地滑出了昆明火车站，向南驶去。在黎明前的晨曦，列车所到之处，未发出任何轰鸣声。车窗里，陈赓端坐在那里，不时地将脸贴在窗户上，往外四处张望，可一看到路边有人，他又连忙将头缩了回来。

经过周密的安排之后，陈赓率领随行人员在一个警卫连护卫下，乘坐滇越铁路小火车开始了他的极为特殊且秘密的使命。

小火车在云南高原的群山中曲折行进。这条窄铁路是法国殖民者占据了越南之后，为了将其殖民势力扩展到云南而在本世纪初修筑的，随着地形的变化，小火车行驶的速度越来越慢，不过这样对欣赏沿途山光水色、锦秀河山是再好不过了。

但此时此刻的陈赓却无暇顾及眼前这锦秀山水，他的脑海中总是猜想着越南战场的情况。

“列车到了什么地方了？”陈赓叫过列车长问道。

“报告首长，火车再行驶两个小时便到开元了。”列车长轻轻地说。

“好，请你去把刘师祥叫来！”陈赓道。

“是，首长！”列车长转身向后走去。

时间不长，刘师祥匆匆走来。“首长，找我有什么指示？”

“来了，师祥。”陈赓抬起头，看了看刘师祥道，“坐下来，我有事与你商量一下。”

“听从首长安排！”刘师祥打了一个立正。

“不必这么严肃了，即使去越南给人当顾问，我们平素也不必有这么多礼节。”陈赓笑了笑，摇摇头说。

“现在不上点规矩，恐怕到了越南之后，一时难以做到。”刘师祥自嘲地笑了笑。

“我们此行机要工作主要有三项任务。”陈赓待刘师祥坐下后说道，“一是及时翻译电报；二是接受新华社播发的《参考资料》；三是收录中央电台

的记录新闻。”

“这三个问题我已经安排到下面了，请首长放心。”刘师祥说。

“很好！”陈赓赞许地点点头道，“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到播发新闻的时候，电台便停下来接收，以便及时了解国内国际形势的最新发展。”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全力办好此事！”刘师祥斩钉截铁地保证说。

傍晚时分，陈赓所乘的小火车悄然无声地停靠在开远站，再往前就不能坐火车了。于是，当晚陈赓一行便在这里住下，等待第二天再乘车继续行走。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一早天公不作美，下起瓢泼大雨，大雨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致使道路泥泞不堪。尽管陈赓一行心急如焚，但也无计可施，只好在开远继续等待一天。

第三天清晨，陈赓一行继续南下。当晚，他们收到罗贵波转发的越共中央电报，通知陈赓，越军总部改变了原定的攻占老街的作战计划，向高平方向用兵。

7月10日中午，陈赓到达砚山。

陈赓一行风尘仆仆，顾不上休息一下，立即安排会见了越军师、团一级的干部，听取了他们在砚山整训的情况。

随即，陈赓又听取了第13军军长周希汉和第308师、中国军事顾问吴效闵等人的汇报。

综合中、越双方提供的情况，陈赓得出了一个结论：越军“月余训练成绩很大，初步解决了战术思想问题，特别是炮兵射击、爆破及机动机枪使用，收到很大成绩”。

同时，陈赓也从周希汉军长那里了解到越南军官夜郎自大的情绪：“我军总的说来和越南部队相处得不错。但是，越军连以上军官还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文化程度比中国顾问高，看不起我们的顾问，认为我们土气，打国民党行，打法国兵不一定行。”

听完周希汉军长的一番话，陈赓没有马上表态，沉思了一会儿之后说：“对越军指挥官有这种倾向，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克制态度，给他们讲一讲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事情，变相地引导他们。”

自从到达砚山后，陈赓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中越两党、两国合作粉碎法军的全盘计划中去了。

7月16日，陈赓一行在文山县稍作休整之后，又在满天雨水之中，来到了临近边境的麻栗坡县城，在这里，陈赓等人见到了越南河江省委先期派来迎接的人。

经受了近一星期的雨水侵袭，陈赓那负过伤的腿开始隐隐作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

因雨迟至8时才出发，路上泞滑，前赴后继。沿途山峰壁立，树木耸天，风景之佳，甲于江南。到达麻栗坡，已下午2时，镇不大，夹谷中，两山环抱，青洁幽雅。距国境仅50余里。

与此同时，陈赓又在反复思考即将开始的越南作战，至于怎么个打法，他已胸有成竹，有了战斗的中心点——高平。

“整日考虑越南作战。越南作战方针，应该是争取完全主动，求得消灭法帝机动部队为目的。改变敌强我弱之局面，高平作战，应该是围困高平，

引诱谅山之敌增援，求得在运动中歼灭其 5 个机动营。如达到此目的，对越北作战即有决定之胜利意义。”

就在陈赓开动脑筋思考越南作战之时，他接到了两份电报。

一份是西南军区司令部来的调令，调王砚泉去东北长春航空学校任校长。

“怎么样，你是去长春当校长，还是跟我去越南打仗？”陈赓找到王砚泉，将电报放在他面前，直截了当地说。

“愿意去越南打仗！”王砚泉师长将电报看了一遍之后，未作任何思考便说道。

另一份电报是罗贵波转来的，越共中央以胡志明的名义致电陈赓，表示代表团的主要翻译周毅之是否去越南，理由是 1946 年国民党军驻守越南时周毅之曾在河内，与不少国民党军官相识。

原来，当时周毅之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越南华侨中工作，也领受党的任务作国民党军队的工作。遵照上级指示，他没有和越南共产党作横向联系。

陈赓几经考虑，毅然决定带周毅之去越南。至于越南提出的疑问，由他与胡志明当面解释。

7 月中旬，陈赓一行踏上了越南国土，开始领受到异国的风土人情：

天气炎热，山高路窄，泥滑难行，有马不能乘，下山至清水河，已精疲力竭。今天算是付出一点国际主义的代价。清水河为中越交界处，河上架有铁索桥，河岸法人筑有堡垒。过桥，越共派专员设宴招待，备有各种饮料和水果，饥渴至此，狼吞虎咽，也顾不得国际礼貌了。越共备有马车 10 余辆，把我们带到距清水河 16 里之小乡村宿营。此为越共专门设以招待我们的地方，招待甚周。吃喝均不同于我国，饶有趣味。稍事休息，即令代表团同志开展调查活动。一夜大雨。牙痛甚剧。

胡志明款待老朋友

按照事先的安排，陈赓进入越南后就直奔向越共中央所在地——太原。

所到之处，陈赓的第一件事便是同越方各级负责人交谈，了解越南人的思想。渐渐地，他发现越方干部对于即将进行的战役目的和自己想的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越南人很少谈论怎么去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争取战场主动权；谈论更多的是如何攻占老街、如何攻占高平，着眼点是夺取城镇、夺取更多的地方。

7 月 22 日，在北京中南海的党中央接到了陈赓自越南发出的电报：

越军主力一部经滇、桂整训装备后，情绪甚高，但营以上干部实战指挥经验较少。据此，目前越北作战方针，应争取于野战中歼敌之机动部队，首先拔除一些较小的孤立据点，取得首战胜利，积累经验，提高和巩固部队情绪，争取完全主动，逐步转入大规模作战。

对于越方决定打高平，建议采取围城打援。先夺取外围孤立点，取得经验，再夺取高平，并利于吸引谅山之敌，集中业经整训的部队，先择战场，歼灭谅山方向出援的法军机动部队。若谅山机动部队 3 至 5 个

营被歼，则高平及谅山附近之若干据点均将便于攻占，越东北及越北敌我形势亦可大为变化。

毛泽东等人看完陈赓的电文之后，明白陈赓高平作战计划的意图，乃是抗日战争中常用的“围点打援”之法。

收到陈虚电报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复电：

越军高平战役甚为重要，请你自己并帮助越南同志充分研究情况，务作充分准备，确有把握，然后动手，期于必胜。

同时，毛泽东又向罗贵波发出了电报，让他重视越军的作战指导思想问题。

几日后，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从中南海给陈赓发去了指示电：

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微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较大的仗。目前不要直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打援是适当的。

有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陈赓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陈赓和胡志明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就相识了。当时，胡志明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不时同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越南青年来往。陈赓乃黄埔一期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当连长，经常受周恩来的指示执行任务。

以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为纽带，胡志明、陈赓相识了。大革命失败后，两人便各奔前程，20多年没有再见过面。1950年1月，他们在南宁重逢，陈赓作为主人，于席间畅叙别情；半年后，当他们再次在越北山谷里相见时，陈赓成为胡志明期待已久的客人了。

当天晚上，陈赓便命令他的随行人员听取越军军委秘书长杜得坚和总参谋部关于越北战局的介绍，他本人则与胡志明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在胡志明详谈了当前越军的情况后，陈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越军应该着眼于制造战机，歼灭法军有生力量，掌握战场主动权；而现在越军还缺乏大规模作战的经验，攻坚的能力还不足，所以应先打法军的小据点，取得胜利，积累经验，然后逐步进入大规模作战。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应该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野战中大量消灭法军的机动兵力。实现了这一点，最后即能拿下高平、谅山等较大的据点。

对于陈赓的看法，胡志明表示同意接受，并传达到下面部队中去。

但是，罗贵波却提醒陈赓，经历了长期而又艰苦的战略对峙后，中国革命一取得胜利就对越南迅速支援，也使得一部分越南同志对抗法战争的胜利变得十分急切，他们对于新近装备的武器寄予很大的希望。

罗贵波最后说明了自己对战争所持的态度：尽管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削弱，但由于越南各方面都太弱，战争将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

7月30日上午，由罗贵波陪同陈赓、曾延伟，还有翻译周毅之去看望胡志明。

一行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来到山口弯弯曲曲的小河边，他们跳上竹筏渡到对岸，进入竹林深处，胡志明的“行宫”——一间茅草顶高脚屋就在一块

小平地边上。此刻，胡志明正满面带笑地等待着陈赓。

宾主寒暄之后，陈赓被让进了屋中，简陋的小竹篷里，床上一席一被，桌上一架十分古老的打字机，柱子上挂着一个时钟，一个背包，里面是一套换洗衣服和几本书。这些已经是越共中央总书记胡志明的全部财产了，连过惯了军旅生活的陈赓也暗自赞叹胡志明的简朴。

“胡主席能以身作则，何愁打不退法国殖民者！”陈赓由衷地赞道。

“陈司令过奖，在下能有今天的艰苦精神，也是当年在中国学到的。”胡志明十分客气地说道。

“这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陈赓道。

“来，快点坐下，我今天请你来是要与阁下共进午餐。”胡志明说。

“胡主席太客气了！非常时期，我看一些礼节就免了吧！”陈赓微笑着说。

“不尽地主之谊，岂不是大失礼了，我今天特意备了一只红烧乳猪，这是我们越南人用来招待最贵重客人时才用的，陈司令就不必客气了。”胡志明道。

“看来我恭敬不如从命了。”陈赓道。

片刻之后，红烧乳猪端了上来，望着桌上的菜，胡志明忽然诗兴大发，随口咏道：

“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

就在陈赓到达越南的同时，在中国境内的越军部队已经结束整训，准备投入战斗了。

7月中旬，除了正在砚山、龙州整训越军的人员以外，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全部集中到了南宁，进行一个时期的学习，为进入越南战场作最后的准备。

起草具体战役计划

8月14日，陈赓到达越南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广渊，与越军总司令武元甲、总参谋长黄文泰等高级将领以及韦国清等中国军事顾问会合，一起研究制订战役计划。双方对战役指导方针取得一致意见之后，越军前指请求陈赓与中国军事顾问起草具体战役计划。

陈赓指示随行人员与中国军事顾问抓紧研究情况，争取用5天时间完成战役计划起草工作。他权衡利弊，要求负责起草计划的人员把握住四条原则：一、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战，务求首战告捷；二、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三、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四、围城打援，坚持运动歼敌。

8月19日，经中国军事顾问们的昼夜奋战，边界战役计划起草工作提前完成。第二天，陈赓、韦国清与两位越军领导武元甲、陈登宁对计划进行最后审查，予以通过。此时在越南东北边界地区战场上，敌军总兵力为1.13万余人。越军边界战役作战计划的内容是：

集中2万多兵力，以在中国整训过的第308师和第209、174团担任主攻，以地方部队和边界各省民兵游击队配合作战，对法军四号公路防御体系实施进攻，以围城打援的战法，争取歼敌5个营，实现解放高平，打通与中国广西相连的陆上交通线的目的。

整个战役预计在 30 至 40 天内完成，具体战役部署是：

以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负责围困、监视高平之敌；以第 209、第 174 团首先进攻东溪，拦腰斩断敌四号公路防御体系，孤立高平，并吸引谅山方向敌军北援，同时以第 308 师在东溪以南山地设伏；东溪战斗打响后，如谅山方向之敌经七溪北援，则在即设伏击阵地中以野战方式歼灭之，如敌不北援，则待东溪战斗结束后，调集部队攻占七溪。然后，主力部队挥师北上，进攻高平。

8 月 23 日至 24 日，越军前指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部署边界战役作战任务。武元甲在会上宣读了战役计划。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即出现了阵阵骚动。越军干部对这一计划所体现出来的战术思想，感到既新鲜，又陌生，与自己头脑中的想法差距很大。因而提出了各种问题，要求前指领导具体说明。

有的干部说：既然战役目的是解放高平，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进攻高平。我们的主力部队数量有限，如在打东溪、七溪时消耗一部分，恐怕无法攻克高平。高平打不下来，整个战役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有的干部说，进攻战斗，应讲究突然性。先打高平，可使守敌猝不及防，不待敌进兵增援即攻占之。而先打东溪、七溪，高平之敌必然会加强工事与守备力量，这样将会增加进攻高平的难度。

还有的干部指出：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道理虽好，但战役时间会拉长。部队没有连续作战的经验，体力又不好，恐怕难以坚持到底。

干部的思想不统一，将直接影响战役计划的落实。武元甲心中十分焦急。他找到陈赓，一一介绍了越军干部提出的问题，要求陈赓出席作战会议，具体解答越军干部的疑问。

陈赓思考片刻，表示同意。这样，陈赓于 8 月 24 日出席越军作战会议，作了 4 个多小时的精彩发言。

陈赓说：“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就是为什么要先打东溪、七溪？为什么不先打高平？为什么要连续作战？下面我对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解放高平，是边界战役的目的之一，但不是全部目的所在。我们最终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打垮敌人的四号公路防御体系，打通中越之间的交通线。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应过分地追求攻城略地的暂时胜利，这是我们在考虑边界战役作战时应把握的基本点。

“为什么要先打东溪？理由很简单，一是我军取胜比较有把握，二是通过打东溪，可以切断高平与谅山之间的联系，在敌人整个防御体系中楔入一颗钉子，肢解敌人防御部署，迫使敌人必须北援，这样我军就有了在野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良机。所以打东溪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占领这个城镇，而在于在这一点上打痛敌人，调动敌人，为运动歼敌创造战机。

有人提的作战突然性问题，这一点的确很重要。但作战中的突然性同时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考虑作战问题，不能只强调对我们有利的一方面因素，而要全面衡量各种可能影响战斗进程的因素，特别是注意到

那些不利的因素。为什么不先打高平？主要原因是我们无取胜把握。高平是敌军边界防线上的核心据点之一，筑有带坑道设施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守军多为雇佣军人，战斗力较强。乘敌不备，突然进攻，我们开始时可能会进展顺利，但要彻底解决守敌则困难重重。首先是地形对我不利。高平背倚高山、三面环江，易守难攻。我们进攻作战必须要强渡江河，而合适的渡江点只有一处，只好一路强攻。退一步讲，即使渡江成功，突入城区，如敌军陆空火力严密封锁渡江点，我后续部队如何及时跟进？如敌空降伞兵，我们又如何分兵对付？假使敌军凭借坚固工事拼死顽抗，战斗形成僵持或我军被迫撤出战斗，在敌陆空交叉火力追击下，后果不堪设想。此外，实事求是地讲，依我们目前的技能战术水平，要担负这样艰巨的攻坚任务，也的确有点力不从心。作战的突然性，并无法解决我们在攻坚作战中所要遇到的种种困难。

“而先打东溪、七溪，后打高平，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军占领东溪、七溪，高平即成为孤城一座。如果我军能在野战中歼灭谅山北援之敌，则更会使高平之敌失去外援。在这种情况下，守敌内守孤城外无援兵，军心肯定会发生动摇。侵略者的本质是得势时穷凶极恶，失势时惊慌失措。趁敌士气低落，我军挟连胜之威，全力攻城，尽管失却了作战突然性，却增加了进攻的取胜把握。

“不打无把握之仗，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些都是组织指挥作战的基本准则。有人提出我们主力部队数量有限，有一点很重要，正因为我们手中的本钱不多，所以就更应该一开始就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打高平，能不能打下来另当别论，如果拼光老本，敌人一旦反扑，我们无以应敌，整个战役就会变得虎头蛇尾，这是兵家之大忌，我们决不打这种得不偿失的仗。

“我判断，四号公路是敌人重点设防的地区，敌人决不会一战即拱手让我们，肯定会与我反复争夺。只有真正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才会迫使敌人知难而退。所以我们应该准备连打几仗，通过连续作战来创造时机，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地削弱敌人，直至最后战胜敌人。另外，通过小仗的锻炼，部队还可以逐步积累运动战与攻坚战的经验，扩大我们在战场上的优势，同时也可以通过消灭弱敌，来剪除敌羽翼。我军愈战愈强，敌军越战越弱，赢得战役胜利就有把握了。

“有的人对连续作战有顾虑，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要胜任连续作战任务，一要抓好战时政治工作，二要抓好伙食。抓好这两点，部队的士气和体力就有了保证。同时也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我这些天在越北地区爬山不止，也察看了战场地形，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到底。大家可以作个比较，我的肚皮恐怕比在座诸位的肚皮都要大，我能爬山，大家肯定更能爬山；我能坚持，大家更能坚持，因为你们的肚皮小，动作比我利索啊。我相信，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做扎实，部队肯定会胜任连续作战的任务。”

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陈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透彻地解答了越军干部的问题，并引伸一步，对作战指挥的奥秘作了深入浅出的叙述，使越军干部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武元甲在会上几次发言，要求越军干部认真领会陈赓的讲话内容。

当晚 12 时，陈赓已准备就寝，突然又接到武元甲的电话。武元甲说：“你的讲话，既介绍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又澄清了我们干部思想中的模糊认识，我甚觉兴奋，以至无法成眠。希望能多传授一些中国革命的宝贵经

验。

陈赓慨然应允。

会后，边界战役的准备工作加快进行。陈赓和韦国清等中国军事顾问认真负责，全力以赴地帮助越军进行战前准备。到9月上旬，战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胡志明坐镇边界战役

9月10日，胡志明从内地秘密来到广渊，亲自坐镇边界战役。他在听取了情况汇报后，用信任的口气对陈赓说：“所有越南部队都交给你指挥了，请你包下这次战役的胜利。”

陈赓谦虚地说，“我会尽自己最大力量来帮助你们夺取胜利。至于最后结果如何，我本人觉得有些把握，但不是绝对把握。要打胜仗，主要还靠越军指战员的努力和越南人民的支持。”

当陈赓向胡志明汇报工作的初步设想时，胡志明一摆手，爽朗地说：“我非军事家，你做就行。你就像在中国一样，放手工作吧！不要事事汇报。”

中共中央也在密切关注着越南边界战役，除了在战役后勤和物资援助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外，并多次对陈赓和军事顾问团的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在接到陈赓汇报战役计划设想的电报后，毛泽东致电陈赓，对战役指挥工作做重要指示，电报说：

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为保证此役胜利，应在思想上作好连续作战的准备，以便对付敌人增援部队。如果谅山方向敌援兵被歼灭，则敌人统帅部可能迅速改正对越方力量的过低估计，而命令高平之敌逃跑，或于越军打谅山援敌时，命令高平之敌弃城向南增援，夹攻越军，则越军于歼灭谅山援敌后，又有可能向高平援敌作战。因此，照你们的计划，在40天之内从容歼灭边界之敌，是很稳妥的，很有利的。而如照上面估计的情况，则须准备在20天左右打大小三四个仗。

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电报。毛泽东在肯定了陈赓主持拟订的作战计划的同时，又准确地预见到了高平之敌弃城南下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提醒陈赓要准备连打几仗。从而弥补了战役计划的不足。陈赓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运筹帷幄，精心部署，决心打好中国援越抗法的第一仗。

首战东溪一波三折

尽管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但首战东溪，仍是一波三折，陈赓为之煞费苦心。

在作战准备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从9月3日起，法军飞机连续轰炸越军前指所在地广渊，并加紧了对四号公路沿线地区的空中侦察。另据报告，谅山、东溪一线敌军调动频繁，东溪守敌已得到增援，正在加修防御工事。这些情况引起了陈赓高度重视。

越军前指告诉陈赓说，的确发生了令人担忧的事情。有两名越军侦察员在东溪附近执行任务时被俘，另有二名越军第308师营职干部外出侦察，至

今未归，下落不明。突袭东溪的计划很可能业已泄漏。

在此之前，陈赓曾几次阻止越军派人到敌据点周围活动，特别是要求各级指挥员一定不要擅自行动，以免暴露企图。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严重事件。假如真暴露了作战企图，必将增加作战难度，甚至破坏预定计划，陈赓对此十分恼火，在电话里，陈赓向越军总参谋长黄文泰严肃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要求今后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鉴于东溪守敌兵力增加，越军部分干部攻打东溪的决心有些动摇，陈赓冷静地分析了局势。他判断，敌军兵力调整有两种可能：一是部队换防，二是调整部署，以图先发制人。然而，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就东溪作战而言，越军仍然占有绝对的兵力、火力优势，只要严格执行作战计划，完全有把握取胜。据此判断，陈赓坚持首攻东溪决心不变。越军前指采纳了陈赓的意见。

胡志明了解到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之后，对陈赓说：“你做得对，对越南干部的缺点，就是要不客气地指出来。”

战役发起的时间日益逼近。为便于战役指挥，越军前指由广渊迁至东溪附近。9月15日，胡志明、武元甲和陈赓等人到达新驻地。这里紧靠中越边界线。陈赓在战役期间一直住在中国广西省龙州县下冻区布局墟，而胡志明和越军前指则住在紧靠布局墟的越南境内，两地相距甚近，中间只隔着一个“布局关”隘口。当晚，武元甲与陈赓研究了有关情况，最后审查了作战部署，决定按计划于16日拂晓向东溪发起攻击。

16日拂晓，东溪战斗打响。越南边界战役由此拉开了帷幕，担任主攻任务的越军第174团迅速扫清东溪以北和西北方向的外围据点，占领攻击出发阵地。另一支主攻部队第209团却与前指失去联系，直到下午才搞清其具体位置，总攻时间被迫推迟。黄昏时分，总攻开始。担任火力支援的3个炮兵营实施人力急袭，炮击效果甚佳，守敌乱作一团。越军第209团、第194团和第426营、第11营从不同方向相继向城区发起攻击。战至午夜时分，越军前指打电话告诉陈赓说，接到前线部队报告，攻击分队，已突入敌核心工事，战斗即将结束。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的陈赓如释重负，他放心休息去了。

不料17日拂晓，越军前指突然又打来电话说：部队根本就没能突入敌核心工事，现在正与敌僵持。天已放亮，敌机马上就会来扫射，准备把部队撤出城区。

陈赓闻言，焦急万分，立即在电话中强调：千万不能把部队撤出来，应坚守既占阵地，否则不但要前功尽弃，而且后撤时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应有的伤亡。然而就在陈赓与越军前指通话时，攻入城区的部队已开始后撤了。在撤出战斗时，由于缺乏严密组织，又遭到敌机轰炸扫射，损失很大。

早饭过后，陈赓来到越军前指，与武元甲等人研究攻击失利的原因。原来部队没有严格遵守作战计划的时间规定，炮火急袭后，步兵分队本应立即发起冲击，但步兵攻击分队却一味要求延长炮击时间，迟至午夜过后才攻入城区。结果打了不久，天就放亮，部队又对敌机存有恐惧心理，无心恋战，所以仓促撤出了战斗，另外在战斗过程中，各级指挥员大多没有随部队一起行动，指挥所位置普遍太靠后。加之通讯联络组织得不好，所以不能掌握部队行动的确切情况，更无法对部队实施有效指挥。

陈赓一一指出了这些缺点，帮助越军前指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调整了攻击部署。17日黄昏，越军部队再次对东溪发起攻击。

到夜间9时，第209团率先突入市区，其他部队也发展顺利。战至12

时左右，占领了部分城区，但始终无法接近敌核心工事。

陈赓坚决反对让部队后撤的意见，建议越军前指迅速查明攻击受阻原因。结果发现各攻击分队之间缺乏协同，进展速度相差悬殊，四面围攻变成了一面硬攻，使守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越军主攻部队，致使攻击受阻。

陈赓立即提出两条意见，第一，打到哪里就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决不能后撤。只要大胆地与敌军纠缠在一起，敌机来了也无可奈何。第二，立即调整部署，改一面突击为四面进攻，西面、东面部队为助攻，北面、南面部队为主攻，使守敌无从招架。

越军前指接受了这些建议。部署调整工作于18日晨2时完毕，部队随即发起总攻，不到一小时即突入敌核心工事，到上午8时，战斗全部结束，守敌260余人被歼，残敌20余人逃往七溪。

边界战役首战告捷，越军上下兴奋异常，求战情绪空前高涨。战斗胜利的当天，胡志明来到陈赓住处，兴致勃勃地吟诗一首，赠给陈赓。诗曰：

携杖登高观阵地，
万重山拥万重云。
义兵壮气吞牛斗，
誓灭豺狼侵略军。

陈赓读罢此诗，兴奋地说：“胡主席这么大的决心，敌人一个也跑不掉了。”

东溪战斗结束后，战场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军总指挥部重新调整了四号公路的防御部署。两天之内，法军从谅山等地向七溪紧急调运部队，使在七溪集结的兵力达到三个步兵营、一个空降大队，而且全系精锐的外籍雇佣军部队。与此同时，法军还调集大批部队，从河内等地出动，开始对越南党和政府所在地太原地区进行“扫荡”。

敌情的变化，为原定东溪战斗后接着进攻七溪计划的实施，带来了许多困难。此时，派往越军各级指挥机构的中国军事顾问陆续返回前指，向陈赓汇报了许多越军作战的真实情况。而陈赓通过东溪一战，对越军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很显然，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对越军的作战能力是估计过高了。尽管参战部队在中国接受了短期训练，但要使越军在作战思想和作战技能上根本改变面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战锻炼。

因此，陈赓并没有在东溪战斗的胜利中陶醉，他在日记中写道：

东溪作战算是胜利，震惊了法帝内部，使之不敢即刻收复东溪。但从战术上讲，则是一个大败仗。东溪敌实际人数为267名（越方虚报800名），我攻击人数将近10000，经两日三夜的战斗，中途几乎被迫撤退，我伤亡500余人，敌尚逃掉20余人。我方兵力、火力均居绝对优势，以如此之战斗力，望攻击约2000人据守之七溪，则不啻缘木求鱼。因此我认为越军仍须求得打小据点，以逐渐锻炼战斗力，特别是改正领导作风，改良组织，加紧干部训练，不然，作战计划都是空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布置调整作战部署

陈赓认为，应该停止执行攻击七溪的作战计划，另寻战机消灭敌人。他向胡志明、武元甲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并说：从目前情况分析，敌增兵七溪，似有北上收复东溪的企图，所以可让部队先后撤一步，在东溪附近设伏，待七溪之敌北上后，争取在野战中消灭之。胡志明、武元甲均同意陈赓的意见，越军前指随之下达调整部署的命令：以二个团位于东溪，以三个团位于东溪东南方向山地，以二个营位于西南方向山地，形成一个向南张口的口袋阵。待七溪北上之敌进至东溪以南地区时，两翼设伏部队首先从敌侧后发动钳形攻击，封闭口袋口，正面部队则随后出击，将敌人聚歼之。

可是，战局并没有向预计的方向发展。连续几天，阴雨连绵，法军只是加紧对太原地区的“扫荡”作战，而在东北边界战场下则一直按兵不动，仅仅是继续向七溪增兵不已。越军部队长时间野地埋伏，不免出现种种困难，干部中也有一些议论。敌人到底在酝酿什么阴谋？增兵七溪却按兵不动，难道要固守七溪，还是在等待北上的有利时机？战场情况扑朔迷离，陈赓陷入了沉思。他最担心的事情是，敌人已觉察到我军作战企图，不从七溪北上，这样越军欲攻城则困难重重，欲野战则无敌可打，整个战役计划就要落空。过度的操劳，加上心情焦虑，使得陈赓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疟疾缠身，腹泻不止，被迫卧床休息。

中共中央在此关键时刻给予陈赓以极大的支持。军委在接到陈赓的有关报告后，几次致电陈赓，就作战问题予以重要指示。军委指出：敌图重占东溪给我以运动战的机会，你们的部署是对的，敌人一定要增援的，敌人还不知道你方的虚实。

军委还指出，如能在与敌夺边界地区的作战中，大量消灭法军的有生力量，是很有利的。要准备进行几个月的战斗。如果粮食供应有困难，可从中国增拨接济。军委的指示坚定了陈赓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信心。

陈赓冷静地分析了战场情况。他认为，边界防线，法军已苦心经营多时。而四号公路防御体系，更是法军赖以封锁中越边境的支柱。东溪一战，法军虽遭失败，但远不至于大伤元气，故敌决不会容忍越军在高平、谅山之间楔入一颗钉子，使整个防御体系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其调整部署的目的，在于集结兵力，伺机北进，重点东溪，恢复谅山、高平之间的联系。而对太原地区进行“扫荡”的意图，无疑是企图以攻击越南首脑机关所在地的行动，迫使越军主力由东北边界地区回师救援，以便为集结在七溪的部队北上收复东溪创造条件。所以，七溪之敌一定会出动北上，越军进行运动战的时机必将来临。

9月27日，大病初愈的陈赓不顾身体虚弱，到胡志明住处与胡志明、武元甲商谈作战部署事宜。陈赓指出：要坚持原定作战方针不变，决不能因敌军扫荡太原和七溪之敌迟迟未动而改变决心，要坚决地集中主力部队在东北边界战场寻机歼敌。鉴于目前七溪之敌迟迟不动的情况，可命令位于西北边界地区的部队加紧对黄树皮、那邦等据点的进攻，威胁老街，让围困高平的部队把包围圈收得更紧一些，敲山震虎，迫使七溪之敌及早出动北援。

法国兵进入越军伏击圈

另外，派第 174 团向七溪以南佯动，给敌人造成人民军主力已南下回师太原的假象，让敌人放胆北上。这一建议得到了胡志明、武元甲的同意。

在越军部队积极佯动的促使下，敌军终于开始行动了。9 月 30 日晚，七溪之敌以三个多营计 2000 余人组成北上兵团，在上校指挥官勒巴率领下，星夜出动，向北推进。10 月 1 日晨，在东溪以南数公里处与越军第 209 团警戒部队遭遇。

久盼的战机终于出现了。陈赓立即向越军前指建议：按既定计划开始行动，令第 209 团对敌军不作坚决狙击，让其放胆北上，待其进入预定地区后，再扎紧口袋聚歼之。

10 月 2 日，勒巴兵团逼近东溪以南那巴高地一线，完全进入了越军伏击圈。陈赓感到战机已成熟，遂建议担任侧翼钳击的第 308 师开始出击，吃掉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为说服越南前指立即行动，他解释说：战机稍纵即逝。如勒巴兵团觉察到自己进入了包围圈，就会立即后撤，那时想打也打不成了。因此必须训令部队立即出击，有多少部队就派出多少部队，先把勒巴兵团围住，再集中兵力歼灭之。

越军前指接受了陈赓的建议，令第 308 师和其他部队逐次投入战斗，至 10 月 2 日下午 4 时，勒巴兵团已处于越军部队的包围之中。勒巴觉察到了自己侧翼正受到越军部队的威胁，遂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在那巴高地一线构筑工事。越军部队遵照前指的命令，将那巴高地团团围住，准备 10 月 3 日晚发起总攻。

此时，情况进一步明朗。法军总指挥部为越军在整个边界地区所展开的强大攻势所震惊，已被迫调整军事部署。总司令尔庞吉埃下令放弃北部边界沿线的军事据点，收缩兵力，以图日后反攻。

在东北边界地区，法军决定放弃高平，集中兵力退守红河三角洲地区。七溪之敌北上，真实意图在于接应高平之敌南撤。10 月 3 日，高平守敌 1000 余人在上校指挥官沙格东率领下，组成沙格东兵团，炸毁城内发电厂等主要设施，弃城沿四号公路南撤，以期与勒巴兵团会合，撤回七溪。

早在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即向陈赓明确指出过高平之敌弃城南撤的可能性。所以，敌人的行动，并没有出乎陈赓的意料之外。相反，通过高平之敌的行动，陈赓进一步准确地判明了七溪之敌是为接应高平之敌南撤而北上这一真实意图。敌军脱离了重兵设防的坚城，正是越军扬长避短，在野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陈赓力促越军前指把握住这一绝妙战机，投入全部主力部队，首先歼灭勒巴兵团，然后消灭沙格东兵团，夺取边界战役的全面胜利。

10 月 3 日晚，越军部队开始向勒巴兵团展开攻击。激战一夜，法军伤亡 400 多人。勒巴感到大势不妙，便命令剩余人员丢弃重装备，全力向西突围。

此时已是拂晓时分，越军部队经彻夜战斗，有些疲劳，加之疏于警戒，未能组织有效的拦截，使勒巴兵团得以突出包围圈，逃进了东溪西南 7 公里处的谷社山地。

陈赓为失去一次歼敌良机而惋惜，然而木已成舟，只能尽力采取补救措施。他判断，勒巴兵团即为接应高平之敌南撤而来，不会就此退回七溪，一定要在谷社山地凭险固守，等待与高平之敌会合。这样，越军聚歼勒巴兵团的战机依然存在。

越军前指同意陈赓的分析，训令第 308 师等部队迅速向西追击，同时令

有关地方部队和游击武装全力迟滞高平之敌南下。

10月5日，越军第308师、第209团等部队在谷社山地将勒巴兵团再次予以包围，并随即发起攻击，占领了外围制高点，将勒巴兵团压至几座孤立的石山之上。

谷社山地，地势险峻，溶洞众多，便于防守。勒巴兵团凭借溶洞、岩石等险要地物拚死顽抗。越军几次攻击均未奏效，伤亡较大。战斗陷入了僵持状态。法军总指挥部得知勒巴兵团再次被围的消息后，紧急采取了救援措施。令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轻装前进，迅速向勒巴兵团靠拢；令七溪部队组成那本兵团，在那本上校指挥下，再次北援。其作战意图是：以勒巴兵团固守谷社山地，以沙格东、那本两个兵团南北对进，构成对越军的反包围，内外夹击，打破越军包围圈，先使勒巴、沙格东两个兵团会合，然后在那本兵团接应下合兵南撤。为保证这一意图的实现，法国在东北边界战场投入了印支战区的大部分空军部队，整天狂轰滥炸，全力支持地面部队作战。同时连续向勒巴兵团空投弹药、给养，并空降伞兵部队加强其防御力量。到10月6日，由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一路冲破越军地方部队的截击，到达谷社山地以北一公里处，与越军负责外围警戒的第209团部队进入交战。而七溪两度北上的那本兵团也从南面逐渐逼近了越军包围圈。战局骤然紧张。越军前指显得有些紧张。一位负责干部给陈赓打电话说：北上、南撤之敌即将会合，而勒巴兵团一时又很难消灭。现在越军部队经过连日苦战，已很疲劳，继续打下去恐怕坚持不住，所以想让部队撤出战斗。

陈赓很清楚，战役发展到目前这个程度，正是敌我双方进行最后一搏的关键时刻。谁能坚持住，谁就有可能获胜。如果越军此时撤出战斗，不仅会前功尽弃，后果也不堪设想。故而他回答说：尽管形势严峻，但敌人已是强弩之末。只要坚持下去，必定胜利。现在决不能姑息部队的情绪，而要动员部队克服困难，打出一股狠劲，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不惜任何代价夺取胜利。

陈赓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肯定。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陈赓，指出：先集中主力歼灭东溪西南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况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计划是正确的。除对东溪西南之敌须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外，并要将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之逃脱，还要对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部署。只要对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

毛泽东的指示，使陈赓对战役指挥更加胸有成竹。他冷静地分析了战局，认为虽然几股敌军已呈靠拢之势，但各部敌军又分别处于越军分割包围之中，这正是发挥越军野战特长聚歼敌重兵集团的大好时机，如果能在谷社山地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就会扭转越北战场的局势，为越军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当务之急是坚定越军的取胜信心，力争尽快消灭勒巴兵团，打破僵持局面，把握战役主动权。陈赓决定向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反映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

胡志明采纳陈赓意见

陈赓将毛泽东的电报及自己就战役指挥写成的一封信送给了胡志明。陈赓在信中坦率陈述了自己对战局的基本看法和对越军作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按既定计划坚决地打到底，即使不能一下吃掉敌军，也要围住敌军，逐步

消耗、歼灭之。他要求对越军干部思想进行整顿，坚决克服游击习气，树立敢打硬仗、恶仗的信念。他还建议胡志明采取适当方式鼓励前方指战员，决不能让勒巴兵团与沙格东兵团会合。

胡志明看过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和陈赓的信之后，亲自干预战役指挥，立即命令越军前指集中第 308 师和第 209 团对勒巴兵团实施总攻。他又给前线官兵发出慰问电，要求全体官兵“不惜任何牺牲，坚决歼灭敌人”，并说，“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同时，他给陈赓回信，诚恳地说：“你的意见很使我们感动，已令他们照办。”

胡志明主席亲自下达命令，加之陈赓在电话中以严厉的语气提出了意见，对越军前指震动极大。陈赓与武元甲等领导干部诚恳交心并帮他们具体筹划了总攻部署。越军前指信心大增，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打赢这一仗。越军前指下达限时歼敌命令，限令部队务必在 7 日之前坚决歼灭勒巴兵团。

龟缩于谷社山地的勒巴兵团这时已处于惊慌失措状态之中。勒巴本人斗志尽失，只求尽快脱身。他在电台上向上司呼救说：“我们伤亡严重，再不来解救，今晚即会有悲剧发生。”他的上司无奈，只好令其设法突围。勒巴回答说：“满山遍野都是越盟军队，突不出去。你们还是快派飞机来把我们运走吧。”

但是，想跑已来不及了。6 日晚，越军第 308 师等部队对勒巴兵团发起了总攻。战至 7 日清晨，侧后突击的部队占领了法军阵地中的制高点——“猫耳朵山”，并由上向下对敌发起猛攻，勒巴兵团立时乱作一团。越军部队趁势从四面八方展开向中心攻击，很快歼灭了敌军主力。勒巴率百余名残兵躲进石洞顽抗，不久也被消灭，勒巴连同他的参谋人员都作了俘虏。

在聚歼勒巴兵团的时候，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也突入了谷社山地。但毕竟晚到一步，不仅无法挽救勒巴兵团，自己也因此陷入了覆亡的境地。战局由此急转直下。陈赓立即向越军前指建议，命第 209 团负责搜剿残敌，令第 308 师迅速转向北面，投入歼灭沙格东兵团的战斗。同时以部分部队缠住那本兵团，待消灭了沙格东兵团后，主力挥师南下，消灭那本兵团。

越军前指完全接受陈赓的建议，并立即依此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命令。胡志明主席亲自给第 308 师写信说：“抗战以来，我军第一次在运动战中连续战斗几天，这是一次大考验。……你们已经勇敢地完成了这次考验的十分之七。你们要努力消灭沙格东兵团。”

7 日上午，士气正旺的第 308 师投入了围歼沙格东兵团的战斗。沙格东兵团自离开高平后，一路上遭到越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拦截、袭扰，早已精疲力竭。因此，聚歼沙格东兵团的战斗发展异常顺利，当天下午，越军即攻占沙格东的指挥所，活捉沙格东及其参谋人员。法军部队群龙无首，四处逃散。

谷社山地之战，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支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法军遭此沉重打击，惊恐不安。加尔庞吉埃下令边界据点的部队立即后撤河内、海防一线。10 日，法军撤离七溪，扫荡太原地区的部队也于同日撤往河内。此后几天，边界地区的法军仓皇撤退，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越军部队乘胜前进，至 10 月底，相继解放了那岑、同登、谅山、禄平、安州，以及西北边境地区的老街、黄树皮等重要城镇。

边界战役结束后，越北根据地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气氛之中。这是越

南抗法战争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共歼敌 8000 余人，解放了边界沿线的大部分重要城镇，将法军的势力范围推回到内地，越北根据地被封锁的状况因此得到根本改变，中越交通线从此畅通无阻。这一战果远远超出了战役的最初设想。

胡志明主席异常高兴。在越军总部举行的庆功宴会上，他向中国军事顾问一一敬酒感谢他们为边界战役胜利作出的贡献，并对陈赓说：“这一仗你们真是帮了大忙，你和中国同志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对你们的工作十分满意。”

胡志明敬酒妙语连珠

宴席间，欢声笑语，气氛热烈。胡志明精神矍铄，妙语连珠。他在和中国顾问王砚泉碰杯时，只喝了一半，突然把酒杯放了下来，神秘地说：“这杯酒我只喝一半，余下一半留给我夫人喝。”

王砚泉听后才一愣，胡志明至今独身一人，人所共知，哪里来的夫人呀！一旁的陈赓明白了胡志明话中的奥秘，但佯作不解。见王砚泉接不上话，他马上说：“如此说来，胡主席应该罚酒。胡主席为革命终日操劳，但对自己的生活却不上心。在坐的都是党员，我建议现在通过一项党的决议，批评胡主席不注意个人生活，限他在 3 个月内找个夫人。否则就认罚两杯。”

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中越干部齐声叫好。胡志明放声大笑，摆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很庄重地说：“党的决议我理应服从。只是也有一个建议，这个决议似乎应由妇女大会来做。如果今天开的是妇女大会，我服从决议，否则就难以从命了。”大家听后，笑声、欢呼声更大了。胡志明激动地说：“战役胜利了，同志们都尽了力。我愿和大家共饮一杯庆祝胜利。”

是啊，胜利了。越南抗法战争的局面终于打开了，陈赓和所有的中国顾问都为此而欢欣鼓舞，然而，胜利并不能说明越南人民军已经成熟。越军，特别是一些干部在战役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陈赓深感不安。对于越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军事顾问感触很深。有的顾问几次提建议不见成效，产生了急躁情绪，干脆自己下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结果因方法不对头，不但没有得到越军干部的理解，反而影响了彼此的关系。有的顾问感到实在不好工作，干脆向陈赓要求回国。

陈赓严厉批评了这些作法。他严肃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国内不同，完全照搬我们过去的工作方法是不行的，我们是顾问，任务是为越军干部出主意，而不是指挥部队，因此我们只能提建议，而不是下命令，最后的决心还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下。我们要正确认识越南人民军，既要清楚他们的缺点所在，又要看到他们所具备的优良素质。在工作中，要诚恳热情，认真负责，还要从其现状出发，循序渐进，谆谆诱导，帮助他们逐步克服缺点，最后建成真正过得硬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主席也在关心着越南人民军队的建设。边界战役后，毛泽东电示陈赓说：

越军大胜，甚慰。越军经此胜利，必能提高一步。越军还年轻，只有从今后多次作战中，才能逐步学会近战的各种技术和战术，你们应更好地帮助他们。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对战役结束后中国顾问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赓及时调整了工作重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帮助越军进行战役总结和建军等工作上。他认为，越军的当务之急，不在于扩编多少部队，而在于结合战役总结，整顿干部思想，克服自身缺点，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10月8日，陈赓与胡志明在布局圩作了一次深谈。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重点是交换了对建军问题的看法。第二天，胡志明派人给陈赓送来了一封信，要求陈赓将自己的意见整理成书面意见给他。陈赓接信后，立即写了一份题为《战役胜利后的工作意见》的书面建议，并与胡志明、武元甲会晤，具体讨论了《意见》中的各项内容。在这份书面意见中，陈赓提出了训练干部、整编部队的建议，还列举了轮训干部、紧缩机关、充实连队、统一主力部队编制、从实战中提拔干部、正确对待俘虏以及作好战场清理工作、对部队进行以战养战教育等内容。胡志明、武元甲接受了这些意见，同时委托陈赓代表越军前指在战役总结大会上作总结报告。

评述战役各个阶段

10月26日，越南人民军总部在南山兵工厂举行边界战役总结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陈赓的总结报告。为使越军干部能通过战役总结，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有一新的变化，陈赓在随行人员和军事顾问的帮助下，精心准备了报告内容。其所下功夫之精细，令许多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中国干部感到惊异，因为陈赓素以才思敏捷、思路清晰而著称，在国内工作时，经常准备一个简单的发言提纲，即开始作报告。像这种对报告内容再三斟酌的情况，实不多见。

27日，陈赓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大会讲台，开始作战役总结报告。在他手中拿的报告提纲上方，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国际主义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正是陈赓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他首先阐明了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接着又结合战役过程，对战役的几个阶段——作了客观的评述，然后从中引伸出战役指挥的几个重要原则，对战役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作了分析。在此之后，陈赓又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作了科学的阐述。

报告的第三部分，标题为“几个领导问题”，陈赓以一个无产阶级国际战士的坦荡胸怀，对越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与批评，他谈到了官兵关系问题，谈到了部队纪律问题，谈到了提拔使用干部的方针问题，谈到了对部队进行爱国家、爱人民、爱护武器资财教育的问题，谈到了思想领导的问题，谈到了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问题，并针对越军的缺点，一一提出了纠正的措施，建议越军通过这次战役总结，制订改进措施，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打好思想和组织基础，以便迎接以后更艰巨的战斗任务。

在报告结束时，陈赓饱含深情地说：“边界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通往抗法战争胜利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但这并不能动摇我们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中国革命也是历经坎坷才最后成功的。我相信，有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有越南人民的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军一定会逐渐壮大，百炼成钢，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一定胜利。”

这一报告，连续讲了4天，其内容在越军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准

备报告时，有的中国顾问曾担心，这样把问题和盘端出，在越军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恐怕越军干部受不住。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尽管有的越军干部因受了批评而有些不高兴，可绝大多数越军干部反映良好。武元甲在会议结束时说：陈赓的意见既尖锐又中肯，非常深刻，包括总部在内的各级干部都要很好地予以领会、反省。胡志明则称赞陈赓的态度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布尔什维克工作风格”。他后来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已经打了两个胜仗，第一个胜仗是我们消灭了敌人并解放了高平、东溪和七溪；第二个胜仗是我们已经看清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越共中央高度重视陈赓的意见。在陈赓回国之后，越共中央根据陈赓的建议，在人民军中进行大规模的整军运动，并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将陈赓的意见一一付诸实施。可以说，陈赓的工作，为越军的发展勾画出了一幅切实可行的蓝图，使越军的成长壮大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战役总结大会之后，陈赓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回国。

越南军民深深依恋着这位中国卓越的军事家。他那敏锐而准确的判断能力，高超而娴熟的指挥艺术，坦诚而灵活的工作方法，坚定而果敢的原则立场，赢得了越军干部的由衷敬佩。越军干部反映，“陈赓同志既能指挥自己军队，还能指挥调动敌人。不仅会打仗，还精通建军工作，又能团结教育人，没有一点架子。这样的领导真是难得。”一些越军干部向中国顾问询问，“像陈赓大将（这是当时越军干部对陈赓的尊称）这样的将领，你们中国还有几位？能不能让他就留在越南指挥我们打仗”。

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也对陈赓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多次诚恳挽留陈赓继续在越南工作。然而，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开始，中共中央决定陈赓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入朝参战。因此，陈赓按既定计划于11月1日离开南山，启程回国。武元甲、陈登宁等越军高级将领远送十余里，与陈赓依依惜别。

山青青，水碧碧。战后的越北根据地又恢复了和平的安宁。荒芜的土地上又出现了耕作的人群，战火毁坏的城镇上又升起了缕缕炊烟。陈赓一行又过广渊，过去的房东热情地拿出水酒、水果，来送别这些为越南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中国同志。

水口关到了，像是要为陈赓洗却满身的征尘，天空飘起蒙蒙细雨。陈赓仁足关前，再一次回首眺望越南，眺望这片他为之工作、战斗近4个月的土地。连绵的群山已笼罩在稠密的雨幕中，此时此刻，陈赓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

三辆汽车疾驶而至。陈赓与送行的越南干部挥手告别，登上广西军区迎接他回国的汽车，重新回到祖国的土地。

胡志明的遗憾

1969年9月2日9时47分，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主席离开了哺育他的土地，去见了他的老师马克思。

他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走的。他还有他未竟的事业，他还要再与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深谈，他还要去看一看钓鱼台内他亲手种植的松树……

胡志明逝世这一天恰逢越南国庆日。越领导人深知胡主席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把越南人民的“断肠日”和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

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和共和国缔造者忌日的纪念活动将不好安排。

9月2日16时45分，越南外交部长阮维桢告知王幼平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为了免使越南人民过分受刺激，同时今天又是越南的国庆日，决定将胡主席的逝世时间公布为9月3日。”

胡志明的葬礼，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由他代表毛泽东先于9月4日去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8日，再由李先念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葬礼。

毛泽东60年代以来，没有再出过国，这是因为多方面的考虑。如果是在50年代，毛泽东一定会出现在这位老朋友的追悼会上的。现在这种安排，应该说是最好的方案了。

午夜，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不知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手有点发抖，以至于他写得最熟练的“毛泽东”三个字都有点异样。

签完这份报告，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他站在桌前，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了一团浓浓的烟雾，他的思绪也飞得很远很远……

他按响了叫秘书的电铃。

秘书进来了。他指指桌上的报告，说“马上送总理。”

秘书拿起报告，正要离去，又听毛泽东说：“再去给我找一张胡志明的照片来。”

秘书答应着往外走，出门时回头看见毛泽东脸上淌着泪水……

第一个医疗组

越南在胡志明逝世的讣告中宣布：“在胡志明主席患病期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日夜守护着他，并委托一个由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每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决心不借任何代价把主席的病医治好。但是由于他年事很高，病情严重，胡志明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也许读者对上述那个“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未多加留意，或许认为那一定是由越南教授、医生组成的小组。其实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派出的医疗组。中国的第一流医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下，为挽救胡主席的生命竭尽了一切可能。

胡志明主席晚年身体不好。应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国经常派医生去河内给他治病。为了保密，在联系中称胡志明主席为“丁老”。中央十分重视，不仅选派第一流医生，而且在每次医疗组出发前，周总理在百忙中总是接见他们，再三叮嘱。

1969年春，胡主席的病情加重，中国立即派出张孝骞（心脏病专家）、孙震环（中医专家）、黄挽（心脏病专家）等中西医专家和翻译张德维组成的医疗组。经过中越两国医务人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主席的身体明显好转。不久，医疗组回国休整，6月30日又返回越南；并向王幼平大使汇报医疗组离京时周总理的交代：“如胡主席的身体状况能稳定，我医疗组可在适当时机告退，需要时再来。医疗组要确实掌握病情，及时向王大使汇报，由大使报中央决定。”

8月2日，医疗组向王大使汇报：胡主席精神很好，食欲转佳，体重也有增加，各方面都见好转。医疗组认为，可以告退，并由使馆报请中央同意。

但8月15日胡主席突患感冒。王大使决定，医疗组推迟撤回，密切注视胡主席的病情变化。

胡志明停止呼吸

8月23日晚，胡主席病危，心脏病和支气管炎突然加重，嗓子里的痰咳不出来，憋得喘不过气来，出现休克，于是，使馆立即处于紧急状态：安排外线电话，直通北京，电话、电传24小时值班，大使和许多馆员通宵未眠。

24日8时许，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黎文良在主席府紧急约见王大使，通报胡主席病情，要求中国党增派医生。

25日8时，中国派专机送来了第二个医疗组，他们是李邦琦、王叔成、岳美中大夫和护士王西明。从越方提出要求，到医疗组到达，仅仅24小时。上午11时，黎文良约见王大使，转交了胡主席给周总理的电报，大意是：医生已到，请报告毛主席放心。

26日，王大使约见黎文良，转达我党中央的复电，大意是，接电感到宽慰，望胡主席安心养病。并告越方，我送急救组（即第三个医疗组）的专机已经起航，共5人，他们是：陶寿洪、胡旭东大夫，麻醉师高日新，化验员刘占利，护士孔繁英。专机抵河内后，急救组直奔主席府，立即投入紧张工作。

27日，胡主席病情继续恶化。急救组和其他医疗组会诊后，主张给胡主席输液。然而，这个很普通的医疗意见，却使越南领导人感到为难。一是因为病人已极度虚弱，担心输液发生意外；二是胡主席一生虽经历过多少次枪林弹雨，但却怕打针。政治局在病榻之侧召开会议，通过了输液的决定。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孔繁英。孔繁英正要进针，病人突然睁开眼睛，问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拿针，并同她开玩笑。孔繁英一边笑着答话，一边就势插针。病人一皱眉，成功了！在场的越南党政军要人松了一口气，——过来同她握手，祝贺成功，称赞她技术过硬。

31日，我中央又派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大夫，并由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梁枫陪同，乘专机来河内送急救药品，了解胡主席病情。出发前，周总理指示他们当天返京，晚上他要听取汇报。就在这天晚上，胡主席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9月1日夜间胡主席的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医务人员全力以赴，一刻也不能离开病人。使馆与医疗组联系中断。王大使无从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心里十分焦急，不断询问使馆值班室和礼宾秘书组。鉴于一国元首病危时，该国领导人守护在侧，一个外国使节在场有所不便的常理，周总理曾电嘱王幼平大使，在胡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当晚，在范文同总理举行的越南国庆24周年招待会上，王大使才从越南领导人那里仅了解到胡主席病情严重。招待会结束后，直到午夜，仍没有等到医疗组的消息。使馆即报国内，胡主席病情不见好转。

9月2日凌晨6时，王大使紧急约见黎文良。通知他，我国又增派了一个急救组（即第四个医疗组），专机已从北京起飞，约于9时抵达河内。大使回到使馆不久，张德维从主席府打来电话，只讲了一句话：“不行了，医疗组不要来了。”使馆立即将这一噩耗报告中央。当我专机接到命令时，已飞越中越边境，再过20分钟就可到达河内。机组通过无线电告诉河内机场指

挥塔，因“天气不好”，折返我国南宁。

9月4日下午，中共代表团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周总理提到了这件事：“31日，我们派吴大夫和梁枫同志来送药和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叫他们当晚赶回北京汇报。因天气关系，他们一日晨才到北京，我亲自听取汇报后又找有关同志讨论了5个多小时。我觉得已经很难见到胡主席了，但仍然决定再派吴大夫和梁枫以及一些医生携带药品、器材前去抢救，他们正在路上，不幸胡主席已经去世了。”

胡主席停止呼吸后，中国医生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希望，继续作人工呼吸，一直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一个个累得汗流浹背，精疲力尽。9点47分，黎笋下令停止抢救。12名中国医护人员列队向胡主席鞠躬致哀，失声痛哭，然后含泪退出。越南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我医护人员一一握手致谢。

这天上午，当我第四个医疗组所乘专机半途折回南宁的同时，周总理曾致电王幼平大使，嘱咐两点：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这是周总理在四天之内，给王大使发的第二份署名指示电。周总理的判断和越方的措施正好吻合，指示及时、准确。王大使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感慨良多，他说：“我当大使近30年，周总理署名直接给我发电报，给我下指示，只有这两次。”

胡志明逝世后，越南领导人请中国医疗组暂时保密，不要离开主席府，不要同外面联系。直到9月4日，越方公布了胡主席逝世消息之后，我医疗组才迁出主席府，住进河内一军队招待所。

9月10日中午，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黎德寿和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黎文良在主席府接见我医疗组，他们热情赞扬了中国医生全心全意的忘我的工作态度，感谢中国同志的大力协助。接见时，黎德寿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给医疗组每个成员送了一份纪念品。晚上，黎德寿、黎文良来到医疗组住地设宴为医疗组送行。次日，越方派专机送我医疗组回国。

周恩来赴越吊唁

1969年9月4日零时，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约见外交部长阮维桢，通知他，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前来吊唁，副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团员是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和王幼平。代表团专机约于7时到达河内。阮维桢表示立刻报告中央。

2时许，阮维桢约见王大使，答复同意，但为难之意溢于言表：越方尚未做好吊唁准备；为长期保留胡主席遗体，现正对遗体进行处理，因此，代表团将不便瞻仰遗容。

王大使将越方答复和阮维桢的谈话报告中央后，即驱车去内排机场迎接代表团。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越南领导人是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和裴光造等。

专机7点钟没有到。一个半小时后，王大使建议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先回去。王大使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专机到达，遂和阮维桢、阮基石一起离开机场。在途中遇见我使馆汽车，车上同志报告王大使：“刚刚接到机场电话，总理已经到了。”王大使急忙调转车头去机场，路上遇到周总理的车子，看见周总理在车里向他招手，他随即与周总理一起到达宾馆。

代表团在空中收到使馆电报后，临时降落南宁，经研究后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因而比预计迟到两个小时。

对此，周总理向越南领导人解释说：“这一次来得很仓促，在途中接到阮维桢同志转告的越劳党中央关于国葬的布置，知道不能向胡主席的遗体告别，但因我们已经在途中，所以还是来了。根据主人的意见，八、九、十三天举行国丧，到时我们再派代表团来参加，我们这次先来吊唁。”

周总理下榻在河内范老五宾馆。范文同、武元甲首先来到宾馆，长征、黄国越、裴光造等领导人亦先后来到。范文同、武元甲见到周总理，失声恸哭。周总理含泪——安慰。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整个大厅沉浸在悲痛之中。

下午3时，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由于灵堂没有布置好，中越双方先举行了会谈。吊唁仪式于5时举行。

灵堂临时设在主席府正厅。大厅高大，宽敞明亮，是胡主席接受使节国书、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这个灵堂是专为我代表团准备的，因为正式吊唁活动将在巴亭会堂举行。

周总理进入灵堂时，黎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依次和周总理拥抱。代表团在胡主席遗像前献了花圈。默哀后，周总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

晚上7时左右，越南领导人秘密地请周总理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了胡主席的遗容。这是唯一看到胡主席遗体的外国代表团。代表团于当晚8时离河内回国。

8日下午，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到达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副团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团员是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当晚，越南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到宾馆会见中国党政代表团。次日，代表团与其他31个外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隆重国葬。

胡主席逝世后，中国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当时越南正在打仗，外国舆论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异乎寻常的”，“是对处于最困难时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

第五章

金日成急电毛泽东，颐年堂灯光彻夜。菊香书屋家宴送帅，紫云轩主人痛失爱子

不合宜的“礼物”

195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宜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来电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急电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中央常委们讨论彻夜，一直到天亮才休会。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

谁来挂帅。”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毛泽东略显急躁的答复说：“挂帅入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实际上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毛泽东从他和彭德怀在20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生活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严守党纪、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勒马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他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作出了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

这次会议还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初步把我国出兵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又提议，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电文要点如下：

(1)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2)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3)在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

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说：“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

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不巧得很，10月3日华北地区乌云密布，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苏制的小型伊尔—14两个螺旋桨的飞机，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宜起飞。所以，直到10月4日周恩来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才飞往西安。

彭德怀临危受命

1950年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来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汽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火速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将这些方案计划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他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彭德怀一愣，惊奇地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开什么会？是不是原先通知要召开各大区领导人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方案的会？”来人回答说：“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彭德怀迟疑一会儿说：“那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来人又催促说：“不行，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彭德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同志找来说：“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待，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你可分头转告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对其他任何人先不讲，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我马上要坐车到机场去了。”此时一贯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彭德怀，对这突然紧张的情况也感到迷惑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过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儿，不管开什么会，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单位报来的三年经济恢复发展的规划方案、调查报告和图表统统带上，和他一起坐飞机到北京。上午11时左右，这架从北京匆匆飞来的飞机又匆匆起飞，穿过西安上空的云雾直飞平原。坐在这架飞机上的除了北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两人外，就是彭德怀、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等3人，这使得这架能搭乘20多人的飞机机舱内显得空荡荡的。因伊尔—14飞机性能较差，只能飞短途，于12时20分飞机在太原机场降落检修和加油。但非常凑巧彭德怀在机场上遇到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赖若愚和苏联顾问沙契柯夫。赖若愚向沙契柯夫介绍说：“这位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去年解放太原的战役，因徐向前同志有病，毛主席和党中央特派彭副总司令亲自来帮助指挥的。”

沙契柯夫一听是彭副总司令，即热情地邀请彭德怀和他共进午餐。此时彭德怀虽有要事在身，但又不能对赖若愚讲出，于是他一再托词谢绝，但沙契柯夫拉着彭德怀的手坚决不放，一再挽留。秘书见此情景实在难以摆脱，即侧到彭德怀身后低声说：“还是应付吃一点算了。”饭后彭德怀一行在机场候机室稍事休息，直到下午2时20分乘飞机自太原起飞。至4时零5分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当彭德怀跨出舱门快步走下舷梯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迅速迎上前来向彭德怀敬礼，几辆小汽车早已停候在跑道一侧。李树槐边帮忙提行李边对彭德怀说：“彭总，今天气候不好，气流不稳，一路辛苦了。行政

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好了住宿。毛主席交待说，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彭德怀的脸立刻严肃起来，高声说：“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车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

古老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地穿来穿去忙个不停。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感慨他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是千千万万的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德怀的话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你没有亲眼看看当时欢乐的场面。”

彭德怀若有所思地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伍进军新疆哩！不是不想来，而是前线离不开呀！”

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也发话了：“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共同的理由是：（1）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2）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3）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4）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5）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

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彭德怀下榻的北京饭店。他和彭德怀两人在房间交谈约1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因为在昨天下午政治局的会议上，彭德怀未曾发言，毛泽东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惫的眼神，直言坦率地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的频频点头，一边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的支持我的意见罗！”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5000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和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25000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100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逼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发出最后通牒，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彭德怀同意地说：“主席分析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话题至此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来对彭德怀微笑说：“老彭，你看，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挂帅合适呢？”

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即刻紧锁双眉两眼一闭，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东北第4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4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可是，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国已大批向北进犯，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外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深为感动的毛泽东略带感叹地讲。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5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因考虑须马上和彭德怀、高岗一起研究入朝的作战方案，遂留下彭、高以及周恩来共进晚餐。

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8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作好入朝准备。同时我把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关于部队入朝的时间，给你10天作准备，初步预定10月15日。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恩来同志即刻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尽快解决。”彭德怀虽然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1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毛泽东听后很高兴地说：“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100%支持我，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将来全国人民都要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了使你到朝鲜后工作上的方便，你先把岸英带去，他既会俄文，又懂点英文。我让他去的目的，为的是在你身边有个可靠的翻译，将来与苏联方面联络比较方便，另一方面也让他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在战争中去锻炼，这也叫作送子从军吧！”彭德怀听后感到有点紧张，开始他默不作声，后来他婉言劝阻说：“你让岸英跟我到朝鲜前线去，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是想给全党带个头，但是自开慧同志牺牲后，岸英从小受苦，到处流浪，后来又送到苏联学习很长时间，他已长期不在你身边生活，你们难得团聚在一起，我看还是别让岸英跟我去，就留在主席身边照料吧！”尽管彭德怀一再表示不同意，但最后毛泽东仍坚持让岸英随彭一起入朝。

关于毛岸英随彭德怀入朝的经过，当时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元帅是这样回忆的：“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求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的物资供应，毛泽东当面指示高岗应首先依靠东北地区的供应，然后全国都要支援。

10月6日凌晨1时左右，彭德怀回到了北京饭店，他躺在沙发上燃起一支香烟，独自一人沉思默想了一会儿，然后叫来张秘书要他尽快派人将带来的西北三年文教事业发展规划送至科学院郭沫若同志处。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

紧张的抗美援朝临战准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战场日益严重的局势，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

10月7日吃过早饭后，他指示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记后，马上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保密室保存。然后准备出发。当天，彭德怀到中南海毛泽东处，和高岗一起共同研究志愿军出国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

问题。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彭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导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千斤的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的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饭店。因为明天就要离京，他首先进屋看了这两天接来和他短暂团聚的侄儿侄女们，此刻他意识到，这次离别后，何时再见很难预测，遂把他给孩子们买的衣物分给每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伯伯明天就出发执行任务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要经常给妈妈写信，把你们在北京的情况告诉妈妈。”幼小天真的孩子们立刻反问：“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还是回西安吗？”彭德怀拍拍孩子们的肩膀笑道：“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接着他叫来秘书吩咐说：“你和小郭把我们需要的东西今夜准备好，明晨出发。”

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内容如下：

1.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2.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 13 兵团及所属 38 军、39 军、40 军、42 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 1 师、2 师、8 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3.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和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5.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6.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同志的特急电报，电文如下：

1.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

侵略者；

2. 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它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4. 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内务相）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阳。

10月8日晚上，当倪志亮大使和参赞柴军武将此电报面交金日成首相时，他高兴得两手一拍说：“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别拉着倪、柴两人的手进入会客厅，随手拿出几瓶酒请倪、柴一起喝酒言谈。其间他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

斯大林临阵犹豫

1950年10月8日上午7时，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彭德怀指挥所的负责人成普，参谋徐亩亢、龚杰，秘书张养吾，翻译毛岸英一行乘飞机直飞沈阳。这次航行是绝对保密的，连每个人的亲属包括彭德怀的夫人均不知他们将前赴何地。上午10时左右，飞机冒雨安全降落在沈阳机场。东北局派人将彭德怀等接到和平街1号交际处休息。

中共中央根据事先与苏联方面的协商，就在彭德怀、高岗飞往沈阳的同一天，特派周恩来带翻译师哲和一名机要员，乘专机前往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派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彭德怀飞抵沈阳后，即争分夺秒开始了极为紧张的入朝准备工作。他和高岗首先召见了原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等，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派兵援朝的决定，并听取了当前部队备战和思想汇报情况。大家看到是彭德怀挂帅，都非常高兴，更增强了胜利信心。散会后，原在红3军团工作过的13兵团政治部主任杜平到彭德怀住处，高兴的向这位阔别了十几年的老首长说：“彭老总，我们真没想到你来挂帅”。彭德怀微笑说：“不但你没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组织志愿军，中央原来考虑是让林彪去的，但林彪说他有病，不接受任命，于是中央才临时决定让我来的。”

下午，彭德怀和高岗召集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开会，在高岗讲话后，彭德怀说：“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司令员也参加了，中央已下了最大决心尽快出兵援朝，要和敌人抢时间，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关于后勤供应问题，中央决定东北地区要全力以赴支援志愿军作战。希望东北局和军区的领导同志要认真研究部署，各项保障工作务必落到实处，这是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关键问题。”会议并商定10月9日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干部开会，研究部队出国前的日程安排。

8日黄昏，金日成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于当天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朴一禹来到沈阳。朴一禹向彭德怀汇报了

当前敌军进攻情况和朝鲜人民军现状，并转达了金日成首相要求志愿军迅速出动，首先一部控制咸兴，一部控制新安州。会谈后的当晚朴又返回新义州。

10月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彭德怀在会上讲话说：“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和金日成首相的要求，中央已决定出兵援朝。这不是我们好战，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逼我们走这条路的。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前夕，周总理曾一再对美军发出警告，倘若越过‘三八线’北犯，中国将出兵援助，但美国和南朝鲜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无视我国政府的警告已越过‘三八线’，正向中朝边境鸭绿江边进攻。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是三天前才决定的。”“这次出兵援助，我们要决心打赢，但是也要有不怕打烂的精神准备，万一美国人打进我国来，那我们就烂了再建。各军要日夜加紧准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树立必胜观念，要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各军要在10天之内，克服困难，连夜突击，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但在会议上，各军干部也提出了问题，他们最担心的是在出国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于是当会议还在进行中，彭德怀和高岗又于9日上午11时联名致电毛泽东称：“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这时，已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犯的敌军有：

美国第8集团军所属之第1军（辖骑1师，步兵第24师），第9军（辖步兵第2师，第25师），第10军（辖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和空降兵第187团，另有英军第27旅、第29旅；加拿大旅、土耳其旅等每旅各约5000余人参战；南朝鲜军队计有：第1军团（辖首都师，步兵第3师），第2军团（辖步兵6、7、8师），第3军团（辖步兵2、5、9师）。此外南朝鲜步兵第1师配属于美第1军作战，第11师配属于美第9军作战。当时先后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还有美国空军第5航空队，拥有各型战斗机700余架，第20战略轰炸机航空队有各型轰炸机300余架，此外，美军每个师有侦察机10架支援其他地面部队作战。

至10月中旬，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总兵力已达40余万人，各型飞机1000多架（海军飞机除外），各型军舰300多艘。

自10月1日夜，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李承晚军队陆军第3师首先越过“三八线”后，到10月9日美国及英、加、土等军也全部先后越过“三八线”。

鉴于朝鲜战场的局势严重，彭德怀心急火燎，他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决定亲赴鸭绿江沿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我态势。

在9日军以上干部会议结束后，傍晚即乘火车由沈阳赴安东（丹东），他在沈阳的两天里，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出国作战方案和后方供应等问题。每天几乎工作约20个小时，连吃饭时也谈工作，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10月9日夜在从沈阳赴安东的乘车途中，彭德怀仍不肯睡觉，他一边啃馒头干，一边在列车上召集丁甘如、成普等人开会，研究组织他的指挥所。他说：“在沈阳两天太紧张，现在抓紧时间算算人头帐，把从北京和沈阳调来的同志们分分工。”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机构，就在火车上组成了。10日凌晨火车抵达安东，边防军司令部将彭德怀一行接到

镇江山招待所，彭德怀吃过早饭后不顾连日的疲劳，亲往鸭绿江边察看渡江地点，了解战备情况。此时侵朝“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40余万人的总兵力中，第一线兵力即有4个军共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共约十几万人，正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进犯。

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占绝对优势，以达初战获胜之目的，彭德怀于10月10日急电请示毛泽东：

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

此外，彭德怀还深感8日他在沈阳与朴一禹的匆匆会谈，内容不够详细具体，于是当晚20时他再次急电请示毛泽东：

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11日）晨经安东前往德川。特报。

彭德怀的电报刚发到北京，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10月10日毛泽东也收到了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急电：

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

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军掩护支援由苏联负责。因此当中共中央于10月2日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于当日深夜即将决定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空军作出准备。但是当8日晚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苏联南方黑海之滨克里米亚附近的阿布哈季亚别墅休假，9日上午周恩来和翻译师哲在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的陪同下，乘苏联政府专机飞抵克里米亚，然后乘汽车前往克里米亚以东的阿布哈季亚，当晚7时与斯大林开始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会谈主要协商在中国志愿军入朝时，苏联能出动多少战斗机和轰炸飞机支援中国援朝志愿军，并由谁担任指挥，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

出乎预料的是斯大林根据朝鲜战争10月2日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中苏边境进攻。他担心如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以，在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犹豫后退了。

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先给中国2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尽快运到满洲里，但是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其实，空军和陆军不同，飞机调动转场不过两三天就可准备完毕，而当时还有10天准备时间，完全可以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斯大林的态度，不过是犹豫推诿之意。

中苏这次高级会谈直到次日凌晨5时才结束，中方代表周恩来对这一突

然变化大吃一惊，立刻感到事关全局，于是他在苏外长莫洛托夫陪同下，赶紧于10月10日飞回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将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迅速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10月10日下午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未曾料到的突然情况立即使他陷入焦虑之中，是马上出兵还是暂缓出兵呢？当夜他又突然收到彭德怀自安东发来的准备11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这两份电报使他翻来复去更感决心难定。经与代总长聂荣臻商谈后，他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明天先不要入朝而是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这时已是深夜，聂荣臻考虑万一明晨以前彭德怀收不到电报，彭就将入朝会见金日成，于是聂荣臻于11日晨1时左右赶到总参谋部作战室给彭德怀打电话：

你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讨论。

10月11日下午，彭德怀奉命带了指挥所负责人成普由安东乘火车于深夜抵沈阳。12日，彭德怀在沈阳和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紧急开会，针对他在安东调查到的部队存在的困难，特别是后勤供应问题研究了一些紧急措施和解决办法。当晚8时，彭、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

(1) 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2) 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来京一谈。

13日早饭后，高岗、彭德怀即乘专机由沈阳飞回北京，由聂荣臻代总长在北京饭店迎接，聂说：“下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出兵问题再次讨论。

在彭德怀与高岗奉命回北京之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部越过“三八线”，并已作好大举进攻平壤的准备。10月9日麦克阿瑟以威逼口吻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

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

10月10日下午4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又到我国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威胁恫吓的情况，金日成首相于10月10日紧急召见我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柴军武同志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11日金日成首相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彭德怀在会议上汇报了三个问题：(1)与朝鲜代表朴一禹会谈的内容，(2)当前侵朝“联合国军”兵力部署和动向。(3)志愿军各部备战情况和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彻夜会议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

须立即出兵援朝。

会议号召要自力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迎击冒犯之敌。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是否出兵援朝作战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力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立刻在中南海给他同机飞回北京正在军委作战部待命的成普打电话，让他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出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仍要继续作好出国准备。

就在 13 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

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还与高岗、彭德怀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

14 日清晨，由于天气不好，飞机飞行有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岗先乘火车离京返回沈阳，立即召集志愿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局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政治局的最后决定。宣布立即作入朝的各项准备，并决定准备召开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14 日全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志愿军各部于 10 月 18 日或 19 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10 月 14 日 21 时，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13 日作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和第一步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其要点如下：

（1）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

（2）美军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

（3）我军决于 10 月 19 日开动，全军 26 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 10 天时间；

（4）为准备在 11 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 12 个步兵师 3 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5）在我军开进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军前进为有利。

毛泽东为什么将上述决定告知周恩来？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我们出动 6 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 12 个步兵师和 3 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种改变出兵方案，

有必要通告苏方，以使苏联方面了解我国出兵情况，从而尽快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困难。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这一天他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因为他知道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基地，打仗要靠重工业，战争的胜负，除了人是主要的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当他在沈阳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六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他还亲切地鼓励职工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并指示工厂领导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15日，由于敌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前来沈阳会见彭德怀。朴向彭说明敌军已逼近平壤，金首相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同志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迟滞敌人，我同高岗今天要赶赴安东，去布置13兵团部队渡江计划……”。

彭德怀并邀请朴和他一起赴安东。16日上午，在安东召开了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彭德怀首先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随后他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形势，阐明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战略意义。他说：“现在美军及南朝鲜军队正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疯狂进攻，局势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兄弟党和邻国遭受侵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中央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后，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决定大力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如果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那对我国就是个直接威胁，国防、边防都会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他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恐美病”思想，指出：“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是占绝对优势，但我们在战术方面就比敌人强，坚决勇敢，敢于近战，送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等，这些就是敌人所害怕的。”

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三面临海的特点，彭德怀还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为此，“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针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新情况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这次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援助兄弟党，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援助朝鲜也就是巩固我们的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分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他们。”

彭德怀最后强调入朝作战要作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遵守纪律，尊重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各级领导干部要多研究新情况，多想新办法，只要发挥群众力量，就能胜利地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师以上干部会结束后，为了了解干部们对出兵的反映，彭德怀又约集了

几个干部到住处谈话，进一步了解部队情况。

在谈话中他又指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社平说：“当前部队干部战士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同思想反映，你们应起草一个政治动员令，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意义，提高指战员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胜利信心。”

政治部立即根据这一指示，编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誓词》，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在誓师大会上领读。誓词的主要内容是：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战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全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姿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在美国方面，却出现了十分乐观的气氛。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所以他们判断美军在向鸭绿江边前进时，不会受到阻碍。

麦克阿瑟猖狂扬言要在感恩节（1950年11月23日）前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优势，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美方要员们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料到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敢与美国相抗衡。这些错误的判断，是美国政府的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导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基本原因。彭德怀在安东部署渡江方案时曾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

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指示，“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伪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同电又指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毕竟还是比较清醒些，他在进入10月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了30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45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使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于是杜鲁门紧急决定，必须和麦克阿瑟进行当面磋商，以便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关于中国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断。

10月15日，杜鲁门由华盛顿乘飞机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当面会谈。杜鲁门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

“可能性极为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30万军队，其中不超过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5万至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向杜鲁门断言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全朝鲜就会终止。”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谈，使美国政府认为侵朝战争已近尾声。于是杜鲁门亲自授予麦克阿瑟一枚橡叶勋章，以示对麦克阿瑟在朝鲜所谓卓越功绩的表彰后，于 10 月 16 日返回美国旧金山。17 日杜鲁门得意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战士们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位合适的入选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为暂时的胜利兴高采烈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正紧张地为出国作战加速准备工作。

17 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的保障问题。

但此时，彭、高突然又接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等的来电，称：

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不顾虑的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

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了毛泽东 17 日下午 5 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 18 日乘飞机火速回京。这是因为周恩来定于 18 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电告彭、高：“对出兵时间，以待周 18 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并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

18 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 17 日来电内容。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告急。就在当日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 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 4 时即停止，5 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 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 月 18 日 21 时。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

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志愿军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先头，开始跨过鸭绿江大桥。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朝鲜战场上，我党我军的一代名将——彭德怀又开始导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威武雄壮的一幕战争活剧。

毛泽东痛失爱子

这是1950年10月7日，一个金风送爽的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即将赴东北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送行。

毛泽东没有专门的餐厅，宴会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客厅的“菊香书屋”内举行。由于江青因事外出，在场的只有3个人：毛泽东、彭德怀、毛岸英。

彭德怀早就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但见面是在1946年，那时毛岸英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见过毛岸英了。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彭德怀一边大口吃着糖醋辣椒，一边关切地询问。

“北京机器总厂。”毛岸英恭恭敬敬地回答。

“工人同志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应？”彭德怀三句话没离本行。

毛岸英显得有些激动：“大家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坚决要求支援朝鲜人民……”

“不是‘发动’，是正义战争的召唤！难道你要去朝鲜是我动员的吗？”毛泽东微笑着纠正说。

“主席，这……”彭德怀愕然停筷，盯着主人。

“……”毛泽东微笑不语，慈祥地望着爱子。

“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毛岸英朗声笑道。

“主席，这不是开玩笑吧？”彭德怀再次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主人。

“岸英想跟你去打仗，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利哟！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他这个兵吧？”毛泽东依然不置可否，高深莫测地微笑着。

“彭叔叔，这不是开玩笑！我考虑好几天了。”毛岸英那张英俊的脸上，洋溢着神圣的光采。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嘛！”彭德怀试着劝说。

“可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现在，全中国的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你们小俩口商量好了吗？你可不能背着她噢！”彭德怀又找了一个劝

说的借口。

“刚才我已经向她辞行了。”毛岸英含糊其辞地说。

彭德怀的脑筋在飞快地转动着：看来这父子俩早就商量好了，那就表态吧？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含蓄地说。

“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有些着急了，他搬出种种理由：上过苏联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

“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毛泽东满意地望了望儿子，又笑着对彭德怀说：“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

彭德怀见事已至此，只得表态道：“那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岸英，你愿意吗？”

毛岸英兴奋得欢呼起来：“一百个愿意！只要让我上前线，干什么都行。”

“主席，让那些记者知道了，这可是头条新闻哟！”彭德怀话中有话地说。

“还是不让记者知道的好。”毛泽东不无幽默地接着说：“要是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罗！”

彭德怀领会了那言下之意：保密！

酒过数巡，毛泽东起身举杯，慨然说道：“这杯酒就为你们送行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他与彭德怀、毛岸英一一碰杯。三人一饮而尽……

在毛岸英不幸牺牲后，彭德怀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件事。彭德怀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个高级干部就没做到，叫他去他都不去！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10月8日早晨，云雾低垂，空气潮湿，预示一场秋雨即将来临。

上午7时，这清晨的宁静被打破了——一辆又一辆轿车，送来了一批赋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彭德怀及其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高岗及其秘书华明；总参谋部作战参谋成普、机要参谋海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几位身分不明的苏联同志。

10分钟后，飞机轰然作响，像一只巨大的铁鸟，射向灰色的天空。

机舱内一片沉默。许多人都是初次见面，相互间不知姓名。毛岸英与张养吾并肩而坐。张养吾是一位年已45岁的知识分子，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教育系，1938年毕业于抗大四期，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彭德怀的行政秘书。

起飞不久，坐在前排的一位苏联同志掉下一支钢笔，毛岸英拍拍苏联同志的肩膀，指着钢笔说：“格尔瓦斯！”

张养吾学过几句俄语，知道这“格尔瓦斯”就是俄语中的“钢笔”。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怎么懂得俄语呢？于是他就比较注意毛岸英的举动了。

沈阳北陵机场。暴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下飞机都成问题，这一行人被迫在机翼下避雨。

张养吾指着毛岸英，悄悄问彭德怀：“那个小同志会讲俄语嘛，他是谁？”

彭德怀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关于“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叫毛岸英，原来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今后你要多关心他，还要注意保密！”

雨势稍减，毛岸英随彭德怀、张养吾、郭洪光上了一辆轿车，到高岗家稍事休息后，又来到沈阳市和平街1号。

这是一幢铁门青砖环抱的小楼，原来是东北军阀万福麟的公馆，现在成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交际处。毛岸英随彭德怀在沈阳期间，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当日傍晚，彭德怀心不在焉地吃了晚饭，然后把张养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我们4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

“毛岸英同志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张养吾首先建议。

彭德怀接着说：“我同意，小郭同志呢？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

其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这个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但仍由毛岸英任组长，直到他牺牲为止。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如实向小组长汇报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部队去带兵……”

当时，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干警卫员这个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出来，事先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可能也有点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彭总事先没打招呼吗？”

张养吾笑了笑说：“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飞机接彭总，彭总还以为是要来参加财经工作会议呢！带的都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把我这个行政秘书也带来了，反而把军事秘书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讲点道理吧？！”

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促膝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被深深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毛岸英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毛岸英 10 月 10 日傍晚随彭德怀等人从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住在“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营造的洋房里。

次日上午，彭德怀奉召紧急返京开会。难得清闲的毛岸英与张养吾结伴而行，在安东中山公园里玩了半天。

在欣赏北国风光之余，他俩谈哲学、历史、俄语。这是他俩共同的爱好。知识的交流，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贴近了。时近中午，他俩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憩，毛岸英向这位兄长般慈祥敦厚、教授般学识渊博的忘年之交敞开了心扉……

张养吾是第一次听说毛岸英的母亲叫杨开慧，第一次听说毛岸英曾经在上海流浪、在苏联留学……

毛岸英的不幸遭遇和非凡经历，使张养吾同情、敬佩、激动。他从毛岸英身上，看到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缩影。

在回去的路上，毛岸英和张养吾相约：在朝鲜战场上互相帮助，张养吾帮他补习中文，他帮张养吾学习俄语。

毛岸英说到做到。当天下午，他就送给张养吾一本《简明俄文字典》。

兵车辚辚，战马萧萧。10 月 23 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阴暗潮湿、霉味扑鼻的简易工棚里，毛岸英解开行李，整理床铺。

“岸英，还没搞好啊？”张养吾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

“马上就好！”

张养吾站在一旁，望着那一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那一大摞书：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

“有些书是爸爸送的，这些衣服、被褥都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

“你妈妈？”

“噢，就是江……江青。”

两人正说着，任荣部长来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邻居。

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在距此二三里远的一条岔沟里。但杜平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带着组织部长任荣、秘书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

彭德怀特意安排张养吾，毛岸英和这些政工干部住在一起，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为了发挥他们在政工方面的特长。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国空军称王称霸，横行无阻。志愿军总部机关，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除个别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间工作，白天防空，几乎天天如此。

毛岸英和张养吾原计划在住处附近挖一个防空洞，可满山都是坚硬无比的铁矿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石头却纹丝不动。他们只得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飞机一来，就往树林里钻。那时，已经开始下雪了，气温降至 -20 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毛岸英依然顽强地坚持看书学习。这给张养吾和任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养吾回忆说：“毛岸英、任荣和我，防空时经常在一起。山上那么多马尾松，钻进去飞机是看不见的。任荣喜欢阴坡，说是保险，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欢阳坡，又能晒太阳，又好看书。”

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毛岸英借时如金地博览群书。张养吾说：“他喜欢看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什么书都看。到朝鲜半个多月，就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百万志愿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则戏称“翻译官”。

朝鲜战争时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

毛岸英总是积极主动而又满腔热情地“没事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仍然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故事。

莱尔斯(Liles，原译赖尔斯)是中国志愿军捕获的第一个美国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俘的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着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形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

“坐下！”任荣威严地指着审讯台前的木凳。

莱尔斯咽下一口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下马威”！

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

“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

“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

“有没有伤到骨头？”

“没有。”

“吸烟吗？”

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

“您想吃点什么吗？”

“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

“谢谢！”莱尔斯边吃边都嚷道：“真是出乎意料。”

在莱尔斯吃饱后，审讯正式开始。那种预期的气氛虽已荡然无存，可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

“您的名字、职务？”

“莱尔斯，韩国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

“履历？”

“……1947年到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韩国任顾问。”

“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术有何印象？”

“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打法，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

审讯圆满结束。这该归功于莱尔斯的密切合作。

是什么魔力使这位美军少校消除了恐惧，违背了入伍时严守国家机密的誓言呢？当然与毛岸英的几支香烟、几块饼干和几句同情的询问有关。但这决不是廉价的交换，其中自有更深沉的东西：那就是发自毛岸英内心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次审讯结果，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他在看了审讯记录后，当即指示张养吾和毛岸英：“俘虏谈的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应该通报全军。这份通报，就由你们写吧！”

毛岸英执笔，写得很快。当天下午，这份《志司通报》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因38军行动迟缓，彭德怀又发了一顿脾气：“.....这说明入朝前政治动员很不深入。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右倾思想！”

“那就发个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议。

“我看有这个必要！”彭德怀态度生硬，像吃了火药。

“彭总，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长吧！”毛岸英当即请求。

“可以。要快！”彭德怀又补充说：“请杜主任审定，赶快发往部队。”

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点燃蜡烛，秉笔疾书，张养吾看到，他思路敏捷，文如泉涌：“.....我军取得了初战经验，证明没有空军配合的人民志愿军，以它无比的英勇与巧妙的战术，同样可以消灭有空军配合的敌人.....亲爱的全体同志们，歼敌良机摆在我们面前，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在飞机、大炮，而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一时机的难得，能否坚决执行命令.....”

当毛岸英写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已是11月1日拂晓。

张养吾回忆说：“杜平同志阅后提了意见，我和毛岸英又作了修改，最后是彭总批发的。这次最辛苦了，毛岸英接连干了30几个小时。”

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任命了志愿军总部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并宣布成立司令部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直属彭德怀领导，负责作战指挥和文电处理，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彭总作战室”。

办公室成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调来的成普、龚杰、徐亩元；还有一个就是毛岸英。

张养吾虽然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他和毛岸英照旧不参加作战值班。

军人与老百姓之间，有时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养吾自从“阴差阳错”，跟随彭德怀入朝以来，深感自己“不是这块料子”。他缺乏起码的战斗经验，无法适应战时生活。因此，他找彭德怀“要求调一下工作”。彭德怀叫他仍回西安任原职，并决定调西北军区司令部的高瑞欣参谋来办公室工作。

毛岸英听说张养吾即将回国，多次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11月16日下午，张养吾将他保管的机要电报移交给毛岸英。交接完毕，两人竟相对无语。

张养吾难过地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沉思良久，正欲抬头，忽然看到毛岸英脚上绑着一只没有后跟的靴子。他想起来了：那是一个雪天，毛岸英脱下潮湿的靴子，放在火炉壁上，这只靴子的后跟被烤焦了。

张养吾默默地脱下自己的一双靴子，轻放在毛岸英脚前。

“不。”

“听话！”

“给我写信。”

“写，还有任荣。”

话到此处，又是沉默。

在过去的40天中，张养吾打心眼里喜欢上了毛岸英，这不仅因为他是国家主席的长子，还因为他身上具有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点：满腔的报国热情，忘我的工作精神，刻苦的学习态度，突出的平民风格……

当然，在张养吾和一些人的眼中，毛岸英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青年。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因为经常工作或看书到深夜，所以有时早晨不能按时起床，因而不能按时就餐，按时防空。

这也是张养吾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问题。

张养吾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防空，司令部叫天亮前进洞。大家吃了饭，岸英才起床漱口。我们等他吃早饭，饭还没吃完，敌机来了，我、任荣、毛岸英，还有任荣的一个警卫员，来不及进防空洞了，就藏在房内，四个人一人蹲一个角落，正襟危坐，静候轰炸。几十公尺外炸弹直炸，那个声音真是震耳欲聋，山崩地裂啊！”任荣讲：“毛岸英同志啊，下次可要注意啊！”

有感于此，张养吾突然打破沉默，语重心长地提醒道：“岸英，我要走了，但有件事一直不大放心。”“你说吧。”毛岸英抬起头，坦城地望着张养吾的眼睛。

“今后，夜里不要搞得太晚，早上要按时起床。”

“嗯。”

“早饭也要按时去吃，不要饿肚子。”

“好的。”

“特别是要注意按规定防空，千万不要麻痹大意！”

“行，我记住了。”

……

当晚，张养吾搭乘高岗的专车回国。行前，毛岸英将一个包袱交给张养吾：“这些多余的东西，你带给我妈妈。”

“我一定带到。”张养吾使劲点头答应。

苍茫暮色中，两人握手道别。

“岸英，多多保重！”

“保重。别忘了写信！”

可是，当张养吾辗转到达西安，给毛岸英、任荣寄去充满思念的信时，毛岸英已不在人世了。

1950年11月24日下午，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异常现象，立即引起了志愿军首长的关注，他们当即研究了几条规定：明晨4时前开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在天亮前全部进洞。

一切都在照计划进行：解方参谋长领着司令部的同志，躲在南山的一座大矿洞里；杜平主任和政治部的几位同志钻进山沟里的一座地下涵洞；距“彭总作战室”两三百公尺，有一座仅可容纳五六人的小矿洞，这是总部首长的藏身之所。

金灿灿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大矿洞里的人们已能相互看清对方的眉眼。此时，毛岸英饥肠辘辘地倚壁而坐，正在闷着头吸烟。他又睡过了时间，没赶上吃早饭。

昨夜对中国志愿军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夜。各部队必须在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做好于黄昏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准备。彭德怀调兵遣将，督促全军，忙了大半夜。毛岸英也跟着忙到后半夜才睡。

如果是在 10 天前，毛岸英就不会迟起，更不会饿肚子。

他的两位邻居——张养吾和任荣，可以督促他按时起床，等候他一起吃饭。可张养吾已经回国，任荣带工作组到东线九兵团去了。

毛岸英有了一位新邻居，他就是张养吾走后，刚从西北军区调来的高瑞欣。他比毛岸英小两三岁，睡得比毛岸英还香，要不是毛岸英叫他起床，他可能还在梦乡里欢度蜜月哩！

上午 9 点多钟，太阳升起老高了。往日这个时候，正是敌机活动猖獗之时。可今日反常，连飞机影子都没出现。

“妈的，飞机怎么还不来？”有人等得不耐烦了。

“今天是星期六，大概飞行员放假了！”有人瞎估猜。

在烦躁与轻松、失望与希望混杂的气氛中，人们的思想开始麻痹了。有人去拉屎撒尿，有人在洞口散步聊天。毛岸英与高瑞欣回宿舍去喝水充饥，随后又立即返回洞内防空。

到了 10 点多钟，还未见敌机，毛岸英和高瑞欣忍不住了，就悄悄地离开矿洞，向“彭总作战室”走去……

大约 11 点钟左右，凄厉的防空号突然吹响。正在值班的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和毛岸英等人冲出“彭总作战室”，就近隐蔽。少顷，从南方飞来 4 架轰炸机，飓风似的掠过总部上空，向北飞去，人们估计：“大概又是去轰炸鸭绿江大桥了！”于是，毛岸英等人又回到作战室。

可是，狡猾的敌机悄然折转回头，其中的一架敌机俯冲着飞临“彭总作战室”上空，翅膀一抖，丢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

就在这些汽油弹降落和爆炸的瞬间，2 个人影从屋内冲了出来：最先是徐亩元，他安然无恙；成普慢了一步，被爆炸的气浪摔到山下，半边脸被烧脱了皮。

“彭总作战室”是一座木板房子。随着一串串振耳欲聋的爆炸声，木屋在烈火中燃烧、倒塌，眨眼间变成一片火海。

无法抢救！敌机还在头顶上横行，轰炸任何可疑之处。实际上也来不及抢救：凝固汽油弹爆炸后，顿时生成高达华氏 2000 度的燃烧着的液体流，岩石被烧的通红，发出“僻僻啪啪”的爆裂声，何况是人的血肉之躯呢！

……人们从四面八方方向木屋跑去。木屋消失了，剩下一堆灰烬。余温很高，站在好远，依然灼人。

警卫排的士兵们在灰烬中扒出 2 具遗体。司令部行政处副处长张仲山回忆说：“尸体烧缩起来了，只剩下骨头架子，拉开，还像个人形。”有一具遗体的手骨上套着一只外国手表的残骸，人们据此断定：这就是毛岸英。

从毛岸英报名参加志愿军到不幸牺牲，仅仅 50 天时间。这 50 天，是他 28 年命运交响曲中永不消逝的最强音，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言——“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暂时隐瞒着毛泽东，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

这一天，毛泽东照例阅读来自朝鲜前线的报告。看着看着，他的眉头锁了起来。

“把岸英调回来！他怎么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终于，毛泽东发火了。

“主席，岸英同志牺牲了，这是另一个翻译写的……”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眼看已经无法隐瞒真相，便用低沉的语调讲述了毛岸英的牺牲经过。毛泽东听后沉痛地呆了……

毛岸英的不幸牺牲，极大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父亲。日后，当彭德怀内疚地对他谈起没有照料好毛岸英时，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支抽着烟，抬头凝望窗外那已经萧条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沉地回忆了毛岸英短暂的一生。稍停，毛泽东昂起头，轻轻走了几步，激昂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彭德怀默默地听着，眼里饱含着泪花，他深知毛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把心血倾注在国家大事上。然而，儿媳刘思齐每周必到的看望，对他是一场感情上的无尽灾难。刘思齐每次来，都要问毛泽东是否收到毛岸英的信？毛岸英为何几个月不来信？……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地宽慰她。

毛泽东做红媒

毛泽东不忍心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刘思齐，他知道这一噩耗对新婚不久的儿媳的分量。

在延安的时候，毛岸英就认识了刘思齐。到了西柏坡以后，他们便确定了关系，并希望结婚。于是，他俩向毛泽东提出了要结婚的事。

毛泽东问刘思齐：“你正在学习，学校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下怕影响你的学习吗？”

刘思齐说：“结婚后好好安排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岸英是1922年生的，思齐你是哪一年生的呀？”

“我是1931生的。”

“他比你大八九岁，你知道吗？”

“知道。”

“你还不到18周岁，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

毛岸英说：“好，听爸爸的。”

两个人离开毛泽东的住处之后，不大一会儿，毛岸英又回到了毛泽东的房间。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今天已26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同意你们结婚呀？”

“是的，就差几个月了，很快就到了。”

听了这些，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管你说什么，思齐还不满18周岁，不能同意你们结婚。”

毛岸英可没有料到毛泽东会这么跟他发脾气。转身就走了，刚走到院子里，一下子就晕倒了。值班的哨兵以为毛岸英得了急病，连忙把他扶到了一间房子里。

过了几天，毛岸英向父亲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很好，那样，你就是一个模范的守法者，而不是一个违法者了。”

毛岸英进城后，刘思齐也来到了北平。

1949年9月，毛岸英和刘思齐商量好了，决定过一些日子结婚，随后，又征求了刘思齐妈妈的意见。

婚期初步定下来以后，毛岸英就跟父亲说了。

毛泽东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毛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喜上加喜。还是应该艰苦朴素。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都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毛岸英和刘思齐经过商量，写了一个参加吃饭的名单，名单上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陈瑾昆等。

毛泽东看了看名单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王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简办，我完全赞同，就是要改一下旧习嘛。”

婚礼完毕，毛岸英和刘思齐在晚饭前就赶到了中南海。毛岸英穿的是在外宾场合当翻译的工作服。刘思齐穿的上衣是灯心绒布的，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晚上七八点钟时，客人们来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西屋里，都带来了小小的纪念品。蔡畅和康克清送的是一对枕头套。大家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都夸毛岸英和刘思齐是一对好夫妻。说毛泽东找了一个好儿媳妇，并向毛泽东祝贺。毛泽东举杯走到刘思齐的妈妈张文秋的面前，对她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饭后，毛泽东说：“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这喜酒和便饭，是岸英自己张罗的。他办的还可以，我要表扬他。如果办得不好，我也会批评他的。”

……

岁月在无情地流逝。毛泽东作为父亲，不能也不愿一直扮演世上最难堪

的角色，两年后，他终于向刘思齐诉说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刘思齐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定都签订了，为何毛岸英没寄片言只字？难道他……她不敢想下去了，反而安慰起年迈的公公。这天，她离开中南海时心慌意乱。

刘思齐又一次去中南海。毛泽东把周恩来请来一起跟她谈心。周恩来委婉地告诉刘思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牺牲了生命的战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也是其中之一！”这句话周恩来说得很轻，传到刘思齐耳内却如五雷轰顶。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泽东肩上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心潮翻滚。周恩来让刘思齐躺在沙发上，他的手碰着毛泽东的手，心里一惊，急忙对刘思齐耳语：“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刘思齐一愣，重又哭着去安慰毛泽东……

毛岸英的牺牲对刘思齐刺激太大了。她寝食难安，神经衰弱。而过去一再怂恿毛岸英“代表父亲去朝鲜”的江青，此时却放出谣言，给刘思齐落井下石。刘思齐刚20出头，经受不了这致命的打击，给毛泽东写信了，毛泽东复信说：“谣言不足信，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不胜其理。你的心要清闲些，把身子养好要紧。”

为了学点技术，刘思齐经组织上批准赴苏留学。毛泽东也同意她换换环境。写信给刘思齐，要她“争口气，学成为国效力”。刘思齐在苏学习期间，常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化名“德胜”复信，给她以循循善诱。

刘思齐回国后，毛泽东还经常给她写信。请看1959年写的一封信：

思齐：

不知你的情况如何，身体是否有起色，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被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

父亲 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出巡外地。他仍掂着刘思齐。

娃：

你身体是否好些了？妹妹（注：指邵华）考了学校没有？我比在家时好些。你愁闷时可看点古典文学，读诗句，可起消愁解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除了关心刘思齐的身体和学习外，毛泽东一直惦记她个人的事情。他说：“我毛泽东历来反对封建那一套！思齐还很年轻嘛，我要帮助她嫁人，不能总呆在我们毛家！”1960年春天，毛泽东明显地为她的事情着急，那时刘思齐已经29岁了。毛泽东很为难：“公公劝儿媳改嫁可怎么说得出口呢！对此事他很机敏又很“策略”。有一次，他趁几个儿女都在家的时候，笑容满面他说：“你们都老大不少了，应该考虑找对象的事情罗……”

刘思齐的妹妹邵华调皮地说：“爸爸，我不是有对象了吗？再找，岸青可……”

毛岸青只顾笑，不说话。

毛泽东板着面孔，假装训斥邵华：“你起的啥子哄？没有你的事！……”他一语双关，是针对刘思齐来的，几个孩子围着他撒娇地乱嚷嚷。

“爸爸，如今找对象可难了！”

“您给我们当参谋吧！”

“到哪里去找合适的呀？”

“我们找不到啊！……”

毛泽东招架不住了，捂住耳朵大声说：“孩子们！不要吵吵了！我有个好办法！”

“啥办法？”大家静下来，都好奇地等着毛泽东出什么高招儿哩！不料，他挥挥手，幽默地说：“你们都闭上眼睛（大家都真的闭上眼睛），上街随便抓一个好了！”

孩子们睁开眼睛，都觉得“上当”了，刘思齐也跟着凑热闹，笑着问毛泽东：“那要是抓一个大黑麻子可怎么办呢？”

毛泽东风趣地回答：“那就认命呗！”他哈哈大笑，几个孩子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毛泽东边笑边看了一下刘思齐，意思是说：“思齐啊，我的大女儿！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

毛泽东为刘思齐的事可谓用心良苦，可是到哪里去找像毛岸英那样可敬可爱的人呢？大笑之后，刘思齐独自回屋暗暗擦眼泪了……

毛泽东为刘思齐的事“赤膊上阵”了。刘思齐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他在日理万机中亲自为刘思齐介绍了两个对象，但都没有成功。后来经空军学院刘震院长介绍，刘思齐和这个学院的教员杨茂之相爱结婚。结婚那天，毛泽东特地派人给他们送来300块钱，还有一首他亲笔写的诗词。

第六章

周恩来醉酒莫斯科，毛泽东嘻嘻一笑：这不算丢丑。日内瓦史密斯失态，一代伟人征服世界

周恩来作检讨

这是 1954 年春末，中南海西花厅庭院里的海棠花开了！它们一朵朵，一枝枝，挺直了腰身，张开了笑脸，吐露芳香，随着轻风摇曳着，向这庭院的主人问好。周恩来最喜爱海棠花，他说，因为海棠花是“群花”。邓颖超在工作之余暇也爱观赏。可是今年花开，周恩来哪里去了？

此时，周恩来正在日内瓦会议上。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有关的原则、方针。身为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我国被邀参加日内瓦会议初步议定之时起，就着手布置各项准备工作。

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这样回忆：

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外交秘书陈浩常常晚上打电话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厅时走大门进去，谈完工作后，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陈浩把我从西房后的夹道送出来，边走边解释：大家都睡了，大门已关了，只好走小夹道。当年的陈浩是个年轻的女同志，作事十分认真负责，细心周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切安排就绪后，周恩来和少数同志先行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协商有关事项。

在出发之前，李克农和师哲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她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杰出地完成任任务。然后，又极其关心他讲了周恩来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她说周恩来时常流鼻血，嘱咐李克农和师哲对周恩来多加关心和照顾。

周恩来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商议和协调中苏双方对日内瓦国际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价。

4 月 1 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后，中苏双方一连进行了多次会谈协商。因为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所以，赫鲁晓夫把这些会谈称作圆桌会议。除赫鲁晓夫外，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然后，赫鲁晓夫简单他讲了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指出这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齐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是有利的收效了。对会议不可以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结果，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国

主义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同时指出，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部会按照我们的预定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依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因此，我们事先只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欲达到的目标。自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讲了话，他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周恩来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周恩来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恩来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

中国方面的这些要求，苏方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

双方在会谈中还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必须注意的各项事宜。

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恩来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然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中国客人。席间，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周恩来虽酒量过人，却患有肝脏病，过量地饮酒引起了不适，加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同他拥抱旋转，终于出现了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无所措手足。莫洛托夫急忙陪同张闻天，把周恩来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不久以后将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周恩来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随行人员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地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8点左右，周恩来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问翻译师哲：“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儿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儿的话。讲的都是非常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 1928 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他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

“没有！确实没有！”

周恩来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说：“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 8 点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周恩来。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跋涉长途。周恩来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启程回国了。

周恩来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 月 21 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他对师哲等不曾离开莫斯科的我方人员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他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了丢丑！

起初师哲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谈完后，他们才明白，师哲不以为然他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这回，周恩来在莫斯科又耽搁了两天，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正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化名丁同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 8 号公寓来座谈，回答中方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座谈中，中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外交人员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中方代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取、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中国代表团飞抵日内瓦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方有

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 200 多个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 300 人之多）。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完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主侍。

4 月 24 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格罗提渥到机场迎送。当代表团正在机场中心大楼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中国代表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中国代表团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事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 20 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咪咪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中国代表团谈笑风生，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机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 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到驻地不久，周恩来又带领必要的人员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这回机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不少外国代表团都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周恩来握手、拥抱。

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尽速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恩来并肩而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出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周恩来的机敏与智慧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担任大会主席，每个会议主席可以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当莫洛托夫担任主席时，宣布葛罗米柯和师哲为他的助手。美国代表一看中国人走上主席台，大惊失色。

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其中有14个国家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侵朝的联合国军再加上大韩民国，都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他们对中、苏、朝的态度是可想而知了。会议的成员国中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中国代表在活动中自然受到了限制，遇到些困难。但周恩来这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也没有受到旧时代外交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陈规俗套的约束，他以极其机敏的智慧、超凡的目光、宽阔的胸怀、灵活的手法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顺利地打开了局面，不仅使中方代表没有陷于孤立地位，而且还帮助有些国家代表团打开了局面，争取到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关于日内瓦会议，当时“政治顾问”（实际任务仍离不开俄文翻译），离休前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师哲，后来回忆了以下几件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举行朝鲜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一方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但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要求根据李承晚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全朝鲜选举。他们忘了美国是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参加侵朝战争的。联合国已失去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

美国人依仗美国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开会时，他们不顾礼节，将两只脚跷在桌子上。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讲了句话，不符合美国的口径。因为卞荣泰想多少解决一些问题。美国代表马上跳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呵斥他，如同在家里呵斥自己的孩子一般。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真是有强权无公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资本主义各国基本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加拿大是跟得最紧的一员。

会场休息室摆了咖啡、糕点、水果。休会时，大家一边吃一边谈，可以随意走动。这也是各国代表交谈、接触的好机会。休息时加拿大的代表悄悄对中国代表说，他听了周恩来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中方代表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高兴，以为他会讲几句公道话。谁知休息过后，加拿大代表发言，又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污蔑，骂我国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散会后遇见中方代表，他又主动同我国代表握手，请我国代表原谅，说他必须听美国的话，照美国的意图讲话不能越雷池一步。

中方代表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灵魂的傀儡，也由此发现他们内部并

非铁板一块。于是也随之调整了对他们的政策，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在中、朝、苏三国联合斗争下，美国的恐吓政策失败了。5月30日，杜勒斯就离开日内瓦回国，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出席会议。史密斯多少有点民主作风，但他不敢破坏杜勒斯不准同周恩来握手的规定。休息时，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师哲为他们翻译。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史密斯挤进来，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用手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这样表示既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又向周恩来打了招呼。

周恩来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中国代表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章法和规定，所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切场面。

6月15日的大会，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是第51天了。这天是由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相提出新的6点建议：主要内容是：

(1) 建议各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2) 在不超过一年的期限中，缩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军队力量，双方军队不得超过十万人。

(3)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创造逐步解除战争状态的条件，将双方军队转入和平时状态等问题，并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缔结相应的协定。

(4) 认为不论南北朝鲜，同其他国家订有牵涉到军事义务的条约，是同和平统一朝鲜的利益不相容的。

(5) 为了创造使南北朝鲜接近的条件，成立一个全朝鲜委员会来拟订建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措施，并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措施。

(6) 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从而为尽速解决把朝鲜和平统一为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的任务创造有利的条件。

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讲话中，周恩来揭露了美国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这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 15 国及南朝鲜紧急磋商。复会后，首先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建议。泰国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再次发言，深感遗憾他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末，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抓住时机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但是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不好发作，急忙派人送了一张条子给斯巴克。

这时，艾登主席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

美国人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史密斯仓惶站起来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周恩来以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场鸦雀无声，静得让人心跳。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周恩来的入情入理、机敏智慧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好战的立场揭露无遗。

这场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后来，史密斯私下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

周恩来的才略与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

出席讨论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三个国家——越南、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 9 个国家。

这个谈判也是相当艰巨的，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关键是前两项，先实行停火，然后划区（南北划界），两年后进行全国选举。

这时，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当时法国由主战派的拉尼埃主政，派主战派成员皮杜尔外长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加之美国千方百计阻挠，日内瓦会议开始后，法国迟迟不愿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之后沦入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了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侵入这三个国家。1945年9月2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的抗法民主力量相继建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

但是，法国拒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寮国、高棉的抗战政府，而把它们视为叛军，当作交战的对方。在中国、苏联的一再努力下，范文同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5月4日到达日内瓦出席会议。后经越南代表团提议，在中、苏、越三国努力下，寮国、高棉的代表也到日内瓦进行会外活动。

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讨论印支问题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歼敌16000多人。

5月8日，法国代表团带着黑纱，打着黑色领带，哭丧着脸，一扫过去趾高气扬的劲头走进会场，低头就座，一言不发。

越南代表团中有人见此情景，不由笑了一声。皮杜尔听到笑声，气急败坏他说：“这么严肃沉重的场合，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真没有什么可讲的。”

范文同的法文很好，不等翻译就立即用法文回答：“噢，难道你们是跟幽灵打仗？！”

一句话使得法国人无言以对，更显其狼狈之态。

由于美国的阻挠，加之拉尼埃政府对停战缺乏诚意，会议进展缓慢。这引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上台。17日，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新内阁，自兼外长，亲自率团到日内瓦谈判，并向法国公民许诺7月20日若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就辞职。所以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对谈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虽然法国在越南吃了败仗，但孟戴斯·弗朗斯仍不能放下大国的架子。

尽管美国仍然极力阻挠会议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恩来运用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方略，同英国代表团团长文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弗朗斯等人直接交往、会谈。这对促进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随着会议的进展，本来就存在着的美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大，美国日益孤立。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6月23日专程到伯尔尼拜访孟戴斯·弗朗斯，并与他交换意见。会谈中，双方不仅坦率地交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意见，而且促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这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起了积极的、决定意义的作用。

会前中国代表对印度支那的情况并不太了解，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来往，同老挝、柬埔寨没有什么来往。老挝的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第一次在会场上—见面就骂中国是帝国主义。他们只知道中国支援越

南民主共和国，因而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替中国侵略他们。中国支援越南是支援他抵抗法国的侵略。实际上中国不仅只支持越南，而且也支持其他印支国家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老挝、柬埔寨代表的上述行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且令人恼火。可是周恩来以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怀，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派师哲和王炳南去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说，他们受了法国人的蒙蔽，必须扭转这种局面。

师哲和王炳南请他们到中心花园里观赏花木，喝咖啡，聊天。他们见中国代表彬彬有礼，不是帝国主义的面孔，才知自己上当了。进而周恩来请他们吃饭，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们的态度一下子改变过来了，斗争矛头不再指向中国，而是指向法国帝国主义者。

中国代表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实际情况，及时地修正了政策，同苏越代表协商后，5月27日，周恩来提出折衷方案：“关于双方军队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印度支那三个国家：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会议因此决定越法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6月24日，日内瓦会议休会。周恩来利用休会机会，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向两国领导人通报了日内瓦会谈情况。7月3日，周恩来在我国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达成“7月5日协议”：在越南争取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随后，周恩来回到北京向中央详细汇报。7月12日，周恩来经莫斯科回到日内瓦。

经过多方协调、商议，在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于7月20日下午达成协议。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恩来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开导、说服越南代表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方已给我方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他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20日晚，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签订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签字的那天晚上，周恩来到苏联代表团住处访问，拟会见莫洛托夫，了解情况。但很奇怪，莫洛托夫傍晚9时就外出赴会，直到夜间11时许，还未回来。周恩来在他们的会客室等候了好久，仍不见人回来。

苏方代表团的人向周恩来解释说，印度支那三国的代表们早已聚会在会堂里，但却拒不签字，故意找麻烦，拖延时间。其用意是有意给法国方面的代表们脸上抹黑。原因是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向法国国民议会许愿，说他一定将在7月20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因此，印度支那三国代表们，非要把签字仪式拖到当天夜间12点以后，即7月21日凌晨不可。这样就可以表示关于印支问题的签字，不是在7月20日完成的，而是7月21日完成的。

莫洛托夫在签字仪式完成后回到住地时，已经是7月21日凌晨三四点钟了，周恩来倦意正浓，昏昏欲睡，忽见莫洛托夫回来了，精神顿时振奋起来。随后，他俩又谈了一席话，莫洛托夫说，在签字仪式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只是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有意拖延了一段时间。莫洛托夫还说，印度支那三国这一招，可把法国人吓坏了，急得他们团团转，坐立不安，结果是虚惊一场。周恩来这才放了心。东方既白，中国代表团才回到万花岭别墅。

日内瓦休会周恩来回国期间，中国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继续留在日内瓦，由李克农任代团长。英、美、法、苏等国代表团都留有人员在日内瓦。代表

团之间相互也有接触。一天，美国代表团要求同中方会谈一次。要会谈，时间不会太短，起码得准备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应该讲些什么呢？师哲、宦乡、陈家康等人讨论，由宦乡执笔写了一个稿子。因为周恩来走后，李克农虽任代理团长，但无权解决谈判中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因此，我方起草讲话稿时，拟定了一个原则，即既要保证能讲半小时，又不涉及实质问题，不要把自己拴死。会谈时，李克农看着稿子向美国代表宣读一番，只是海阔天空，泛泛地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第二天的报纸对此作了报道，说中国代表团的话讲得很好，很有内容，有价值，有水平。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互相合作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常去苏联代表团驻地，同莫洛托夫协商问题。这个地方是苏联国家购置的一座别墅，管理精心，保密条件很好。莫洛托夫也多次为周恩来及其随员安排过便宴，热情招待，以示亲近、友好。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尊称莫洛托夫为“莫老”。

因为中国代表团是首次出席如此重大的国际会议，工作人员差不多没有什么外交活动常识，尤其没有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对一切都是抱着体验、考察、学习、研究的态度。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朝鲜、印支的问题，虽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涉及的毕竟是第三国的问题，事态非常微妙，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严肃对待。因此，中国必须同自己的朋友经常校正口径，协调对策、合作关系、方式、步骤等等。苏联则既要演带头人的角色，又要起中间人的媒介作用。

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恩来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介绍他们相识。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是莫洛托夫事先征得了周恩来的同意而特意作的安排。宴会后，周、莫、艾交谈了较长时间，相互揣摩，交换意见，以后，周恩来同艾登还进行了几次谈话，艾登也回访了周恩来。

莫洛托夫还为中国代表团组织过两次电影招待晚会，除放映苏联影片外，还放映过一次中国片子《梁祝哀史》。这是我国拍制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很成功。

放映前，周恩来曾风趣地介绍说：“请看看中国的罗蜜欧与朱丽叶。”一句话，招来了满堂观众。

观看这部影片时，莫洛托夫极力对周恩来称赞欧阳菲的俄文翻译水平，说她的俄语是道地的、标准的、超级的莫斯科俄语，其清雅、优美、悦耳动听之声大大超过了一般俄罗斯的乡下人。

当他看到影片上的梁山伯、祝英台相遇相处的情节时，惊讶他们互相不苟言笑，不相谐谑。当看到梁山伯访问祝英台的家而发现后者是一位妙龄女郎时，竟不握手、不拥抱、不接吻时，莫洛托夫极其诧异而惊愕他说：“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国的礼仪和道德准则：看见了自己心爱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不亲吻，不拥抱！”

当天他们招待的客人只有中国一家，范围较大，也很隆重。

在日内瓦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中苏双方自始至终密切联系，互通情报，协同步调，互相配合得很好。在斗争激烈、形势紧张的日子里，中苏两国首席代表周恩来与莫老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并约请有关第三方面（朝或越）协

商、调整步骤。会议期间，形势变化多端，难以揣摩，如果各行其是，其结果肯定是糟糕的。

正是由于中、苏、朝、越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社会主义阵营取得了比较完满的结果。尽管斗争的对手是十分老练而狡猾的，他们利用他们的一切优势、有利条件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施展一切阴谋诡计，但最终几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特别是美国。朝鲜问题虽然以无结果而告终，但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军，根本不想通过政治会议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侵略者的面目却因此暴露无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取得了更加满意的结果，最后迫使法国停战，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纬 17 度线为临时分界线。自然，法国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从越南从容撤走。

为了便于发言，中、苏、朝三国代表团的座拉排成倒品字形，三家紧紧靠在一起。这也是费了一番苦工夫，经过细心研究和斗争得来的结果。当时，大家异口同声他说：团结就是力量。

莫洛托夫是会议主席之一，平时常和艾登会商，很少到其他国家代表团驻地，但却到周恩来住处和中国代表团总部来过两次。

莫洛托夫说：“长时间都是中国同志到苏联代表团住处来，虽属工作关系，但从外表上看，好像只是有来而无往。你们中国有句古语：‘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这从礼节上说，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必须前来登门拜访。”接着他又说：“你们的住处是租赁来的别墅，很难说事先没有人在这里安装窃听器、录音器，甚至拍照设施。这使我们不便畅所欲言。这也是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但却经常劳驾你们去我们住处的原因。”

但是，当天周恩来、莫老二人还是在收音机大音量的噪声中交头接耳，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对若干敏感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周恩来在张闻天大使陪同下去见莫洛托夫。双方交谈时间不长，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一下日内瓦两个会议的经验。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由于美国、南朝鲜两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步步设置障碍，阻挠会议的进展，最后无结果而告终。这是国际斗争中常有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虽然经过种种努力达成了一项协议，但并未彻底解决，留下的麻烦还不少。而且为了实现已达成的协议，仍然需要越南同志继续努力，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和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在勘定划界、人员转移、搬迁和安排、组织 17 度线以南人员的撤退及人事、后勤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还应特别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动向。法国，由于国内的困难形势，加上其他的麻烦，可能在印度支那不能长期呆下去了。但是它走了，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可能要钻进来。因为它野心勃勃，实际上已开始插手了。要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周恩来谈到他很快就离开日内瓦，东归途中打算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然后再访问莫斯科。莫洛托夫认为，东归时，莫斯科是必经之地，在莫斯科逗留几天，参观、休息都是很适宜的，并表示欢迎。但莫洛托夫却未理解周恩来的意思是要作一次正式访问。所以，周恩来访问东德、波兰后，7 月 28 日到达莫斯科时，苏方没有举行隆重的正式接待仪式，只把周恩来作为过路客人来迎接、招待。

周恩来在莫斯科只待了两天，就动身回国。途中首次访问了蒙古人民共

和国。

7月31日，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上。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机场举行了热烈、壮观的欢迎仪式，车队在至宾馆的途中，受到蒙古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乌兰巴托真是万人空巷。周恩来拜访了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回访了泽登巴尔，参观了工厂、博物馆、展览馆等，听取了各项介绍，出席了他们举行的招待会。8月1日下午回到北京。朱德、刘少奇等到机场迎接。

日内瓦会议期间，最忙的是周恩来。一星期中难得有一两天睡足8小时，他既要参加会议，又要在会外同有关方面进行协商、谈判，还要听取我代表团各方面的汇报，研究情况，作出决策，并向中央汇报，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出自于周恩来。师哲住的房间在周恩来的房间的对面，常常是他刚刚醒来，师哲利用他上卫生间、洗漱的机会跟着他，向他汇报、请示、商量。汇报中国代表起草的文件和苏联的一致不一致，口径对不对；商量具体的地名、名称如何称呼，译成俄文后准不准。师哲同他商定后指导翻译。他抓工作具体、认真，一杆子插到底。他常讲：“外交无小事。”

周恩来气宇轩昂，不卑不亢，平易近人；遇事从容不迫，对问题深思熟虑，思考得深入细致周全；对各方面照顾周到，工作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中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从此，全世界对周恩来的外交活动的的能力、魄力与灵活性、策略性及调解技巧无不称赞、钦佩和敬重。周恩来堪称一代伟人。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印度尼西亚瓜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团长、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

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4月3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4月5日晚上12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趁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3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4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特派员在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他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

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情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表团成员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过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据成元功回忆：

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

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工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来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

却派出了一个由 70 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 1954 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于组成的“铁血团”，还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

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 4 月 11 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分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做制服已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入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 4 月 12 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净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 月 13 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定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 月 14 日晨 7 时 15 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 1000 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 12 时（当地时间为 10 时 30 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 3 点 30 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

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来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拘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嘻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

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中、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

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俩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周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11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决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来。成元功赶快拿了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2点45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的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3个钟头，于下午5点30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

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团成员不由又想起了那 11 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 3 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

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 10 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 4 月 18 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 3 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 28 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 3 月 10 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币 20 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 20 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 40 万盾。

中国代表团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

来之后，先送陈毅，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

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3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分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1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

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见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

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坏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

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月18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下到5000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标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则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3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4月20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结论。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4月23日），又是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入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

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4月23日，周恩来在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4月22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疑惧。

罗慕洛在1956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

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

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8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恩来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8点一直争到下午6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点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5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点了。周恩来略略休息了一会，11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点，周恩来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碓达之助，10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7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8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再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舱附近，当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3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走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5月18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口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台刊披露空难真相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发生40年以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专访了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当年曾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终于打破了台湾的“沉默”，首度揭开了尘封40年的情报黑幕，抖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末。

《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张平宜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该文说：

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

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

两人全盘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炸弹，时间一到，炸弹爆炸，自然什么都炸得灰飞烟灭，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证据。

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问题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找个陌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混不过机场严密的检查，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查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20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此外，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

在港币60万的重赏下，小郑“勇敢”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

计划大致确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来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因为本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不断在积极谋划暗杀周恩来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正好周斌成此时提出了炸毁周恩来的专机计划……

尽管毛人凤觉得计划可行，可是周、陈两人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601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毛反对，最后，两人决定央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请他出马为60万港币代为通融。

谷正文详听计划始末后立刻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

领导人，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我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太漂亮了，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谷正文并建议周、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例行检查。

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而简易的洗盥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

就这样，小郑带着TNT成功闯关。

4月11日早晨，小郑负责3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来加油、作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

失踪的小郑，是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随时等待飞往台湾。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挺精灵的，当初与台湾特务在研拟退路时，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计划，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最方便不过了。至于如何搭上便机，个子瘦小的小郑，决定缩在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竟能藏人。

当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小郑也顺利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以后，倒是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差点叫小郑爆了光……。

那就是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在小郑躲进去后不久就起飞了，（这一说法与本书307页有异，但原文如此——编者注。）不久，从启德机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由于飞机降落后，突然跳下一个人，当场引起一阵骚动。

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鸡飞狗跳，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功亏一篑。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

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一下。

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主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

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运逃过一劫。

载着中共代表团3人、中共5名记者、1名波兰记者、1名奥地利记者、1名越南工作人员，一共11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只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似地获救。

根据谷正文表示，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向他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不料，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签下好大一笔奖金——美金9000元，搞赏有功人员。

而台湾对于万隆会议前夕发生这种敏感新闻，也一反常态，3家晚报均以不太显著的版面处理空难的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代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5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中共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一竿子人等，连小郑，点头之交的朋友，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抓去严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郑的下落，及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

打了又打，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不顾中共的抗议，香港政府只得放人，只起诉了本名周驹的小郑一人。问题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郑，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将小郑逮捕归案？

另一方面，在台湾保安单位严加保护下，小郑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员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名换姓，如今已在台湾落地生根。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尽管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谷正文却说，最大的收获是，的确让香港政府吓了一跳。因为事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曾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特务一马，则台湾特务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假钞。

蒙上神秘面纱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已经事过境迁40年，周、陈两人也先后在前年、去年离开人世。谷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来，坦承是台湾当局主谋放的炸弹，当局可能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不过今年85岁的谷正文还是忍不住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

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刊最近介绍，谷正文生于1910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生”）。他后来还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是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大特务。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后，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到了台湾，30多岁的谷正文继续干他的本行，担任情报机关的“侦防组”组长长达17年之久。后来，他又升任“情报局督察室”主任。

不久前，中华航空公司一架运输机在台湾境内坠毁，引起各方面议论，退休多年的谷正文也发表一番高论，大胆假设华航这架飞机可能是“人为蓄意破坏”。此言一出，引得华航高层人员的不满和追究。

第七章

紫光阁，朱德、周恩来为活佛洗尘。勤政殿，毛泽东诚会达赖、班禅。

达赖、班禅联袂来京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那天，在所有国家领导人和各族各界各方面的代表中，有两位最年轻的代表特别引人注目。他们穿着桔黄色的缎子袍，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一片掌声。

这两位受关注的年轻人，就是达赖和班禅，作为西藏选区的代表，他们联袂来京，共商国是。

在历史上，五世达赖、十三世达赖、六世班禅、九世班禅曾先后来过北京，但达赖与班禅联袂来京，还是头一次。

这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当年中央人民政府所要做的几件大事之一。自从得到西藏工委关于达赖、班禅决定赴京开会的报告后，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

中央为接待达赖、班禅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接待组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民委主任李维汉负责，有政务院各部门的有关同志参加。有关事宜直接请示政务院或周总理。接待小组下面又分别成立几个组，对接待工作中的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安全保卫、外出参观、重大活动等事宜分别研究如何按照达赖、班禅的生活习惯具体安排。这次达赖、班禅到北京开会是否圆满成功，除在中央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和宗教政策指导下在政治方面努力外，接待工作的好与坏同样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对负责达赖、班禅接待工作的人们语重心长地说：接待工作十分重要，“事无巨细，均须请示”。

民委为此成立两个招待所，选配精明强干，有经验，懂政策的同志任接待人员。首先拿出接待方案，然后再在最短的时间里抓紧落实。因为达赖、班禅已经上路，留给他们的只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他们去做。

甄选达赖住处，急煞接待人员

接待工作遇到头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为达赖、班禅寻找住处。住所未定，其它工作都不好展开。达赖、班禅住所的基本要求是舒适宽敞、环境优雅、交通便利，便于安全警卫。别看偌大的北京城皇亲国戚、王爷驸马留下不少王府深宅，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也留下不少高级住宅，可要为达赖、班禅找一处合适的住处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班禅的住处经研究后很快确定，还安排他1951年来北京时中央安排的寓所，即西郊动物园内西侧的北京市高级干部疗养所——畅观楼。这个畅观楼也是九世班禅到北京时的住处，因此把班禅安排在这里住比较合适。

去畅观楼从动物园的西门入园，沿着通道向北走大约300米的样子，便可看见中央一座红墙绿顶，欧式建筑风格的小楼。小楼在动物园的西边，因

远离动物棚舍，又为绿荫所掩，所以一般游人都不知这里还别有一番景致，很少到这里来。

畅观楼坐北朝南，南、东、西三面有条不太宽的小河环绕，碧绿的河水缓缓流淌，不时有一两条小鱼冒出水面，打个泡，激起一圈涟漪又调头游去。小河是个天然屏障，把畅观楼拥在怀中。楼前有一座长约十米的白色石桥。桥头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铜雕像。东边的一座似狮如豹，龇牙咧嘴，威风凛凛。西边的一座像是玉麒麟，扬首向天，仪态万方。两座铜像制作精美，艺术夸张，像两尊守护神不分日夜忠实地守在桥头。只是因为年代太久，虽然铜像神态依旧，可是铜像上的镀金已基本剥落掉光，斑驳陆离，铜锈斑斑失去往日的风采了。

畅观楼的造形十分美观，顶部为绿色铁皮做瓦，阁楼高低起伏，还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球状装饰物。外墙为红砖主体，白灰勾缝，门窗等处均涂成白色，远看十分醒目。门窗的顶部都砌成欧洲风格的弧形，显得别具一格。跨过石桥走进畅观楼，一进门便是一个很宽敞的走廊，也可以叫做厅。走廊尽头有4根白色的镶嵌着欧式浮雕的柱子。走廊两侧各有一个面积百余米的大厅，厅内全部是欧式装饰，华丽的吊灯，高大的壁炉，浮雕装饰的墙角窗框，置身其中给人一种似在异国他乡的感觉。在两个大厅的两端，各有一间面积十余平米的圆形小屋，从小屋里向外看，可以更好地观赏四周的景色。两个大厅的北面各有几间可做客房卧室的房间和卫生间。二楼的布局也大致如此。三楼是几个较大的亭子间。但按佛教的规矩，佛爷头顶上不能再有人，所以三楼不能住人。四层则是一个宽阔的平台，从这里向东望去，绿荫碧水，动物园的美景尽收眼底。向西看去，是大片大片的稻田，金秋时节，稻子金黄，沉甸甸的稻穗低下了头。这里僻静安全，便于警卫，经过研究，班禅的寓所就确定在畅观楼这个原国民党要员的官邸，剩下的就是维修和准备物品的工作了。

班禅的寓所确定了，但达赖的住处还没解决，仍令负责接待的同志牵肠挂肚，放心不下。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达赖、班禅要同等待遇，这就是说标准要尽量一致，住房也是如此。但畅观楼在北京是独此一家，别无二致。其它房子好虽好，但却是高不成，低不就，这可真难为了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他们以畅观楼的面积和规格为基准，把中央和北京市机关的房子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可就是找不到理想合适的住处。正在接待组的人们为此犯愁的时候，有人提了一个线索，说北京市委在御河桥（现在的台基厂）有一座楼，日伪时期那里是日本领事馆，现已改为北京市的交际处，可以去看一看。

几个同志听了很感兴趣，立即乘车前去察看。汽车开进御河桥，驶入路东的一座大门，进门就看见北面有一座日本建筑风格、坐北朝南灰砖经瓦的二层小楼。楼前，早有接到通知的北京市交际处的同志等着他们。双方相互作介绍后便将他们引进楼。

进了楼门向左一拐便是一间面积约50平方米左右的厅，再向里是一间有100平方米左右大小的大会客室。挨着大会客室还有一间60平方米左右的会客室和几间办公用房，门厅右边是一个楼梯，梯壁雕饰华美。楼梯右手有一走廊，通向一楼东侧的几间房。

交际处的同志介绍说，这座楼是1901年建造的，已有50多年的历史，原先是日本领事馆，解放后北京市政府接管，作为交际处使用。这座楼的外形和内部装饰都是日本风格的，楼内房间多，有的比较宽敞，便于布置和摆

设，尤其大会客室，可以召开中小型会议和举办小型舞会，作为接待贵宾的场所也方便舒适。说着，引他们上了二楼。楼上除有两间大会客室外，还有十几间房子可作住房。另外二楼还有南、西两个方向的平台，楼的东侧还有一个旋转的木楼梯可通一楼。三楼没有住房，只是一个小阳台，可以凭栏远眺。看完楼内的布局后，总的印象是适于达赖居住与会客，是个较为方便的住处。内部装饰也较华丽，墙壁都是用三合板做的墙围，大体和班禅所住的畅观楼规格相近。楼的西侧还有一个小花园。花园占地不大，秀丽别致，曲径通幽。两座小巧的凉亭，一西、一南座落在满坡青草绿树的小土丘上。园内的假山、花墙点缀得恰到好处。小径弯弯曲曲似漫长无边，倒显得给花园平添了不少空间感觉，整个花园给人一种雅静清幽的印象。

御河桥和畅观楼都是二层独立小楼，面积相差无几，建筑风格不同。一个是日式建筑风格，一个是欧式建筑风格。从房间数量、居住面积、建筑质量、装饰等方面衡量都为同等规格。从地理位置说，御河桥地处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距王府井、前门大栅栏、北京饭店和天安门较近，参加一些活动比较方便。寓所旁还有一座小花园，可供闲暇散步，可谓闹中取静，畅观楼虽离市中心稍远一些，但住地风景优美，雅静宜人，随时可以在动物园漫步游览，相比较，御河桥和畅观楼规格基本等同，符合中央在达赖、班禅接待中尽量做得恰当，不偏不倚的要求。最后决定，达赖在京期间的寓所定在御河桥。北京市委服从中央决定，交际处搬往他处。

为佛爷动用“库缎”

寓所问题解决后，接下来的就是住所布置问题。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请来一位民委的藏族处长做顾问，可是这位处长的出身寒苦，在西藏仅接触过寺庙里的一些小喇嘛，没见过活佛，更不知佛爷在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是怎样生活的，只听别人说过佛客的居室和经房都要布置成黄色。别的再也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了。

就为把达赖、班禅的客厅、居室和经房布置成黄色，就把两个招待所人忙个不停。首先布置经房、卧室所需的黄绸和卧具所需的绸布就要用上等的绸缎，而当时北京街面上的布店均买不到黄绸缎，最后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才在“瑞蚨祥”等北京有名的“三大祥”布店找到一些，不论多少全部买下，可仅这些也不够布置所需，要想全部布置好，还需不少绸缎。万般无奈之下招待所只好给政务院打报告，请求调拨部分黄绸缎以供急需。

政务院接到报告通过有关部门了解到，在故宫博物院还存有部分“库缎”。“库缎”就是明清皇帝御用的存在仓库中备用的黄绸缎，十分名贵。物以稀为贵，故宫中存有的这些库缎就成了宝贝，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谁也不能动用的。但这次为接待达赖、班禅，政务院特批让两个招待所到故宫领取一些“库缎”。拿到政务院的特批件，招待所的同志十分高兴，一是解决了目前的困难，二是可以到故宫仓库开开眼。

他们立即驱车来到故宫，故宫管理处的工作人员验明证件，审核政务院的特批件后，便把他们带到高大坚固的仓库，打开厚重的大门走进殿内。殿堂里光线暗淡，眼睛一时适应不了，看不清里面都有什么东西，稍待一会儿，逐渐适应了屋里的光线，这才看清屋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坚固厚重的樟木箱子，箱子上贴着宽宽的封条，上面大大小小地盖了不知多少朝代的鲜红大印。

箱子上积满了灰尘，看得出已有多年没有动过了。故宫的工作人员找了半天把他们领到一个硕大的箱子前，弯腰小心地把封条启开，吃力地把沉重的箱盖打开，一股防虫防潮的芳香药物的香气扑鼻而来。

“看见没有，这就是库缎”。故宫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 from 箱子里抱出两匹绸缎交给招待所的人，然后又仔细地把箱子盖上封好。招待所的人抱着“库缎”，只觉沉甸甸、凉嗖嗖、滑溜溜的，虽然光线不好，但也可看出绸缎的质地极好，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着滑润的光泽。

来到外面的阳光下，便可以看出“库缎”是稀世之宝。看上去明光闪亮，光艳夺目。摸上去细腻滑润，柔软轻薄，为世间少有的珍品。如若不是为了接待达赖、班禅，恐怕这辈子也无缘见到“库缎”。动用皇帝的东西来接待达赖、班禅，可见中央为使达赖、班禅在北京过得愉快舒适，不惜一切满足他们的要求。

招待所的人员赶回寓所后，即用“库缎”为达赖、班禅缝制卧具，做好的卧具光彩照人，华贵精美，看上去就赏心悦目，舒适宜人。

朱德、周恩来设宴请活佛

当时公路尚未通车，1954年7月11日，达赖一行从拉萨启程，走康藏路；7月1日，班禅一行从日喀则启程，走青藏线。9月1日两位活佛在西安相会，一同前往北京。

9月4日下午，到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亲自到车站迎接。

9月5日下午，朱德副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欢迎达赖、班禅的到来。

这是达赖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此之前他早已听说过这个久负盛名的地方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来此一看，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一个极好极美的去处。北面的远处，景山郁郁葱葱，五座亭台高低错落，排列有序。再近些，北海的白塔挺拔多姿，秀立琼岛。中南海景色怡人，绿荫中时隐时现点点琉璃瓦的屋顶和段段红墙，一湖绿水，碧波荡漾，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人间仙境。

汽车停在紫光阁门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迎在门外。达赖、班禅一见这么多领导都在等着他们，过去哪里见过这种阵势。虽然以前每到一地也是前呼后拥，万众膜拜的阵势，但那些都是手下的随从和僧众们，而今天都是大名鼎鼎、功勋显赫、身居要职、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来迎接他们，他俩从心里感到承受不起，慌忙下车，快步走上前去和各位领导一一握手。

朱德副主席挂着一脸笑容说：“两位大师，欢迎你们哟！”

达赖躬身致敬：“有劳副主席大驾，谢谢，谢谢。”

班禅紧紧握住朱德副主席宽厚有力的大手说：“谢谢副主席。”

周总理把达赖、班禅一行请进宴会厅。

参加宴请达赖、班禅的中央政府方面的阵容十分强大，有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邓小平、军委副主席贺龙、军委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副主任甘泗琪、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民委主任李维汉、副主任乌兰夫、刘格平、张执一……基本上是在北京站欢迎达赖、班禅时的阵容。

人们在宴会桌旁坐定后，首先由周恩来总理致欢迎词，他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位先生、同志们，”周总理声音洪亮，吐字清晰，两

眼有神，面带微笑，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视线和注意力吸引过来。达赖，班禅礼貌地将两手放在膝盖上正襟危坐地听着，翻译在一旁小声地给他俩翻译。

周总理说：“今天，在这个宴会上，请允许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以最愉快的心情，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茆京，表示热烈欢迎……”周总理的讲话博得达赖、班禅和在座人们的热烈掌声。

周总理在讲话中赞扬了自“17条协议”签定以来西藏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强调了达赖、班禅晋京赴会的重大意义。最后，周总理提议为达赖、班禅的身体健康干杯！

周总理率先端起酒杯，杯内晶莹透亮的白酒微微晃动，在灯光的映照下折射出点点金光。周总理举杯向达赖、班禅致意，又举杯向在座的人们示意，然后礼貌地、象征性地抿了一口，在座的人们也为达赖、班禅身体健康干杯！

人们落座后，该由达赖致答词了。达赖站起身，戴上白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拿讲稿，略清了清嗓子讲起来。

在座的绝大多数领导都是头一次听到藏语，听着达赖略带稚音的声音，不免有些新奇感。好在有翻译在一旁帮忙，人们可以一段一段地听清达赖在说些什么。

达赖说：“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西藏方面，我和班禅以及其他代表和工作人员，虽然来自边远的边疆，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首长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央代表张经武将军的直接帮助下，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兄弟般的欢迎和招待，沿途都很顺利。昨天到达北京的时候，更承蒙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各位首长、各人民团体和各机关代表的热烈欢迎，今天又承蒙朱副主席设宴欢迎，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人们对达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朱副主席、周总理满面笑容，愉快地拍着巴掌。

达赖接着说：“……尤其能晋见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一生最光荣、最感兴奋的一件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张经武将军及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的指导帮助下，使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改变了面貌，逐步走上了幸福康乐的大道。”

达赖最后提议：为朱副主席、周总理和各位首长身体健康干杯！

为中华民族团结干杯！

为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祖国和平、统一、富强而干杯！

为毛主席万寿无疆而干杯！

人们热烈鼓掌，纷纷举杯响应达赖的提议。人们没想到达赖还这么能讲，而且表达的还挺有条理。

达赖致答词后坐下时，挨着他的朱副主席和周总理与他热情握手，夸他讲得好。

该班禅致答词了。

他说：“……我和达赖代表西藏人民到伟大祖国首都北京即将出席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承蒙中央各位首长对我们热烈欢迎并设宴招待，这使我们深受感动的，现在我以最兴奋愉快的心情，向各位首长致以恳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人们同样对班禅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班禅兴奋得脸颊红红的，也鼓了几下掌，待掌声平息后，他接着说：“……我相信西藏将来也会像祖国各地一样，不断地繁荣和发展起来。”

最后班禅收起讲稿，从桌上端起酒杯说：我提议：

为各民族大团结干杯！

为朱副主席、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健康干杯！

共产党万岁！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所有的人热烈鼓掌，纷纷举杯，宴会始终充满团结友好的气氛。

这次宴会，是达赖、班禅到北京后，也是到内地后第一次吃得最丰盛的一次。餐桌上一道道色鲜味美的冷拼、热菜令他们目不暇接，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更叫不出菜名来。每上一道菜时，周总理就让服务员报一下菜名，并介绍这道菜是用什么原料，大体是怎么做的。让翻译说给达赖、班禅听，有时周总理还亲自介绍菜的特点和是什么地方的风味。达赖、班禅觉得和周总理在一起，不知怎地没有紧张感和距离感。和周总理在一起是那么自然亲热。他俩完全为周总理的蛙力所折服。

朱副主席不善言辞，和他在一起更像和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在一起。朱副主席不时热情地给达赖、班禅让菜，用浓重的四川话说：“吃嘛，多吃点！”这么多菜达赖、班禅吃也吃不及，面前的餐碟堆得像一座小山，一个菜吃上一两口肚子就饱了。望着满桌丰盛的菜肴，真有眼大肚子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这次宴会给达赖、班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朱副主席和周总理风采魅力和各位首长的热情好客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丰盛好吃的菜肴同样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会见两活佛

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会见两位活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十四世达赖，也是第一次同时会见两位大活佛。

下午3时许，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停在勤政殿前。车门开处，达赖、班禅精神焕发地走了下来，达赖侧身等班禅来到后，两人并肩走进接见厅休息室。

接见的的时间到了，达赖、班禅紧张而兴奋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不约而同地用手整理一会身上只有在盛大节日场合才穿的“礼袍”，随着工作人员走进大厅。

刚入大门，达赖迎面看见一个身材魁伟，满面笑容的人向他伸过手来。尽管是首次见面，达赖还是一眼就认出这是毛泽东主席。他慌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又宽又长的雪白哈达，低头躬身、双手平举地向毛泽东敬献。

毛泽东微微躬身，用双手接过哈达，略一举表示谢意后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转过身来，毛泽东向达赖伸出手，含情地说：“欢迎你哟，达赖喇嘛，我们等你好久喽，很早就想请你到北京来。”

“毛主席好！谢谢毛主席的邀请。”达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激动地说。

“好，好，达赖喇嘛身体也好吧？”

“好，好，谢谢毛主席的关心。”

当接受班禅敬献的哈达后，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班禅额尔德尼，你好哇！你是第二次来北京，我们见过面，已经是老朋友了嘛”

“毛主席好，您的身体还是这么健康！”被毛泽东称为老朋友的班禅高兴他说。

“托新中国的福，身体还不错。”毛泽东说完后，一一介绍刘少奇、宋庆龄、张澜等领导人和达赖、班禅见面。接着，毛泽东提议：“我们今天见面是个大喜事，咱们照张像做纪念吧！”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一张历史性的镜头留下了。前排自左至右依次站着的是：李维汉、黄炎培、张澜、宋庆龄、班禅、毛泽东、达赖、刘少奇、李济深、郭沫若和陈叔通。后排站着的是其他领导人和达赖、班禅的主要随从。

第二天，首都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条消息和照片，在全国影响很大。

这一喜讯很快从北京传到拉萨，传到万里高原，广大藏族僧俗群众，更是激动万分，他们奔走相告。按照藏族宗教界人士的说法，毛泽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三位至尊至圣的菩萨在人世间的化身，能够相会在一起，自然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象征国运昌盛，众生幸福。人们高兴地谈论：这真是吉祥圆满。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犹如初升的太阳，上弦的月亮，从今以后会更加发达兴旺，繁荣昌盛。

怀仁堂引人注目的代表

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达赖和班禅都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议开始之前，在休息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亲切会见他们，并询问了几天来他们在京的情况。毛泽东关切地问：生活习惯吗？这几天参观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活动？看了什么节目？达赖和班禅——作了回答，对活动安排表示非常满意，并再次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表示感谢。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连声说：“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又指着周恩来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安排不周的地方，都可以找他。他是我们大家庭的管家，是个大管家，好管家。我们大家的事情都归他管。你们有事尽管找他，他会帮助你们。”

下午3时，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发表重要演说。他强调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满怀信心他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达赖和班禅都不懂汉语，大会为少数民族代表准备了同声传译。达赖和班禅都戴着耳机。但是，他们为会场上团结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心情十分激动。与其说是听懂了同声传译，不如说是用心灵感受到、体会到毛泽东讲话的深刻含义和丰富内容，以及永久的历史价值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会议于9月28日闭幕。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那一年他才19岁。在不久以后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班禅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他16岁。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勉励他们：“你们是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你们俩位都很年轻，前途远大，要好好团结，努力学习，大胆工作，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西藏的事情办好，把全国的事情办好。这样，西藏人民就会感到高兴，全国各族人民也会感到高兴。”

颐年堂藏历新年宴会

人大、政协会议结束后，达赖、班禅分别到全国各地参观视察，于次年2月下旬回到北京，恰适藏历木羊年。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除夕，当天下午和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寓所丰泽园分别会见达赖和班禅。达赖、班禅向毛泽东汇报他们在祖国内地参观视察的收获和心得体会。他们说：解放才几年，祖国各地发展很快，我们感到很高兴。

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家里，许多地方还很落后，西藏也是落后的，这是应该承认的。我们承认落后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样，我们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在我们内部各民族间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共同建设，那么我们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

2月24日，是藏历正月初一。达赖和班禅向周恩来汇报，说他们想在北京隆重庆祝新年佳节，邀请毛泽东主席、其他中央领导和各有关方面人士，共度新年。周恩来高兴他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中央也正等你们回来后，商量过节的事。党中央、国务院要向你们二位，并通过你们向广大藏族同胞祝贺新年。”

24日下午，达赖和班禅早早地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在休息室门口迎候客人，两位佛爷身穿黄缎袍子，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比原来估计的时间要早一些到达，在休息室同达赖、班禅交谈。达赖、班禅等了很久，不见朱德总司令来。他们很希望朱总司令也和他们一起共度新年。达赖一面同毛泽东等人谈话，眼角不时朝门外扫视。周恩来立即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抱歉他说：“朱副主席前两天到外地视察去了，不能同你们一起过节，他要我向你们表示歉意，并向你们祝贺新年。”

那天，在一排长沙发上，毛泽东坐中央，达赖、班禅、刘少奇、周恩来分坐两边，茶几上摆满了各种油炸果子和吉祥物，完全照藏族传统习惯布置。

毛泽东对达赖、班禅说：“等一下我讲几句话，向你们表示节日祝贺，可以吗？”达赖、班禅几乎同时说：“欢迎！欢迎！毛主席有什么教导，我们非常愿意聆听。”

毛泽东说：“不是教导，是祝贺。”说着从衣兜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稿纸，递给刘少奇，说：“您看看，行不行？”

刘少奇很快扫了一遍，立即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传给达赖，口中说：“很好，很好！”

达赖接过周恩来递过来的稿纸，转交毛泽东，学着周恩来的口气，用汉语说：“很好！很好！”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毛泽东等人也爽朗地笑了起来。

达赖、班禅跟国家领袖在一起，愉快地交谈，亲密无间。在场的人们都非常高兴，极为感动。记者们不断把镜头对准5位领袖，拍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

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达赖、班禅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欢度藏历木羊年的照片，被翻印过无数次，至今还是藏族人民最喜爱的珍品。

宴会开始时，达赖喇嘛首先讲话，对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

周恩来总理以及所有贵宾光临招待会，和在京的藏族同胞一起，欢度藏历新年，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向毛泽东主席和所有贵宾致以节日祝贺，祝愿“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接着，达赖请毛泽东主席致词。那天是达赖、班禅作主人，事先并没有安排毛泽东讲话。可能是头一天同两位佛爷谈得融洽愉快，心里高兴，便欣然应允。

毛泽东首先向达赖、班禅和全体藏族同胞致节日祝贺。然后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毛泽东的即席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许多藏族人士涌向他，向他敬酒，敬献哈达。学生代表们争着去同他握手，怀着崇敬的心情，致以节日的祝贺。

1955年3月上旬，达赖、班禅准备返回西藏。藏历年过后，他们分别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

3月8日，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达赖住所为达赖送行，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陪同会见的有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将军、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和汪锋。

3月9日，毛泽东到畅观楼去看望班禅，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陪同会见的有汪锋和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等人。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回去的准备情况，并指示汪锋、刘春、计晋美（班禅堪布会议厅负责人）要认真负责，尽心尽职，让活佛平安返回故乡。

班禅非常感动，一再表示感谢。

这时，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又轻轻吐出去，沉思片刻，说：“昨天我给达赖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班禅说：“毛主席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一定牢记在心，认真贯彻。”

毛泽东又说：“前年我对（西藏）国庆观礼团的朋友们就讲了这个意思，现在旧话重提，无非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进一步搞好团结，争取进步和发展。”

毛泽东问计晋美：“您赞成不赞成团结。”

计晋美说：“赞成。”

毛泽东又问：“您愿不愿意进步。”

计晋美说：“愿意。”

毛泽东放下只抽了一半的烟蒂，平伸双手，在大家面前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合拢，用慈祥的目光看看班禅，说：“那好，我们就想到一块去了。团结了，进步了，也就会发展。”“现在我们还很穷，很落后，西藏要发展，内地要发展，全中国都要发展。”

达赖突然求见毛泽东

1955年3月1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为将要去内地参观尔后直接返回西藏的达赖、班禅饯行。席间，周恩来和达赖、班禅都发表了

充满情谊、感人至深的讲话。

按照计划，3月12日，达赖一行，由刘格平、张经武陪同，经武汉，过三峡，从四川入藏；班禅一行，由刘春陪同，经西安，由青海返藏。

达赖与班禅，在性格上有所不同。班禅外向，性情直爽。达赖则比较内向，他的情感不容易表露出来，性情温和。但是，藏历年过后，尤其是即将离开北京的日子里，达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心情很激动。这次内地之行，是他被认选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以来，第一次离开西藏，看见了雪域之外的大世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结识了不少朋友，对他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他认为给他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还是与毛泽东的相会。

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了。中央说人代会年年开，今后要常来常往。话虽这么说，但北京到拉萨，山高水长，万千阻隔，来一趟也不容易，这次一来一去，就将近一年。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在这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达赖喇嘛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再次见到毛主席。

本来，11日这一天，他自己的日程就安排得很紧很紧，已经取消了几个重要的活动。但是，他依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同刘格平、张经武、平措旺阶（中共西藏工委委员，陪同人员之一）商量工作之后，请刘格平留下，说：“刘主任，今天我想去见毛主席，请您给中央汇报，安排一下。”

刘格平一愣，前几天不是刚见过吗？他问：“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没有。”

“那……”刘格平犹豫了一下，又问：“那干什么去？”

“去辞行。”达赖喇嘛沉吟片刻，说，“我想再见一次毛主席。”

刘格平为难了。从达赖到北京，中央就指定他陪同，一起转了大半个中国，彼此都很熟悉了。刘格平知道，他提出要见毛泽东，肯定是很认真的，经过慎重考虑。怎么能轻易回绝？但是，达赖、班禅在京的一切活动，都是经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亲自安排。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临时决定，再说，毛泽东更忙，他的活动，中央有严格规定，早有安排，有时连毛泽东自己也做不了主。不请示不行，请示了也不行。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责问他：你刘格平身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难道连这一点党的纪律也不懂？！

看着面前的达赖喇嘛，态度是那么诚恳，那么执着，丝毫没有要放弃要求的样子。

怎么办？刘格平是个有个性，敢作敢为的人，他考虑了一下，对达赖说：“请您等一等，我马上去请示。”他决定直接向中央办公厅请示，一切后果只好由他自己承担。

中午饭吃过了，中央办公厅没有回话，晚饭吃过了，没有什么动静。按原定计划，达赖参加了一个又一个活动，一切很顺利。到了晚上11点多，依然没有消息。

达赖有些失望，有点遗憾，还有几分懊悔，今天是不是唐突了一些，让刘格平为难，给中央添麻烦。

刘格平更感到不安，他想得更多，觉得这件事没有处理好。

达赖说：“刘主任，毛主席太忙，今天我看不会接见了。您不用等，明天一早就走，您早点回去休息吧！”他又自我安慰他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以后请您代我向主席致意。”

刘格平懂得中央的规矩，按常规，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毛泽东肯定是不见了。他不无遗憾地劝达赖早点休息，就告辞了。

送走刘格平，达赖焚香祝祷，静坐诵经——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活佛应遵守的规矩。这时，达赖的卧室里，除他外，只剩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寝官”，是位僧人，专门负责他的起居，藏话叫“森本”；另一个是西藏工委派去的保卫科长，也是个藏族人。按规定，达赖上床休息，关了灯，才能离开。

突然门卫风风火火跑进来，说：“毛主席来了！”

“什么？”达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门卫也顾不了平时的礼节，着急他说：“毛主席来了。”

达赖赶紧出门迎接。毛泽东已经走进客厅，身边只有两个工作人员，没有任何领导人陪同，毛泽东拉着达赖的手，一起坐在沙发上。翻译也不在场，只好临时叫保卫科长翻译。这时楼上楼下灯火通明，整个大院沸腾了。达赖着急他说：“快请翻译！请刘主任。”

等人们安静下来，毛泽东对达赖说：“实在对不起，让副委员长久等了。我刚才接到报告。说您要来看我。我说，那怎么行？您明天就走，理当我来为您送行。这么晚了，没有影响您诵经？没有影响您休息吧？”

达赖十分不安，激动他说：“毛主席，真对不起，太打扰您了。”这时达赖才注意到，毛泽东穿着长长的睡衣。难道主席已经休息了？

看着达赖惊异的目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已经休息了，正躺在床上看报，接到报告，马上就来了。”

达赖喇嘛的眼睛湿润了。

他想得很远，很多。

当年第五世达赖进京，顺治皇帝本想出城迎接，但文武百官反对，说贵为天子的天国皇帝，怎么能出城去迎接客人，哪怕是极尊贵的客人。后来以“围猎”为名，出京城，与五世达赖“偶遇”于郊外，既表达了欢迎之情，又不失天子之尊，一时传为佳话。

本世纪初，十三世达赖进北京，他要见皇上、皇太后，西太后非要他磕长头，行大礼，否则不见。

六世班禅来内地，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会见，也算“皇恩浩荡”了！而九世班禅颠沛流离几十年，正赶上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历尽艰辛，备受屈辱。

而今天，毛主席这样关心我，爱护我，怎能不让人感到万分激动？拿毛主席与顺治、乾隆、西太后相比，那是大海与滴水，高山与尘埃，太阳与萤火之别。

念经信佛的人，常容易产生幻觉。达赖喇嘛觉得，坐在他面前的，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丰碑，一轮太阳。

据刘格平后来回忆，11日上午达赖提出要见毛泽东的要求后，他立即向中央办公厅请示，不知在什么环节耽误了。到深夜才向主席报告。刘格平当时担心：一方面达赖见不着毛泽东，怕他不高兴；另一方面，干扰了中央的布置，怕挨批评，两头不好交代。并做好了挨批评、写检讨的思想准备。

刘格平不无欣慰他说：“主席来了，我也解脱了。”他还说，“据我们所知，毛主席自1949年进北京，穿着睡衣出中南海参加活动，只有两次，一次是1972年参加他的战友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再一次就是为达赖喇嘛送

行。”

这件事使达赖喇嘛深受感动。离京参观视察期间，刘格平经常给达赖讲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达赖对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回拉萨后，他又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了组诗《毛泽东颂》。他热情地歌颂：

啊！毛主席！您的光辉和业绩像
创世主大梵天
只有从无数善行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位领袖
像阳光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样宝贵
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
远及天涯
……

第八章

共和国莺歌燕舞，中南海再传佳音。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评衔工作并非易事

50年代中期，年轻的共和国进入了莺歌燕舞蓬勃发展的时期。抗美援朝的胜利，更使全国军民激动不已……在这种背景下，中南海的决策层将酝酿已久的一个伟大的计划付诸实施。

1955年早春，中央军委正式下发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件——《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

同年2月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毛泽东主席正式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这一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等问题。同时，中央军委还决定，要在1955年内全部结束对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

从中南海吹出的春风，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太好了！我们也可以授衔了。”“这也是军队正规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尽管授衔的事在军队和国家的高层酝酿已久，尽管在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的时候，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但评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战争年代，我们的军队没有搞过军衔。只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搞过一次临时授衔。那是为了协调与苏军的行动，中央临时决定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与苏军的协调工作结束后，又收回了军衔。

在世间的一切事物中，人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给数以千计的英雄评军衔又谈何容易？要评衔的人中间，多数是红军时期的老同志，也有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人。还有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平衡问题……

按照权限，授元帅和大将衔的由军委决定，授少将至上将衔的名单分别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校官的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

这段时间，身兼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两职的罗荣桓和几位副主任和副部长忙得不可开交。

对于授中将与上将的200多人的名单，都是罗荣桓亲自主持讨论的，对少将一级，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和肖华、王宗槐负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议解决。

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日后回忆说：“我记得那个时候除了处理其它正常工作外，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搞这个平衡工作。在排队平衡过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军委于9月初召开了总结会。罗荣桓主待，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至此，评衔工作基本就绪。

毛泽东不当大元帅

军队要授军衔，最高统帅怎么办？

这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那个年代向苏联学习，斯大林可是苏联的大无帅啊！

按照军官服役条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是应该授衔的。在人们的议论中，在初步方案中，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授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评为元帅。

据说，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摇摇手说，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此事在高层引起纷纷议论。

一次人大常委会开会，不少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无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那天的会议很有点要形成决议的样子。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他说，还是不作结论好。

一位留胡子的民主人士说：“我们人大作了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刘少奇笑笑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

……

争论来争论去，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吗，你们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我们这次先不作决定。”

此后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毛泽东说：“你们搞评衔，是件很大的工作，也是件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无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多不方便呀。依我看哪，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强烈的表率作用，军工厂为他准备的大无帅服，也就只能永远放在博物馆里了。

斯大林后悔同意受衔

原苏联作家弗·瓦·卡尔波夫曾恳切地请求原苏联作家丘耶夫为他安排一次同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会见。

1973年12月30日，丘耶夫说服了莫洛托夫，举行了会见。

卡尔波夫说：“我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斯大林大元帅》我想真实地写斯大林。而真实地写这个人物，就是说正面地写。”

“但是，请注意，”莫洛托夫说，“斯大林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仅有个人好感是不够的。当然，这是好的，否则就无法如实地写，但是，他有很多特殊性，要理解时代和环境。您如果把他作为一个军人来写，毕竟是无法表现这个人物的。他身上的主要点是政治家。他在我国的政治和历史中都起过这种作用。现在这渐渐不明显了。”

谈到了斯大林战后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一事。莫洛托夫说：“斯大林说过，他不适于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应当表现出个人的勇敢气

概。‘我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敢气概’，他没有领取这枚金星英雄奖章。只有画像上的斯大林才佩着这枚奖章，那是画上去的。他去世后，奖赏处主任发下了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奖章被别在衬垫上，下葬时由人托着。”

“斯大林只戴一枚金星奖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我有时佩戴列宁勋章，”莫洛托夫补充说。

“有一阵子某些人执意建议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城。非常坚决！我当时反对。是卡冈诺维奇建议的。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见解：‘不仅有列宁主义，还有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发火了。”

俄国的大元帅衔由彼得大帝设立，俄国历史上曾有苏沃洛夫等四人获此衔“斯大林于1945年6月26日获苏联大元帅衔。谈到大元帅衔时，莫洛托夫更有惊人的披露：

“斯大林直后悔，当时不该同意受大元帅衔。他一直后悔。是的。这是卡冈诺维奇、贝利亚过分卖劲儿……还有，司令们也坚持。

“他并不全知道。斯大林是反对的。他后悔：‘我要这些干嘛？’他干嘛要这种表面上的特殊，他本来就已经是举世皆知的名人嘛！军人是一回事，斯大林是政治家，国家领导人。苏沃洛夫并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嘛！他需要这个衔。而斯大林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领导人。他不需要这个衔。他很后悔。

“斯大林只有一个人，请注意，将军们人很多。事后，他真想骂起来：‘我怎么会同意的？’全党、全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不过是个大元帅。这是贬低，而不是抬高他！他比这要高得多！大元帅不过是个军事领域的专家。而他不论在军事、党务还是国际问题上，都是专家。两次想给他授这个衔。第一次被他驳回了，后来却同意了，老是后悔。”

一场将帅荣耀的考验

毛泽东不知道斯大林后悔受衔之事，但他当时的明确表态，却起到了表率作用。也正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也在部队搞过，你也应该评元帅！”

刘少奇挥了挥手，说：“不要评了，我现在不在军队工作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连连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邓小平笑笑说，当什么元帅哟，早不带兵了。

毛泽东又看看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等人很有几分幽默他说：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啊？

李先念操着很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没想过当大将，我也不要评大将。”

张鼎丞和邓子恢也直摆手，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罗荣桓是较早知道他自己要被评为元帅的。那天，他回到家里，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极诚恳的信，他说，我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对革命的贡献也很小，给我授元帅军衔当之无愧，我恳请不要给我元帅军衔……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是在参加了建军28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时才知道自己要被授大将军衔的。回家以后，他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家人都觉得奇怪，大过节的，他是怎么回事？

他当夜给毛泽东和军委的其他同志写了报告，他把自己和有关同志作了比较，然后郑重请求：

给我授大将军衔高了，希望降为上将……

正是在他们的表率作用下，使那些本来想争一争，评高一点的人不好再讲话了。

自然也还有个别同志自恃功高、资深，觉得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和奖赏，而组织给自己评的衔低了。有同志甚至公开说自己应该评什么军衔。

还有的人因为评衔闹起了情绪，流下了眼泪，要不，毛泽东怎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有那么一位老同志，他参加革命时间长，功劳也的确不小，但进城后犯了错误，受到处分。他认为评衔是论功行赏的事情，期望值较高。当他知道只能评为中将的时候，心中很是忿忿不平，给有关军委领导提意见……

罗荣桓亲自找他谈话，和他谈心并告诉他能评为中将是比较公正的，并且严肃指出他的问题。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他的思想通了……

周恩来检查授衔场所

授衔的前一天凌晨，女摄影师舒世俊正在台上测光，忽然听到有人叫她：

“小舒，小舒。”

她抬头一看，是周总理。赶忙走过去，说：“总理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上午。”

“准备的怎么样了？”

“快完了。”

周恩来总理没再说什么，径直朝着主席台上走去。

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说，总理是刚刚开完了授衔的准备会来这里检查会场的布景情况的。这是周总理的工作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首批女摄影师很快产生，说是一批，其实全国也就仅有5个人。刚刚从华北大学毕业的舒世俊作为5个中的一个，于1949年底开始接触电影，之后，便时常出入重要场合，拍摄中央领导人的开会、接见、视察等活动。

授衔的几天前，舒世俊和李华刚刚举行过极简朴的婚礼。那时人们的心思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婚假也没顾上休。这天，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徐肖冰通知舒世俊，和负责照明的同志一起到中南海去布置灯光、看角度、安装摄影器材，准备拍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元帅、将军授衔仪式。舒世俊早就听说要给元帅、将军们授衔了，但没想到这任务会落到自己头上，心情既激动又紧张。

那年代拍电影用的家什，远远不止一架轻便摄影机，而是苏联笨重的照明灯、沉重的电缆、自带发电机、外加一大堆一分钟就得换一次的胶片。收拾起来，整整两大卡车。

来到怀仁堂，他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拍摄的场地不仅仅是大礼堂，东大厅、西大厅、休息室，还有怀仁堂北面的草坪都要布灯布线。

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还没有忙完……

礼堂的灯全部打开着，主席台上的桌椅和话筒也已摆放停当，舒缓的穹

顶，明亮的灯光……

周恩来首先走到主席台的正中央，坐在了毛泽东开会时将要坐的地方，摇摇身子，站起来，看看前面的灯光，对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说：

“别太正了，晃眼，毛主席、朱德同志、宋副主席，还有林老、沈老、黄老、李济老年纪大了，怕光。你们年轻人不理解老年人眼睛怕光，体会不到老年人的痛苦！”

他又敲了敲话筒，对广播局机要处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大高了，挡嘴，另外，也别影响他们拍电影。”

周恩来走到主席台的后排，看看舒世俊，说：

“你们拍电影的，要拍全了，不要把这里丢了。”

舒世俊知道这里坐的是民主人士。

周恩来在主席和老师们将要经过的地方，都亲自走了一遍，然后对服务人员说：“台阶上的地毯一定要铺平。”

那时，怀仁堂设施还不很完善，中南海每次开会都要临时布灯布线。当周恩来走下主席台台阶，看到了地上的电缆时，回头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电缆会不会绊人？”

还没等他们回答，又听他说：“找块胶皮盖上。接头的地方一定不要电了人。”

周恩来检查了礼堂，又去检查休息室。走到门口，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扭过头，对身边的秘书吩咐：

“天不早了，给他们找点吃的，他们还没吃饭，要照顾好他们。”

这时，卫士成元功提醒说：“总理，8点还有个会……”

当周总理他们走出怀仁堂的时候，东方已经亮了。

怀仁堂笑声

1955年9月27日。下午4时一过，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开进了中南海，停在了怀仁堂前的广场上。

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都身着海蓝色的元帅服，个个精神抖擞地走下车来，就连一向严肃寡言的徐向前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已经整整28年了，这些老帅们戎马倥偬，征战南北，立下了屡屡奇功，才赢来了今天这个日子。然而，又有多少同样是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有名的无名的英烈，悲壮地、默默无闻地战死沙场。因此，细心的人们会看得出元帅们此时的心情是沉重的。

“我们的总司令来喽！”是陈毅老总的声音。只见朱老总健步走进休息室，着元帅服的朱总司令显得特别魁梧，神采奕奕。

“各位早来了！”

朱老总双手抱拳，向大家致意。见大家站了起来，他忙说：“免礼了，免礼了！”

陈毅站在朱德面前，上下端详着说：

“老总哎，穿起这行头好漂亮嘞！比南昌起义时还年轻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

陈毅转过身，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贺龙：

“贺老总当初在南昌打第一枪时，想没想到今天要当元帅噢？”

贺老总摸了摸他独特的一字形黑髭须，沉思了一下说：

“别说想当元帅，那时连打响的是第一枪也没想过呢！就是一心想把那

一枪打好！”

老师们被贺龙的直率逗得哈哈大笑。

说到“八一”南昌起义，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另一位起义的领导人——叶挺。

“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就会出两个元帅。”一向沉稳的叶剑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给原来其乐融融的气氛点缀了一束冷色调的康乃馨，把老师们又一次拉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

“叶挺要是还健在，能看到今天该多好啊！他要在，我一定要把元帅的桂冠奉送给叶军长！”陈毅的语调，充满了深情。

“如果新四军中有两个元帅的话，十大元帅中该是两个叶帅喽。”诗人的机智不仅表现在诗中，而且是无处不在。陈毅的一句话，又将老师们的思绪从十几年前拉了回来。

只有彭德怀似乎仍然处在一种沉思中。他面带微笑，眼睛却望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哟，大家都穿上了新衣服。祝贺大家！”

不知何时，周恩来已走进了休息室。望着面前几位身穿海蓝色将帅服的老战友，多少感慨系在他的眉宇间。

“我们的周副主席来了。”叶剑英拱乎相迎。

“我们的周副主席也应该受衔嘛！”贺老总真诚他说。

周恩来身穿灰色中山装，右手习惯性地弯在胸前。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随和、谦逊。他笑着摆了摆手，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是为诸位元帅服务的，当好你们后勤嘛。”

正说着，会场的铃声响了，那庄严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他们陆续走出会议室。

毛泽东授元帅军衔命令状

那天，好多人在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他们要看看毛泽东今天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他真的不要大元帅的军衔了吗？当然最高层已经作了决定，但更多的人并不知道内情。

毛泽东来了，他仍旧坐着那辆黑色的吉姆车，依然是穿了那身灰色的中山装，依然是那般慈祥地微笑着和大家招手。

时针指到下午5时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出现在主席台上，会场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情宣布典礼开始的话音刚落，气势磅礴的乐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便在中南海的上空奏响。

会场的气氛庄严而肃穆。

“同志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他的声音高

昂而富有激情。十分安静的会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主席站起身来，他要亲手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的有功人员——这些人跟随毛泽东浴血奋战，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这勋章，是对他们所做贡献的最高奖赏。

第一个走上台来的是朱德元帅。

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

毛泽东和朱德握手时，他俩的目光都是那样凝重。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会师第一次握手至今，他们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次握手来得不易呀！

紧接着走上台的是彭德怀元帅。他今天的表情更加严肃。这位很有个性的元帅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曾经多次出生入死，不是有过这样的诗句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双手接过毛泽东授给他的元帅军衔，还了一个十分正规的军礼。一切尽在不言中，他还需要和毛泽东说什么呢？

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如雷的掌声中依次走上台来，从最高统帅手中接过了金光闪闪的勋章。

整个授衔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他那紧抿的嘴唇说明了什么？

……

授衔、授勋典礼于下午六时半在《胜利进行曲》的军乐声中宣告完成。这时，记者镜头里的老师们，人人兴高采烈，脸上流溢着难以言表的激动与欢欣。

秋天的中南海，傍晚很是迷人。太阳的光芒从红彤彤的云朵的间隙散射出来。墨绿色的水面在霞光的照耀下，似有无数片锦鳞在畅游，岸边垂柳依依，宛若仙境。元帅、将军们金光闪烁的勋章和灿烂的笑脸与这些景物交相辉映，使这个夜晚更加迷人。

这一天的怀仁堂北草坪很特别，草坪上摆了一片木桌，木桌上又摆了丰富的冷餐和水酒。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都自拿碗碟，自己动手。穿着海蓝色礼服、佩带着金色勋章的元帅和将军们、政府高级官员也都如此。

周恩来总理的祝酒词热烈而激动人心：“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为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为元帅们、为将军们和所有荣获勋章的有功人员的健康而干杯！”

在一片欢呼声中，将帅们共同举起了酒杯，将无限的幸福一饮而尽。元帅和将军们几乎是排着队，张张绯红的面孔，他们端着酒杯，来到了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身边。“给少奇同志敬酒！”“总理和我们于一杯！”“小平同志，这是我们的心意！”

……

晚宴刚刚结束，舞曲就响了起来。在舒缓的舞曲的伴奏下，将帅们欢快地跳起舞来……

朱德元帅的舞姿仿佛在行军作战，挺胸抬头，节奏准确；刘少奇跳舞则很是标准，有板有眼……

周恩来的舞步是很婉熟的，他不仅跳得好，还忘不了在跳舞时做些“工作”——他看到新闻电影厂的舒世俊刚刚放下摄影机，就说：“来，小舒，你辛苦了，你最喜欢跳的快三步，华尔兹，来一曲。”

在优美的乐曲声中，舒世俊陶醉了。

紧接下来，是一曲“紫竹调”，陈毅元帅招招手，说：“小舒，来，咱们俩跳。”

……

刘伯承、林彪的镜头在青岛补拍

人们习惯上说是为十大元帅授衔，其实，在怀仁堂参加授衔的只有八位。当时，刘伯承和林彪因为生病，正在青岛疗养，他们没有回北京来参加授衔。

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资深摄影记者李华等人，受命前往青岛拍下了这两位着元帅服的镜头。

李华是在授衔仪式后第二天接到任务的。他同解放军画报社的柳成行一起出发，坐火车前往青岛。坐在东行的列车上，李华就开始盘算怎么拍好这两位元帅。他设想，把他们其中的一位安排在海边上以蓝天、白云、大海作背景；把另一位安排在花丛中……

谁知到了拍摄现场，和李华设想的有很大差距。

他们先到刘伯承的住处。刘伯承元帅戴一副墨镜，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正等着他们。“你们刚下车，吃饭了没有，”刘帅站起身。

这位以儒将风格著称于世的军事家，对这次授衔的意义看得较远，他认为，这是我军实现正规化的一个步骤，至于他本人，对授不授元帅军衔倒是无所谓。“你们说怎么拍，我就怎么配合，你们当导演，我听从你们指挥。”“我们怎么敢指挥刘帅？现在就是要听你们的指挥嘛！”“刘帅，请你从会客室走出来，先向东走，然后再向西，走两个来回。”“好吧。”刘帅非常痛快地答应着。

镜头顺利地拍完了。为了给剪辑的同志多备些素材，李华还特意多拍了几个特写。

到了林彪的别墅，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空荡荡的屋子只有一面窗子，而且，还用一层白纱和一层厚重的灯芯绒窗帘遮盖着。屋里弥漫着一股药味，叫人感到这里像医院。秘书告诉他们，林彪怕风怕光。

李华问秘书：“能不能请林总到室外去拍？”秘书说：“那要请示叶主任。”正说着，叶群出来了。李华告诉她，光线太暗，感光度不够。“把窗帘拉开一点嘛！”叶群说。秘书将双层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不行。缝隙再大一点，还是不行。叶群很明白这次拍摄的意义，看到这种情况，便说：“打开吧，拍照嘛！”林彪从卧室里走出来，显得很精神，并不像有什么病。“你们来了？”他说，声音倒是显得很没有力气。柳成行同志是军人，赶快立正，敬礼。李华却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林彪。“北京很热吧？”“比这里热多了。”“你是总政的，你们肖华主任好些了吗？”林彪问柳成行。

前段时间，肖华的身体也有不适，林彪是知道的。“听说好多了。”林

彪点点头，叶群上前把他的衣角抻平，说：“你在屋里走动走动。记者同志好拍嘛！”

林彪很满意，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他从东头走到西头。又站在窗边不动了。那样子像是在沉思。

李华觉得这很能表现这个人物，赶快抓拍下这一组镜头……从林彪的住处走出来，李华才发现背上的汗水已经把衬衣湿透了。

第九章

沙皇的寝宫里迎来了东方客人，毛泽东助赫鲁晓夫一臂之力。中南海游泳池“蜜月”气氛不再

毛泽东与“哼哈二将”

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但中南海“菊香书屋”院内却嗅不到菊花的馨香，只有数棵苍劲、挺拔的古柏，分布在院子里路径的边侧，像是忠于职守的卫士一样，笔直而严肃地站在岗位上，显得凝重而森严。

菊香书屋为何没有菊花？这得从他的主人说起。

毛泽东搬入这所院落，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遍布小草更是给了他幽静恬淡的心境。

有一次，周子健安排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忽然，一个浓重的湖南口音唤住了他们：“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就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置换新鲜的氧气。

初夏来临了，这座古旧的四合院门口摆放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盆花。

“过去这里是公园，由他们随意美化，我们不干涉，可现在我住这里，就不要摆了吧，摆一点松柏怎么样？”毛泽东跟工作人员商量。

看到工作人员流露出了不解之色，毛泽东接着说：“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来。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虚荣的风气就不好了。”

听完毛泽东的解释，工作人员连连点头，他们立即与花工商量，挪走了花盆，只是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对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木，走廊上摆的也是鲜翠欲滴的两盆绿草。

这是建国后迎来的第八个金秋。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由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组织上确定李越然跟随毛泽东访苏，担任翻译。

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为了让李越然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李越然在中南海直接接触毛泽东，尽量熟悉他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

在卫士李银桥的带领下，李越然走进菊香书屋，穿过过厅，沿着向北去的小径，约20余步，到了北房门前的台阶。因为北房有较高的台阶，显得比东、西、南房高些。在台阶两侧的窗下，各栽种着一棵约有胳膊粗的龙爪槐。其树干直但不高，树枝分枝很多，而且都弯曲向下垂落，加上茂密的叶子，犹如一把绿色的阳伞。踏上数个台阶，抬头向上看去，只见双开门的门框上方，也横挂着一块木匾，上面雕刻、彩涂着三个大字：“紫云轩”。

李越然心中暗道：好一个含蓄、典雅的“紫云轩”呀！在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唐朝著名诗人李贺诵端砚的一首诗来，那诗的开头两句是：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这又是谁家早为毛泽东准备好的书房、卧室？难道建造它的主人具有特

异功能，知道毛泽东是紫云轩最合格的主人？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时代骄子。他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当代伟人，就是在文学艺术上，毛泽东的造诣之深，也不愧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大豪。他的诗词气魄之宏伟，可谓是前无古人，真是“下笔位鬼神”的大师。唐朝大诗人、被称为诗仙的李白曾有名句：“白发三千丈……”以及“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他对客观景物的描述，其想象力不谓不丰富，气势也极磅礴；再看毛泽东的诗句：“安得倚天抽宝剑……”“可上九天揽月……”又是何等的气魄。对主观力量的渲染、描画，对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力量寄予了极大的依托。诗文给予我们的形象是一位巨人，他靠在广袤无垠的天际，伸手抽宝剑的动态，或者伸手摘月的姿势，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无限力量缩在一张画面上，想象力和概括力是何等博大，比起李白诗文中“三千尺”、“三千丈”的有限数字去描绘客观世界的景物，要高得多吧！你想想看，如果毛泽东所白描的巨人有长发的话，该是多长呢？其形象比喻的想象力一定会大大超过李白吧。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其造诣之深在中国书法史上也称得上是罕见的大师。他精研体势，变古通今，真个把肥瘦、长短、曲直、方圆、平侧、巧拙、和峻运用自如了。笔墨任意挥洒，自成一体，创造出自家的风格，真是挥毫龙蛇起伏的大家。到50年代后期，如1957年首次发表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的手书墨迹，已是达到了完美的成熟阶段。与王羲之的行书、张旭的狂草，可并称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三绝。

毛泽东的行草，既有张长史狂草的奔放道劲，更具有王右军行书的雄健、妍媚。

在中国历史上，把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集于一身者，唯见毛泽东一人。由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哲学上的伟大成就，以致人们对他的诗文、书法就不特别注意了。

这“紫云轩”也可能隐喻着帝王、圣贤的祥瑞之气，李白曾有诗句云：

“东海泛碧水，西关乘紫云！”

或者上述两种猜度的含义，兼而有之。

从紫云轩大门进去，也是一个过厅。这过厅东西两面的山墙上相对着各开一门。李银桥把李越然带到了东侧的门里之后，他就退走了。这里就是毛泽东的起居室。

毛泽东穿着毛巾布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翻卷的线装书正在阅读着。他见李越然走了进来，立即将手中的书放在床侧，移动了一下身体，变成了半坐姿势，面对着李越然斜靠在床头，微笑着用手示意他对坐在床旁的靠背椅上，然后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一支香烟。对李越然说：“伏老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

毛泽东说着，李银桥已进来替他点上了火，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二李呵，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可谓是‘哼哈’二将啦！”接着，他深吸了一口，然后让从肺里返回的烟雾自然地从小口角流出。李越然便有了话题：“主席，您抽烟太多了。”

“唉，伏老劝我戒烟，戒不掉怎么办？”毛泽东面露难色，“只好点起一支，看着冒烟，不往肚里吸。”毛泽东提到的“伏老”，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伏罗希洛夫，不久前访问了中国。

“伏老是个好人，”李银桥在旁边说，“还抱起我的孩子照了相呢，还有他的儿媳妇，一起照的。”

毛泽东喜欢和身边工作人员交谈，李越然借机对他说：“伏老到警卫团参观。一进连队宿舍就立正敬礼，说‘红军战士伏罗希洛夫前来报到！’”

“是吗？嗯，他是老红军，斯大林的老朋友，打过不少仗。”毛泽东提到伏罗希洛夫总是带出一种亲切友好的语气，“伏老劝我早睡早起，这个意见很好，可我已经多年不这样了。不过，如果真能按太阳的规律去作息，那倒是件好事。”

“主席有主席的生活规律。”李银桥说。

“你了解赫鲁晓夫这个人吗？”毛泽东忽然问李越然。

“不太熟悉，只是跟总理和彭真同志出访时，和他接触过几次。给我的印象是思想敏锐，很精明，比较开朗，有时容易锋芒外露。据说这个人脾气是比较暴躁的。”

“赫鲁晓夫有胆量。”毛泽东不无赞赏地说，“不过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可能日子不大好过，是多灾多难的。”毛泽东的举止总是高度的镇静，走路很慢，步伐稳健。他时常停立在一个地方沉思着什么。

李越然聆听着毛泽东的谈话，时刻考虑翻译上的难点，力求有所准备。

有一次，毛泽东忽然问李越然：“俄语纸老虎怎么说？”

“
|
。”

“拍拍，太根儿。”毛泽东接口讲了一句。李越然愣了一下，忽然明白这是英语的纸老虎。他请了林克担任他的英文教员，学得很认真。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讲英语，而是为了阅读西方报刊。他后来果然达到了阅读目的，但口语始终不行。当他说“拍拍，大根儿”时，湖南乡音很重。一本正经地走了腔。李越然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于是，毛泽东也笑了，竟笑得像个小学生一样不好意思。李越然觉得与毛泽东距离一下子近了许多。

这段时间，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刻都在注意着毛泽东访苏的行程，几乎每天都要来电话询问代表团启程日期等情况。

快到出发的日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李越然叫去，吩咐说：“小李啊，你即刻约见一下尤金，向他转告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

“什么请求？”

“这个交涉你要尽力办好，请尤金报告苏联领导，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能够照办。”杨尚昆先提要求，而后才具体谈请求，“主席的意思是要请苏联方面把机场的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一下飞机就走。”

“这恐怕不行吧？”

“你去谈谈看。”杨尚昆眼缝里闪着柔和的光波，说话总是不慌不忙，“有什么结果我再报告主席。”

“别的还有什么要求吗？”李越然问后，杨尚昆又讲了几点主席生活作息方面的事后说：“王敬先（警卫局长）已经去了莫斯科，请按他的意见做好准备。”

“主任还有别的指示吗？”

“你去约见尤金吧。”

电话联系后，李越然驱车赶到苏联驻华使馆。尤金迎上来，开口就问：

“怎么，行程有改变？”

见他紧张，李越然忙笑着说：“不，没有。”

尤金松口气，全身做出松弛状。可想而知苏共中央对毛泽东亲自参加会议的重视和尤金肩上担子的分量。

“尤金同志，我找你来是转告毛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李越然用俄语讲述了毛泽东的请求。

“哎呀，这可不好办。”尤金耸起圆滚滚的肩膀，摇动红润的四方脸盘，波浪形卷曲的头发随着摇头颤动不已，“我可不能做主。我立刻报告，请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讨论决定吧。我能做到的就是如实传达毛主席的请求。”

“谢谢。”李越然点头表示理解，“另外，还有毛主席的生活习惯……”

“至于生活安排，莫斯科已做好准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尤金向李越然介绍了一下准备情况。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是有一定了解的。

毛泽东要求搬出沙皇寝宫

时光到了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许，毛泽东登上“图104”客机。

一位塔斯社记者虽然顽强，此时也只能望“机”兴叹了。他曾追着毛泽东提问，想请毛泽东讲几句话。可惜，落空了。外国记者，除了当年的斯诺和斯特朗，很少再有谁有与毛泽东谈话的荣幸。

“图104”客机轰鸣着滑上跑道，送行的中国党政领导人在旭日的光辉中向滑动的飞机频频招手，为领袖送行。

这是苏联派来的专机，机舱里清洁舒适，有办公的桌椅也有休息的床铺。机组人员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很平稳。精选来的空中小姐热情庄重。她们包围了毛泽东，争抢着握手，而且握住不肯放，热烈地问候，纷纷表达着自己的崇敬热爱之情。

“好了好了，可爱的姑娘们。”

尤金走过来为毛泽东解围。

空中小姐们频频回头地退出去了。毛泽东没有休息，先去看望同机出发的宋庆龄。毛泽东此次访苏，同行的还有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对宋庆龄非常尊敬和关心，到她的客舱中问候：

“怎么样，还适应吧？”

“感觉还好。”宋庆龄微笑点头。

“路途还长，到了莫斯科后估计还不能马上休息，在飞机上倒是轻松了。趁这个机会你要休息好。”

“主席，您事情多，更要抓住时机休息好。”

回到前舱，毛泽东对翻译李越然说：“你去把尤金叫来，我要跟他谈谈。”

尤金走进来，毛泽东请他坐到桌子对面。

“你是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毛泽东开玩笑似地眨一下眼，“对不对？”

尤金带着哲学家的认真表情，很沉着地点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跟您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

“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尤金下意识地用手指理理头发，说：“那好吧，争取及格。”

毛泽东笑笑，接着又问：“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

尤金一个劲眨眼，终于作难地叹道：“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

“考住了？”毛泽东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笑道：“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快到依尔库茨克了，飞机将在这里做暂停。尤金告辞去办一些事，李越然借机将一份讲话稿送给毛泽东。按照惯例，首长在公开场合的讲话稿事先总要给翻译一份，预做准备，李越然说：“主席，这是为您准备的机场讲话稿。您过过目吧？”

毛泽东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地握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扫过字里行间。随行的摄影师侯波见毛泽东在飞机内聚精会神看稿子，便轻轻地靠近过来，选位，对焦，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毛泽东看过讲话稿，头也不抬地吩咐：“去把尚昆同志请过来。”

“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毛泽东掀起眼皮，用商量的口吻问道。

“这是公开出访，依照惯例还是讲几句好。”杨尚昆解释。

毛泽东略一沉吟，又问：“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就算了。”

“这只是做个准备，不一定照着念。”

“好吧，”毛泽东将讲话稿收入上衣袋：“留作备用。”

“图 104”在依尔库茨克机场降落。苏联派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专程来到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

费德林是中国通，无须翻译，一上飞机就和大家打招呼。他看到空中小姐给毛泽东送茶水，忙探头望望。原来那些高级龙井茶叶全浮在了水面上。他快步朝那些空中小姐们走过去。

“姑娘们，你们把操作程序弄颠倒了。”费德林介绍说：“沏茶水要先放茶叶，后倒水。水要滚烫滚烫才行。”

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深度花镜时而搭在鼻梁上，时而摘下来放一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向邓小平介绍《莫斯科宣言》的起草情况和活动日程安排，又向杨尚昆介绍会议组织筹备情况。

莫斯科时间下午 3 点左右，“图 104”飞机经过 8 小时的飞行，来到莫斯科上空。这天莫斯科天气晴朗，从舷窗向下观望：灰黄的田野，蔚蓝色的莫斯科河，色彩斑驳的树林，被公路和林木分割成各种几何图形的城市建筑，宛如一幅油画尽收眼底。

“图 104”徐徐降落在伏努克机场，经滑行道停在候机楼前。当舷梯与飞机舱门对接好时，卫士长已经替毛泽东整理好大衣和礼帽，毛泽东向舱门走去，翻译李越然跟卫士长李银桥两人如同毛泽东所言的哼哈二将紧随其后。

舷梯下是红地毯铺就的一条路。毛泽东的身影在舱门一出现，机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热烈鼓掌的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满面笑容地向舷梯走来。

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也来了，立在赫鲁晓夫身边。毛泽东缓步下梯，剩最后三级阶梯时，抬起头望着赫鲁晓夫浑圆而结实的面孔，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们在舷梯下拥抱，亲颊，互致问候。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

毛泽东和胡志明主席拥抱在一起，尤为亲切。

“身体好吧？”胡志明讲中国话。

“很好。你怎么样？”

“比上次见面还要好些。”

“上次是在家里，这次是在莫斯科。”毛泽东说的“家里”是指中南海的勤政殿，夏天胡志明曾在勤政殿与毛泽东长谈。天气闷热，毛泽东请胡志明赤裸了上身，并说：“这是在家里么，尽管随便就像走亲戚一样。”

毛泽东顺序同到机场来迎接的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一握手，赫鲁晓夫跟随一旁做介绍。之后，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过来引导，请毛泽东检阅仪仗队。

毛泽东走到三军仪仗队前。他立住脚，将头上的礼帽摘下来交李越然拿着，面对仪仗队的陆海空士兵，用激昂高亢的湖南腔，大声问候：“同志们好！”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威虎势，发出震耳三声欢呼。

仪式完毕，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上了第一辆“吉斯”车。

这种车很宽大，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坐后排，前排和后排之间可以拉出一排略为低矮的活动椅，李越然和李银桥“哼哈二将”坐在其上。前排是司机，司机旁边坐了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副局长查哈洛夫少将。他被指派力毛泽东访苏期间的卫士长。

李越然侧着身体，将手搭扶在椅子靠背上，为世界最大的两个共产党的领袖翻译对话。

“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吗？”毛泽东问。

赫鲁晓夫搬动手指介绍已经到来的共产党领袖。介绍到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毛泽东对这两位来自西欧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领袖很感兴趣：“他们住在哪里？”

“安排在市郊别墅了。”赫鲁晓夫说到这里，有意补充介绍，“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驻地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

毛泽东对这种特殊友好表示似乎并不在意，身体倚靠沙发，头侧扭着望着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是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对他们像我一样……”

“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

毛泽东点头：“谢谢，谢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毛泽东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不无庄严地解释道：“是啊，我们收到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照惯例办的，您这样的尊贵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

“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都没用了。”毛泽东微笑着吮一吮下唇。他高兴或者生气都有可能做出这个动作。

道路两旁的楼房建筑渐渐增多。毛泽东朝窗外望去，赫鲁晓夫介绍了住

宅建筑的情况。

毛泽东始终注视着窗外，良久，他点点头说：“看清了，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人们穿着也都不错。”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查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舍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和叶子龙，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都看了一遍。特别留意了一下毛泽东的寝室里的木板床和改造过的蹲式马桶。

“我们该告辞了吧？克利姆，”赫鲁晓夫扯扯同毛泽东谈笑风生的伏罗希洛夫的衣襟，“该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休息了。”

苏联领导人纷纷起立，握手道别。赫鲁晓夫不无殷勤地向毛泽东介绍：“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表示我们对您的一番心意。”

可是，毛泽东到为他准备的房间里没呆多久，便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直朝李越然住的房间走来。

李越然和保健医生李志绥住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见毛泽东进来，忙起立。

毛泽东摆了下手，没说话，在屋内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是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一切都很方便。毛泽东点点头，仍然一言不发，回身走出去，慢步上了楼。

李越然和李志绥正在犯嘀咕，不知怎么回事，李银桥来了，拽着李越然说：“你来一下，主席找你。”

李越然忙跟随李银桥上楼走到毛泽东寝室。只见他老人家独自一个，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李越然在距离他3米远的地方站立，听候指示。

毛泽东招招手，李越然走到他身边。他用很轻的声音吩咐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住，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

李越然一怔，头立刻摇起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你看，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

“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

“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毛泽东做个手势。

李越然走出屋，没去找苏联同志说，先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

毛泽东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与赫鲁晓夫多次交谈

莫斯科会议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简称。会前重要的准备工作是起草宣言。《宣言》由中苏双方讨论起草。中方首席代表是邓小平，苏方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不同场合（包括会议休息室、宴会席间，乃至汽车上等）有过多次数交谈，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

赫鲁晓夫本人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与毛泽东交谈，基本内容一是关于如

何对待铁托。抵达莫斯科后不久，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毛泽东。赫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请帖，他可能不来。”又说：“他不来是他自己失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

毛泽东微微一笑，又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

“来，是卡德尔。”赫鲁晓夫介绍说，“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那好啊。”毛泽东兴致高涨：“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赫鲁晓夫表示赞成。

二是关于会议文件（指宣言草案）。赫说：“苏中是两个大党，大家都在看着我们，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兄弟党都在等着。”

毛泽东着重讲了我党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

当天夜间，毛泽东把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他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的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他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李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李越然写完，他就在这个信封上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

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会谈，并正式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提纲。

三是关于现代战争和物质生活。在拜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的时候，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观点：“我们对现代战争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赫不表态。布尔加宁很欣赏，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分析。”

谈到物质生活时，毛泽东说：“人身上的热量是很有限的，不能昼夜都吃，也不能同时穿10件皮大衣，享受也有自然的限度……。”

双方都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享受也不是无止境的。

四是关于苏联专家。在会议休息时，赫鲁晓夫说：“我们专家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做，是不是可以回来？”

毛泽东表示：“事情是有得做的，不过不一定要那么多。我们的同志应该学会自己走路……。”

赫鲁晓夫对米高扬说：“你听见了没有，毛泽东同志同意专家回来。”

米表示：“想想再说。”

五是关于核武器。毛泽东出于后发制人的观点，在会见场合问赫鲁晓夫：“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赫说：“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他什么时候放？”毛泽东问，

“能知道。”接着，赫鲁晓夫又说：“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

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

“这种说法不对，”毛泽东不同意这一观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有？”

六是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在宴会席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忠告说：“你的个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在兄弟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让人家讲出来以后，慢慢谈，着急不行……”

赫没有完全听进去，他说：“你不了解，有些人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使人生气。”

七是关于以苏联为首，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

赫鲁晓夫说：“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毛泽东说：“我们没有资格……”

接触其它共产党领袖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接触了其它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方面听取意见，并阐明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到郊外别墅看望了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

多列士身材匀称，不是金发，是像亚洲人一样的黑头发，鼻梁高，脸膛红红的，可是他自己说身体不好。据说，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议会中的合法斗争问题。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也搞过合法斗争。但是搞合法斗争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不合法的斗争，至少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一旦有条件，就要轰轰烈烈干一场，你只在资产阶级的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斗争，怎么可能夺取政权？”

多列士持有自己的观点，他摇着头说：“不能搞冒险，流血总不是好事情……”

“这要看为什么而流血，巴黎公社不是有极大的牺牲吗？”多列士没再多说什么。

毛泽东邀请陶里亚蒂来到他下榻的克里姆林宫，交谈中他仔细地了解了意大利的社会情况和意共的斗争。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额头已经看得出明显的深纹，大背头，眼镜后两只眼睛特别亮，但又总是漾出一种哲学家的思索的神情。

陶里亚蒂行止稳重，对毛泽东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走路、入座、谈话都坚持礼让毛泽东在先。陶里亚蒂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欧和意大利的情况。强调西方与东方社会情况不同。

毛泽东赞赏这种讲求实际的态度，也承认：“我对西欧党的情况不太熟悉。”

陶里亚蒂点头说：“中国党要加强与西欧党互通情况。中国党是大党，应该多了解西欧各党的具体情况。”说着，便简略介绍了一下西欧的政治经济特点及西欧各党的概况。

陶里亚蒂说：“在资产阶级统治还比较稳固的意大利，在社会各种矛盾还没有尖锐化，在人民群众也没有改变这个社会制度的迫切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共产党必须善于和执政党很好合作。条件不具备，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会脱离实际。”

毛泽东想了想，说：“坚持实事求是，这样对，我们过去和国民党也合作过，搞统一战线。”

“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但是斗争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陶里亚蒂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广大工人阶级，让社会各阶层了解我们的党是为各阶层人民谋利益的。意大利政治是多元化的，政党很多，我们是一个大党，在政府里也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们要发动劳动人民起来，共同争取利益。”

毛泽东只是认真听，并没有对这些观点做评论，但是对陶里亚蒂本人有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以后的事实发展表明，毛泽东认为陶里亚蒂的思想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思想。而且毛泽东也指出来，苏共“20大”路线在国际共运中大有市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提出了两个新理论——通过取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不仅有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合作。毛泽东反对这两条新理论，陶里亚蒂显然是支持这两个论点。那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呢？

这一天，毛泽东又驱车来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拜访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哥穆尔卡出迎到院外，他细高个子，背稍驼，已经脱顶，鼻梁不高，但是鼻头却倔强地翘起，面带一种深沉的微笑，寒暄着将毛泽东让入客厅。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兄弟关系。”哥穆尔卡像老朋友一样，坐下后便用抱怨的语气向毛泽东发牢骚。在波苏关系问题上，哥穆尔卡是感谢中国共产党的公正态度的。“我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么。”

毛泽东当然明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难言之苦，他们国土上有苏联驻军。然而，还要顾大局，讲团结。讲团结就不能搞小动作跟着发牢骚。

“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毛泽东将手划一道线，在战争年代他常用这个手势表明形势，“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

哥穆尔卡抿嘴耸肩，表示没办法。

“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

“嗯。”哥穆尔卡鼻子里哼一声，勉强喃喃，“这个道理还可以讲得通。”

“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没有先例么。”

哥穆尔卡对涉及苏共“20大”路线的问题似乎不愿多谈。稍停片刻，他很直率他说：“毛主席，你是有很高威望的无产阶级领袖，但是你讲的‘纸老虎’这个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

毛泽东也很坦率：“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

哥穆尔卡听着翻译有些发怔。

毛泽东侃侃而论：“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的，是纸老虎，但是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

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又是纸老虎，又不是纸老虎，这话怎么讲……”

“这就是辩证法，一个是从战略上讲，一个是从战术上讲……”毛泽东反复讲解，哥穆尔卡没再说什么。不过，在场的人能观察他对事物的理解好像是跟原来有所不同了。

这番关于辩证法的讨论引得毛泽东思考很久。他说：“看来辩证法不讲不行。”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同志请来一道用餐。

毛泽东风趣地与郭沫若等人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截，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李越然问：“李越然同志，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

李越然听到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

“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毛泽东停下筷子，谈得兴致勃发，“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说：“晋书地理志载 5600 万。”

“现在还统计不全，总有一些不入户之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姑且算作 5600 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建安七子中王粲所作《七哀诗》，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多少人？比比么，三国混战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一声，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后来，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及其它党的领袖们又讲了以上观点。

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口述，整理了一大段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文稿，建议写进会议文件。

苏斯洛夫为此来看望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说：“毛主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不添进去好像也可以……”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摆：“说大家都熟悉，不见得。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必然也就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你信不信？”

《宣言》本来就是中苏协商，你一段，我一段，苏斯洛夫同意将辩证法的论述写入会议文件。

妥协不是单方面的，毛泽东也决定做出妥协。

毛泽东点“家珍”

当赫鲁晓夫再次陪毛泽东共进午餐时，毛泽东递出一个信息：“文件可以照顾你们‘20大’的观点，我们搞份备忘录，算是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赫鲁晓夫顿时精神起来。他在高兴的时候，喜欢“滔滔

不绝”，“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战争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指挥打仗。卫国战争的胜利跟他没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到一次次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不接茬，有意岔开话题：“我愿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

“这好办，我们负责安排。”赫鲁晓夫仍然想着那话题：“斯大林对西南前线的指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我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停止包围哈尔科夫地区的作战行动，但是斯大林蛮横地拒绝我的正确意见，下令继续进行哈尔科夫包围战。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上将，请求他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讲明形势。你要知道，斯大林是不看地图的，他是用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地球仪上的哈尔科夫地区只有针尖大！可是华西列夫斯基说，‘斯大林已经研究了这一问题，对此问题我不能向斯大林再说什么了。’他害怕斯大林的粗暴，歇斯底里，还有总参谋部那位可怜的元帅，胆小如鼠，一见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光会颤抖。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但我还是勇敢地在另一个地方向斯大林打电话……”

赫鲁晓夫眉飞色舞讲述他自己如何“正确”，“勇敢”，向斯大林一再提出正确建议。但斯大林不接电话，他就站在马林科夫身边，马林科夫接电话他就不接，自己的正确意见遭到无理拒绝云云。

这期间，毛泽东不是吃饭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军的赫鲁晓夫，在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名不见经传，现在自吹他比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还高明，而且是在指挥过千万次大小战役的毛泽东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用餐巾擦擦嘴，终于幽默地讲一句：“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西南战线还没打完呢。”

在一次宴席间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扳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一下指头，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赫鲁晓夫点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注：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他与邓小平打过交道）。

毛泽东继续扳动第三个指头：“第三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原则性不够强，但他也是个好人。”讲到这里，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扳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但不

能指望他主持工作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像对我一样来对待他们，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着右手说。

席间还谈及莫洛托夫。毛泽东以我党“八大”保留王明为例，问赫：“你们能不能把莫洛托夫选进中委，以示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赫说：“不能，这个人没有用，只能妨碍我们的事业。”

莫斯科风云人物

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终于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开幕了。

毛泽东每临大事思想高度集中。出发前，他中山装制服领扣没扣，李越然帮他扣时，他好像根本没有受到触动。坐电梯下楼，请他上电梯，他便机械地走上电梯，立在角落一声不响。电梯停了，什么时候请他下电梯，他什么时候迈步，完全是机械的。他在考虑即席发言。而他的发言，对会议来说是举足轻重的。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向乔治大厅走去时，情绪很热烈。因为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活动中，毛泽东在列宁山向集会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盛赞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盛赞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世界革命所做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用美好的语言祝贺了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即席无稿发言，赞扬苏联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他说：“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各国代表听到毛泽东的生动语言，气氛活跃。

会议中，毛泽东有几次即席讲话，留给人们深刻印象。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做个手势，望着会场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还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

大厅里响起一片热烈掌声。赫鲁晓夫也显出喜悦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目光掠过会场，落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身上，微笑道：“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他朝卡德尔努努下颏，“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

卡德尔当时显出很受感动的表情。

“现在世界分力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些？算一下吧。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多少钢？苏联有多少钢？”毛泽东说出两个数字，而后讲道：“但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现在苏联又发射了颗卫星上天。这个意义很大，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接着，毛泽东对着赫鲁晓夫说：“你们再加把劲，能不能用10年的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美国。”

赫说：“我们努力，还是可能的。”

毛泽东说：“你们用10年时间超过美国，我们15年超过英国。”

会场响起了掌声和喧哗声。毛泽东在分析了力量对比之后，用那高亢的声音说出了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著名论断。

“要警惕出战争狂人，他们有可能到处乱扔原子弹和氢弹……”毛泽东郑重声明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在战争中充当侵略者。他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考虑了一旦发生战争所可能出现的局面。他介绍说：“我和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相信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消灭。我说如果糟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多少年内又会有 17 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建设，我们希望和平，可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横下一条心，奉陪到底，打了再建设。如果你每天怕战争而战争最后来了，那么你怎么办？……”

全场聚精会神地听着毛泽东的即席演讲。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于 1957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召开；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又于 16 日至 19 日召开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

11 月 2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林娜大厅为各国党的代表团举行隆重的送别宴会，气氛非常热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主宾席正中并坐。

毛泽东祝酒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们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毛泽东略一停顿，用诗词比喻了共产党人的团结，他说：“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宴会厅响起热烈掌声。赫鲁晓夫举起酒杯，一边喝彩，一边在毛泽东的酒杯上碰出清脆的一声响。

“联合舰队”的争论

时光到了 1958 年 7 月 29 日，中办翻译组长阎明复从居仁堂给李越然打来一个电话。

“李兄，有要紧事情，你赶紧过来。”

“什么事？”李问。

“有重要工作。你赶紧过来，杨主任找你。”

李越然赶到居仁堂，阎明复向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苏联方面通过驻华大使尤金请见毛主席，表达了苏联领导的一个意思，希望在中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个长波电台以便与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我们搞个联合舰队。尤金第一次来谈，毛泽东便严肃地问他：“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尤金解释不清。毛泽东有些恼火，严厉他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回去便向莫斯科紧急发电报告，返回来再次请见毛泽东，还是说要搞一个联合舰队，以对付美国第七舰队。毛泽东听后很生气。追问苏方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尤金依然回答不清。毛泽东说：“不行，这事必须弄清楚。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就这样，尤金给赫鲁晓夫拍了电报，赫鲁晓夫决定马上来华。

阎明复告诉李越然说：“尤金两次来，都没有讲清楚，主席很火。赫鲁

晓夫马上就要到，杨主任让你参加翻译工作，所以找你来。”

他们一道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杨尚昆把毛泽东和尤金的谈话过程又介绍一遍。

听了情况介绍，李越然思想上也有了准备：看来将有一场大争论！

隔一天，7月31日，赫鲁晓夫便来了。李越然随毛泽东乘车到南苑机场。参加迎接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候机室等待时，气氛比较严肃，不像过去那么轻松愉快。大家很少说话，毛泽东也不像过去喜欢和尤金谈论哲学，这次没有多少话谈。

赫鲁晓夫乘坐的“图104”客机缓缓落下，我方党政领导人迎出去。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毛泽东只是同赫鲁晓夫握手致意，互相寒暄着走进会客室。

在会客室稍坐一下。没有谈正题，毛泽东一般地谈及中国国内情况，他说：“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很好。”

刘少奇接过来讲：“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露出一种异样的笑容，说：“那好办。粮食多了你们不好办，可以给我们。”

没多谈，宾主便乘车从南苑直驶入中南海。

毛泽东陪赫鲁晓夫走进颐年堂。邓小平和杨尚昆陪同参加。刘少奇和周恩来迎接过赫鲁晓夫便回去了，没有参加会谈。

走进颐年堂，毛泽东随便问候：“一路上还好吧？”

赫鲁晓夫点头：“还好。你健康吧？”

“自我感觉良好。”毛泽东已经请赫鲁晓夫坐下，自己也坐下来。说：“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意思，但说不清究竟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说他可能没有听明白苏联领导的意思。然后说明自己的想法。大致谈的是，根据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此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求，请苏联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建造潜艇的技术。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等等。

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十几分钟，加上翻译，就讲了有半个多钟头。毛泽东神色肃穆，不停地吸烟，望着赫鲁晓夫默默地听。赫鲁晓夫显然对毛泽东的想法不了解，对毛泽东将会出现的反应估计不足。他还在泛泛作解释，越讲情绪越高，有些得意。

突然，毛泽东抬手做个断然而简截的打住的手势，只说了一句话：“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是呀是呀，你别忙，我还要继续讲，继续讲下去……”他强做笑脸，有些不自然。“尤金告诉我了，您很火。尤金不行，他没讲清楚。我们只是想法，想跟你们商量……”

毛泽东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绕山绕水，便语锋犀利地直戳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联合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支支吾吾，憋出一句显然是不着边际的解释：“所谓联合么，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请你说明什么叫联合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拍了一下桌子，愤然立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李越然见此情景，在译语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地表达毛泽东的情感，使赫鲁晓夫充分感到问题的严肃性。

赫鲁晓夫脸孔涨红了。看得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始终处于答辩地位。但他仍然搪塞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下不乏自信的嘲意：“你们都拿去算了！”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外长费德林是位著名的汉学家，精通中文。他用俄语从旁提醒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可真动人了！”

赫鲁晓夫自然明白毛泽东已是“维佳里夫谢里约斯\但他还能沉住气，耸耸他那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式的双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眨两下，锋芒稍纵即逝，摊开了两只胖而小的手，带着鼻音嘟囔着：“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毛泽东重新坐下，他至今还没有附和过一句赫鲁晓夫，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还注意选择一些有共同点的问题谈。这次不然，抓住要害不放：“你明明是搞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提高一些话音：“我们还不过是来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误解。”说着，赫鲁晓夫温怒地连连摇头：“这就不好商量不好办了。”

毛泽东心里是有数的。8个月前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曾劝说哥穆尔卡：“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

是呵，“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那时，中国海军创建不到10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

难怪毛泽东敏感，难怪毛泽东愤怒。苏联在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驻有军队，建有基地，那另当别论，中国管不了东欧，但是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任何外国的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土地上立足，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立场。

赫鲁晓夫曾多次责怪埋怨尤金不会办事，现在这样收场他大约也感到不好下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拂开：“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的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微露愤撞。他在不高兴或愤怒时，眼睛便眯细成一条线，目光像被聚光之后那么凝成犀利的一束。

毛泽东反而但然了，甚至轻悠悠地吸起了香烟。大概他的目的达到了：弄清苏联人的真实想法，并且抓住时机把态度明确告诉他们，叫他们永远忘不了。他斩钉截铁他说：“不能！”

赫鲁晓夫已经不再眯眼，表情恢复了平和。毕竟是位大国领导人。他的意志也是足够坚强，忽然一笑：“为了合情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做基地。”

“不要！”毛泽东吮吮下唇，淡淡一笑，换了一种慢条斯理的声音说：“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赫鲁晓夫无声地望着毛泽东，望的时间不短，那种表情是说：我没法理解你，也没法跟你谈话。

毛泽东却像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继续讲道：“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上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话讲到这一步，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眯细的眼睁开了，缓解一下气氛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

似乎就此结束他也不好下台，便又将眉毛耸了耸，用不无遗憾的口气说：“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大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 and 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用柔和的声音将援助和主权问题区分开，礼貌而不失坚定地重复一句：“是另一个问题。”

在颐年堂的会谈是一下车就开始，可见毛泽东的重视，他对中国的主权问题毕生都是格外珍重。

这次会谈结束后，一位领导同志曾对李越然说：“小李，主席还问我呢，问你是不是怕赫鲁晓夫？”

李越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位领导同志说：“主席问，我指赫鲁晓夫他为什么不指？”

李越然解释说：“我不是怕他。我跟少奇、恩来、彭真几位首长出国多次，对赫鲁晓夫还是知道一些的。他脾气是很暴躁的，都那样指，干起来不好。”

游泳池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毛泽东在游泳池等候赫鲁晓夫，准备第二次会谈。

李越然先到了，见毛泽东已经换了游泳裤，穿了一件浴衣正在做准备活

动。

李越然趁机走过去，小声问：“主席，听说你问我是不是怕赫鲁晓夫？”

毛泽东停下活动，望着李越然：“嗯，你怕不怕呀？”

“我不是怕他，我是了解他。”李越然向毛泽东解释了赫鲁晓夫脾气暴，也是容易发火的。李越然说：“主席，您指他鼻子问题还不算大，我要是再指他，问题就可能闹大了。当时您已经很激烈，我作为一名翻译再激烈就不妥当了。干起来对双方都不好。”

“嗯，”毛泽东的神情半是思索，半是赞同：“你考虑的有道理，说的也有道理。”

受到鼓励，李越然更能畅所欲言了，便说：“当时我也站起来了，在主权问题上是不能含糊的。不过，关键不在指不指他，把意思准确地翻译出来，词锋够尖锐就行了。”

毛泽东点点头，目光朝身体两侧扫来扫去地说：“你讲的对，赫鲁晓夫这个人，该碰碰他就碰碰他，也不是什么都去碰他。”

这是室外游泳池，阳光照射在清澈透底的池水中，浅水一侧泛出青白的光辉，深水一侧蓝幽幽给人以清凉的舒适感。白磁砖亮得耀眼，池边摆了藤椅。藤桌上有茶水和香烟，藤椅摆放的格式是准备会谈的样子。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来了，他们显然也是来参加会谈的，阵容比昨天大。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都很能抽烟。周恩来除偶尔拿支烟摆摆样子，基本不抽。毛泽东是很随便的，穿一件浴衣，光脚踩着拖鞋，另外三位领导人都是穿着整齐，立在池水边，抽烟聊天。

毛泽东讲话多些，给人们印象深的几句话是：“我们都要学点唯物论、辩证法，这里可有学问哩！客观事物复杂着呢，一切都处于运动中，一切都在变化，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从1957年始，毛泽东格外强调辩证法，特别是与苏联人打交道时，总是加以特别强调，1957年李越然随他访问莫斯科时，一上飞机他就谈起了辩证法。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苏联方面安排的参观列宁格勒，看芭蕾舞、话剧歌剧以及游览等活动都拒绝了，他只提出见见苏联的哲学界名流们，与他们交谈辩论，津津有味，和他们一道讨论辩证法以及如何把哲学变成普通人手上的武器。会议期间，曾根据毛泽东的口述，整理了一大段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文稿，建议写进会议文件。

后来这段论述写进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中。

毛泽东坚持讲辩证法就是坚持要革命，世界上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对辩证法不感兴趣，就是追求平静安逸，不愿改变现状，不愿打破旧的平衡，就是不想继续革命继续前进。毛泽东对他的战友们讲过有关辩证法的话。

赫鲁晓夫到了。双方握手寒暄几句，赫鲁晓夫也知道毛泽东是习惯夜里工作，他问毛泽东睡眠如何？主席说：“心里有事，睡不着……”随之，便在藤椅上坐下来，开始第二次会谈。

关于建长波电台和搞共同舰队的问题已经在昨天被毛泽东否定，今天便不再提这个事，转而谈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双方分歧不是很大，可以谈出许多共同点，因而气氛比昨天融洽些。

不过，还是有争论。

从国际形势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又谈到中国的“大跃进”。

赫鲁晓夫摇头说：“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越阶段的情况。”

从大跃进谈到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

赫鲁晓夫仍然摇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儿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的，你们比我们更清楚。”

赫鲁晓夫不吸烟，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都是不停地吸烟。主要就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别人基本不插话。赫鲁晓夫借谈中国国内形势之机，将话锋一转，转到国际关系上，说：“对亚洲，对东南亚，应该说你们比我们清楚。我们对欧洲比较清楚。如果分工，我们只能多考虑考虑欧洲的事情，你们可以多考虑考虑亚洲的事情。”

毛泽东几乎没有一件事随声附和赫鲁晓夫，他做个手势说：“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你们比我们熟悉一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毛泽东讲这段话，仍是坚持尊重别国主权，提醒赫鲁晓夫不要搞什么划分势力范围的事。

会谈结束，毛泽东请赫鲁晓夫游泳。

赫鲁晓夫换了游泳裤权下水。他游泳水平不行，在浅水那边下他于，说不上是什么泳姿，就是手脚乱刨的那种姿态，“刨”了几下就沉不住气，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爬上池子，要了一个救生圈，套上以后才重新下水。

毛泽东游泳在国内外都是闻名的。他从深水区下水，下到水里便从容地游几下蛙泳，然后将身体一侧，用侧泳向浅水区游去。

这时，赫鲁晓夫悄悄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将手一划，两腿一蹬夹，肩头冲起一片水花，速度很快，像颗巨大的鱼雷一样飞速前进，手刚动了几下，身体已过游泳池中线。

赫鲁晓夫大约是出于自尊心，想故意不去看毛泽东，但又忍不住要打量这位既是伙伴又是对手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他将头刚转开，很快又转回来。转回来时，毛泽东已经游到他身边。

“我早就知道你游泳是能手。”赫鲁晓夫伏在救生圈上喃喃，毛泽东微笑作答，没有说话，已经又折向深水区游去。转折时，他的侧泳已经换了仰泳。游到了池中间。

这时，赫鲁晓夫忽然睁大了眼，嘴唇也稍稍张开着僵住了。难怪赫鲁晓夫目瞪口呆：

毛泽东竟躺在了水面上！

工夫不大，更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竟在水中成70度角竖立了身子，近乎立正的样子。有人可以躺在水中，但还没见过谁能像毛泽东这样不动地“立”于水中！

赫鲁晓夫怔了片刻，终于叹服地晃了晃头，又点了点头。

毛泽东游过一段时间，心满意足地靠近赫鲁晓夫聊天。现在已不是双方坐下来会谈的官场气氛，换了个人交往的轻松自由的气氛。

“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毛泽东望一眼赫鲁晓夫，语意深沉地说：“过

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这段话时面无表情，他是怎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赫鲁晓夫7月31日到北京访问，8月3日回莫斯科。来的时候是秘密的，走的那天发表了会谈公报。是公开离开北京的。

毛泽东虽然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但是没有同车。

送行时没有搞什么仪式，毛泽东也没有同赫鲁晓夫拥抱。这次会谈，对以后的中苏关系的发展是有较大影响的。

第十章

含冤走出中南海的元帅，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向居住近 10 年的永福堂投下最后一瞥

“永福堂”和它的主人

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一排造型相似的院落中间，有一座中国古老式的建筑，名叫“永福堂”。1953 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后，就住在这里。

这座院落，有北房 5 间，西头的两间打通了隔墙，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东头的两间是卧室兼作他夫人浦安修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当中的一间，由东到西打了一个隔断，隔出十来平方米的一块空间，作为餐室。东厢房作会议室，有时用来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后改为宿舍，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彭德怀刚搬来时，这座房子由于长年日晒雨淋，没有及时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剥落，花花点点，不像个样子。尤其是办公室天棚的一角也漏雨，每逢下雨总要湿上一大片。管理部门的同志对此很是过意下去，几次提出要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怀拒绝了。他说：“哪里漏就补哪里，能住就行了！”并多次嘱咐工作人员：“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是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上。”

1956 年春，管理部门对房屋进行检查后，根据房屋的破损情况，又一次提出要油漆门窗和廊柱，并送来了维修计划。彭德怀听了工作人员的汇报以后。把脸一沉说：“又修什么！这不是蛮好的嘛。更不要油漆！房子是住人的，也不是图好看！你们就是不考虑工人、农民住得怎么样，也不考虑国家的困难！”工作人员将彭德怀的意见转告给修缮队，他们解释说，彭总的心意他们知道，但油漆门窗廊柱不是为了图好看，主要是为了防腐蚀，延长房屋使用年限，这完全符合彭德怀要求的精神，并要工作人员再次向彭总请示。

这一天晚饭后，彭德怀坐在走廊里的藤椅上休息，机要秘书孟云增上前报告说：“彭总，修缮队的同志又检查了一下房子，认为确实该油漆一下了！”他不高兴他说：“看，你又来了，不是讲过不修了吗！”孟指着就近一根廊柱的底部说：“你看，这根柱子因为油漆剥落，木头已经腐朽了，如果现在不修，以后还得换柱子哪，花钱就更多了，岂不是因小失大？”彭德怀没有吭声，站起来围着柱子转了几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还不时地动手敲敲，觉得说得有道理，才勉强同意了：“你们这些人呐，理由就是多……”

彭德怀家的住房不仅旧，而且也很紧张。他的侄子、侄女住校学习，节假日回来探望，晚上必须赶回学校去，因为家里没有他们的住处。小侄女彭钢改为走读后，不得不把东厢房的会议室，从北头隔出一小间来给她住，尽管很不方便，但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后来，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也来了，住房就更加困难，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非常发愁。老实说，那时的住房问题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只要彭德怀一开口，解决几间房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彭德怀从不这样做，有困难自己克服。

一天晚饭后，彭德怀和浦安修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东看看，西瞧瞧，还不时地用手指指这儿，指指那儿。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孟云增的办公室，把

他叫到院子里说：“太北的住房怎么解决？现在房子实在住不开，只有考虑盖一两间。”原来他们是在“勘察”地形哩！但院子大小，没有多少空间，在哪儿盖呢，经过反复斟酌，只有西厢房靠南头的院门处，有20余平方米的空地，可以盖两间小平房。经彭德怀同意，由孟云增出面和有关部门商量。经过精打细算，共需材料费一千余元。彭德怀一听，就对孟说：“你算过没有？一千多元，能买多少斤小米？能买一万多斤！这要多少农民的劳动，又能养活多少人？不盖了！”彭德怀在日常生活中，还习惯于用小米作为计算单位。每当遇到花钱的事，他总是首先想到抵多少斤小米，想到农民，‘汗滴禾下土’，种出一点粮食来不容易，花钱不能大手大脚。就这样，盖房子的事，第一次就这么“吹”了。

房子不盖，住房的困难还是没有解决，过了几天，晚饭后彭德怀出去散步，正赶上附近东八所那边拆旧房，彭德怀看到后对孟云增说：“你去找他们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用些拆下的砖头和木料。用那些旧材料，不是可以节约点钱吗？”经过孟云增和修缮队的同志商量，他们答应可以用，并说可以节约不少钱。他高高兴兴地向彭德怀作了汇报，以为盖房的事可以定下来了，却不料彭德怀听完后没有吭声。他环顾一下四周，又提出了新问题：“房子一盖，就把路堵上了，朱总散步从哪里走？”原来朱德到南海散步，习惯于从彭德怀家的院门穿过，房子盖起来后，朱德只有绕行，没想到这件事也被彭德怀记在心上。于是孟云增说：“可以从前院南边那条路绕过去，也不算远。”彭德怀摇摇头说：“不能那么做，朱总走这条路惯了，不能改变他的习惯，只能改变我们的主意。房子先不盖了，以后考虑考虑再说。”第二次盖房的事，就这么“搁浅”了。

后来，大家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有在西厢房南头盖好，为了使朱德去南海散步时不绕路，还从这院子里经过，要在西厢房的北头再开个门。彭德怀同意了这个办法。就这样，几经周折，最后盖起了总共只有20多平方米的、比老房矮半截的两间小平房。

彭德怀一向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在中南海居住期间，他没有单独起伙，一直和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领导人在一个食堂就餐。有时打饭回家吃，剩下点饭菜，还嘱咐工作人员给他留着，下顿热热再吃。他穿的内衣，经常缝补，很少买件新的。平时上班穿的是军常服，下班后换上中山装便服和布鞋。只有参加外事活动时，才穿上礼服和皮鞋，回来后马上脱下来保存好，为的是延长服装使用寿命，为公家节约开支。

由于省吃俭用，彭德怀的每月生活费开支，只占他薪金的四分之一，其余的不是存入银行，支援国家建设，就是用于接济别人。他除了供养几个烈士子女和侄子、侄女上学外，还经常救济烈士的遗属、战友、同事和其他亲戚。他说：“我给他们寄点钱，帮助他们解决一点暂时困难，也可以减轻政府一点负担。”据工作人员不完整的统计，仅是1955年2月至9月，彭德怀就先后给袁淑、彭鹏、周嗣琴、肖绍梅、李桂生、彭佩兰等人汇过款。还有一回，他家乡的生产队修建楠木冲新塘缺少资金，彭德怀一次就寄去了200元。1954年国家发行公债券时，他将平时积蓄和当月的薪金共1000余元，全部买了公债，还专门交代工作人员说：“不要领利息，帮助国家搞建设嘛！”1955年部队实行薪金制后，凡是在学校上学的军队干部子女，改为由父母供给，但烈士子女除外。一直生活在彭德怀身边的彭钢，按规定应享受烈士子女待遇。一天学校寄来了通知单，彭德怀看后在上面批了“不要国家供给，

由我负担，，几个字，给学校退了回去。那些年，只要遇上能为国家减少开支的事，彭德怀总是乐于去做，从不“弃权”。

彭德怀常说，过去，我们节约每一个铜板是为了支援革命战争，现在，我们节约每一分钱是为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平时，他处处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从不乱花一分钱，出国时也不例外。1957年，彭德怀出国访问前，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他发来了服装费。他除做了必需的便服外，把剩余的钱全部退还给公家。又有一次要出国，秘书建议他多做两件，他狠狠地瞪了秘书一眼，说：“不花自己的钱，你们就是不知道心疼！”他的夫人浦安修见他身上穿的毛衣太破旧了，就悄悄到工府井买了一件回来。晚间，工作人员请彭德怀试衣服时，浦安修也将她买的毛衣请他穿着试了试。毛衣太瘦了，惹得大家都笑起来，彭德怀诙谐地说：“花钱买来了一件‘紧身咒’，穿不得，穿不得！”说着脱下毛衣，顺手给了孟云增：“你穿合适，给你吧，你就不用再买了！”而他自己打定主意仍旧穿着那件破毛衣出国，别人劝他再买一件换换，他说：“出去是为了工作，也不是去搞服装展览，旧毛衣穿在里面怕什么！”

彭德怀曾多次出国访问，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每次出国时都十分节俭。在国外，他对那豪华的接待场面很不习惯，尤其是对那丰盛的西餐更是吃不来。他在外国参加活动的时时间一长，就想吃中国的家乡饭菜，每逢这时，不是到中国饭馆去吃，就是大使馆请他回去，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便饭。有时他只让做一碗面条，浇上点肉丝，吃起来也特别香。

在国外，每次都发给代表团成员一点外币，作为零用费。1957年11月，彭德怀参加毛泽东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时，既是政府代表团团员，又是军事代表团团长，发的零用费比一般人要多点。回国前，大家都用外币买了些纪念品和生活用品，秘书去请示他需要买点什么东西。他还没等秘书开口，就说：“又来动员我花钱是不是？不买！”接着，对秘书说：“我们国家的底子薄，现在还很穷，搞经济建设正需要外汇，能省就省些吧！”还告诉秘书说，外国的东西并不一定什么都好，常用的东西家里都有，他什么也不需要。秘书问发给他的钱怎么办，彭德怀急了：“你这个人哪，把钱交到大使馆去嘛！”秘书还是站着不动，他想了想又说：“噢！黄克诚同志的眼睛不太好，看报困难，要听广播，外出时也需要带个收音机，这里有一种直交电流两用的体积较小的收音机，就给他买一个吧！”秘书问他要不要给浦安修和孩子们买点什么东西，并提议为他上学的侄子买一块手表，彭德怀听了很不以为然他说：“小孩子上学戴什么手表，参加工作后再买也不迟！”后来经大家再三劝说，彭德怀嗯了一声，说：“远芳（任弼时同志的女儿）需要一套计算用具，就给她买一套吧。其他上学的孩子，每人买一支三用铅笔也就可以了。”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了几个钱，剩下的外币，都交给了大使馆。

部队实行军衔制后，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具体要求，在外事活动中的讲究就更多一些，有的时候一天要换几次衣服。特别是出国访问，穿礼服的时间多，要求熨烫得平整，裤线笔直。这是彭德怀当时最讨厌的一件事，也是工作人员最感麻烦的一件事。为了礼节符合要求，有时在飞机上就得更换衣服，可当时配发的装衣服的箱子不给作美，礼眼一放进去就给压线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委办公厅管理处向皮件厂定做了一个专装军礼服的皮箱。那皮箱比较大，里面设有挂衣服的架子，衣服之间可以隔开，礼眼熨好

后，挂在衣箱里，就再也压不坏了，随时都可以取出来穿。

箱子做好后，彭德怀仔细地看了一遍，很是满意，说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1957年彭德怀出国访问时，就用上了这个箱子，减少了不少的麻烦。

按规定，回国后这个箱子应交还给管理部门。但因当时正值年底，清退文件工作较多，再者，管理处说过这箱于是为彭德怀做的，秘书孟云增也想留作以后彭德怀出国再用，所以没有及时退还。一天，彭德怀见到这个箱子还放在那里，就问：“这箱子按规定是应该交回去的，你怎么还没有交？”孟云增赶忙答道：“是应该交还，可是我们以后出去还是需要啊！”他听秘书这样一说，马上转过身来，对着他有些不高兴他说：“所以你不还了，不按规定办了。什么工作需要，是你们图省事求方便的需要！”秘书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了，没再解释。彭德怀看他不再说话，又耐心他说：“我说同志呵，你怎么不想一想别人出国也是需要的啊！还是按规定交回去，别人出国时就不用再做了，这就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第二天，秘书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把箱子交还给管理处了。

1955年，我国进口了几台吉斯牌卧车，按当时的规定，分配给彭德怀一台。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都非常高兴，特别是司机和警卫人员，都非常愿意将现用的吉姆车换一下。当向彭德怀报告这一情况时，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换。有一天晚饭后，彭德怀在院中和工作人员一起说笑，秘书见他兴致很好，就顺便提起换车的事：“彭总，中央办公厅通知，你的车要换一下。”彭德怀说：“现在用的车不是很好吗，换什么！”秘书说：“吉斯车比较宽敞，坐起来也比较稳，舒适些。”彭德怀很严肃地说：“配车是工作需要，不是为坐着图舒服，不换！”

以后，工作人员利用车辆检查保养的机会，暂时把车换过来，让彭德怀坐坐试一试。过了几天，彭德怀就问了：“怎么那车还没有检查保养好？”他又一次严肃他说：“这个车我不需要，谁需要就给谁去用。我还是用原来那辆车，催他们快些检修。”过了几天，工作人员只好将原车又换了回来，彭德怀很高兴。

说来事情也巧，刚把旧车换回来，就碰上了到机场送客人的任务，警卫部门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交通部门，彭德怀的车就出发了。到了一个路口，因交警只认吉斯车，不识吉姆车，所以没有及时放行，压了车，几乎误了时间。借此机会，工作人员又向彭德怀提出换车的事，向他说明换车是办公厅的规定，是按工作需要配备的，彭德怀这才勉强地接受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认为工作上不再需要，又将这辆车交了回去。

有一年彭德怀到中南去视察。一天，他应邀来到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家里。彭德怀一进门，陶铸的夫人曾志忙着沏茶倒水，又趁彭德怀和陶铸谈笑之际，到厨房忙着准备饭菜。彭德怀和陶铸谈起来没个完，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曾志进来请求说：“彭总，今天我下厨做了几个家常菜，就请吃了饭再走吧！”彭德怀不好说什么，只好答应下来。

这天的饭菜是极普通的，在不多的几样菜肴中，有一盘甜姜。彭德怀吃了第一口，感到很合口；吃了第二口，说这菜不错；接着，又吃了一口。彭德怀对这盘甜姜很感兴趣，说这种姜做得好，有味道，吃上一点，可以帮助开胃口，增加食欲。这顿饭彭德怀吃得很满意。

其实，甜姜在广州几乎家家都有，户户会做，是极普通的小菜。彭德怀

吃的就是曾志自己泡制的，他们也很爱吃，家里泡了好多坛呢！他们看到彭德怀爱吃，想送一坛给他。为了这件事，他们夫妻之间还有过一番争论呢！事情是这样的：曾志提议给彭德怀送去一坛，陶铸不同意，说：“要送你去送，反正我不送。彭总的脾气你知道，他从来不接受别人送的东西，当心姜送不成，倒把你‘将’在那里。彭总不吃，你兜着回来！”曾志不服气他说：“送一坛自己做的甜姜，块把钱就能买几斤，这算什么呀，你不送我送！”

在彭德怀离开广州之前，陶铸和曾志带上一坛姜，到住地去看望彭德怀。他们谈了一会话，告别时，曾志提过来那坛姜，对彭德怀说：

“彭总，给你带来了一点好吃的东西！”

彭德怀问：“是什么呀？”

“一坛甜姜！”

彭德怀听后，马上认真起来，说：“我不要，留着你们自己吃吧，谢谢你们！”

陶铸看了曾志一眼，意思是说“你看怎么样”，见她下不了台，只好自己上前去解围：“彭总，姜是老曾自己泡的，家里还有好多呢，这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彭德怀看推卸不掉，说：“那就给钱吧！”陶铸和曾志互相望望，说不能收这个钱。彭德怀不依，说：

“姜是你们花钱买来的，你们花钱买，我也应该花钱买。”

陶铸听了，故意把面孔一板，说：“你也不是买姜的，我也不是卖姜的，你买我不卖！”

说罢，三人哈哈大笑起来，彭德怀用手指指陶铸说：“你呀，主意就是多……”

彭德怀有一张很好的东北虎皮，皮软毛匀，纹路清晰，头尾完整，谁一看见，都特别喜爱。

这是在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的日子里，中国人民慰问志愿军代表团送给彭德怀的一件礼物。在朝鲜那几年，彭德怀长期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这对当时已经50多岁的彭德怀来说，对他的健康是很有害的。祖国人民为了彭德怀的健康，供他防寒防潮之用，特意赠送给他这张珍贵的虎皮。

老实说，那几年的战争生活，也的确摧残了彭德怀的健康，他的膝关节病，就是那时留下的。回国后，他的病也经常发作，疼痛得厉害时，走路都十分困难。按说，用这张虎皮做一件保暖防潮的褥子，是再好不过的。但彭德怀却没有舍得用，也不给家属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一天彭德怀把秘书叫去，让秘书给何香凝老人去送一件东西。秘书走进屋子一看，原来是那件珍贵的虎皮！他不由得一愣，说：“你身体不好，常犯病，留着用它做条褥子，还是有些作用的。”说完，他怕话的分量不够，打动不了他，又着重补充了一句：“听老人们讲，虎皮褥子是一宝，可以防风湿呢！”彭德怀还是听不进去，微微一笑说：“这张虎皮很贵重，但我需要，还是送给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吧，听说她近来身体不好，她比我更需要。”

秘书来到何香凝老人的住处，说明了来意，老人说什么也不收，让他带回去，说彭德怀也需要它。秘书把彭德怀临来前说的话告诉老人，老人不再说话了，只见她抖动着双颊，颤巍巍地伸出手，轻轻地在虎皮上抚摸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何香凝老人为了感谢彭德怀，不顾高龄，提笔作画，画了一只猛虎，并赋诗题词，作为对彭德怀的回敬。而可惜的是，这张十分珍贵的画在

十年动乱中被抄走，后来被某些人于 1975 年 10 月，以在社会上下留下彭德怀的任何痕迹为名，连同彭德怀阅读过并有眉批的 62 本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一部分照片等物，统统付之一炬。

195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四周年，也是打败美帝侵略军朝鲜停战一周年。金日成为了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团结，这年秋天，派人专程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些苹果。中央办公厅把这些苹果分送给各位领导同志，其中也有彭德怀的一份，每份有半箱。

苹果取回来后，工作人员打开箱子一看，不禁惊呆了：苹果既大，个儿又整齐，个个红彤彤的，又圆又润，有的还带着绿油油的叶子呢！看了真叫人喜爱。机要秘书孟云增后来回忆说：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又大又好的苹果，过去光听说朝鲜苹果有名，那天是眼见为实哩！而我更惊奇的是有的苹果上还有字，分别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写上去的，而像是“印”上去的。起初，大家都搞不清这些字是怎么弄到上面的，后来经过一番分析，终于搞清了“制造”这些“字苹果”的秘密：原来是先把字写在纸上剪好，然后附在苹果上，经日光照射一段时间，苹果成熟后，再把纸字揭去，由于字下面的部分阳光照射不着，一行浅黄色的字就在苹果的表皮上显现出来了！面对着这半箱苹果，大家都深深为金日成同志的深情厚谊所感动。这哪里是普通的苹果，分明是凝聚着朝鲜人民汗水和智慧的艺术品！

彭德怀平时有一个习惯，凡是公家分送给他吃的东西，他从不自己一个人享用，而是和大家一起分尝。有一次，他把哈密瓜切好请大家吃，笑眯眯他说：“我们家乡有句话，叫‘一个人吃了烂牙腔，大家吃了喷喷香’。”说罢，爽朗地大笑起来。

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住时，有一个小保险柜，里面放着四样他最心爱的东西，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奖章，8 块银元，还有一包历史资料。有一次，警卫部门登记个人保存的枪支时，孟云增将保险柜打开，彭德怀见物生情，给他讲述了这几样东西的来历：

左轮手枪是抗日时期的纪念品。红星奖章，是在中央苏区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他的。他掂了掂那 8 块银元说：“这是在井冈山的时候，分给我的伙食费。那时候官兵一样，长官和士兵分的一般多。”他稍停了一下，说：“别小看这几块钱，这是红军官兵平等的标志，历史的见证。”接着，他告诉秘书，他原先一共攒了 10 块，红军到达陕北时，为了庆祝胜利，花掉了两块，所以只剩下现在这 8 块了。那包材料，里面是彭德怀的笔记本和一些油印的战斗经验总结。其中有一份《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是他 1941 年 10 月 13 日、14 日在北方局党校的讲课提纲，一直小心地用红布裹着。

那红星奖章和 8 块银元，伴随他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岁月：井冈山斗争，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支左轮手枪更是他的心爱之物，激战太行山，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赴朝参战，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彭德怀对这些东西很有感情。有一次，彭德怀让秘书打开小保险柜，他亲自检视这几样东西时，摸摸手枪，掂掂银元，眼睛闪耀着明亮的光。显现出无

限喜爱的样子，想对秘书说些什么，又没有开口。后来，他打开用红布裹着的那包材料，拿起《中国革命战争问题》，动手翻了几页，对秘书说：“革命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可惜这些材料过去没有保存好，喂了老鼠了。”说着，他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在这份材料的首页上写道：“已被老鼠啃了不少，这虽然是素材，但是经验中得来的实际材料。”然后叫秘书把材料包好，放回了保险柜。

彭德怀对于这四样东西，视如家珍，从来不让人动，工作调动时，总是带在身旁，精心保存。但又有谁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强战士、名扬天下的将军所积存的全部“家私”呢！

1959年10月初的一天，

孟云增来到吴家花园看望迁出中南海后的彭德怀。

“家里的东西都搬过来了吗？”瞅着屋里空荡荡的四角，他问道。

“都搬来了。除了书籍之外，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军衣、帽徽、领章；统统上交了，你看，”彭德怀顿了一下，指指身上穿的灰布衣裤：“我现在是真正的老百姓了。”

孟云增听了心里感到一阵难受，不由得又想起了他的小保险柜，于是问：“小保险柜带来了吗？”

“没有。”

“里面的东西呢？”

“那包材料我带来了。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红星奖章、银元和枪，那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还给党和人民了！”

吼虎岭下的虎啸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彻底肃清彭德怀在军队30年来的“流毒和影响”。

毛泽东将这个会议交给了中央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承办。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

很明显，这次会议在庐山就定下来了。庐山的八届八中全会是8月16日结束的，8月18日紧接着召开这次会议，可见当时的气氛是如何紧张了。而彭德怀在庐山吼虎岭下的那声久未闻听的虎啸，还回荡在不少与会者的耳旁：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冲昏头脑喽！”

西北组的会场就设在吼虎岭北面的一幢西式平房里。7月3日开始小组讨论。彭德怀在小组会场中央的一张沙发上，冷着脸，锁着眉，微抬起那张线条四楞四方的下腭，以一股不肯通融，不甘罢休的倔相说了这番话。

“把那些个经验好生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了！也不要埋怨。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经间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毛泽东，认为他不实情，掩饰……

7月4日上午，彭德怀在西北组继续放炮：“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

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

第二次发言依然涉及毛泽东，而且直呼其名了。

彭德怀似乎还是粗中有细。他知道他在批评谁。因此，先把自己擦出来，当众承认犯过四次错误。谁也不是圣人，对谁的错误也不必讳言。然而长期以来，在党内竟形成一个成例：无论任何人，不管地位多高，绝对不敢指责毛泽东犯过什么错误。此党内第一大忌。此忌在解放以后又扩展而为中国第一大忌，这在 1957 年使第一批数十万中国优秀分子在它面前悲壮地纷纷栽倒，从此 20 年不得翻身。这个巨大的封建阴影笼罩了中国大地几十年，以致后来在一场大悲剧终于演完后，人们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还是战战兢兢。

因此，庐山会议 3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评价彭德怀直言“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这句听似平淡的老实话，便可窥见它那光彩！

毛泽东住在美庐，然而美庐沉默着。二楼大套间的灯光照例是天天亮到子夜以后。也不见毛泽东频频召人来谈，只是一个人闷在房里读书。午后，美庐的工作人员常见他或坐在阳台上对着残阳抽烟；或在后面的竹林里独自徘徊；或者绕着长方形的水池踱步。

吼虎岭下那个嘶哑、浑厚的捻熟乡音依然不留情面地频频传来：“农村 4 个月不供油，办得到吗？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意见。你们提了意见没有？抵制了没有？”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国家那样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7 月 8 日晚上八九点钟，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由水静、朱旦华陪同抵达庐山。

贺子珍直到此刻，对这场神秘的安排还毫无所知。自从她 1938 年离开延安去苏联后，中国和她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乾坤扭转的巨变，人民获得了一个共和国，她却失去了丈夫。而她的丈夫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首脑。这种命运的残酷捉弄，对她个人来说固然是终生失悔的悲剧，然而，由于首脑人物的婚姻无论怎样都要带上政治色彩，这种必然性，也由于后来取她而代之的另一个女人极为罕见的阴毒残忍这种偶然性，竟使得毛泽东的这次婚姻的改弦更张，无意之中给中国政治舞台引入了一股潜伏很久而又为祸巨烈的恶，因此，命运便通过这两个女人的更迭也残酷地捉弄了整个中国。这是一种善与恶的更迭。真正的不幸则在于，倘不是几千年封建幽灵的作祟，毛泽东娶一个什么样的夫人又与中国老百姓有何干系？无情的历史偏偏在这样偶然的小事上同中国开了个毛骨悚然、深创巨痛的大玩笑。善良的贺子珍，这年才 50 岁，头发却大把大把地枯白了。她烟抽得很凶。永远无法医治的抑郁症死死地攫住了她。

按照毛泽东安排的时间，水静、朱旦华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美庐。

“你们可以走了。”毛泽东轻声说。而后，警卫员又下来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警卫员说了一句：“你也走。”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又把水静、朱旦华叫来，让她们送贺子珍回住所去。后来，毛泽东说：“看来不行了，她的脑子坏了，许多话答非所问。”

当晚深夜，美庐里忽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江青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宣布她明天要来庐山。这么快，她就知道了？毛泽东再无睡意，起身枯坐到天明……宁静的庐山之夜，头一次伴他捱到尽头。当晨雾已经渐渐稀薄起来

的时候，他才在孤寂中睡去……

这时，彭德怀偏偏踩着露水朝美庐走来。他也整整苦熬了一夜。是写信，还是请求面谈？谈，怕是已生嫌隙，反会谈崩，写，又怕反问：为什么不来当面谈谈？现在他下了决心，找主席谈谈。谁知，他一走到美庐门口，警卫员就告诉他：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对彭德怀和毛泽东来说，今天早晨无疑是失去了一次彻底决裂前的缓和或通融的机遇。撇开历史的必然性不谈，就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秉性而言，这次相遇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26”号别墅里，她也一夜未眠。22年后的突然重逢，对贺子珍刺激太强了。要知道，在那漫长岁月里她是只要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就会昏厥的。这一夜，她在猛烈抽烟和痴迷的回味中，捱到天明。毛泽东说了，我们明天再谈。她发了一夜的誓：明天见他决不再哭。她恨自己昨天语无伦次，她要告诉他，她整整想了一夜才拣出的那些最要紧的话。她要把那隔在他们之间的万恶的空间搬掉。她要告诉他当年离开延安的苦衷。她要向他倾诉在苏联带着娇娇所饱尝的万般艰辛，她要向他叙述解放以后她的苦苦思念。她要再次请求让她回到他身边去。

敲门声把她惊醒。来的人不是水静和朱旦华。她不认识。

“哦。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了。请你也马上下山。”

“怎么？毛主席下山了？他，昨晚上没说呀。他上哪里去了？他说了今天还要见我的呀……”贺子珍急得几乎哭出来。

“组织上没有说什么，贺子珍同志。只说请你马上下山。车子已经停在门口了。”

“组织上？”——她忽然明白了。10年前在山海关车站也出现过这样的“组织上”派来的人。她呆呆地站起来。手哆哆嗦嗦地想去拿烟，又缩回来，慌乱地地理理那一头枯发。她浑身都在颤抖。一滴浑浊的泪水无声地爬上那张已经再也不会抽动的面颊……她和彭德怀一样，哪里知道昨晚传到美庐的杭州电话。如果说，毛泽东在和江青结婚以后曾经多次萌动过同贺子珍破镜重圆的念头的話，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美庐有反应了。7月10日下午，毛泽东把各小组组长召来。对前一段的讨论，他和颜悦色他讲了几点看法，弦外之音是有人在“犯规”了，他出示了“黄牌”。

7月14日晚，雷声、风声、雨声伴着彭德怀写下了他那封著名的致毛泽东的信。

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到美庐。他说，昨天收到彭德怀14日给他的一封信。他已经给这封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带着漫不经心的笑意，夹着香烟的大手，在空中划了个弧形。“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

7月23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西餐厅举行。毛泽东坐在台前，黑色的漆茶盘里，一听“熊猫”香烟，一盒圆筒茶叶。衬着雪白台布，像一幅版画。“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点，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困不着！”

他的眼球里隐约可见缕缕血丝。一贯高亢的嗓音里有些辟裂的嘶哑声。难道是他的威望还不够？难道是那些批示还不够明白？难道是那么一些人故

意装糊涂？康生此言极是：“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彭德怀同志拉光了！”现在又出来一个洛甫同志！好哇。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好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些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样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的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那也要灭亡的。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这种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谈锋越来越凌厉。“众神仙”鸦雀无声。空气近乎凝固。动摇、立场、方向问题、垮台、右派……这些可怕的政治术语，在当年就像鼠疫和霍乱一样令人不寒而栗。在南宁会议就说过周恩来他们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这次讲是30公里，似乎还是嘴下留情的。但凡是一沾上“右”字，性质就严重了。

“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600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也觉得可行。我6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毛泽东谈到这里哽咽了。全场一片肃静。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

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也会像 1927 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如讲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 1070 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戛然而止。

第二个谁讲？全场在失去了知觉般的盼望。一个巨大的心理磁场，仿佛把人们都钉在原地。然而，毛泽东宣布散会！

27 日，毛泽东的秘书，把彭德怀引上了楼。

他走到会客室的门口，立即愣住了。靠窗的大沙发，坐着毛泽东。左右的单人沙发，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在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毛泽东对面的墙根旁的沙发，是空的，显然，是留给彭德怀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和彭德怀谈心，而是在山的所有常委。情况比彭德怀预感还要严重。

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

“老彭，你怎么也抽烟了？”毛泽东的眼神显出真实的惊异。“抽我的。老彭。”

这是决定彭德怀命运的关键时刻。先听！先听！彭德怀的右手的大拇指甲，使劲地掐了一下左手的“虎口”。这个穴位能制怒。从北伐战争起，他就晓得这么点中医知识。

“……我和彭德怀同志共事 30 多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你呀，北戴河会议不讲，郑州会议不讲，上海会议不讲，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没有机会了，就下战书了。……”毛泽东任随他的意识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奔逐。

坐在他沙发后面的两位秘书，不作记录，只用一双耳朵听。彭德怀惊异地注意到这个细节。他迅速地环顾四周。没有录音机，他相信自己看得真切、细致。

常委们按照他们的法定次序一个个地批判彭德怀。

“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林彪把批判推到了崭新的阶段。

“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跟赫秃子说了些什么话，你们找翻译调查嘛！”他忍不住了，嗓门渐大。

“老彭，你是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毛泽东正色道，“憋了那么久的气，这次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

“主席，为什么不允许我对问题有个认识的过程？去年，北戴河会议，我也赞成了共产风。上海会议，我才提了浮夸风的问题。这次给你写信，丝毫没有恶意嘛。”

“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

“我——”彭德怀猛地站了起来，扯开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他完全失去控制了，脸色铁青。

毛泽东停住了手中的烟，面不改色。

常委们都没料到彭德怀会说出这等粗话，惊愕了片刻，随之纷纷严厉批评他的态度。

彭德怀又坐下了。意识一片空白，浑身血液都仿佛开锅似地要从嘴里喷出来，他用抖得很厉害的手指夹着烟去堵。一切对他都不存在了……。

彭德怀的这句粗话，作为他“记仇”的一个证据，永远刻在毛泽东的记忆中。反过来，毛泽东则比他“记”得更结实。

事隔三年，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事隔五年，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重提此事：

“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不是说，你们骂了我40天，我也骂你们20天。”

彭德怀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回忆道：“隔了两天，浦安修同志到了庐山。她是自己跑到庐山度暑假的，并不知道庐山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时，还嚷嚷着到处去走走看看。第二天早起，她的眼睛红肿着，什么话也不说了。彭总的办公室主任正式通知我，首长犯了错误，会议正在解决他的问题，要更好地关照他的生活起居。”

其实，浦安修并不是自己跑上来的，而是由当时的中办主任杨尚昆悄悄安排的，毕竟20多年前在长征中，杨尚昆是彭德怀的新三军团政委，即使在今天这种非常时刻，他也还是要给落难的老战友委婉地送去一点安慰。

军委扩大会议

中南海怀仁堂的军委扩大会议首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彭德怀、黄克诚到了会，依旧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做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然而，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即使发言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是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人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意见书”的某些言辞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很多人在私下闲聊时议论：就这样走走过场算了，别磨蹭了，下面还有很多事等着于呢！

将军们的想法太天真、太善良了。在流血的战场上，他们个个谋多智广，英勇善战；可是在“不流血的战争”上，他们幼稚得像新兵蛋子。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遭透了”，“彭

德怀表面做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的地位翻庐山的案”。康生亲自跑到毛泽东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求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商量会议的进程。

晚上 10 点，中央决定会议延长到 9 月 12 日，人数由原来的 140 人增加到 1061 人，另增 508 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据此，军委发出紧急通知：大军区级干部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及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司、政、后也要各来一名干部参加；总参各部、局来一名正职干部参加；军委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全部参加。

与会者统统住在前门饭店。会场除怀仁堂以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拉线广播。两个会场统由大会秘书处管理。秘书处设有秘书、简报、警卫、总务四个组。罗瑞卿担任秘书长，谭政、肖华担任副秘书长。

大会要求参加会议人员务必一天之内到齐，22 日正式开会。

8 月 21 日，是大会秘书处人员忙得透不过气的一天。

一下派出 18 架飞机飞赴各地，将大会代表接到北京。秘书组组长邵英和总务组组长高克恭分别坐镇飞机场和前门饭店。飞机场，飞机飞起落下，落下飞起，往返不停，换人不换机；前门饭店，汽车此进彼出，彼出此进，犹如穿梭，换人不换车，以致闹出了互相接错代表的笑话。

8 月 22 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关于彭、黄、张、周的座位安排，曾有人提出单独在主席台前另摆上椅子让他们坐。许多人认为这样不妥，这样有法庭审讯的味道。经过一番争执，最后确定让他们坐在主席台前排的两侧。怀仁堂，彭德怀在右侧，黄克诚在左侧；紫光阁，张闻天在右侧，周小舟在左侧。

大会内容没变，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是彭、黄、张、周做检讨。

会议以小组讨论与大会批判结合着进行。

小组以每个大军区、军兵种、总部划定。

总参谋部与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成员有：副总长和各部、局长；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处长。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使大家的认识尤为深刻：

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去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 1 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他说：“少说 1 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

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是 18 亩地的稻子移到 1 亩地里，小孩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太阳灯！如此弄虚作假，一下子打破了报纸宣传的神话。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腩的“儿童团”。不到 10 分钟，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是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当即下令把“队伍”轰走了。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给他的棉籽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就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里漾出泪光，“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

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问题，“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起来。

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吧！”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做，恐怕会招来麻烦啊！”

“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万毅，一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职业军人，一位部长，一位中将，在那样的形势下，敢于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良心，确属难能可贵。然而他面对的是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决策人物，其行为无异于人们惯常引用的两句俗话：“拿鸡蛋碰石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失败是注定了的。他的言行早被密切注视。他刚一“表演”，一场灾难迅即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

与此同时，邓华上将又出场了。这位沈阳军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是彭德怀的助手，直接同彭德怀共事几年，深知彭德怀的为人。他终于按捺不住正义的冲动，直率地替彭德怀说了许多好话。结果，遭到严厉批判，勒令他立即写出检查。

抗美援朝时的副司令员，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被作为“彭的同伙”而点名批判。

接着，一个又一个“彭德怀的小爪牙”被列入名单。

会议的气氛变得愈加消沉而紧张。很多人恍恍惚惚，神容憔悴，胆颤心惊。他们为败北者的悲哀而悲哀，痛心疾首地议论着：耍枪杆子的斗不过耍笔杆子的，搞战术的斗不过搞权术的！

在一期大会简报上，登出了某军军长唐金龙揭发的“20根黄瓜”事件，成了攻击彭德怀“伪装朴素”的唯一炮弹。唐金龙在揭发中说：此事有人证，当时经办者是西北野战军四科科长高克恭。

被编在总参小组的高克恭借故自己是大会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参加小组会。当他得知此事去申明时，“20根黄瓜”事件已经上了简报。他怒不可遏地骂起来：“你唐金龙知道个屁，你唐金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王政柱都可作证！”

他找到大会秘书处，讲起“20根黄瓜”的由来：

1947年夏，西北野战军以强有力的攻势，迅速收复了马鸿逵匪部侵占我三边的全部失地。7月13日，野战军司令部进驻靖边县的张家畔，决定后天在此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要王政柱副参谋长与管理科的同志分头准备一下。

战争年月开会，准备工作很简单。王政柱找到科长高克恭商量：“近来部队接二连三地打仗，指挥员们很辛苦。这次开会应该把生活搞得更好一些。”高克恭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伙食改善问题包在我身上，明天就让炊事班的同志到街上看看。听说这里的羊很便宜，买上一只，让来参加会议的首长们尝尝荤。”王政柱马上提醒说：“但要注意，可不能搞得过分了，不然我们在一号（指彭德怀）那里准也过不了关。”

一大早，炊事员杨应国就上了街。他先买了一只羊牵了回去，然后又到街上转游，看还能采购一点什么。转来转去，街口摆的一筐黄瓜吸引了他。他想买几根做凉菜，可又怕首长批评。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高克恭走过来了。他便喊道：“科长，你快来看，这儿有黄瓜。”

高克恭上前一看，果真是一筐又嫩又鲜的黄瓜。一问价钱，每根要两千边币。

“噢，就是贵了点，两千块差不多能买半斤小米呢。”高克恭自言自语他说，“买回去非挨一号的批不可。”

高克恭犹豫了。

杨应国把嘴咂得老高老高。

高克恭不由自主地绕着这筐黄瓜转了一个圈，心想：撤出延安快4个月了，上上下下谁吃过鲜菜？我这个管理科长不能让首长们顿顿啃窝头嚼辣椒、吃洋芋蛋嘛！”再说“一号”常常闹便秘，没有丝毫“优待”，也太说不过去了。他咬了咬牙，对杨应国说：“好！买上20根。但要注意，在开饭之前绝不能让彭总看见。”

杨应国当即买下20根黄瓜，细心地用围裙包好，紧紧搂在怀里，高高兴兴往回走。为了“避嫌”他绕道进了司令部所住院子的后门。真不凑巧，偏偏一进后门就碰上了彭德怀。

“你抱的什么呀？”彭德怀问。

“……”只有十七八岁的杨应国慌了手脚，想跑不敢跑，想溜溜不掉，不会捣鬼也不敢实说，只好呆呆地站在那里。

彭德怀一眼就看出了围裙里一定有什么名堂，走过去扒开一看：“噢，黄瓜！哪来的？”

“首长，这、这……”杨应国“这”了半天，还是答非所问，“您看这黄瓜好吗？”

彭德怀急了：“什么好不好，我问这黄瓜哪来的？”

“买的。”

“多少钱一根？”

“两千块。”

“啊！”彭德怀听罢气乎乎地扭头就走，嘴里念叨着：“两千块一根，一根两千块，哼！真舍得呀，摆啥子阔哟！”

彭德怀以为这件事是炊事员小杨办的，当天没有再作深究，而在第二天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他却做了自我批评：“你们常说我彭德怀艰苦朴素，可是，我昨天一下子就买了20根黄瓜。一根多少钱呀？”他举起左手，伸出两个指头，重重地摇了摇说。“一根两千块。20根要多少钱呢？4万块。同志们，一下就花了4万块钱啊！难道我不应该检讨吗？”

王政柱一直和参谋长张文舟为会议准备材料，统计数字，不知道买黄瓜的事。彭德怀这一番自我批评，使他和大家一样莫名其妙。他用目光在会场里搜寻高克恭，只见高克恭满面通红，耷拉着脑袋坐在后头。他一下明白了：肯定是管理科又捅了漏子，彭总在替他们做检讨。

这时候，彭德怀继续说道：“同志们，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老百姓舍得吃黄瓜吗？舍不得。那我们这些人就应该吃吗？战争打得这样苦，二纵队过沙漠的时候就渴死了人。我们应当多为战士们想想嘛！应当多为老百姓想想嘛！多浪费一分钱，我们都应该觉得惭愧！”

听到这里，王政柱不由想起1943年随彭德怀在晋东南抗击日寇的日子。一天，彭德怀把没收汉奸和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一点黄金交给他，对他说：“陕甘宁边区遭受敌人封锁，经济十分困难。你回延安一趟，把供给部保存的这点黄金带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吧！这是前方将士从日本鬼子和汉奸手里夺回来的，你一定要安全带回延安，交给党中央、毛主席。”

“黄瓜”和“黄金”，在王政柱脑海里翻腾着。他责怪自己事前不精心，检讨应该由自己做。

开饭了，管理科的同志帮助炊事员把蒸好的黄米饭，炖好的羊肉菜汤搬到院子里。每个组还有一小盘凉拌黄瓜。彭德怀招呼大家吃饭的时候，看到盘子里的黄瓜。又说起来：“我们在陇东、三边走了一大圈，确实够辛苦了。今天大家到这里开会，改善一下也是可以的。吃点黄米饭，喝点羊肉汤，也就很不错的嘛，偏要搞什么黄瓜！战争年月不是讲口味，图新鲜的时候。我们的革命还没有成功，还需要艰苦奋斗啊！”

“这就是‘20根黄瓜’事件的前前后后，这才是事实真相，我敢用我的脑袋作证！”高克恭极力向秘书处的同志申辩。

有些好心人劝他：“老高啊，你没看现在是什么火候？你呀，还作什么证呀，就老老实实搞你的后勤服务吧！”

高克恭，这位来自黄土高原的憨厚、爽直的硬汉子，怎么也想不通。他借故有病，离开了会务组。

几天的小组讨论收效甚微，会议的气氛凉了下來。这样下去如何收场？

于是，各小组集中，进行大会揭发批判。批判会采取自由发言的形式，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由谁发言及发言内容均经过了周密的准备。

在庐山会议上被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人追逼的问题，不仅在这个会

上再次抖露出来，而且这帮“左派”又抛出许多本末倒置、耸人听闻的“旧事”。

“彭德怀的井冈山突围，违犯了毛主席的指示，不要根据地，实行逃跑主义！”

彭德怀在追忆了突围经过后，说：“我看把这个事件作为我一条罪状的人，对根据地如果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毛主席旗帜反对毛主席。按照你的逻辑，只能死守，不能突围，直到把自己拼光了，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你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怎样才能创造根据地？如何支持根据地的斗争？你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却随声附和地大骂别人反毛泽东思想，我看你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投机分子！你呀，谨慎点吧，防止哪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

彭德怀以雄辩的事实，对诽谤者的各种诽谤一一给予了驳斥。参加会议的许多将军们无不感慨：这位元帅雄风犹在，丝毫不减当年！他为共和国的诞生所作的卓著贡献令全世界瞩目！且不说他在长征中四渡赤水，二进遵义，攻占天险娄山关等战役，使围追堵截的敌人闻风丧胆的赫赫战功，单就他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机智地救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性命这件事，也足使我们这个素有“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传统的民族中的“受恩”者报答一辈子。更何况连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赋诗赞颂：“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

多么富于戏剧性啊！揭发批判会，变成了别开生面的故事会，变成了传统教育会。它使不太熟识彭德怀的人对彭德怀有了深刻的认识，使熟识彭德怀的人对彭德怀有了新的认识。使误解彭德怀的人对彭德怀有了正确的认识。

然而，批判会还要继续开下去。

批判会的气氛突然变得灼热起来。其形式由开始的“对话式”，变成了“审讯式”。一阵阵的“轮番轰炸”，一次次的“重点开花”，使得彭德怀根本无法说话，刚要开口，就有人高呼口号：“彭德怀你不要再欺骗我们了！”“你不老实坦白，休想过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历史和现实的画面在彭德怀眼前交织，在与会者眼前更迭，由清晰到模糊，由模糊到清晰；然而，历史和现实在颤吟，在淌血……

彭德怀如骨鲠在喉，虽觉不吐不快，但却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居心叵测的“理论家”陈伯达经过精心剪辑和杜撰，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庐山与彭德怀的谈话和会议发言罗列起来，以此证明“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的，并且还在继续招兵买马，发展‘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并一再追逼彭德怀交出“军事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名单。

彭德怀气愤已极，一股遏制不住的冲动使他坐不下去，“啪”地拍响了桌子：“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庐山上中央已确定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三同志是成员，我服从中央决定。要是现在还有人愿意报名，那就上来报名吧！有吗？谁愿意呀？快上来呀！”

会场出现骚动。

有几个人马上奔到他跟前：“彭德怀，你激动什么？！”“你这样太不严肃了！还是冷静些，老老实实交代吧！”“你这样顽固没有什么好处！”……

是规劝，是恫吓？

彭德怀脱视了他们一下，把脸转向一边。他努力使自己再度沉默下来，而被割断的呐喊却在膨胀的胸隔里鼓荡着回声！

吴法宪抢着发言。这个“文革”中成为林彪死党的矮胖子，当时任空军副政委。

他双手抱住麦克风，像操持一尊重炮。会场上响起一种经过放大的鼻音很重的瓮声瓮气：“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

一语既出，全场惊愕！人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他。

吴法宪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

这时林彪气冲冲地喊了起来：“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

“胡说！”突然台下响起一声严厉的呵斥，宛如庞大的乐队里一支长号跑了调，把某些人精心设计的一首协奏曲搅得七零八乱。全场无不震惊，齐把目光集中到说话者身上——噢，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

钟伟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事儿！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队伍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帐，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

他嗓子暗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议论鼎沸。

钟伟的发言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各色人们的心态：有的人因谎言被戳穿而恼羞成怒，惊恐万状；有的人抒胸中不平之气，深感痛快淋漓；有的人为自己的懦弱而愧悔交加，无地自容；有的人把敬佩的目光投向钟伟，手里却又捏着一把汗。

然而，时间留给人们思考的余地并不多，局势正在急转直下。

钟伟发言过后不到5分钟，只见总政保卫部一位领导干部奉命率领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卡”的一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了会场，直到他被押出去很远的地方，仍能听到他的高呼：“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彭德怀的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站起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为他鸣冤叫屈，打抱不平！他用崇敬的目光将被逮捕的钟伟送出了会场，直到那刚武不屈的身影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他们要把你押到哪里去呀？钟伟啊钟伟，你可要珍重啊！从此以后，彭德怀一直在心里念叨钟伟。遗憾的是，自从这次会议之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彭德怀当然也就再无机会见到钟伟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钟

伟事件”才得以平反，钟伟则于1984年逝世。

“钟伟事件”被很快平息了，但它给会议带来的影响久久不能消失。

不少人私下议论：庐山是彭、黄、张、周，北京是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会议再往下进行，是否还要再揪出几个呢？事态发展实在难以预料，就看谁撞在“枪口”上！

为了挽回“钟伟事件”的影响，林彪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讲了一番话：“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么。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还是早发现、早爆炸的好！我劝那些没有来得及响的‘定时炸弹’们，还是早点暴露出来的好，等到识破了，控出来了，那就只有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肃清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及其反动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

“……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与他们的决裂，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一刀两断！你感情上恨不起来，认识就上下去，觉悟就提不高。我们要牢牢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要以为蛇冻僵了，就不会再伤人，等它得到恢复的时机，它就会更加恶毒地咬你一口！”

林彪的话既是一种煽动，也是一种威吓。他要用铁的手腕使大家在感情上对彭德怀恨起来，对他林彪敬起来。不然，他的施政纲领就不会有人接受。在座的是全军的要员，征服了他们，就统帅了全军。如何征服？最灵验的一着就叫“控心战”。

他十分清楚，尽管还没有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但事实上他已经当上了国防部长，全面主持军委工作。可惜他的权威不够，他长期给人们留下的弱不禁风的病人形象一时不易抹去。

他当然记得：1950年，朝鲜战争吃紧，中国政府决定派兵援朝抗美。在毛泽东的“点将牌”上，就有他林彪的名字。恰在此时，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什么病呀？答曰：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怕……竟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就为这，他在北戴河的别墅选了好几处，非要找一个看不到海水、听不到浪声，但又有着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不可。他的住室窗户，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光、挡住风，空气要进行过滤。外人进邸，必须经过紫外线消毒间方可入内。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人样子。

他的“病”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你不去朝鲜自然由彭德怀去，治病要紧嘛。并一再指示负责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将军组织专家对林彪身体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林彪一见到傅连璋便呻吟道：“傅部长呀，我活不了啦，你要救我呀！”

鉴于林彪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傅连璋组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专家，给林彪会诊。肖华还代表党中央参加了会诊小组。会诊前，林彪特意让叶群出面找傅连璋，暗示他最好先给林彪开一个疾病证明。作为从长征时就担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傅连璋，当然不能苟同。经过专家们对林彪身体各系统的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主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只是

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他吸毒成癖有关。会诊后，傅连璋将林彪健康情况向叶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让林彪多晒晒太阳，多散散步，多呼吸呼吸室外的新鲜空气，并要多吃些蔬菜和水果，多喝些茶水。傅连璋还亲自劝告林彪：若要长寿，请戒吗啡啊！

事后，傅连璋把会诊结果如实地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婉转地告诉毛泽东：林彪钻进“白粉”里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实，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恶习。借此机会，毛泽东特地抄录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为戒。

林彪装病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败露了。为此，他对傅连璋恨之入骨，他要找机会陷害傅连璋。后来，机会终于找到了——“文革”中，林彪死党邱会作给年逾古稀的傅连璋将军戴上了“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帽子，说“傅连璋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林彪副统帅患病时，不给药吃，还威胁。陷害林副统帅，手段何其毒也”！紧接着傅连璋的家被抄，人被斗，作为一个凭人道和医术终生行医的傅连璋，却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景况。信中写到：“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他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零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多么催人泪下的信，多么微薄的希望，多么可怜的请求！此时正忙于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也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他在傅连璋的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可是，整天手摇语录本的林彪、邱会作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置之不理，傅连璋也根本得不到毛泽东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谓的“群众义愤”下，傅连璋将军肋骨被打断，头被打破，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熟睡”在监狱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其实，从另一种角度看，林彪又十分“感谢”傅连璋：是你傅连璋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信息，我林某人是装病，也就是说，我在待价而沽。

于是，在党内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出现严重分歧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找林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林彪曲意逢迎。毛泽东找到了知音。毛泽东决定让林彪重振雄风，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泽东小14岁——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学生”。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向权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径”！

于是，林彪异常卖力地组织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要树一树自己的权威，他要拉起队伍，他要扫除晋升路上的障碍。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

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

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

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浓气氛！”

毛泽东的话通过林彪那拿腔拿调的嘴，再通过扩音器的特有效果，更显得声色俱厉：

“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路线‘错误严重’，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会主义的晴朗天空，吹得乌云翻滚，一团漆黑！”

“毛主席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将军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话里哪些是毛泽东说的，哪些是林彪说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泽东说的如何，林彪说的又如何，不都是坚决执行吗？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严。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想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竽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好，如影随形也好，千万当心，别走了神，别跑了调，别错了节拍。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做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向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衷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革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但刘少奇在讲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几位元帅的发言并没有从“高度原则”进行大批大轰，是将几十年来彼此间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理解数叨了一番。他们的大半生都泡在了战场上，他们互相间的争论都是讲打仗，讲哪一“炮”放得不响，哪一“车”踏得不是地方。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做了检讨。这个检讨被印发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陈云是唯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他以无声表达着自己意念。林彪向毛泽东报告说：陈云简直像一尊瘟神，不言不语，可眼睛很怕人。毛泽东说：“他总以为看得很远，顾前瞻后，一贯右倾。”

古人云：悲莫大于无声。陈云的“无声”不仅申诉悲凉心境，更多的是抒发忧患意识，无声中凝聚着信念、力量和使命，燃烧着炽热的希望和永无穷期的探寻精神。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即将接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这位性情耿

直的大将，一听到“彭德怀反毛主席”的消息，神圣的信仰不容理智的大脑略加思索，当即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正确！”于是，为了查出彭德怀、黄克诚的“军事俱乐部”，他将随同彭德怀出访八国的王树声、张宗逊、肖华、杨得志、陈伯钧、陈熙、张学思、路扬、朱开印等人召集起来，想从出访八国的角度揭开内幕。他形象地比喻说：彭德怀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魏延，毛主席是军师诸葛亮。魏延脑后长有反骨，诸葛亮知道此事，临终作了安排，防止了魏延叛变。彭德怀脑后长没长“反骨”，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趁自己还健在，必须尽早采取措施，解决彭德怀的问题。

可是，揭来揭去，一无所获。罗瑞卿感到怅惘，他信仰的支柱在震撼中发生倾斜：难道我错了吗？到了1966年8月16日，在报刊上公布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时候，罗瑞卿被作为彭德怀的“死党”一起揪了出来，并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罪名，开始了囚禁生活。这位不谙水性，而为保证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安全不惜半路出家学会了游泳的虎将，此时方大彻大悟：原来彭德怀也是这样挨整的呀！看来挨整的人未必真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勇敢地站到了前面。

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毛泽东接到此信，阅后即作了批示：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

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报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1959年9月9日

9月13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

约8点钟，当与会者来到会场的时候，只见毛泽东早已坐在主席台上了，他那双夺人心魄的眼睛，他那雍容大度的气派，他那富有幽默的微笑，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在刹那间被震撼。会场静得出奇，人们马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屏息静气地等巨人的声音。

毛泽东站起来向大家挥挥手，然后坐下来：“你们来得早，我来得更早，我还没有吃早饭，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就在这儿吃点东西。”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这就证明你们不反对。”毛泽东轻松地笑笑，点点头。

很快，一位服务员端上来半碗稀粥、三块馒头干和一小碟炒辣椒。

在座的人不禁想起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一句口头禅：“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继而又想起“大脑袋”的红四方面军和“小脑袋”的红一方面军（因四方面军人多，军帽做得也大，而一方面军人少，军帽也小，故有此称）在懋功会师时，在举行的宴会上，毛泽东三句话不离辣子。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议，他坚持说，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湖南的辣子。

颇有心计的张国焘倒是听出了话外之音，故用筷子夹起一只辣椒，抛在地上。毛泽东针锋相对地马上夹起一只辣椒，送进自己嘴里。眼下，毛泽东拿起馒头干，夹上辣椒，一边吃，一边讲：

“我这个人专爱吃辣子，可有的人不喜欢吃。人各有志，不必强求嘛。我劝你们几位（指彭、黄、张、周）应该学会吃‘辣子’了，不然怎么知道‘辣椒’是辣的呢？”

“噢！闻天同志，我可没有想到你也参加‘军事俱乐部’了。这下可好，你们搞的是文武合璧嘛！文是张闻天、周小舟，武是彭德怀、黄克诚嘛！听说你们还想把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几位同志也拉过去，这可不行。你们别想着搞阴谋，把我的秀才拿走……”

最后，毛泽东挥舞着手势号召：要彻底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会场的空气变得沉重起来，将军们又都绷紧了渴望能放松一下的神经。

彭德怀木然地坐在主席台上，耳边回旋着这极为熟悉而又陌生的咄咄逼人的声音，呆呆凝视着礼堂顶棚上的水银吊灯——顿时唤醒了几乎每天黎明都能产生的感受：他有早起跑步的习惯，当他迎着东方一抹红艳艳的霞辉奔跑着的时候，只见紫灰色的天幕上，那一颗最大最亮的蓝宝石般的星星正向他，向醒来的世界熠熠闪光。他呆呆凝视着它，心中立刻充满庄严、肃穆之感。就是这颗星，在光芒万丈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首先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点燃了自己，以它全身心的爱，向大地宣告新的一天的到来。它无愧自己的名字——启明星！这时，它会看到茫茫原野之中。莽莽江河之上，有无数伟大而平凡的造物者，正在翘首仰望着它，用山岩一般坚实的脊梁背负起贫穷和艰难，一天又一天地播种着希望！有谁不承认这个民族生存能力的顽强呀！只要有一抔土、一瓢水，就能够活下去，而且永无穷期地繁衍生息。这是洋人和高等华人所无法想象的。据说在太空中能见到地球上唯一的人类造物便是长城——这是这个民族凄楚而悲壮的骄傲！当荒唐谬误、怪诞离奇和盲从蛮干组合在一起，狂热和愚昧便孕育而生，接踵而来的是人的生存本身也成了疑问——多可悲呀，导演悲剧和扮演悲剧角色的人物竟悟不出自己排演的是悲剧！启明星随之黯然无光，它的归宿在哪儿呢？

水银吊灯，启明星；启明星，水银吊灯。二者遥相辉映，相悖相应。当理智促使他从幻觉的缥缈中走出来时，眼前的一片惨白使他感到眩晕；揭发呀，批评呀，铺天盖地的罪名压下来吧！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

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起，使他的视听神经在瞬间的惊惧中断裂了好久：此间台上发生的一切，他毫无察觉——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军，迅速掀起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走出中南海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

这几天，每到黄昏，彭德怀就像幽灵一般在永福堂门前徘徊。他望着眼前这影影绰绰景物，越发感到它们愈来愈朦胧，跟他愈离愈远……

他回到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雾化作各种奇形怪状的猛兽在空中张牙舞爪……

“景参谋，你来一下。”他突然对正在院子里浇花的景希珍大声喊道。

景希珍急忙跑过来，问，“彭总，您叫我有事？”

“我给主席写信了，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彭德怀说，“主席的批示对我很关心，我们毕竟在一块30多年了，他还是不会忘记我的。不过我想，虽然主席和其他同志并没有让我搬出中南海的意思，可我也不能不考虑，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读书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住在这儿给主席、总理他们添麻烦。你去和管理科说一下，我电给尚昆同志写封信，让他们给我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也好静下心来读书啊！”

景希珍偷偷地抹着泪，立即去了管理科。他为这位老人博大而坦荡的胸

怀感叹不已！什么高官厚禄，什么荣华富贵，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过眼烟云而已！只有高洁的品格，只有痴心探求真理的精神，才是永恒的。而这些，有的人是永远做不到，也永远理解不了的。

彭德怀提笔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搬出中南海，工作人员从简，专车换掉，一切待遇该怎么降就怎么降，决无怨言……

三天后，管理科通知，房子已找好，位于后海。彭德怀高兴地在景希珍，綦魁英随从下，和浦安修一起去看房子。

院子十分宽敞，院中有座楼房，靠近北海，风景怡人。彭德怀先是点点头，继而摇摇头，对管理科的同志说：“谢谢你们，给我找了这么个好地方。可是我今后的任务是学习，不能老观赏风光嘛！况且我学习是在中央党校，距离太远了，车接车送多不方便。我看，还是拜托你们就在西苑附近随便什么地方找处房子就行了。”

两天过后，管理科通知说：在西苑的房子找好了，它位于中央党校东面，叫吴家花园。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连看也不去看了，马上向景希珍吩咐：“这个地方好！既远离闹市，又离党校那么近。好！你告诉管理科，咱们很快就搬进去住！”

“彭总，稍微缓一缓嘛，等过了国庆节再搬吧？”

“不，不，很快就搬！”

“那房子里乱七八糟的，也得等收拾好了再搬呀！”

“不用不用，咱们自己收拾就行。告诉他们，就搬，就搬！”

景希珍清楚，他决定的事情是不容改变的，也就只好去告诉管理科。

景希珍刚走，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来到永福堂。他告诉彭德怀：尚昆同志收到了他的信，马上找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随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中央办公厅的决定：彭德怀同志的政治待遇不变，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办公室撤销，可保留秘书1人，组织关系安排在中央党校。生活待遇也不变，仍然配备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参谋、司机、医生、护士、公务员、管理员等9人。

彭德怀听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说：“谢谢了，感谢毛主席和办公厅对我的照顾！”接着又说，“我没病，要什么医生、护士的，到时候有个地方看病不就行了？现在我是闲人了，要公务员、管理员做啥子？免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坚决换掉，现在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也很好吗？”最后他一再申明，希望中央接受他的请求。

谈话的同志只好如实地将他的请求向办公厅做了汇报。办公厅也只好尊重他的请求：人员从简，将斯大林赠送他的那辆灰色“吉姆”车又重新配给了他。

他把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我的情况你们和我一样清楚，这次中央和主席对我十分照顾，配给了秘书、警卫、参谋、司机、炊事员几个人，像医生、护士、管理员、公务员我都坚决谢绝了。我想问问你们有什么想法，愿意不愿意继续在我这儿工作？”

他说话的时候，故意显得很平静，可声调却越来越低。

他们很清楚，首长舍不得他们，他们也舍不得首长啊！特别是在这种时候，他身边亲人很少，夫人浦安修在师范大学工作，只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来；大侄女彭梅魁在医院工作已有个孩子，只有逢年过节或一月半月地来一趟。无形中，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三人便成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在他们面前，他虽是威严的首长，却又像慈祥的父辈。在这种时候，他们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前程而舍下这位蒙受灾难的花甲老人呢？在他们的心目中，他还是以前的彭德怀！还是深受民众敬仰和爱戴的元帅！还是对他们关怀备致的首长！

要说有想法，他们只有一个：老总在部队的职务已全部罢免，已不再是部队的人了，他们留下来，势必也要脱军装，心里实在舍不得解放军这个大家庭。

彭德怀似乎看透了他们的心事，问道：“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我办不到，还可以向中央反映嘛！”

景希珍喃喃他说：“彭总，我们……我们舍不得这身军装……”

这话触动了彭德怀的心：军人，这个字眼在人们的心里是多么威严而崇高！当年自己正是怀着尚武之心参加湘军的。自立下“石穿”之志，就是把枪杆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为穷苦人打天下！戎马生涯几十载，南征北战大半生。如今，人民军队已成为保卫人民江山的铁壁铜墙，作为它的每一分子，怎能不万分珍惜自己的荣誉呢？

他理解他们，就像理解自己一样。

他什么也没说，抓起电话要通了中央办公厅，他把保留他们军籍的请求告诉了杨尚昆。

第二天，军委办公厅将景希珍、爹魁英、赵凤他三人叫了去，很明确地向他们传达了军委的意见：他们的工作性质不变，隶属关系不变，仍归军委办公厅管，享受军人的待遇。

三人回来见了彭德怀，都激动得痛哭流涕。

“有道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还是拧在一起了。好，我们现在就行动吧！”彭德怀欣然下了令。他和景希珍一起负责收拾家中的东西，爹魁英负责收拾办公室遗留的文件和资料，赵凤池负责搬运。

景希珍把彭德怀的元帅服从衣柜里取出来，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啊，元帅！这是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毕生为之奋斗为之攀援为之献身的最辉煌的宝塔之巅啊！可它却捡不来要不来争不来换不来。它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在于它是文韬武略、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结晶，而与无德无才的平庸之辈，鼠肚鸡肠的宵小之辈，狗苟蝇营的奸邪之徒根本绝缘。

“景参谋，怎么愣在那儿？快收拾嘛！”彭德怀哪里晓得他的部下在为“元帅”感慨不已啊！

景希珍把他的元帅服、常服以及所有的布、呢军装，佩戴的军衔、勋章和所有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全部整理好，摆满了几桌面。

“怎么，要搞展览哪？”彭德怀扭头一看，嚷道。

“这些东西开个博物馆绰绰有余！”景希珍一本正经他说。

“你想得多美哟，”彭德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但马上消失了，“哎！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不要了，统统上交！”

尽管景希珍要多不忍心有多不忍心，要多不情愿有多不情愿，要多舍不得有多不舍得，但也只好在彭德怀的监督和强迫下，把东西一件一件装入箱子。什么照像机、狐皮大衣、长筒皮靴、名人字画，还有金日成和其他国家首脑赠送的珍贵礼品，中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一件一件统统不留，统统上交！

当景希珍把那支彭德怀十分心爱的猎枪取出来时，彭德怀接过来，思忖了好大一会儿，说：“早就答应给胡子（指贺龙），怕现在给他也不合适了，哎，上交吧！”他连看也不看，把枪递给了景希珍。

“现在不合适，等以后再给嘛。”景希珍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彭德怀。

“不，用不着了，上交！”他坚决地挥挥手。

景希珍无奈，将枪装入箱内。

当景希珍和赵凤池把装满一车的物品送交管理科后又返回来，只见彭德怀正在翻腾他们偷偷给他留下的几箱东西。他把几件好衣服拽了出来，把一些作为布置新居的装饰品也都翻了出来，仅留下他认为最需要最宝贵的一大堆书籍。

他亲自看着景希珍把东西装上车送去。

他回到空荡荡的屋里转了一圈，又发现一个箱子。他马上生气了，抬手把箱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照片。

他拿起一张全家合影，端详良久，自言自语他说：“我这人不好，把全家都连累了……”

他放下照片，走到窗口，凝视着窗外的世界，一缕思念涌上心头：梅魁、彭钢和康白，你们全知道这一切吗？你们也该来了，怎么不来呢？……想着，想着，不觉又自语道，“不来也好，不来也好……”

早已站在他背后的景希珍，似乎揣透了他此刻的心情，默默走到他身边，轻声说：“彭总，要不要我去通知梅魁一下？”

彭德怀摇摇头，强抑着感情的波澜，对景希珍说：“你把照片分一下，家中的留下，其余的也都上交吧！”

景希珍生气了：“上交！上交！还有什么没上交？干脆把我们也一起上交了吧！留下这些照片有啥不好？干嘛硬要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消除掉？”

彭德怀若有所思，一字一顿他说，“把过去忘掉吧，一切重新开始！”

在北京汽车制造厂职工医院，人们都以惊诧而怜悯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腼腆而拘谨的年轻妇女。

若不是厂里传达了中央文件，若不是报纸上藏头露尾地透出风声，若不是消息灵通人士私下传言，谁敢相信——他的伯父、名声赫赫的彭德怀元帅竟成了“右倾反党集团”的首领！

此时，她端坐在医院党委书记办公室里，低垂着头，用不停地滚落在前襟的泪珠代替胸中的千言万语。

已经好几天了，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怎么也想不通，仅仅几天工夫，她慈祥的伯伯、对党忠心耿耿的伯伯、深受人民爱戴的伯伯，竟一下子变成了面目狰狞的罪魁祸首……她简直不敢想下去！她要亲自去问问伯伯，问问伯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人？

“梅魁同志，别哭啦！事到如今，最需要的是冷静、坚强。要相信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书记，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彭梅魁抽泣着说。

“怎么办，一如既往。一人做事一人当嘛！他是你的伯伯，你还应该把他当作亲人看待，这是人之常情嘛！”书记显得很激动。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说来我也算得上一个老党员了，依我看现在党内存在一种危险的倾向，看来还会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彭梅魁百感交集，突然抬起头，直直地看着书记的脸，眼中闪着泪光，

好久才说：“书记，我想去看看伯伯，您说行吗？”

书记态度很明确：“你应该去！”

彭梅魁来到中南海东门。警卫战士看了她的“特许证”之后，示意她稍等片刻，便跑到传达室报告一番，很快又跑出来，对她说：“你可以去了。”

她往日跨进永福堂的门坎，感到空气是温馨的，心情是坦然的，欢畅的。可今日，她体会到一种阴郁、萧瑟的气氛，她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心哆哆直跳。她跨进屋门，一眼看见一位孤零零的老头儿静静地躺在深陷的沙发里，神情木然，睡眼惺忪。她鼻子一酸，泪水充满了眼眶，慢慢地向他跟前走去。

“伯伯……”她控制不住感情，哭喊出声。

彭德怀扭过脸，惊讶地看着彭梅魁。他喉咙里像塞了团东西，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在这难忍的沉默中，他也许在考虑：是告诉她自己受了冤屈，把事情说开去呢，还是告诉她自己犯了错误，让她彻底与自己划清界限？

他让梅魁坐下来。他毅然做出了第二种选择。他明白，他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梅魁和张春一正年轻，又有孩子，不能因为自己而毁了他们！

于是，他开口了：“梅魁啊，我的情况，你可能知道了吧？我犯了严重错误！”

“不，不，伯伯您别说了！您没有犯错误……”彭梅魁哭喊着扑在伯伯怀里。

彭德怀的心碎了，但他还是极力平静他说：“梅魁，你听伯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啊！我只希望你和春一忘掉我这个伯伯，也告诉孩子们忘掉我这个外公吧！从此以后，你们要和我划清界限。我的名誉不好，以免……噢，对了，我就要搬走了。”

“啊？”彭梅魁抬起头，环顾一下空荡荡的屋内，又看到在一边堆放的大箱小包，才明白过来，急急地问：“伯伯，您要搬到哪儿去呀？”

“噢，大概搬到颐和园那边，也就是清华大学那一带吧？”彭德怀含含糊糊地答道。

“具体叫什么地方？”彭梅魁追问。

“……”彭德怀摇摇头。

“您告诉我，伯伯！”

“……”

“伯伯，我求您了……”彭梅魁哭泣着，要屈身下跪。

彭德怀马上扶起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梅魁，你听我说，你以后别再想看我了。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

侄女哭成了泪人。

伯伯也哽咽了。

就这样沉默着，沉默了好长时间。

彭梅魁不愿让伯伯这样痛苦，便擦去眼泪，安慰他说：“伯伯，您老人家以后要多保重身体呀！您搬到那里，要赶快把地址告诉我，我好去看您，您是我唯一的亲人啊！”她又恸哭起来，滚烫的泪珠落在伯伯那冰凉的手背上。

“好孩子，别这样，你们就是不来看我，我这心里头也会想着你们，啊……”他言未尽，止不住老泪横流。

黄昏时分，父女俩依依惜别之后，彭德怀从大门口往回走。

落日的余辉把他那弯曲的身躯投下一个长长的变了形的影子，像一条被困在岸上的长龙；他的面孔被勾勒出一副铜色的轮廓，显得刻板而粗犷；他那黑白相间的鬃发此刻变得丝丝金黄而灿烂。

他巡视着眼前这熟悉的一切，仿佛一下子返回了那和谐充满神韵和情趣的时代。

噢，前面就是新华门了，那矗立两旁的饱经风云变幻的石狮子还是那般模样吧？

当初他与几位领导人来到这里时，他望着石狮子。石狮子暴目怒对。他看了很不是滋味，吼道：“你瞪我干什么？你就会张牙舞爪地吓唬老百姓！我砸烂你！”引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哄然大笑。毛泽东说：这可是镇妖之宝，万万毁不得哟！

噢，这湖水的水多清，不，这海……他至今没想通，皇帝佬儿为什么叫它海呢？就这么肚脐眼大的地方，还要分成什么南海、中海、北海？它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湖，且远不如西湖、太湖，更不及洞庭湖、洪湖、鄱阳湖，确切地叫它什么塘什么坑最好。当然，在这里洗澡倒是件惬意的事。毛泽东会好几种游法，而且那泳姿潇洒极了，使人拍手叫绝；朱德那不叫游泳。两只脚只能打“澎澎”，叫人捧腹，贺龙的扎猛子令人赞叹，大概是他喝惯了洪湖水的缘故……

噢，瀛台，这曾经软禁过光绪皇帝的地方，记不得多久没过来了，也许再也听不到老朋友聚在一起拍棋子的声音了。就在这上面的翔鸾阁或迎薰亭，他多次与朱德“两军对垒”，厮杀得难解难分，相别时两双大手紧紧一握，战友深情尽在其中。以后还能与他对弈吗？

噢，丰泽园！这里曾是清帝行演耕礼之地。据说乾隆皇帝常在园内的颐年堂（原名崇雅殿）设宴赏赐王公宗室，骄奢淫逸，享尽人间福祿寿。而劳苦大众的智慧 and 血汗都凝结在这雕梁画栋处，长廊曲径间了……而今后，毛泽东还要居住这里。他不是皇帝，他是被人民所推举所爱戴的领袖。“领袖”，这是个多么崇高，多么神圣的字眼！只有最充分地代表人民利益，具有最高威望的人才 有资格成为领袖。然而，领袖对自己的权威绝不能滥用。当群众像对过去的皇帝那样山呼万岁时，领袖该怎样对待这种纯真而又愚昧的感情呢？此时，毛泽东在干什么呢？他也许正在菊香书屋读“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也许在即兴挥毫，又一首黄钟大吕般的诗、词问世；也许正在批阅文件，斟酌政治领域、思想斗争诸方面的论著。他太辛苦了，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昼夜操劳，日理万机。在中国，在现在党政军最高领导中，有谁比得上毛泽东？他的雄才大略，他那非凡的政治家的气魄，他那特有的巨人形象，谁不叹服呢？……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 30 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口眼心服！可是，这一次，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逆耳之言？这样可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为了你和党的威望，我只好认错，可我实在想不通啊！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聚？好，我走，我听你的，我要好好读书。我不再打扰你，给你找麻烦了，你可要多珍重啊！还有少奇、恩来、朱德等老战友，你们都要珍重啊！……

9月29日，彭德怀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告别了他居住近10年的永福

堂。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

在阵阵秋风中，他就这样走了，悄悄地走了……

当他对中南海警下最后一眼的时候，他说“再见”了吗？

最后的日子

1965年底，彭德怀结束了吴家花园6年的软禁生活，到四川主持三线建设，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再干一番事业。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一下子又把他打入了灾难的深渊。

1966年12月28日，北京西郊五棵松某部驻地。

汽车奔驰到驻地的一所房子门口。车上下来了一个身穿青呢大衣的人，他入室内，脱了大衣，蒙头便呼呼睡着了。

蓦地，大衣口袋中掉下一本“红宝书”。警卫战士小潘拾起书，打开一看，那扉页上三个熟悉的字赫然在目——彭德怀。

警卫战士每顿给他打饭，如有粗粮细粮两种，他总是先吃粗粮，留下细粮。吃剩的，他总是倒进破搪瓷缸里，下顿再煮热来吃。他的搪瓷缸，既用来漱口喝水，又用来作饭锅。他常端着它对战士说：“我这顿饭有了，不用再打了。”

一盆热水，他常常用几次，先洗脸，再洗脚，然后洗脱下的衣服的头遍。

战士们问他：“你为什么只吃粗粮？”“我没干工作，吃粗粮就不错了。”他答道。

一天，一个战士给他理发，问他：“老头（他们这样称呼彭德怀），听说你过去和林副主席一样大，是吗？”他说：“呵，不不，我可比不上他。他比我强多了，强多了。”“你还蛮谦虚哩，说说他怎么比你强？”“他比我会喊万岁！”

1967年初夏，彭德怀给他曾工作过的四川省三线建设办公室的会计雷文写过一张字条：“会计同志，每月18元生活费刚够交伙食。我的眼镜度数不够了，看书不行了，需要另配，我还需买些肥皂、牙膏，可否每月多给几元钱呢？”

雷文不禁为之鼻酸。可是，她却帮不了忙。她只是一个会计，无法改变上头的有关规定。为此，她直到现在都感到愧疚和痛苦。

彭德怀转而求助于其他人。他请求自己的老警卫员景希珍给他寄书。景希珍将书寄出去了，可书却到不了彭德怀的手上。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亦收到了他的求援信，她给他买了一大捆书和一架收音机，这些东西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1967年初夏，中央文革的代表要来审讯彭德怀。

彭德怀闻讯，非常兴奋，他认真地整理了自己的内务，然后正襟危坐，等待中央代表的到来。他盼来的中央“代表”实际上是造反派头头王大宾。

“中央”派来的代表一拥而上，将彭德怀推倒在墙角，拳脚交加。对彭德怀毒打一顿之后，又勒令他限期交代如下的问题：

- 一、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关系；
- 二、在朝鲜战场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 三、毛岸英究竟是怎样死的……

1973年4月下旬的一天，有人告诉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你伯伯病了。”当她步入一间病房时，四周漆黑一团。原来向着阳台仅有的两扇窗户和门上的玻璃全被蒙得严严实实的。

伯伯告诉她，十几天前开始便血，起初他不在意；后来，蹲在厕所里就再也起不来了。“伯伯，让我看看你的腿还在不在？”彭梅魁要他站起来让她看。“我起不来，我没有裤带。他们”，他看了看周围神色阴沉的专案人员，“不给我裤带，手表也收走了，连一支铅笔放在我身上都不放心。你看这屋子，糊得好死，他们怕我……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怕我！”

有一次专案人员在接彭梅魁来医院的路上，对她说：“你伯伯又发脾气了，骂人了。我们对他讲林彪爆炸的事，他一直不信，还说我们有意骗他，要引他犯错误，他说：‘林副主席永远是健康的！’”

在专案人员不在场时，彭梅魁悄悄地提醒伯伯：“你再也不要喊他‘永远健康’了，林彪爆炸了，死了，这是真的！”“他们给我讲了我信？”他格格地笑着，“我什么时候喊过林彪‘永远健康’？砍我的脑袋我也不会喊。可现在我偏要喊，气死他们！”他说着，把手掌贴在胸口，比划着喊了起来：“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像个顽皮的孩子那样大笑起来。

1974年10月，彭德怀处于经常性的昏迷之中，靠输液维持着生命。

一天，他又醒过来了，一字一顿地对彭梅魁说：“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他指着被黑纸糊成一片的窗户，挥动着他那干柴般的手臂，喊道：“撕了！撕了！”专案人员没有理会他这一最后的要求，他狂怒地喊叫起来：“呵——呵——”

他挣扎不起来，因为他全身都瘫痪了。他只得用他的牙齿咬着被角，用他仅能活动的右手撕扯着被子，一直把它扯得粉碎，一直扯得自己牙床流血，嘴唇破裂，一直扯得他精力枯竭为止。

第十一章

圣洁的中南海，演出了一幕人间悲剧。增福堂女主人被绑，怀仁堂陆定一蒙冤

增福堂惊梦

4月的北京，正是风和日丽的阳春时节。原来是皇家内苑的中南海，更是一片桃红柳绿，到处鸟语花香。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的住所——院中院“增福堂”，也正群芳吐蕊，生气盎然。那纷纷扬扬沾着人不放的柳絮，吹不尽拂不开，引发了“增福堂”女主人严慰冰的诗兴文思，感到它很像漫天飞雪……

现在恰是农历闰三月，真是艳阳三月飞白雪，不知怎么，她由三月雪，忽然联想到“六月雪”——也就是我国古代著名悲剧《窦娥冤》。这部悲剧以违反自然规律的六月飞雪作为象征，为一个贤惠女性的横遭诬陷蒙受奇冤发出了悲愤的控诉……。严慰冰一扬头，似乎要甩掉这个与眼前景色极不协调的不愉快的联想。谁知这个联想没有闪开，又想起了昨夜二妹严昭的一件事，觉得这简直是个不吉之兆或是难解之谜。

中年丧失的二妹严昭，由于就在中南海工作，身边又无所住，大姐严慰冰就让她来增福堂同住，一来上班近些，二来相互有个照应。多年来倒也平平静静、安生自在。谁知昨夜（1966年4月27日深夜），已睡下的严昭，忽然起床出屋，打开院子里所有路灯，到处寻找着什么。什么也没找到以后，又一个人呆在外头，凄凄切切地唱开了一首不知名的悲歌，本来没有睡着的严慰冰，连忙起来拉住严昭，用自己早年给她取的外号叫道：“二木头，你又发什么傻劲，半夜三更，跑出来唱什么哭调？”

严昭一见她，竟越发动情地哭起来。严慰冰更着急了，连着追问她怎么回事，她这才恍恍惚惚他说：“晚上躺下后，似梦非梦地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哭，声音很清楚，哭得真伤心，我自恃一向胆子大，又想知道到底谁在哭，便独自起来查看，可是满院子都转到了，却什么也没有见到，心里纳闷，睡意全跑了，就坐在外头，好安定一下自己，同时再听听那哭声会不会再出现，坐着坐着，只见冷月寒星，浮云若梦，不由想起自己的孤寂和不幸，便随口唱起一首悲歌，以寄托和宣泄自己的伤情忧思，结果却惊动了大姐。”严昭又说，最近她回到增福堂，总是有点心神不定，院子里有一棵梨树，平时她常为它除草培土和浇水，这几天那棵树正满树银花。轻风一来，素净花瓣纷纷飘落，满院都是一股清香。可是她今天下班回来，见到那棵树，突然产生一种可能再也见不到它的感觉。

严慰冰道：“你别神神道道他说胡话了，自己活见鬼，还要吓别人，回屋睡你的大头觉去吧！”

严昭还固执他说：“说不定真有第六感觉。我总觉得有什么事，好像要出什么事！”

大姐道：“能有什么事？有事也碍不着你，只要有我在，就没你的事，什么事也没有！”

她这话是安慰严昭的，也是给自己宽心的，因为她心里，也感到有“什

么事”了！

1965年人冬以来，她总是摆脱不了一种郁闷烦躁以致想大喊大叫或痛骂什么人发泄一下的心情，她曾暗自找过原因，发现这种反常情绪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形势引起的。自己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丈夫陆定一又是我国宣传文化战线上的负责人，直接间接知道不少情况，从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来，全国思想文化界都被搅得人心惶惶。到了1966年4月，政治气温直线上升，本来只在军队内部发行的《解放军报》，突然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全国的所谓大革命问题，气势汹汹地指手画脚甚至发号施令起来，耸人听闻地宣传党和国家已被什么“黑线”、“黑帮专了政”。那个当年上海滩的三流“明星”江青，正和自己一向嗤之以鼻的林彪、叶群打得火热。他们你唱我和，互相吹拍已令人恶心了，而毛泽东主席又公开首肯了他们合伙搞的一个什么《座谈纪要》。这个所谓“纪要”虽以“部队文艺工作”为名，内容却与部队风马牛不相及，说的全是党和国家的大事，特别是文化战线的大事，并且又是陆定一所管的事。《解放军报》登的那些火药味特浓的文章、社论等等，大都与这个“纪要”有关。这不能不引起人的注意：军报和它后面的人，到底要干什么？这是严慰冰焦虑的问题之一。

使她心烦的问题之二是自家的事。老伴陆定一在2月间招呼也不打就去了外地，并且一去无消息，不仅没写过一封信，连电话都没有给家里打过，以至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作为妻子的严慰冰都一无所知。这大反常也太蹊跷了！她虽然无意涉足政坛，却感到政治之“足”，正在往她家里“涉”。就在这个月，陆定一和她一直尊重和比较亲近的彭真，突然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原来由他主持的有陆定一在内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宣告撤销，他们在2月初一起讨论议定的向毛泽东作的“汇报提纲”，当时已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也通令撤销并收回。加之《解放军报》和它后边的林彪、江青等人的所言所行，无不使她感到，正有股阴影甚至是魔影，向她的头上以下家里，越来越近越沉重地袭来！

严慰冰心想，二妹严昭梦魔似的幻觉，是否也是由此而起的呢？她想不情，更没法说，只得连自己带别人一起胡弄着，连哄带劝地拉着严昭回屋睡觉去了。

她们一觉醒来，已经是4月28日，就在这一天，比他们幻觉和梦魔更可怕的事，果然发生了！

白日被绑架

严昭一早就上班去了。严慰冰所在的中宣部，因为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形势，搅得人无法安心工作，不上班反而眼不见为净，严慰冰也就没去。过两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严慰冰想利用时间把家里收拾一下，准备全家人都回来过节。孩子们要回来，离家两个多月的陆定一，如果回来过“五一”，这一两天就该到家了，她想好好安排一下，享受一次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稍稍冲淡心头的愁云。谁知这成了难以实现的梦想，她所渴望的天伦之乐，再也不会出现了！

将近上午11点，严慰冰正忙着整理家务，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她放下手里的事，过去抓起听筒问道：“喂，哪里？”

“我是×××。”对方答。

“哦，×副部长，我是慰冰。”×××是××部管人事的副部长，严慰冰对他比较熟悉的尊重。他知道陆定一不在家，这个电话显然是找严慰冰自己的，就又问道：“有事吗？×副部长。”

“是这样，严慰冰同——”不知为什么，×副部长随口而出的对对方的称呼，却咽回了后一个字，“同志”不同“志”了。不过严慰冰并未在意，只听对方又说：“是这样，我要去看你，你不要出去。”

严慰冰忙说：“要是有事，还是我去吧，您别亲自来，太不敢当了。”

“不，不，你不要动，哦，你不要来！”

平时说话办事都很稳重的策副部长，今天似乎很急，刚才竟脱口说出“不要动”！似乎下一句就是“举起手来！”严慰冰也没细想，听见对方在电话里似乎尽量用平静的口气继续说：“你不要出去，不要来，就在家等着，我马上就到。”

不等严慰冰回话，那头就把电话挂断了。她奇怪地瞅瞅手里的电话耳机，这位×副部长，今天怎么啦，往日也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为什么忽然要来“看”自己？如果有事可以让自己去，他却要亲自出马，电话里声音又那么急，这都为什么？她本来想自己去一趟，对方却把电话放下了，只得遵命在家等着。她无可奈何地淡淡一笑，搁回了耳机。无心再干别的。随手一一拉平了沙发中和茶几上的桌布，又端来了等客人用的一套紫砂茶具，静候着×副部长的光临。

才过了十几分钟，增福堂院外就响起汽车声，严慰冰听出不止一辆车。一会就见调副部长出现在院门口，却见他又回头向什么人招呼了一下，才一个人走了进来。严慰冰慌忙上前招呼道：“×副部长，欢迎您来，让您亲自来，真是不敢当。”边说边把手向客人伸过去。

谁知×副部长却似乎没有看见她伸过来的手。连通常的问好寒暄也没有，更没有接受她的热情邀请人座品茶。劈头就冷冷他说：“中央组织部找你去谈话。”

“找我？”严慰冰疑惑地问，又暗自想道，就这么点事，电话中也可以说，×副部长何必亲自来，不过既已来了，还得以礼接待，就点点头答应道：“好吧！”又说：“我马上骑自行车去。”

×副部长却说：“不，你现在就去！外边有车——接你去。”

“哦？”严慰冰奇怪了，中组部这么近，干嘛还要用车接？愣了一下又问道：“谈什么，你知道吗？”

“不清楚，哦，不大清楚。”

“怎么这么急，还现在就去？”

“这，也不清楚。”

“到底什么事呢？”

×副部长回头看看周围没有别人，小声吐出半句话：“好像是，你和叶群……”

“和叶群什么？”

“你们——不和的事——吧！”

严慰冰同叶群在特供门市部“吵架”的事，早已风闻中南海和中宣部等中央机关。组织上要正式了解一下这事，是可能也是必要的，但是×副部长却在本来可以肯定的半句话后面，加了一个“吧”字，不由使问题又玄妙了。

严慰冰还是没有再细想，却因为×副部长提到叶群，又引导起了自己的一股气，是需要和中组部谈谈，他们也应该管管这事，就对×副部长说：“好吧，我这就去。”她本想进屋换件外衣，见×副部长一直站着等她，便只掠了一下头发，拉平了衣服下襟，就穿着家常布鞋，向门口让出一步，对客人伸手示意，想请他先走，谁知客人却反过来退到后边，严慰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心想走就走，反正公事公办，不必太客套，她领先迈出了客厅。

严慰冰一出增福堂院门，就见迎面上来两个彪形大汉，很不礼貌地一边一个夹住了她，并且紧紧抓住她的双臂，她正想问×副部长这是怎么回事，却见他低着头连忙闪开，快步一溜烟走了。自己连想什么都没来得及，就被那两个人连推带拽地押向正停在墙根下的一辆黑色小车，她扫了一眼汽车牌号，发现是公安部的车，正想问什么，就被人一下塞进车里，抓她的两个人，一左一右挟紧了她，她突然陷入恶梦中似的，很想挣脱和清醒一下，却听那两人低声喝道：

“不准说话，不准动！”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诱捕”或“绑架”了。虽然她身处国家安全系数最高的中南海红墙以内。

她当时没有想到，那位奉命诱捕她的×副部长同样没有想到，就在他那么认真其事、尽心尽责地完成了任务以后，事隔二三个月，他自己也被揪了出来。

严慰冰出增福堂时，没注意院外还停着另一辆车，等她一被“请”走，那车里立刻下来几个人，冲进了增福堂，对陆、严全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由于他们是公安部的人，较之稍后被称为“打砸抢”的抄家，还是很讲政策的。可是，尽管搜查的专业水平很高，这次却没抄出他们想象中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任何“罪证材料”或“作案工具”，更没有什么“秘密电台”之类。只发现这家最富有的是塞满所有书柜的各种中外古今和文史经哲学书刊资料，此外有陆定一手抄自赏的毛泽东诗词，其中一幅《沁园春·雪》还精裱成中堂式挂轴，不仅显示了书写者的文采爱好，也表明了他对自己领袖的敬爱深情。这次是对陆家的第一次“洗礼”，随后而来的就不再是“洗礼”，而是彻头彻尾的“洗劫”了。不过，这一切严慰冰都不知道了，增福堂的女主人，再也管不了这个家，连她自己的生死安危，都管不了！

打掉“臭架子”

绑架严慰冰的汽车，堂而皇之地驶出了中南海饰有庄严国徽的西门，只拐了一个弯，就进了一个外观毫不起眼的院子。

她被押下车来，一定神就认出这是中南海西门斜对过的××胡同×号，距离那高大威赫的红色高墙，只有100多米，陆家所在的增福堂，离这里也只有常说的“一箭之遥”。严慰冰平时经常路过这院外，只是从未进来过，也根本不想进去。因为她知道，这不是个“好地方”，而是一个设在中南海墙下的秘密监狱，或者叫拘留所。严慰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这里的“客人”。

似梦非梦，半清楚半迷糊的严慰冰，没来得及表示惊诧和发出呼喊，目光却被院子里凡株盛开着的夹竹桃吸引了过去。她是个热爱生活 and 一切美好事物的女诗人，是个充满热情、柔情和温情的女主人。面对耀眼的艳红“桃”

花和青翠欲滴的修长“竹”叶，刹那间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和所在……

“走！”一声怒喝把严慰冰一下惊醒，她被推进里院一间大房子里，一进门只听一声怒喝：

“反革命分子严慰冰，你被逮捕了。”声音带着浓重的河北腔，出自一个50上下干部模样的汉子之口。

“笑话！”严慰冰一抬被按着的头，生气他说：“谁是反革命？凭什么逮捕我？我犯了什么法？”

“你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那河北口音的汉子又说。“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什么？”严慰冰真的觉得好笑，可这又不是开玩笑，便半是申辩半是自语他说：“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又蹦出一个女人憋着嗓子的厉声斥喝。“你，猖狂迫害，阴谋杀害林彪副主席和他的全家，你知罪不知罪？”

“我不知——”没等严慰冰答完这一句，就听那河北汉子一声令下：“搜身！”

几乎同时，一下子跳出四个汉子似的女人，这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至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这四条女汉子对严慰冰仅差开膛破肚的搜查，使她被侮辱得想哭，想喊，想骂人！一股从内到外的透心凉，使她迅速冷静下来，不作任何反抗地咬紧牙关，似乎麻木地任凭那几个好像是女人的人，搜遍了她的全身，又把从她身上剥下的衣服裤子等等，一件又一件，一寸又一寸地摸捏探寻着，连穿来的布鞋底子也撕开作了全面深入和广泛持久的彻底搜索。严慰冰默默地看着她们，连自己都希望她们真能搜出点什么来，以免辜负她们的“辛勤劳动”。可惜，她们什么也没查出。

到底才是4月天，不少人毛衣还没脱，赤裸裸站着的严慰冰，只觉凉气逼人，不由阵阵寒襟，她见身边一张床上有条旧毯子，就顺手拉过，想裹在身上挡挡风寒。谁知没等她将毯子披到身上，忽听那河北汉子一声怒喝：“放下！”

毯子被一下扯去，摔到地上，严慰冰被拽得一个踉跄，双手连划拉几下才保持住平衡，没有摔倒。

那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

严慰冰轻蔑地看了对方几眼，此时此地的她，明明精赤条条，毫无体面可言，竟被认为是在“摆臭架子”。

严慰冰从这一天开始接受连日连夜、无休无止的逼供审讯。审讯人员和看守差役分为每天四班，轮番连续作战。审讯的人员的每次交替时间只有五六分钟空隙，严慰冰连上厕所都来不及，只能抓紧时间啃几口扔过来的冷窝头，不等吞完，下一轮审讯又开始了，她最初还听审讯者的问话，后来慢慢听之任之，以至根本不听也不理了。这一是因为自己又累又困又饿又渴，由无力作出反应发展成脑子完全晕眩了；二是发现他们问来问去几乎毫无新内容，只翻来覆去地追问她一件事，如何“疯狂迫害”和“阴谋杀害”他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和夫人叶群同志”。同义反复，周而复始，这一拨逼她交待，那一伙追她招供，审到后来，她连白天黑夜，天上地下、左东右西都迷糊、混淆和颠倒了。

终于她实在忍受不住了，就朝着水泥墙，一头撞去……！

“血溅”政治局

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陆定一，正在安徽合肥作“调查研究”时，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打给他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回北京，参加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专程来迎接陆定一回京的飞机升空时，他的情绪不由也随之升空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从此走到了顶端。北京等待着他的，不是5月的鲜花和节日的欢笑，而是他根本不会想到的自己“政治上的死刑”！他那温馨的家所在的美丽的中南海，对于他来说，已像一首唐诗所述的：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虽有丰富的想象力，陆定一怎么也没有想象到，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熟悉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中南海及其院中院增福堂里，发生了多少难以想象的事。他的妻子严慰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从中南海的增福堂“此厅中”诱捕绑架走了；连姨妹子严昭，也忽然失踪，正在某个“云深不知处”被“隔离”着。他更没有想象到，自己在增福堂的那个家，已经被彻底砸烂，完全解体，自己回不去了。

陆定一乘飞机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得到通知：“毛主席要你回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那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林彪突然大爆“冷门”，创造了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大“奇闻”，会议一开始，到会者都奉命传阅一份特别“文件”：

我证明

- (一) 叶群在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 (二) 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 (三) 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 (四) 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就是这样一份宜占未闻的“历史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传阅，并严肃认真地进行讨论。这种奇事大概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未必能遇到一次，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一次。

林彪为什么要干这种丑事呢？就在严慰冰姐妹已经被“揪”走以后，叶群几次向他放刁撒泼，逼着林彪要郑重地声明、辟谣，消除影响。林彪于是就给政治局写了那份“庄严声明”。

匆匆飞回北京的陆定一，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赶到政治局的会场，到达时会已开始了。他的视力本来欠佳，进会场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往常之点。

例如他外出“调查研究”前代表中央和他谈话的彭真今天就不在；不该在这里出现的本是他下属的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等人却在场。他更没有注意到，过去开会常常因病或在外地请假不来的人，例如林彪和康生，今天却端坐在会场的中心位置，并且虎视眈眈又居高临下地盯着他，而自己的位置恰恰被排在他们的对面。这些他都没有在意，只是在与先到的同志招呼时，感到反应不够热烈，缺少通常必有的握手问好和亲切寒暄，更缺少一种必要的活泼愉快的气氛。对此他都视而不见，没往别处更没往坏处想，安然地坐在位置上，想静听一下今天会议的内容。

会议在过分沉重的气氛中静默了好一会，坐在陆定一对面的林彪，突然对他气势汹汹又怒气冲冲地，直呼其名喊道：

“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一惊，茫然地抬起头，林彪正怒目而视地瞪着他，由于气得咬牙切齿，把后面的话也给“咬”住“切”断了。隔了好长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道：

“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

陆定一莫名其妙地嘀咕道：“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声色俱厉道：‘你讲，你跟你老婆严慰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你立刻向党讲清楚！’

整个会场内的空气，似乎一下凝固住了。林彪由于说得过分激动和用力，急促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的陆定一，吃惊地看看这位发难者，又看看周围的莅会者，只见有的人忙扭头他顾，有的人似乎在低头沉思，也有人抬头看着他，只是其目光又明显地分为几种：一种是惊异和不安；一种是关切以至同情；还有一种是学着林彪样子作出的气愤状。只是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一声不吭。

陆定一虽然是一位书生，可又是一名长征老兵，革命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乃至急风暴雨，也经过了不止，他很快使自己从林彪突然袭击中镇定下来。他发现对方“火力急袭”的“弹着点”，只在严慰冰写过信这一个“突破口”上，便尽可能冷静地用平静语气解释申辩说。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因为事情的起初情况，并不是——”他抬头示意了一下林彪，接着说道：“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到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他本来还想再说明一点什么，却听林彪突然又尖声嚷道：

“你，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不一定。”虽也能言却并不善辩的陆定一，随口说了一句。面对这位不大顾体面欺人太甚的中央副主席，他不慌不忙地补充了一句不咸不淡的话：

“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说完还直愣愣地看着林彪。

常常不苟言笑比较严肃的陆定一，出人意料地冒出了这么一句看似平常却颇有针对性和又极富幽默感的话，使全体莅会者一齐愣住了，不断传闻的严慰冰匿名信中说的，加上传闻的林彪亲笔写的“处女证明”，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窃窃私议的笑料，陆定一这句颇为幽默的话大大刺伤了这位副主席。

果然，只见林彪的脸，先是气得煞白，接着又因极度愤怒，好像被人迎

面搨了一个大耳光似的胀得通红，嘴巴张了好几下，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像电影“定格”似的，足足僵住了几分钟，然后突然跺着双脚，抬起右手，直指陆定一道：

“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他的右手食指，还应着骂声，勾手枪扳机似的曲了一下。将他意念中的满怀仇恨的“子弹”，全部“射”进了对方的脑门……

人们不由庆幸，亏得中央早有规定，凡是进中南海参加党的高级会议的人，都不准携带武器。不然的话，今天一定可以看到了——一部惊心动魄的活剧《血溅政治局》。

好在当时林彪手里不仅没有真枪，并且有枪也似乎只有一颗子弹。他刚才打出了那一“枪”以后，又卡壳似的哑火了，虽然怒目而视得憋出了一头大汗，那本来“瞄准”着陆定一脑门的手，却抖抖索索地软瘫着垂了下来。而他的仇人陆定一，却若无其事地纹丝不动，似乎正在回味和欣赏着自己刚才那句幽默的回答。双方正僵持对峙进行“冷战”时，半腰又杀出个“救驾来也”的“程咬金”。只听一个山东老垮腔的男中音吼道：

“陆定一，你是个特务！”

被指为“特务”的陆定一，头也没抬，只凭声音就听出此言出自何人之口，他冷冷他说：“康生同志——”

“谁是你同志？”那山东腔又吼道。

陆定一又淡淡他说：“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1942年整风的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

延安整风本来是毛泽东倡导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康生却节外生枝地借口审查干部，利用整风运动将大批干部特别是来自白区的知识青年，诬为“国民党特务”、“汪精卫特务”和“日本特务”等等，冤屈和伤害了许多同志。此事后来由中央作了纠正，但康生当时的所作所为，却给所有亲历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恶劣印象。

“文革”中，康生又故伎重演，不断毫无根据地随口定人为“特务”、“叛徒”等等，以压制和打倒反对者。这时见林彪敌不过陆定一，慌忙祭起他的传统“法宝”，下想陆定一也是过来人，不理他这一套，他便又祭起另一更厉害的“法宝”，重新厉声叫道：

“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

他还要继续“伟大”下去，会议却已经“全场活跃”，无法再开了。康生见自己的：“法宝”治不了对方，压不住人，连忙提高嗓音，挥开了似能置人死地的“尚方宝剑”：

“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

会议也赶紧收场，中止了这场“严肃”的闹剧。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林彪，在康生等“军师”的掩护下收兵回朝了。原是书生的陆定一，虽然仅以轻声慢语就初战告捷连挫“强敌”，却终于胳膊扭不过大腿，不容分辩就被推出了会场。

陆定一是严慰冰的丈夫，当然就是“反革命黑后台”；他是中宣部部长，而中宣部在此之前已定性为“阎王殿”，他当然是非倒不可的“活阎王”了。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又被列为一个新的“反党阴谋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其第一号竟是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的彭真，第二号是与自己很少交往的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第四号是仅有工作接触的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陆定一不知自己列名其间的这个所谓“反党阴谋集团”是怎么“反党”的。有过什么“阴谋”，何时“集”为一“团”，自己又何以列为第三号人物，俱一无所知。

5月23日，当时的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在关于陆定一的决定中宣言：“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9月30日，又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并与已经成立的以“502”为代号的严慰冰反革命案的专案组，正式开始进行“横向联系”。至此，陆定一被彻底赶下了中国政治舞台。就在彭真，陆定一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批从来不务正业甚至不干人事的“党棍”、“文痞”和“投机家”，一齐挤上了我国最高政治舞台，成为红极一时以至主宰一切的政治暴发户。

“陈尸”中宣部

就在林彪、叶群和陈伯达等“开心之日”，陆、严全家“难受之时”，远在陆定一和严慰冰共同故乡的江苏无锡，一个当地驻军政治部的首长，凭着自己高度的“政治嗅觉”，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副统帅”的无限忠诚，忽然主动上书帅府夫人叶群说，他们搞到了一批陆定一、严慰冰在无锡的“罪行材料”，信中还附了这些“罪证”的照片、复制件的说明，写信者说，如果需要，他可以将这批“罪证”实物，立即亲自送来北京，请“副统帅”及其夫人过目。叶群见信喜出望外，当下就降旨宣其晋京献“宝”。

这位“首长”到底献的是什么“宝”呢？原来此人所在的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就在无锡，过去也因当地出过陆定一这样的中央首长而津津乐道，后来风云突变，陆定一出了问题，他的同是无锡老乡的老婆严慰冰，还是“阴谋暗害”“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陆严二人与“副统帅”全家，已成不共戴天的死敌。便灵机一动，利用红卫兵正到处抄家破“四旧”之机，组织人闯进陆定一、严慰冰两家祖籍旧宅及所属七户亲属之家，进行了全面、深入和彻底的大搜查。他们兴师动众地查了个天翻地覆，只找到些旧日的破烂衣物，仅有几件东西似乎有点价值，一是陆定一父亲生前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有的竟画了个有着顶戴花翎、身穿朝服马蹄袖的清代官员；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陆氏家谱”，也多少算是反动遗物；最最重大的收获，是从陆家的破烂家什中，发现了一顶不知哪个年代用过的青布小轿，这都说明陆家确曾是一个“反动官僚兼恶霸地主”。但是仅仅这些还分量不够，又从县政府所存档案中，找到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这才算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铁证”。这批“罪证材料”被集中起来以后，又加进了一些据说也是陆严两家剥削来的“金银细软”以至锅碗瓢盆之类，一一拍成照片，编成目录，由他上书帅府报告，果然一“箭”中标，正投帅府所好。这位首长就带着他的“好马快刀”，用飞机和火车运载着那批“赫赫战果”，奉旨进京投靠林彪来了。叶群对来人表示了热烈欢迎，亲自安排作了高规格接待，请这位首长在

北京第一流招待所洗尘下榻。

陆定一和严慰冰的老家横受查抄，他们在北京中南海内的住所，更是在劫难逃，从严慰冰被绑架走的4月28日起，连续经受了五次掘地三尺的彻底搜查，应该说由公安部执行的第一次抄家，是最为“文明礼貌”的，后来就一次比一次更不“温良恭让”了。一批又一批可爱的革命小将们，一趟又一趟地冲进增福堂来，见书籍就撕，据说那全是“封资修大毒草”，虽然其中既有李白、杜甫和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反动家伙”写的，又有鲁迅、高尔基等革命作家写的，却都沦为同样货色，享受同等待遇。陆定一是个文人，也收藏了几件虽不名贵却也珍贵的陶瓷工艺美术品和古砚之类，“无产阶级”岂能搞这一套，兵里兵郎，七里卡嚓，全都给砸烂摔碎！最令陆家心疼的，他们多年来购买搜集到的几百张京剧名角唱片，也都成为“毒草”“四旧”毁于一旦，这些小将们有的真不知道，有的装不知道，他们心目中最最“无产阶级化”的康生和江青，用强取豪夺和诈骗偷盗等手段，搞到了大批也属“封资修”的古元、文物和国宝，以及更多的老京剧唱片等等，据为己有独自赏玩。但是他是他，你是你，他们怎么都行，你陆定一就不行，就得，“打翻在地彻底砸烂”不可！

叶群、陈伯达等人得到报告，在陆定一的北京住家，也查抄出不少东西，这触动他们，不妨将这几批东西集中起来，让更多的人看看，以便接受现实和生动的“阶级教育”。几经磋商，拍板成交，他们决定将无锡送来的“罪证”材料，加上在增福堂抄家所得的各色“封资修”物品，合起来办一个《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于是，“史无前例”期间的又一“伟大创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的原北大红楼后院，以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命名的“子民堂”揭幕开张了！

在展览筹办过程中有关人员把各种“罪证”材料摆出以后，发现除了重新整理加工过的青布小轿和几纸地契以外有许多展品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仅不能揭露陆、严二人如何“反动透顶”，相反还透露出他们生活相当简朴，不失一个革命干部的优良家风，这样如实展出，岂不是作了反宣传。当他们向帅府及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后，竟获得了完全意外的解决办法，批准他们从国库中借出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绸缎布正之类一起充实进原有的展品之中。这一高招果然取得了强烈效果，展览开幕以后，许多观众看到展柜中陈列的巨额钱钞，特别是那么多皇家才有的金光灿灿的元宝，还有整匹的绫罗绸缎，据说其长度可由中南海一直铺到颐和园。人们看后无不对陆定一、严慰冰这对“反革命”及其“反动家庭”，竟如此“骄奢淫逸”和“穷凶极恶”，纷纷表示出自己的强烈愤慨和深刻仇恨。叶群和陈伯达、康生等人，看到中宣部大院内的展览会场中，每天挤满了各个机关、学校、部队和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来的观众，连外地“革命派”也都派来了参观学习的代表，不由心花怒放，拍手称快，说这个办法等于进一步宣判了陆定一、严慰冰“政治上的死刑”，他们从此更是两具“政治僵尸”，展览就是将他们来一次陈“尸”示众，这是举办这一展览的重大政治意义。

不过，叶群没有注意到，这次展览除了政治意义以外，对于许多“革命派”来说，还有十分实惠和经济收益。原来在展览结束以后，除了那些成捆人民币和金元宝应该归还国库，整匹的绸缎布和大件展品也应“统一处理”，其余全部展品凡是尚有实用价值的，都用内部处理办法折价出售，一件皮大

衣只“卖”10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细瓷花瓶，标价仅为5角。这使一批“革命派”战友大拣“洋落”发了一次货真价不实的“国难”财。这一政治、经济双丰收的“革命行动”，很快就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到处都竞相效法办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罪行展览会”。

上述一切，只是林彪、叶群亲手导演的系列悲剧、丑剧的序幕。以后的部分，许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陆、严全家及其亲属一一被打入黑牢，分别遭受了多年以至十几年的摧残折磨，严慰冰的老母亲、老共产党员过璞同志惨死狱中……然而光明必将取代黑暗，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林彪、叶群一伙终于自取灭亡，葬身荒漠，与他们狼狈为奸并继承其衣钵的“四人帮”也相继垮台，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陆定一、严慰冰等同志这才大难不死，重见天日。陆老当选为党的中顾委常委，严慰冰也重新工作并出版了著作。可惜，严慰冰同志因为身心受伤过重，于1986年3月不幸早逝。但是，他及全家人亲历过的那些惨痛往事，似乎不该随之湮没。发生在那个不正常年代和不正常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事件，不是可以让人看到、感到和想到些什么吗？

骨肉亲情得团聚

1988年春节，北京全国政协团拜会上。

陆定一握近邓颖超座位，把身子贴过去，对着她说了些什么。邓颖超万分惊讶，点着自己的鼻子说：“爱生，你还记得我吗？”陆定一笑着点点头。

“恭喜您啊！整整半个世纪了，总算寻着了女儿！真是喜出望外的悲喜事！我这个外婆总算不空做。下次她来北京，一定要带爱生来中南海见我。”邓颖超大喜，又问：“告诉我，您是怎么找到爱生的？”

陆定一笑着说：“这个秘密，只有我陆定一知道！”

7年前的1980年，陆定一曾找到失散40年的儿子陆范家定，如今又找到了失散53年的女儿“爱生”，岂能不让人欣慰。

邓颖超所说的“爱生”，是陆定一与前妻唐义贞所生。唐义贞与陆定一是在莫斯科相识的。

唐义贞1909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名中医家庭，是家中有了5个儿子后才盼来的掌上明珠。良好的家风和20年代大革命的热浪把她熏陶成一名热血青年，17岁的她在著名的湖北女师求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并被选为女师学生会和妇女会负责人之一。1927年秋天，18岁的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和相互爱慕的陆定一结婚。婚后不久，陆定一国共国际提出要“更新”中共代表团而回国；唐义贞也因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学校支部局”而遭迫害，被开除团籍和学籍。次年秋天回到上海，团中央才恢复她的团籍，派她到闽西苏区工作。

1931年，陆定一进入中央苏区后很快就担任了团中央局宣传部长，与唐义贞住在瑞金叶坪一座庙旁。当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出生了。为了纪念女儿出生的地方——苏区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叶坪，孩子便取名“陆叶坪”。

那时，邓颖超也在苏区瑞金，她非常喜爱正直热情的唐义贞，认义贞做干女儿，义贞则称她为“爱妈妈”。叶坪出生后，“爱妈妈”为她另起了一个亲昵的名字“爱生”。唐义贞便让叶坪称邓颖超为“爱外婆”。月子未坐

完，唐义贞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就抱着“爱生”叶坪上任去了。

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转移，开始长征，唐义贞却因再次怀孕留了下来。这一去一留，夫妻俩竟成了永诀。

两人分别后，唐义贞随派往闽西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毛泽覃以及贺怡、周月林等从瑞金转移长汀。

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唐义贞又一次受到王明一伙的政治打击，被无故开除党籍。可在福建长汀山区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担任省军区宣传部长长的她不顾政治上蒙受的屈辱和即将分娩的身体，忘我地工作和斗争。生下儿子刚满月，她就将孩子托付给一户农家，便毅然返回省军区所在地四都汤屋。

当时，四都红军处境险恶。为摆脱困境，唐义贞和疏散后留下的胡政委、胡营长率队伍寻找主力部队，不料经过马蚊塘大山后，被敌36师的“铲共团”发现并以密集兵力包抄。28日，因寡不敌众，唐义贞等20多人被捕。当天夜里，唐义贞、胡政委、胡营长越狱出逃，但拂晓前被发觉，第三天3人再次被捕。次日拂晓，敌人给唐义贞松绑后，她趁机将藏在身上的一份文件吞下，不幸被敌人发现。天亮后，唐义贞等3人被敌人押到四都赖下坝村外河坎上三棵栗树下枪杀，敌人还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划开了三位烈士的肚子……

陆定一是后来从贺怡口中得知唐义贞牺牲的噩耗的。他当时心都碎了，失眠了半个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再也流不出眼泪。那些时日，他常在延水河畔徘徊，怀念唐义贞，思念不知流落何处的骨肉——女儿叶坪和另外一个不知性别名字的孩子。

陆定一曾把分得遗产的一半用于交党费，一半交给唐义贞的大哥唐义精用于寻找女儿叶坪，可找回的没有一个是真女儿。后来，他又请贺怡设法寻找，也未成功。1946年，他怀念唐义贞，重温贺怡提供情况的日记，又立即写信给邓颖超，请邓颖超代找，可时值战乱，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解散了。全国解放后，他又委托人前往江西赣南一带找过，也不见线索。

原来，当年唐义贞把女儿叶坪托付给了厂管理员张德万，他是一个善良厚道的红军战士，平时就常帮唐义贞照料孩子，她让孩子称他为“好妈妈”。张德万带着叶坪到了农民赖万森家，时近元宵，整个村子闹哄哄的，到处都说白匪要来了。张德万眉头皱成大疙瘩，当年仅5岁的赖普恩还清楚地记得他搂着叶坪的头流泪。三天之后他郑重其事地将叶坪领到赖万森、华灶女面前说：“大哥大嫂，这孩子是我受战友之托带着的。我不能在这儿连累你们，只能把孩子托付给你们收留。说着跪了下去。下午，下着细雨，张德万走时，一步三回头，雨中小叶坪大喊：“好——妈！——妈”。

事实上，叶坪也主动找过不知姓名的父母，但失败了。成年后的叶坪与赖家的儿子赖普恩结了婚。

1956年，地处赣南山区铁山垅钨矿的矿党委书记郭若珊在整理干部档案中，发现矿组织部干事赖普恩的履历表有不详细之处，于是，他立即找到了赖普恩：“小赖，你为什么不填岳父岳母一栏？”

赖普恩被问住了；讲了半日，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了。他最后补充道：“我父亲赖万森已死，要不是这样，可能知道不少情况。”

郭若珊是位南下的东北大汉，半辈子在军营度过的，所以他清楚红军长征前夕，许多德高望重的干部在赣南留下了子女，好些没有下落。他问：“好

好想想，有没有什么线索？”

“我们人同村有一个留下打游击的红军干部赖友江，解放那年，他在于都县政府配合解放军工作。他知道陆定一同志写过一封信到于都，说他有一个女儿有可能寄养在于都，从出生时间等情况看，很像我的妻子。”

郭若珊是个有心人，当即派人找着赖友江作了调查，认为情况属实，当即以矿党委的名义整理了一份材料寄往中宣部陆定一收。

赖普恩也写了一封信。

不久，赣南区党委宣传部奉中宣部指示，派了一名干部来到铁山垅钨矿，与一个姓李的秘书一起去禾丰上库赖家调查核实。同时，请了一个摄影师准备拍摄照片。

叶坪欣喜若狂，拿出最好的土特产，殷勤地接待客人。她翻出过年才穿的衣服，梳好头发，与丈夫和刚满岁的大儿子赖章盛合拍了一张照片，又按调查人的要求，单独拍了一张全身像。

调查人员又依组织的意愿，征集了一些叶坪小时带来的旧物。其中，象牙筷子与一柄医用小刀已经失踪了。衣物也穿烂了，只剩下一只半截小手套，毛线织的，一节蓝一节红。

以后，叶坪夫妻俩便进入了焦灼的等待期，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没有消息。

身居要职的陆老，每天为党为国为民操劳着，闲暇时仍禁不住思念亡妻和一双失散几十年的下落不明、生死不知的儿女。他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同样在焦的地寻找他这个从未谋面的生父……

福建省长汀县民政局退休干部陆范家定有一个特殊的复姓——陆范，有一个特别的家庭——由6个姓氏组成。

陆范家定小时候叫小定，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爸妈范其标、聪秀妹的亲生独子。他不知道，他其实是位女红军留下的孩子。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了，留下部分人坚持在当地斗争。这年11月19日，一位怀孕临产的姓唐的女红军干部被送到福建长汀四都圭田，住进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范其标家中，次日生下一个男孩。

女红军生下孩子后，就做着给孩子断奶的准备。孩子满月那天，范其标带回了敌人清乡逼近圭田的消息，省委通知女红军归队转移。女红军毫不犹豫地收拾好行装，从床上抱起孩子对范其标夫妇说：“大哥大嫂，孩子你们抚养他，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孩子是我的人，也是你们的人。这里我替孩子向你们行礼了！”她说着，深深地向范其标夫妇鞠了一躬。

“可孩子……还没名字呢。你是他母亲，就给孩子起个名字吧。还有……我们还不知道唐同志你的名字……还有孩子他父亲……”范其标说得眼里泪水打着转。

“那就叫他‘小定’吧。”女红军略略一想说，并掏出一个纸条：“这是我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革命胜利后，我若活着，会来看孩子。如果我未能再来，就说明我牺牲了，请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女红军说完，又坚持留下了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和一个布包裹袋子。

范其标的妻子聪秀妹再也忍不住了，抽泣着对女红军说：“老妹子，快别说这些。你会回来的，我们和孩子等着你……”

女红军就这样走了，把孩子小定留在了圭田范家。

范其标夫妇没有孩子，他们决心冒着生命危险把小定养大，等待这姓唐

的女红军回来。他们带着小定经历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索盘查。躲了一阵后，他们就称小定是自己生的。乡亲们也共守秘密，众口一同咬定小定是范家所生，使小定免遭“斩草除根”的厄运。

作为范家的孩子，按辈份，小定属于“家”字辈，便定名“范家定”。他们逢年过节，总是在桌上多摆一副碗筷、多留一个座位，一直盼望着那个姓唐的女红军——他们心中的亲人到来。可是，一晃 18 年过去，解放都 3 年了，小定都长大了，可女红军却一直杳无音讯……

1952 年除夕夜里，团年饭上，范其标在那个多摆的酒杯里斟满了家酿的米酒后，郑重地让范家定把他洒在天井沿上，然后泣不成声地对范家定说：“孩子，你满 18 岁了，这是为你生母摆下的，我们等了她 18 年了呀！孩子，你不是我们亲生的，该让你知道了……”

听了父母所讲的往事，范家定惊呆了：眼前天天在一起的爸妈，原来不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我居然只是他们的养子？我的母亲是位女红军！

从这天开始，接过可敬的养父母拿出的生母当年留下的物品，范家定开始了他艰难的寻亲生涯……

范家定最先着手的是生母当年留下的那张写有家址的字条。他按地址给湖北武昌写信，然后望眼欲穿地等待，可收到的却是退信——查无此址。

他到处寻找蛛丝马迹，有一丝一毫的可能，他就写一封信。可是，没有一封信给他带回信息。那些年，他不知写过多少信，不知间讯、走访过多少老红军、老干部，都毫无结果……十几年过去，十几年失望。他常常对着母亲留下的物品呆想。

60 年代初期的一天，他又翻出看过无数遍的那个布包裹细细地抚看，突然惊奇地发现上面有隐隐约约的墨迹，可怎么拨弄也看不清字迹。

养父母这时想起布包裹是染过的。他们说，当时布包是白色的，上面有毛笔字，不识字的他们怕这些字会暴露什么被敌人发现引起麻烦，危及小定的安全，便把它染成了蓝色，隐去了字迹。

如何使布包上的字迹显现出来呢？家定到处求教。后来，他在县公安局的同事启发说：“你不妨将布包浸在漂白粉液中，或许可能褪去蓝色看到字迹。”

不管这法子行否，家定都决定一试。他干脆弄湿了有字迹的那块，并洒上一把漂白粉。一洗，唉呀！布包裹上出现了几行漂亮的毛笔字：

送 胜利县平安区琵琶龙乡卫生材料厂唐一真 同志收（内衣料两件）
一九三三、五、六号。

“唐一真？！”母亲不是姓唐吗？莫非母亲的名字就叫“唐一真”？！显然这是另一个人寄出的东西，这个未留姓名在包裹上的人，是不是那个不知名的生父？……一连串有机组合的问号刻在家定思亲心切的心灵上。他预感到，这几行字和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或许可以将自己带到生父母身边！

有了线索，家定到处请教求助。一次，一位者同志推荐他向当时的广东省委副书记李坚贞查询。闽西革命战争时期，李坚贞是第一位女县委书记。范家定赶紧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包裹上的字，通过在广东省公安厅工作的长汀人介绍，终于和李坚贞联系上了。李坚贞回信肯定他说：“‘唐一真，是唐义贞的谐音化名，唐义贞同志是陆定一的亡妻。’”

范家定接信后大吃一惊：我的生母难道就是著名的红军女烈士唐义贞？那么，现在中央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岂不是我的生父了？

范家定心中已经认定唐义贞就是自己的生母了。但他又不愿相信。他渴望生母活着，而唐义贞这个伟大的女性据史料记载早在30多年前就壮烈牺牲了啊！

然而，范家定明白自己终究要接受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只有与陆定一联系上，才能认定，才能弄清。况且，还有一个同样令他激动、兴奋、焦急的问题需要弄清：陆定一自己的生父吗？

一切似乎很快就迎刃而解。可是，正当范家定要与陆定一接上头时，“文革”开始了，陆定一被“炮打”、“火烧”，送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13年！

有形与无形的障碍，就这样令人悲怆地横隔在范家定与他敬慕的他还不能最后认定是父亲的陆定一之间，一时难以逾越……

1981年底，陆范家定看望父亲时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知道生母唐义贞牺牲的确切时间、地点、情景。75岁的陆定一因此对唐义贞和女儿叶坪更加怀念。他决定把唐义贞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写下来，作为对烈士永久的纪念。于是，有了《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一文，发表于福建出版社出版的《风展红旗》第二辑。文中写道：

唐义贞烈士，所生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名叶坪，1931年12月30日生，长征时寄养在于都。对这个孩子，我尽了力，从1937年找起，到现在没有找到。如果她在，应该是50岁了……

寥寥几句，为5年后父女的重逢打下了基础。

1987年的一天，赣州南方冶金院资料室的黄玉香整理资料时，无意翻开1982年出版的《风展红旗》一书，看到了这篇文章，联想到教师赖章盛的母亲叶坪的身世——1981年，赖章盛刚毕业时，叶坪常来看儿子，没事便与黄玉香聊家常，唏嘘过他苦难的身世，黄玉香读了这篇文章后，立即激动地把书交给了南方冶金学院社科系讲师赖章盛。

赖章盛——叶坪和赖普恩的儿子，读罢陆定一的《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一文，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索笔给陆老写信。信中说道：

文中谈到您和唐义贞烈士的两个孩子的情况，得知您的女儿叶坪仍无下落。这使我联想起我乡下母亲的身世。我的母亲也是红军长征前留下的子女，现在仍不知亲生父母是谁。但从姓名、年龄，寄养地点和时间看，我母亲与您失散的女儿叶坪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陆定一面对来信认真地思索着，并与唐义贞的八妹唐义慧商议。70高龄的唐义慧老人，正为一直找不到姐姐的骨肉而耿耿于怀。唐义慧说：“不能失之交臂了。当年，您让我验证的那张照片。我说不大像，如果这个相中人真的是叶坪，那我可是一句话误了您们父女几十年呀！”

陆老认为八妹的意见对，随即函请江西省政府再次代查。同时，叮嘱自己与唐义贞在长汀的儿子——陆叶坪的弟弟陆范家定协同江西省政府核实。

家定来到江西于都县禾丰乡库心村上库，看着从菜园里被叫回的叶坪，

怦然心动！活脱脱父亲的容貌！他顿时感慨万千：自己住的长汀和这于都只不过百十公里路程，50年来姐弟之间竟然“咫尺天涯”啊！

“当年，你是怎样称呼张德万的呢？”他问。

“听我养母说，我叫他‘妈妈’。”她答。

“张德万是个男同志，你为什么称他妈妈？”

“不知道。”

她怎么会知道呢？那时她才3岁，那是母亲50多年前为她留下的寻亲的“情饵”！家定听了叶坪的回答，证实了父亲要核实的事实。但是，他没有轻易把这个判断即时告诉姐姐叶坪。

调查结束了。在等待父亲陆定一决定的时候，家定了解到姐姐因调查引起失眠，他显然有些负疚了，委婉地告诉赖普恩：“赖同志，好好照顾您的妻子，叫她不要多想了。”

赖普恩缄默地点头，看着这位不曾暴露身份的调查人员，他记着小女儿赖慧竹说了这么一句：“爸爸，那些人当中有个男的好像妈妈哩，他是谁？”

1987年11月30日，81岁的陆定一领着53岁的儿子家定、76岁的八姨妹唐义慧来到南昌，和他那28岁参加长征时没来得及看一眼就离别了53年的女儿重逢。当家定在叶坪家中再次出现，叫叶坪一声“姐姐”时，叶坪呆了，许久许久没有说出话来。

陆定一老人则蹒跚地迈向想念了半个多世纪的女儿。当了祖母的叶坪，在他眼里还是那个3岁的娇娃。“啊，是真的一真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陆定一一手执着女儿那双长茧的手，一手时而抚摸女儿那苍白的头发，时而拍拍女儿消瘦的肩膀，不敢相信似他说：“孩子，53年前，我把你扔啦……，不要啦……现在，又捡回来了——到底捡回来了！”

一对离散了半个多世纪的父女，终于重新团聚了。

高级工程师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八姨婆唐义慧，则在保健医生的监护下来看望唐家曾殚精竭虑苦苦寻找过的“坪坪”。

当年，失去爱女的外婆企望能找回女儿的骨肉，天天念叨外孙女。渐渐地，老人家失望了，嘱咐任湖北艺专校长的长子唐义精：“可怜的外孙女，我可能见不着她的面了。你就画张坪坪的像，放在我身边，也好让我天天看上几眼。”

为了满足老母的心愿，唐义精按照妹妹义贞小时的样子，画了个长着两根小辫的小姑娘。老人家就常常含泪对着画像呢喃：“坪坪呀，你说话呀，你在哪里？”她没有等到见到叶坪，连唐义精也未等到。如今只有唐义慧为父母兄姐代享这份迟至的喜悦了。

春节，这份喜悦又感染到了叶坪的“爱外婆”——邓颖超。

这年5月，叶坪与丈夫、小儿子进京探望父亲。陆定一领着他们上“爱外婆”家拜望。“爱生”失而复得到了眼前，邓颖超抓住叶坪的手高兴他说：“你是我的爱生哩。我见过小时候的你，现在终于又看见你了。相隔50多年，不容易，不容易哟。”

陆定一因此感慨地对儿孙们说：“应该记住：我们之所以有今天，一是因为革命胜利了。……没有千百万烈士的牺牲，我们能相见么？二是因为老区人民，爱党爱军，心地朴实，道德高尚，否则叶坪和小定不死也早已沦为乞丐了。第三，才轮得到亲属情谊和各种个人偶然性的东西。”叶坪和家定记着这话，始终不张扬自己的特殊。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陆叶坪一家始终

生活在于都。她有三男一女，孩子们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平平凡凡而幸福地生活。

陆范家定呢？他遵循父亲的意愿，一直生活在长汀养父母身边。养父范其标 1989 年 79 岁高龄时辞世，养母聪秀妹 91 岁依然健在。妻子是养父母当年为他抱养的童养媳，他们共有三男三女，也已孙儿满堂。最感人的是，这位退休老人十分敬仰从未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革命父母和当年冒死收养自己的养父母，他除了让三个儿子都姓“陆范”外，在三个女儿的姓名上也表达着他对生养父母的敬爱：大女儿叫范火金，二女儿叫唐继贞，三女儿叫陆承贞。在这个一家六姓的家庭里，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除了第三代，全家都是四都乡音。

如今，在福建的四都和湖北武昌都有一所“义贞小学”，陆范家定很欣慰，虽然记忆中没有生母面容的笑貌，但他看到了他寻找到的母亲的精神正在他的后代人和这个社会中继承受着。1996 年 5 月 9 日凌晨 5 时 45 分，陆定一在北京逝世，终年 90 岁。这位当年蒙冤中南海的老革命，晚年不但在政治上获得新生，而且老有所得，可谓“双喜”临门。

